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2017年第1期

总第二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期：总第二期（2016年11月—2017年1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辑：孟繁之 谢宁

编务：陈天传 关雪 崔璨

摄影：刘学红 吕莘 杨扬 等

装帧设计：王瑾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通讯

2017年第1期 总第二期

目录

01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 [10] 李伯重：停滞与创新——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 02
- [11] 许宏 V.S. 何努：“最中国”——陶寺与二里头 04
- [12] 伊佩霞：宋代的榜谕告示 07
- [13] 李爽学：明清西学与文学 09
- [14] 傅汉斯：汤若望译《矿冶全书》（1556）——东西方大分流中的有用知识 13
- [15] 白谦慎：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 16
白谦慎：晚清官员与书法 20
- [16] 佐川英治：北魏六镇史三题——设置、变质、崩坏 24
- [17] 汲喆：作为宗教实践的朝圣——在事实与隐喻之间 31
汲喆：回到日常与重建当下——禅宗与现代人的自我建构 33
- [18] 亚当·罗伯茨：当代世界民族主义者的复兴——基于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以及其他事例的探讨 36
- [19] 卜正民：测绘于浩淼之上——明时代的航行与全球舆图学 38
- [20] 罗柏松：“回光偏向”——西方对《道德经》的挪用与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交流与多重误解 40
- [21] 汪荣祖：史学的主体性问题 42
汪荣祖：论环球史学 44

- [22] 李淞：“形式的深意——再读《重屏会棋图》” 47
- [23] 刘皓明：围绕着 allegoria 的中西诗论之争 50
- [24] 包弼德：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 52
包弼德：传记与著述——12 至 17 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 54

（二）未名学者讲座

- [06] 陆胤：从“记诵”到“讲授”——近代中国的读书革命 56
- [07] 韩巍：西汉竹书《周勃（训）》与“黄老道家” 61
- [08] 王洪喆：信息时代的人与机器——维纳论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延伸 66
- [09] 程乐松：日常中的长生——道教的生命技术与现代困境 71
- [10] 张海：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考古学的观察 75
- [11] 黄淳：品位之争——罗斯金《现代画家》的创作背景 81
- [12] 张长东：税收与国家权力的韧性 85

（三）北大文研论坛

- [08] 阎步克：“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 88
- [09] 刘斌 V.S. 孙周勇：良渚与石峁 92
- [10] 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度量衡 98
- [11] 常怀颖：殷墟世界的声色犬马 100
- [12] 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 102
- [13] 来国龙：百年“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破坏 103
- [14] 魏斌：“山中”的六朝史 107

- [15] 郝景芳：从《北京折叠》到《不平等的历史》 109
- [16] 郑岩：另一种绘画史——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壁画 111
- [17] 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 113
- [18] 师说，我与宋史 115

（四）文研汇讲

- [01] 祁小春：《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 119
- [02] 常怀颖：何来金镶玉——早期玉石器矿、作坊的发现与殷墟早期的绿松石镶嵌 125
- [03] 赵宪章：“文学图像论”臆说 127
- [04] 汲喆：世俗化理论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 129
- [05] 罗祚楠：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意识——以北宋神宗时期盐法为例 131

135 专题会议

- 北京论坛：“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136
-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142
- 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 146

153 静园学术

- 凝聚议题恳谈会 154
- [01] 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 154
- [02] 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 156
- [03] 东方视角下的西方文明 162
- [04] 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 164

内部交流

- [01] 钱理群教授新著《岁月沧桑》研讨会 166
- [02] “艺术史研究与发展”恳谈会 169
- [03] “数字人文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170
- [04] “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座谈会 172

静园雅集

- [03] 黎晟：图示与功能——南薰殿宋代帝后像的图像分析 174
- [04] 黄小峰：宋画的迷雾——对若干传世画作断代的再检讨 176
- [05] 白谦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遭际——从吴大澂说起 178
- [06] 王纪宴：交响乐的谜语——从贝多芬到马勒 181

185 文研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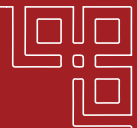
- “清新风气一流标准”：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学者项目第一期圆满结束 186
- 历史学家包弼德访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192

197 文研纪事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10

李伯重： 停滞与创新——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



2016年11月2日下午，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邀请，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李伯重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作了题为“停滞与创新——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的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担任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担任评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数十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讲座。

李伯重教授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权威学者，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现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国际经济史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是经济史学科最重要的国际学术机构之一，在其第14届大会（Helsinki，

Finland, August 2006）上，李伯重教授当选为该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其成立以来惟一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的华人学者。李伯重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历史：南宋后期至清代中期的江南经济》、《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等。

讲座起始，李伯重教授谈到以“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演变”为讲座题目的原因：一是目前学界，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二是自身做经济史，信息是市场的要素之一。

信息、传播与信息传播方式等概念，需要厘清与界定。信息一词，古今用法不同，在古代是音信、消息的意思。现代社会中，信息泛指情报、消息、指令、数据、信号等

有关周围环境的认识。“传播”一词是由英文 communication 翻译过来的，大体被解释为传送、传递、传播、传染、通讯、交往、交流、信息（尤其是指消息）、交通工具、交通设备、通讯系统等。李伯重教授以时间为线索，勾勒出从古代到当代传播方式简史，指出古今传播方式有很大不同。

随后，李伯重教授就“谁需要信息”的话题展开分析。政府需要的信息主要为政治军事信息。中国古代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政令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商人需要的信息主要为商业信息。李伯重教授以晋商和徽商为例，指出商人需要把握市场信息，审时度势，从而作出准确高效的决策。

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的政府信息发布方式主要有公文、布告、规章条例、章程与则例、邸报、口头传递、燧烟传递、邮驿等。李伯重教授列举大量的史料，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政府信息发布方式的历史沿革及作用。

与政府信息发布方式相平行，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更大的发展与创新。在传统帝制时期，政府的信息系统不对民间开放，普通人的书信主要靠路过的商客、僧人、文人等云游之人捎带递送。唐李朝威小说《柳毅传》中“柳毅传书”即反映这一历史现象。中国古代商人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有：口头信息交流、茶馆（茶坊）、会馆与公所、民办报纸、民办邮政等。李伯重教授列举大量实例，如徽商信客，受雇于会馆的“过塘行”，主要负责徽商书信、银两、包裹等物件的传送，根据所传递的物件

贵重度和路程长短获得报酬。

最后，李伯重教授比较“官”、“民”传播方式演变，指出政府经办的传播方式，是量的扩大，并非质的改变。从民间来看，出现很多创新，如报纸、民信局、茶馆等。明清时期商业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大，以致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或简称为“信息革命”。中国既有停滞的一方面，也有创新的一方面。因而，就中国民间信息传播创新的角度而言，黑格尔、费正清、伊懋可、黄宗智等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范式是无法适用的。

倪玉平教授随后评议李伯重教授讲座，认为讲座有四个方面特点：信息量大，提纲挈领，古今中外比较；非常前沿，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非常有理论深度，视野非常宏大；李伯重教授对自己的研究不断超越。倪玉平教授同时提出应关注中国古代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非主流信息（如谣言）以及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加密情况。

在互动环节，李伯重教授就“近代早期”概念、报纸受众率、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最后，邓小南教授指出，自己正在主持“7—16世纪信息沟通和国家秩序”的科研项目，李教授提供了讨论重要问题的不同的维度，对信息、传播等概念建立了阐释链条。邓小南教授认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关节”，由于技术问题及人为操纵，信息会发生变化。在具体研究中，要关注信息的源头，以及信息集中到某个部门之后是如何处理的。

（撰稿：李灵均）



11

许宏 V. S. 何努： “最中国”——陶寺与二里头

2016年11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许宏与何努两位考古学家应文研院之邀，分别就二里头和陶寺两个遗址，进行了一场“最中国”之辩。在这场辩论式讲座中，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数百位师生前往观“战”。

许宏和何努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先生现任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著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等。何努先生则担任社科院考古所山西第二工作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负责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等。

在开场介绍中，主持人播放了视频，视频中包括许多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和陶寺遗址的旧照片，以此视频向曾经和现在活跃在这两处遗址的考古人致敬。

在这两处遗址中，究竟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还是陶寺是“最初的中国”呢？两位学者接下来就此进行了陈述。

首先由许宏先生对“最早的中国”进行介绍。他在“邦国——王国——帝国”三大历史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将中国上古史分为前中国阶段和中国阶段，前者为无中心的多元，后者为有中心的多元。然后在宏观历史中对二里头进行了定位，他认为二里头是中国历史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玉石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节点，并且在诸多制度上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

他指出，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车辙，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礼仪用青铜器等，还发现有“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群、随葬奢侈品的墓葬，其遗址规模和遗迹现象，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了王国气象。

二里头的文化在当时影响力很大，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风”，各地选择性地向二里头看齐，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许宏先生对此举例加以说明，如玉器方面，云南地区发现有二里头风格的牙璋；青铜器方面，爵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直贯穿中国历史，而最早的爵发现于二里头；建筑方面，大都无城、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轴线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头。这些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迹象，显示了其中心地位。

基于以上，他认为二里头既具有国之气象，又处于中国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其若干元素还被后世继承，故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当无疑义。

接下来，由何努先生对“陶寺和最初的中国”进行了介绍。他认为考古学判断国家性质首先要研究都城的微观聚落形态，并提出确认都城遗址的七条标准。然

后他依次介绍了陶寺遗址早期的墓地、早中晚三期的城址、宫城内的重要发现、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平民半地穴式房子、观象祭祀台、城北IVFJT1~3夯土基址、中期王族墓地、中期官僚墓葬、城址东南手工业作坊区、城址窖穴区的基本情况，并指出，到了陶寺晚期，其城墙、宫殿、王陵被破坏，体现出当时的政治报复行为。

在介绍观象祭祀台时，何努先生曾和天文学家进行过合作研究，通过实际模拟和天文计算，得到20个节令，说明以农业立本的陶寺，已经具备了依天文历法指导农事生产的核心软实力，其文明程度毋庸置疑。而且陶寺城址中有祭天的天坛和祭地的地坛，存在“四象限方以类聚”的现象，说明其城市建制体现了基本的宇宙观。

何努先生认为，陶寺作为一个国家，一定存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关系，他选择从驿站遗址入手从考古学上证明这种关系。从遗址本身看，他指出陶寺的驿站遗址规模较小，有灰坑和房子，并且灰坑没有发现生产工具，反而出土大量炊器和仓储器；从地理位置看，何努先生认为陶寺的驿站遗址位于侯马南部到陶寺的交通线上，认为这是我们判断陶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个指示点。

在“中国”的问题上，何努先生认为“中国”之“中”应指“地中”的概念。他展示了陶寺中期22号王墓中发现的漆圭尺和游标玉琮，认为圭尺标示的夏至影长长度与文献记载的“地中”相符，游标玉琮与甲骨文卜辞“立中”相契，从而断定陶寺为“地中”。在此基础上，他以陶寺城址

的地中所立中表为基点，分别按照陶寺城址所处纬度线和经度线，测量寻找到陶寺文化所处欧亚的东西两端点和南北两端点，找到了陶寺文化的东西南北四表。用数据论证了陶寺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在互动过程中，许宏先生解释了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确定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和面积。何努先生就圭尺和“立表测影”、陶寺为地中的“四表”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并对李猛教授提出的驿站、陶寺礼器与后代礼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讨论中，何努先生回答问题时提到，二里头是中原地区最早的王朝国家，它的文化突破了自己的文化圈，其文化因素辐射到了外埠；而陶寺是邦国，它的势力范围不可能跨区域。他承认二里头已经突破了陶寺的阶段，但指出我们不能用文化圈的大小作为判断国家与否的因素，而要从微观角度分析国家形成的各项要素。从这方面看，陶寺是符合国家的形成标准的。许宏先生则指出，陶寺是邦国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它有大邑而未成大国；其城圈几乎囊括了全民却没有发现王族墓地，也未发现铜器作为墓葬高等级随葬品的迹象；它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小的政治实体，与后面的王朝文明形成鲜明对比。

在“最中国”的问题上，何努先生认为本初中国的概念在陶寺就形成了，只是这个概念后来被二里头发扬光大。而严志斌先生则倾向于二里头，他认为陶寺遗址是邦国之尾，而二里头是王权之初，并且特别指出玉钺在王权问题上的研究意义。邓小南教授则指出，怎么认识中国的概念

和中国这个概念还是有很多差异，“中国”究竟是王朝形态，还是地理之中，这是一个概念的分异问题。

在考古学理念的互动交流中，李零教授提出跨界的问题，提出考古学研究不只是二重史证的延续，考古学家需要做很多慎重的的工作，凭考古本身说话。渠敬东教授则认为，对早期文明形态的观察和研究，需要建立在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之上，以此支持整体学术的布局和研究。孙庆伟教授指出，考古学家应该思考如何把考古材料消化掉以后，换成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模式传递给大众；如何把考古材料转化为史料，让考古学家们能够在史学研究上有更多的发言权。许宏先生提出，考古学擅长的是宜粗不宜细的长程回答，只有在学科内部做扎实，尽可能地把详实的考古学材料披露出来，才能让更多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参与到考古学研究中来。他还指出，在二里头遗址夏商问题的争论中，为商还是为夏，更多的不是因为考古学材料的变化导致理论的转变，而是学术主流的转变导致理论的变化。但是主流的河东河西之变甚至做不到三十年，所以他不禁要问，哪一种主流观点更接近于史实呢？

最后，孙庆伟教授总结道，考古学家应该不忘初心，承担起重建上古史的使命。考古学科应该做出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使得更多考古研究成果能被其他学科吸收，从而取得共同的进益。

（撰稿：李可言）

12

伊佩霞： 宋代的榜谕告示

2016年11月1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应邀作题为“宋代的榜谕告示”讲座。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出席，数十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讲座。

在开场介绍中，邓院长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伊佩霞教授在中国中古时期（middle period）的家族史、妇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贡献，充分肯定了她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而本次讲座中伊佩霞教授带来的是她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一问题也与近来国内史学界一些学者对帝国内的沟通方式与社会秩序的关注有着密切联系。

伊佩霞教授首先以宋代史料中记载的三个具体事件为引子，引出了她对宋代官方向民众发布的榜谕的思考。伊佩霞教授的研究主要以《宋会要辑稿》、《作邑自箴》、《靖康纪闻》、《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朱熹文集等五种重要史料作为材料，主要目的在于解答有关榜谕告示的一些基本问题：



宋代官方会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目的张贴文榜告示民众？张榜的行为是否随时间变化而有发展变化？这一行为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

伊佩霞教授指出，宋代的文榜一般被粉刷或张贴在路府州县衙门对外的墙壁上，或是张贴在人员聚集的要路、热闹之处。这与榜文内容需要得到民众周知有关。而官方出榜告谕民众也可能是出于多种目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同。从《宋会要辑稿》保留的中央政府要求榜谕民众的命令来看，其榜示内容包括招募兵士、招募商人入中粮草或是发布一些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经济、法律命令。《宋会要辑稿》显示出似乎中央

政府是榜谕的主要发布者,但是《作邑自箴》显示,县官不需要上级指示就可以发布很多文榜。材料提到,地方官员上任后应当张贴的榜文,多是抚慰民众、旌善罚恶或是在征发赋税过程中晓谕民众的内容。《靖康纪闻》显示在战争期间,榜文可以向民众更新局势的进展,发布关于战争动员、食品分配等问题的命令。而对朱熹而言,张贴文榜也是他在辖区内敦化风俗、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

那么,向民众张贴榜谕的行为在历史上是否随时间发生演变呢?就这一问题,伊佩霞教授是从儒家经典的记载开始说起的。《周礼》中有“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灋,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的说法,这很可能并非是周代实际有过的制度,但这也是儒家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资源,朱熹便对这一内容有所重视。对榜示民众比较确切的记载出现在汉代,《汉书·贾山传》有“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疾病扶杖而往听之”的记载。唐代也有布告天下、宣布中外的说法,使用的说法与宋代相似,但是大多数是指对官吏的告示,而不是对一般民众;相反,唐代记载中会有一些针对官员并不将信息告诉一般人的抱怨;到了9世纪后期、10世纪,政府的诸多命令开始到达一般人的范围,但似乎都是有关法令的问题。

而在宋代,张榜行为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个重要变化是文榜更多地使用印刷品,这使得政府命令能够更快地传达出去,并使更多人有机会知晓其内容。宋高宗是这一变化的主要支持者,他多次要

求行下的文榜要镂版。另一个变化则是,在法令之外,面向民众的榜文承载了更多的教化用途,朱熹正是这一变化的积极倡导者。伊佩霞教授提示我们,这些变化可能同宋代印刷业的发展有关,且这样的行为可能使得榜文的作者与读者都对自己参与了政治进程而产生满足感。

在揭示了上述变化后,伊佩霞教授开始转而评估张榜行为的实际运转情况。在宋朝,民众似乎一般不会被聚集起来听从官府的统治,然而很多消息仍然传布很快。那么,读写能力有限的民众如何接受到以文字为载体的榜示中的信息?一般在官府出榜以后,会有很多民众自发聚集来观看,其中识字能力较强者便可以口传方式告知读写能力较差者,榜文内容往往以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进入民众之中。因此,官方经常强调榜文要大字、清楚,以便识字者认读。

那么,作为一种官府向民间传递信息的方式,张榜的实践效用如何?伊佩霞教授就此问题,将宋代的情况与今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做了对比。比起今天多种媒介的及时传播,我们当然不能对宋代官府信息传播的速度、效率抱有过高的期待。但是比起同时期甚至稍晚时候的欧洲,宋代还是自有其特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印刷术的不同影响:在欧洲,印刷术带来了具有更多新消息的小册子,而张贴的告示还是以手写为主;而且在欧洲,政府命令的传播大多与使者到地方口头传播相结合,民众聚集在公共场合共同聆听消息,这种情况与宋代非常不同。伊佩霞教授提示道,在这样的行动背后,除了传递消息

之外可能还要为其他目的服务。

讲演结束之后,在场的各位师生踊跃地向伊佩霞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与见解,讨论气氛热烈。刘后滨教授比较关注阅读现场、解读者与抄写者的政治交流,提出榜谕发布之后谁来解读、谁来抄写以及乡村文化精英与政治领袖的形成有何关系等问题。伊佩霞教授对此回应道,印刷品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谁来抄写的问题,而民众的口耳相传可能是熟人之间奔走相告,也可能只是临时询问偶然遇到之人,因此张榜的行为与乡村政治、文化精英的

形成之间似乎较难建立比较确实的联系。

另有师生也就榜谕告示与识字率、印刷术的关系,其他时代、其他类型的史料在研究这一问题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宋代官方的信息类型与传播形式等问题与伊佩霞教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不知不觉间,橘色的夕阳已经映入窗帷,本次讲座在到场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杨光)

13

李爽学：明清西学与文学



2016年11月1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外文系兼任教授李爽学应邀在文研院作题为“明清西学与文学”的讲座,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主持,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与了讲座研讨。

本场讲座包括“圣传与佛传”与“明末耶稣会士笔下的荷马”两个议题。讲座的前半部分,在简要回顾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脉络后,李爽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欧洲证道故事的起源和发展。

耶稣会的证道故事是西方修辞学的产物。为了吸引更多的信众，神父在证道时常常引用《伊索寓言》、中世纪神话故事甚至是笑话来作解释。直至中古晚期（约15世纪），证道故事在欧洲被教会禁止讲述，而在入华的传播过程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自16世纪末耶稣教会传入至18世纪被禁，约250年的时间里，大量的证道故事因注解《圣经》及护教所需被传教士引入中国并广泛传播，利玛窦的《畸人十篇》即为此类代表。

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爱重之深于己，其一爱重之如己，其一甚菲薄，希覩面焉！忽遇事变，国主怒逮讯之，诏狱。士闻之，急走其上友，诉己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与他友有嬉游之约。当候于此，不得动移。祇能送汝衣一袭，與一两（辆）耳。”士怅然叹息则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诉己患：“祈勿袭前友，特脱我于厄也。”友曰：“今日适远行，不暇，唯得偕汝行于中途，远则至公府门耳。讯狱在内，吾不得与闻也。”则益窘而悔曩昔择友之误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实，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其所，无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负状，又自[忏悔道]：“曩之菲薄，请勿介意也。唯幸念一日之雅，愿微（唯）大德无弃我矣。”友曰：“吾故（固）寡交，恒念汝。汝今勿忧，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济，为好我者劝也。”言毕，即先行趋王所。此友之宠于王也，异甚，则一言而释士，竟无虞矣。

——利玛窦《畸人十篇》（1608），见李之藻辑《天学初函》（1629），1:160-162

上述基督教“一士三友”的证道故事脱胎于英国中世纪著名宗教戏剧“Everymen”，在内容和故事结构上却与印度佛教经典《杂阿含经》中“一夫四妇”的故事极为相近。

第一妇为夫所重，坐起行步，动作卧息，未曾相离。沐浴庄（装）饰，饭食五乐，常先与之。寒暑饥渴，摩顺护视，随其所欲，未曾与诤（争）。第二妇者，坐起言谈，常在左右。得之者喜，不得者忧；或致老病，或致斗讼。第三妇者，时共会现，数相存问。苦甘恣意，穷困瘦极，便相患厌。或相远离，适相思念。第四妇者，主给使令，趣走作务，诸剧难苦，辄往应之，而不问亦不与语。希（稀）于护视，不在意中。此四妇夫，一旦有死事，当远从去，便呼第一妇：“汝当随我去。”第一妇报言：“我不随卿。”婿言：“我重爱无有比，大小多少，常顺汝旨，养育护汝，不失汝意，为那不相随？”妇言：“卿虽爱重我，我终不能相随。”夫便恨去，呼第二妇：“汝当随我去。”第二妇报言：“卿所爱重第一妇，尚不随卿，我亦终不相随。”婿言：“我始求汝时，勤苦不可言。触寒逢暑，忍饥忍渴，又更水火，县官盗贼，与人共诤（争）。僮僮咋咋，乃得汝耳。为那不相随？”妇言：“卿自贪利，强求为我。我不求卿，何为持勤苦相语耶？”夫便恨去，复呼第三妇：“汝当随我去。”第三妇报言：“我受卿恩施，送卿至城外，终不能远行到卿所至处。”夫自恨如去，还与第四妇共议言：“我当离是国界，汝随我去。”第四妇报言：“我本去离父母，来给卿使。死生苦乐，当随卿所到。”此

夫不能得可意所重三妇自随，但得苦丑不可意者具去耳。

——《雜阿含經》，

見《大正新脩大藏經》，2:495-496

李爽学研究员认为，虽然无法给出实证性的论据，但对上述两则故事间的关系渊源自己仍然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因为佛教的譬喻故事并非完全是释迦摩尼在世的发明，而是大量取材承袭于历史，而在历史上，亚历山大东征曾到达印度北部，印度和古希腊因战争、移民、宗教交往等方面的因素产生密切联系，故而导致文学内容上的相互影响极有可能。

与此类似的还有“圣母的奇迹故事”与“浮士德的传奇”。圣母在基督教的地位颇为崇高，基督教来到中国翻译的第一本书、传教士高一志所著《圣母行实》一书便是讲述圣母的。在本书第三卷中，记载了百余条圣母的奇迹故事，其中“一贤士入异境”的故事可谓浮士德传奇的基本原型。李爽学指出，此类玛利亚式的人物故事，在17世纪的中国至少可以看到4篇相似但有区别的记载。

贤士某，素备圣德，钦崇圣母，每行串经功课惟谨；积久动众，教宣内外。会本郡教主卒，众议共推贤士。贤士固辞免，执履行教如故，德益修。恶徒深嫉之，诬以他罪，讼于官。贤士不辩，触逢官怒，失职败名，举国兴谤言。贤士始不堪，忧疑不止，遂为魔徒巧诱，入一异境，伏叩巨魔，冀雪其枉；甚且从魔命，手立背弃天主血契。魔喜曰：“子且归，寻如意矣。”谄哉魔也！盖是时主教者，已旋悟其冤，

魔知之，故居为己功耳。寻且旌其德，复其职，庶民亦复从如初。然贤士至此，仍不多魔功，自以背主违教罪重，心卒不安。于是自许自责，投入圣母案前，恳乞提祐，涕泣悲号，凡三昼夜不止。忽见原书血契，从空坠入手中。贤士幸消重罪，即趋主教之前，告解求救；更图补失倍功，登高临众，自鸣其非，并扬至慈圣母功德之灵验。言毕，辞众归室，投跪圣母台前，叩谢大恩，誓死不忘，寻踪所获血书之所而逝。后主教者，赐瘞于圣堂之隅，仍列于圣品焉。

——高一志（Alfonso Vagnone）《圣母行实》（1624/1629），载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3:1445-1446

李爽学研究员随后以在华传教士龙华民所著基督圣人传记《圣若撒法始末》和佛教《普曜经》为例，详细阐述了“圣传”与“佛传”的关联。

公元17世纪初，耶稣会在华初期仅凭小本的《教义问答》不足以生动形象地向中国民众传达教义。广东韶州居民列举道教道藏经的丰富内容以质疑基督典藏，故而传教士龙华民翻译基督圣人传记《圣若撒法始末》，描述了从小在金宫中抚养长大、从未见过世间丑恶的王子若撒法，偷偷走出宫殿，亲见人世生老病死，最后遇见一位名为巴拉姆的修道者，在他的指引下皈依基督的故事。这与佛教《普曜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极为相近，遂很快为当地中国居民接受。

李爽学认为，佛教的故事之所以能西传并成为西方圣人传记，与两大宗教密切相关。其一，发源于波斯、向东西

方传播的摩尼教。摩尼教在印度北部传播时将佛祖的传记带回波斯。其二，在基督教中被打为异端的“景教”。景教于6世纪经印度北部从摩尼教接受《普曜经》的故事，随后在7世纪传入中国。简言之，摩尼教把《普曜经》带入中亚、西亚，景教将之基督教化。在辗转不同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普曜经》的故事先后被译成格鲁吉亚语（“The Balavariani”，6th century in Georgian）、希腊语（7th-8th century, Barlaam and Ioasaph）、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其文学性不断增强，并在公元14世纪经由图书馆藏书员翻译成拉丁文（Barlamuset Iosaphatus）。此后，该圣传在西方广泛传播，欧洲大陆、英国、甚至非洲大陆都有不同版本的译注流传。19世纪中叶以前，圣传在基督教会享有极高的地位，后德国学者和英国学者在1850年代几乎同时发表关于《圣若撒法始末》传记与佛教渊源的研究，经基督教会学者考证属实后，基督教会逐渐废弃每年11月27号的圣若撒法日，但在1933年，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中国学者又重新加以刊载，并相信是天主教的故事。

讲座的后半部分，李爽学研究员与大家分享了他今年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议题“明清传教士笔下的荷马”。李爽学认为，公元1632年，在传教士高一志《达道纪言》一书中，荷马第一次以错误的形式出现在中文里。

诗士实诺每谤古诗名士，而以己为大也。一日，对贤诉其穷乏，不能给二仆，

贤责之曰：汝所谤阿哩汝死后犹足食二千人，而汝犹未足供其二，乃何以大焉！

——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达道纪言》(1632), 载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 2:752

李爽学指出，上文中“阿哩汝”一词为刻工错误，应为“啊默汝”，即荷马（Homer=Homerus=Omero）的音译。李爽学认为，当时耶稣会对荷马的评价存在分歧。从上文可以看出传教士高一志对荷马并未有恶感，但另一位传教士马若瑟则对荷马持否定评价（见下引文本）。总体来说，当时整个耶稣教会对荷马存在一定敌视，只有当荷马的作品可作为寓言警示来说时才会给予正面评价，如奥德赛的故事在1630年已成为传教士笔下警示寓言的重要材料。

昔[欧逻巴]有一贤名曰何默乐（案即荷马），作深奥之诗五十余卷，词富意秘，寓言甚多。终不得其解，反大不幸[于]后世之愚民，将何默乐所诬之诸象欣欣然雕铸其形，不日攻成大庙以供之，邪神从而栖之，而左道始入西土矣。君子儒者如毕达我、索嘉德、白腊多（柏拉图）等艷然怒而嫉其蔽，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灭之。

——马若瑟《天学总论》撰于康熙年间，见钟鸣旦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26:491

古贤尝作寓言警世云：“昔地海中有妖倡曰祭儿责，居小岛屿，伏祠四方，歌唱不息。度海者或迷淫声，近岸就之，少日则变为兽类奇丑状，而不觉不回也。有

大师名曰乌利色，有智计，即豫备以蜜腊塞其友之耳，不使媚音入而感怀，乃幸免非命之灾矣。

——高一志《则圣十篇》(1630)所刻画
的Odyssey

发言结束后，李爽学研究员与参与讲座的师生们就阅读写作的学术语言、明清传教士常用语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李爽学强调，明清西学并非只有历史维度的研究，我们还应从文学角度进行探讨，进一步收集和讨论东西方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学材料，而这需要掌握拉丁语、法语、葡萄牙语、印地语等多种语言的学者共同努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指出，文研院正是这样一个提供给不同研究领域、

掌握不同学术语言的学者们交流讨论的平台机构，而对整个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沟通交流的讨论，也远远超出了单纯文学性的范畴——一种文体或故事体拉丁化后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再公布，包括最后重新走到中国——实际蕴含着不同宗教甚至文明体的重构因素，尤其是文明传播沿线同样故事文本的不同材料，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有待不同领域研究学者的共同推进。

主持人高峰枫教授最后总结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李爽学研究员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精神，并再次代表到场师生对李爽学研究员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撰稿：丁洁琼）

14

傅汉斯： 汤若望译《矿冶全书》(1556) ——东西方大分流中的有用知识

2016年11月2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斯（Hans Ulrich Vogel）应邀作了关于汤若望将阿格里科拉《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翻译为《坤輿格致》的学术讲座。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黄燎宇担任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

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担任评议，来自德国驻华使馆、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外众多学者嘉宾们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邓小南院长首先对傅汉斯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德国驻华使馆科技处处长柯玉莲博士（Julia Kundermann）向文研



院表达了德国政府欲加强与中国大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合作的愿望。在黄燎宇教授介绍了汤若望的生平并表达了对这位17世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科学技术的感佩之情后，傅汉斯教授开始了他的报告。

傅汉斯首先简要介绍了他于2015年起开始主持的研究项目“翻译会通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至晚明中国：从《坤輿格致》和《泰西水法》看东西方发展大分流”。项目集结了众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他们共同对《坤輿格致》、《泰西水法》、《泰西人身说概》、《空际格致》、《西法神机》、《测量法义》等多部西学翻译著作进行研究。此次报告的主题即这一研究项目中的第一部分：汤若望将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译为《坤輿格致》。阿格里科拉（1494–1555）是来自开姆尼茨（Chemnitz）的医生，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巨匠之一。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除政治以外，特别是对教育学、医学、计量学、哲学和历史有着广泛的兴趣，但又不囿于此。他被誉为

采矿、地质和矿物学三个新兴学科之父。这位全才学者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就是《矿冶全书》——当时第一部真正系统介绍欧洲中部采矿和冶炼技术的专著。该书以拉丁文写成，后被译为多种语言，二百多年之后仍为人称道。此书造成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书中的大量精美插图，涵盖了各种矿产资源的种类和形态、勘探、矿井和矿洞构造、采矿、井下测量技术、通风、排水、照明、选矿、矿物测定、熔化和冶炼，乃至矿场的法律问题及矿业管理问题等方方面面。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由时任光禄寺卿、主持历局的李天经（1579–1659）倡议，德国科隆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以及光禄寺录事、历局见习官杨之华和黄宏宪共同完成，但从此销声匿迹，被学界认为已在明清之际的兵火中散佚。

傅汉斯教授对《矿冶全书》译为《坤輿格致》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曾与著名的中国技术史专家潘吉星教授一起，在《东方经济史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上发表文章，详细考察《矿冶全书》在中国的流传和翻译为《坤輿格致》的情况。此后，他从未停止对这一译本寻找。2015年4月，江苏凤凰出版社的编辑韩凤冉先生发表《南图藏汤若望〈坤輿格致〉发现记》一文，宣布该书重现于世。惊喜之下，傅汉斯教授立即组织了研究组，开展了对这一抄本的研究。同时，研究组也查阅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汤若望曾经使用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原

本。傅汉斯教授介绍了南图藏抄本和国图藏西文原本的形态、批注、钤印、篇目、内容等等，由此分析了抄本完成的时代、翻译的过程以及流传、收藏和阅读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汤若望所译《坤輿格致》不仅仅依据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还参用了其他书籍，例如比林古乔（Vannoccio Biringuccio, 1480–1539?）于1540年出版的《火法技艺》（*De la pirotechnia*）。

傅汉斯教授介绍道，他希望达到的是按照严格的语言学原则和标准，结合其他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将《坤輿格致》完整地译为英文和德文。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考察《矿冶全书》的哪些内容被选择译为中文，哪些内容被改动，为什么被改动，如何被改动；哪些部分被完全忽略；哪些插图被选留；以及与耶稣会士翻译、改写的其他书籍相比，有何异同。他将着重分析耶稣会士译者的初衷和意图，中国读者的看法和理解。在研究方法上，他将利用其他学者已有的成果（如全球化进程早期耶稣会士与西学东传的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阐释阿格里科拉《矿冶全书》的翻译与会通，力求探明《矿冶全书》传入中国和译为中文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另外，傅汉斯教授将着重讨论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中的论点，指出《坤輿格致》的探讨与中西方矿业历史的比较研究为讨论东西方“大分流”的发展的问题提供重要的案例。

傅汉斯教授同时指出，他的理论框架参考了社会学家Jó hann Páll Ámason（1940–）在《争论中的文明：历史问题和

理论传统》（*Civilizations in Dispute: Historical Questions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一书中“构造世界的方式”（ways of worldmaking）理论。Ámason指出了三种构造世界的方式，即财富（wealth）、权力（power）和意义（meaning）。傅汉斯认为应该补充第四种方式，即知识（knowledge），包括有用且可靠的知识（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和科学。他接着借用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在《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一书中对“知识”的分类，即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规定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以当作对《矿冶全书》与《坤輿格致》的合适的分析工具。除此以外，他还提到了卡雷尔·戴维兹（Karel Davids）在比较中西方河流治理和知识演变的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转变”（theoretical turn）的观点。他强调了这些理论与观念都为进行中西方矿业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将解答在中国的矿冶业上也发生了认知和理论上的转变这一问题。

在主讲结束后，中国科技大学石云里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的评议。石教授首先介绍自己专攻天文史，而《坤輿格致》译者汤若望的主要工作是天文历算，在一点上，他和傅汉斯教授的研究兴趣不是“分流”而恰恰是“合流”；而数十年前，潘吉星教授对《坤輿格致》的研究，也受到了天文学家、石云里教授的博士生导师薄树人教授的帮助。这些“合流”正凸显了《坤

輿格致》的重要性。石云里教授从明朝末年天文历法研究的背景，阐述了当时耶稣会士如何作为唯一合适的人选，承担了翻译《矿冶全书》的工作，并以此稳固传教士在朝中的地位和达到传教的目的。而就在东西方世界产生大分流之前，中国和西方对有用的知识有着共同的兴趣：阿格里科拉正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例证之一，而在明代的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书籍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的出现也证明了这种趋势。利玛窦首先意识到了这种知识“汇聚”的趋势，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向皇帝建议，主张以数学为基础，然后应用到关系日用民生的各种技术上去，表现为他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所列的“度数旁通十事”。这“十事”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輿地、医药、

计时。徐光启去世后，李天经接任主持历局的工作。《坤輿格致》的翻译即是在李天经对徐光启的思想和工作的继承下完成的，被李天经视为历局的份内工作之一。傅汉斯教授的研究将展示给我们，为什么这样一种对有用知识的共同兴趣或者说汇聚，最终带来了东西方发展的分流，他的研究材料和理论框架均值得充分地肯定。之后的问答评论环节，北大历史系朱孝远教授评论道，汤若望对有用的知识的利用经过了学习、比较、改造和行动四个阶段，值得学习，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值得借鉴。

最后，傅汉斯教授总结道，他认为中国的矿冶史应该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中国矿业知识和历史的研究被严重低估，而中西方的比较研究更加具有广阔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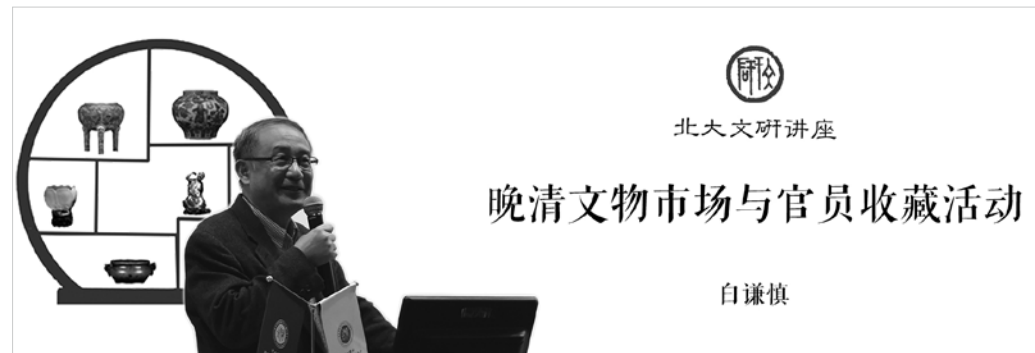
（撰稿：曹晋）

15

白谦慎： 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

2016年11月2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五期第一场在第二体育馆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以“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为题发表讲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淞教授担任主持。

白谦慎教授这些年来的研究专注于传统政治精英的文化活动，而此次讲演亦集中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862—1894）文物市场和官员收藏活动之间的关系。讲演中，白谦慎教授指出关于收藏史的研究是近年来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相当多。因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在收藏史的研究中，对文物市场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

第一个困难是研究艺术品市场和收藏活动的文献问题。作为历史研究，首先就要遇到史料问题。要谈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市场价格的问题。但是要描述19世纪下半叶的艺术品市场价格，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中国文人很少在他们正式的著作中提到艺术品的价格，很难见到收藏家比较完整的藏品价格表，记载自己购买的艺术品和古董的价格。不过，白谦慎教授发现，晚清文人喜欢写日记，现在还有不少日记幸存下来，在日记中有一些关于艺术品价格的记录。还有不少晚清文人的笔迹和信札存世，其中就有一些艺术品价格零散的记载。依靠这些零星的资料，可以粗略地重构一个晚清文物市场和收藏活动的图像。

第二个困难是关于价格的记载通常十分简略，无法得知所谈作品的尺寸，加上在很多的情况下，没有实物或实物的图片，亦无法对艺术品的质量做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样价格和艺术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不清晰。

第三个问题则是资料的不平衡。吴大澂是名人，他给名人友人写信，有时也会

提及文物的价格，这些信札更容易留存下来。他写给文物商的信札，有一些也保留下来了。但是那些文物商写给他的信札却没有保留下来。另外，文物商们在当时肯定有自己的帐簿，但至今已很难见到古董店的帐簿。

第四个问题就是地域的差别。在出土的地方价格通常会最便宜，运输到其他的地方后，价格就会贵很多。贵多少？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五个困难就是文物商的能力问题。吴大澂就说过，山东潍县的王石经曾经给他看过一些古董，价格比别人高许多。会卖东西的文物商，能把价格卖得高。文物商的能力，卖家的知识结构，都会对最终成交的价格有所影响。

而第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出不同时期艺术品价格发生的变化。这就要追踪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卖价。要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因为例子很少。

第七个问题，货币体系。我们谈市场价格，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计价的货币。但是，晚清的货币体系比较混乱。有时候用银子，有时候用洋元。各地的银子的重量、计价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不同时期洋元和银子

的比价不同，铜钱和银子的比价也不同。所以，在研究市场价格时，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因素。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受国际因素影响，银价的跌涨。正如齐白石的画在1950年代几元人民币可以买一张，那时的几元不是现在的几元。

白谦慎教授表明，尽管有上述这些困难，但和前代相比，晚清关于文物市场的资料已经算是多很多了。但也正因为上面提到的困难，他对晚清艺术品市场的分析多有推测的成分，对它的描述和分析也可以说是尝试性的。

吴大澂（1835-1902），苏州人士，1868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中国著名的学者、书法家、收藏家。白谦慎教授的讲演就是以此人及其友人的日记、信札等文献为依据，分青铜器和书法绘画两大类来探讨研究当时的收藏品市场价格的。

在讨论艺术品的价格之前，白谦慎教授首先谈及了可能影响价格的一些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和影响今天的文物价格的因素有很大的相似性。谁是收藏者，这很重要。是否著录出版，是否有题跋（对书画而言）也是重要因素。对于青铜器而言，文献价值十分重要。此外，稀有性和艺术质量也都会决定价格的高低。

而后，白谦慎教授通过分享两个故事——“布医士”和“虢叔钟”——生动地讲解了1870年初洋人开始收购藏品对青铜器的市场价格乃至给京师收藏界带来了影响，以及1872年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史实。1872年潘祖荫在致吴大澂的信札中写道“虢叔钟所值二（或三）千四百元，

岂不可发一大噓乎？始知厂肆之物，未足云贵也。”但沈秉成最终花5000两买下虢叔钟，而这个价格在当时大概能买下“刘园”（即苏州著名园林留园）。

虢叔钟的价格在晚清能开到如此高，与钟鼎为青铜器重器有关。那为什么青铜器价格会在1870年代涨得那么快呢？白谦慎教授认为，除了有外国医生加入购藏外，还与“战乱后经济恢复”、“国际银价的跌落”、“上海藏家的崛起”及“地方差价”有关。

书法绘画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数量上比青铜器要多得多。一位多产的艺术家的作品，存世的常常会多达上百件或几百件。尺幅、质量的差别也比较大。青铜器只能著录，不能题跋。书画能题跋，是否经过名人品题，在价格上的差异也会很大。白谦慎教授的研究以《翁同龢日记》中的记载为主，辅之其他文献来讨论晚清的书画市场。因为《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收藏和买卖活动最多也最详细，并且他提到的一些重要藏品至今还由他的玄孙翁万戈先生收藏，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这些作品的尺幅和艺术品质。

由于大量的古代书画名迹已经在清代初期和中期进入内府，晚清已经没有像梁清标（1620-1691）、安岐（1683-？）那样的书画大收藏家。但是，仍有一些未入内府的名迹尚在晚清的市场上流通。从晚清官员的日记中可得知，当时市场上流通的名迹有王羲之的《行穰帖》、《游目帖》、王献之的《新妇服地黄汤帖》、颜真卿的《自书告身贴》、苏轼的《黄州寒食帖》、米芾的《多景楼诗》、《向太后挽词》、《珊

瑚帖》、《复宦帖》、《乐兄贴》、黄山谷小卷、文彦博墨迹卷等等。白谦慎教授以其中几件为例进行了说明。

如王羲之的《游目贴》和颜真卿的《告身贴》，这两卷加在一起在1863年文物商才索价五百两。此时太平天国战乱尚未结束，文物市场的行情自然会受到影响。但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在1880年开价仅六十两，也低于我们今天的想象。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在1884年开价一千两。米芾的《珊瑚帖》、《复宦帖》合卷在1893年开价一千五百两，杀价后一千两。可见从1863年至1893年的整整三十年间，从绝对的银两数来看，文物价格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与当时青铜器的价格相比，书法绘画的价格实在不高。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廿三日，翁同龢“一日无事，展观石谷画图，忽思厂游，径往，日落矣，携《东方朔画赞》两册（国初拓）、《张猛龙碑》、《宋元人画集锦册》归。宋元册极有精神，决知非苏州片，索值卅金，拟得之矣。”《宋元人画集锦册》索三十金，大约二十余金就能拿下。1871年正是潘祖荫等在北京开始收购青铜器的时候，二十余金大约能买一个没有铭文的商州青铜爵，可见当时的古画价格不及青铜器高。

白谦慎教授讲解说明，清官员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书写大量的书法，但在任官期间通常不卖字，他们的书法（如对联、条幅、手卷、扇面等）多为礼品。他们去世后，昔日的礼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数量虽多，价格并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和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书写（如信札、

日记、笔记、手稿等）也有了商业价值。

最后，白谦慎教授对讲演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晚清官员的收藏对象，除了少数域外金石拓片外，主要是中国金石书画，这是行之有效的文化传统。不过，西风东渐之际，有些官员对西方文化极有兴趣，并开始收藏西方艺术品。由于资料限制，对晚清在上海崛起的商人收藏家（如顾寿臧等）的了解甚少。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上海有着相当一批商人、实业家买办收藏文物。可以推想，在其他的口岸城市（如天津、广州等），类似的收藏群体也同样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有富商巨贾收藏古董的例子。只不过，在传统中国，财富的拥有者不见得在文化上具有话语权。

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士大夫对商人收藏家依然持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依凭着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他们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实业家、商人在收藏界变得越来越重要。以此观之，白谦慎教授研究的1860-1890年代，正是西方收藏家尚未大规模介入、商人收藏家群体尚未取代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成为收藏主体的最后时代。晚清官员留下的文献资料，使我们能够比较细致地观察历史大变迁之际的收藏活动。

在晚清的高官中，收藏金石书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很多高官虽不以收藏著称，但却或多或少有着金石书画的收藏。在书画收藏中，家传、交换、赠送的现象更为普遍，通过市场来购买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在吴大澂的时代，

明清书画并非稀有，士大夫之间互相赠送的现象屡见不鲜。晚清文物市场上流通的许多艺术品在制作的时候是礼品，艺术礼品的消费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的，流通的方式是主动赠送、互赠、索求、代求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昔日的礼品和许多日常书写（如信札、笔记、是文稿、日记等）一起，有了市场价值。

聆听完白谦慎教授的讲演，主持人李淞教授发表感言道，虽然很多文人艺术家

羞于谈论作品价格，但艺术品价格的研究其实对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甚至可以从作品价格的变化追踪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白谦慎教授所从事的精细研究和他深厚的文化定力令人钦佩，像他这样专注于个案的研究非常值得学习，值得推广。

（撰稿：崔璨）

白谦慎： 晚清官员与书法

2016年12月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五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以“晚清官员与书法”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白谦慎教授近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晚清士大夫文化，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晚清名宦吴大澂（1835-1902）及其友人展开。他希望通过研究书法来观察中国文人文化在晚清的状况。他一向关心的议题是1850-1895年活跃在晚清政坛的高官的文化活动，而书法活动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白谦慎教授在讲座的开始就展示了他

鲜明的问题意识——他从晚清许多官员写了大量书法的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了几个问题，即他们为什么会写这么多的书法？这些晚清的高官花多少时间来研究、练习、“创作”书法？

白谦慎教授指出，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主要分为练习、自娱、应酬三个方面。他详细阐释了三者的具体内涵。练习不仅仅是动笔，主要是临帖。自娱则往往是个人行为，比如按照个人喜好撰写条幅，手卷等。应酬则是别人请他写，或者他写了送给别人，是一种和社会发生关系的艺术活动。

对于“晚清官员花多长时间习字”这一问题，白谦慎教授解释道：由于晚清官员有日记存世，所以有一些直接的文献。比如曾国藩为自己定下每日课程的时间表：

“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李鸿章临《圣教序》每日约百字，时间、天气皆历历在目。甚至，由于临帖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太过平常，有些官员在日记中不会记载练字的事实，但是他们留下的一些书迹却证明他们不仅练字，还有日课。一些官员没有每天临字的记载，但是通过书信，依然可以发现他们临帖的事实。此外，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还包括友朋之间切磋书法和独自领悟书法。

随后，白谦慎教授详细介绍了晚清官员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从白谦慎教授接触的文献来看，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流行的形式，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白谦慎教授通过近年拍卖行的数据和晚清文人日记的互证也证明了这个设想。白谦慎教授指出，晚清一些官员书写对联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以曾国藩为例，每月书写百余幅对联是常态，翁同龢、曾纪泽、何绍基等人也是如此。晚清官员写扇面也非常多，在数量上几乎可与对联匹敌，这和扇子是晚清时期身份和文化的象征不无关系。白谦慎教授指出，对联在清初开始流行，清代中期以后，成为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此之前，扇面是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晚清，扇面依然是仅次于对联的流行书法形式，在不是夏季的时候，书法家也会写很多扇子。

白谦慎沿着之前的脉络，解释了对联和扇面的使用问题。在挽联、喜联之外，对联最大的用途还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品。比如，同治七年，翁同龢护送亡妻和兄长的棺木回籍埋葬时，就在付银



两酬劳之外送扇对致谢。但是，由于没有史料，现在无法确认这些扇对是自己书写还是他人代书，署款问题也无法确定。以上说的是私事，其实书法也被用到公务当中。慈安太后于光绪七年去世时，翁同龢参与出殡事，对于出力者也曾赠以扇对。这些例证至少可以说明扇对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相当广泛。此外，在京官员，特别是高官，还有一项书法应酬，那就是为来京科考的举子们写字，各省的学政也常常有类似的应酬。

书写量如此巨大，如何提高书写的效

率就成为相当重要的命题。首先是联语的准备。白谦慎教授指出，郭嵩焘、吴大澂等人都会事先准备好联语，八股文和对联书籍也为书法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对偶资源。其次是代笔的问题，在当时，幕僚代笔的现象相当普遍。随后，白谦慎教授提到了落款的技巧，一些晚清官员在写对联时，经常只写对句，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才题款。当然，这不仅是效率的问题，还有称谓中的礼数问题。此外，一些书法材料的发明和改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对联纸使对联章法变得相对容易。由于磨墨耗时，大字费墨，墨汁的出现和磨墨机的发明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写字的效率。

这时，针对晚清政府官员书法写作数量的问题，白谦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重要假设，他指出了人口增加对书法的影响。康熙年间大约有一亿人口，而到了光绪年间增加到四亿。人口增加了，但有些职务并没有增加。这涉及到书法的三个流动模式：平级流动，由上向下，由下至上。其中由上向下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流动模式对书法需求量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对联会成为主要的应酬形式呢？白谦慎教授认为，对联章法简单，字数少，书写的速度快，其成功率也比较高，可以满足社会对书法的巨大需求量。晚清官员写扇面也非常多，在数量上几乎与对联匹敌。扇面的灵活性很大，而且可以为多人合作。比起对联，扇面不仅在视觉的丰富性和精致性上更胜一筹，随身携带，它还是使用者社会身份的证明。

随后，白谦慎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

历史事实，即晚清官员不卖字。他们的书法交换几乎都是赠送，不进行金钱交易。晚清官员不卖字的原因有几个：做官的收入比较高；做官期间的润格很难定，以官位高低来定润格或许并不恰当；书写的日常性也使润例难订。白谦慎教授指出，不卖字可能是晚清官员书写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使文人文化得以维护。由于没有市场价格，向人索字不易要钱，所以在书法应酬中出现了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官员的字往往在去世之后才能成为有市场价格的艺术品。

白谦慎教授指出了一些他面临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许多书法杰作都是信札，药方、笔记都可以是书法，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日常书写。晚清官员们创作量巨大，但是有些书法原始资料由于书写技法或个人亲疏等原因，已经被处理掉，不存于世。

在讲座的最后，白谦慎教授再次回答了为何晚清官员会写如此多的书法，其背后自然存在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比如科举等等。但是，对这个事实也不必作过度的功利性解读，因为其中的很多人成为高官后，依然坚持练习书法。在中国步入20世纪前，书法是中国官员主要的艺术爱好，他们在这方面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而就社会生活而言，对官员们书法的需求量也相当大。

白谦慎教授用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一句话总结道，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对于古代经典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意蕴的探求，对于遣词造句的细微之处的玩味，而不是对有实际用途的技能进行训练，才是知识表达的主要方式和社

会权力的核心内容。”白谦慎教授指出，列文森的话是针对晚明而言，其观察基本正确。但晚清和晚明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在晚清官员的知识构成中，已经有了相当的西学成分。而且，晚清的官员并不“玩物丧志”，本演讲所涉及的曾国藩、李鸿章、吴大澂等都是当时的“能吏”。

总之，书法在维系传统政治集团的社会凝聚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根本性变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的下半期才发生。20世纪以来，中国的书写工具、丧葬文化、牌匾文化、书信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法的生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书法的日常必要性被消解，政治精英群体集体退出了书法。书法也不再是精英的艺术。晚清的官员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观察他们文化活动中的细节，自然能加深人们对中国文化在百年间发生的变化理解。

主持人朱青生教授对白谦慎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白谦慎教授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白谦慎教授对中国艺术的价值进行了延展——书法事实上是人存在的方式，而不是交易的载体。艺术可以并不完全是特定职业，这对中国之外的艺术史家是一种冲击。其二，白谦慎教授通过研究书法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这可以被认作是一

种对官本位结构的研究。在当时，书法构成这个结构的载体，而这个问题可以延展到书法不构成载体后，哪些东西替代了它的作用方式。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代表文研院对本次讲座谈了体会。他认为，文研院最主要的事情，是想方设法支持好学者，做出好学问。此外，还要为现今的北大补一些文气。在中国的历史上，书法从不独立存在，它构成一个人的人格修养与社会身份的品味区隔。写字是社会交往的载体，也是修身治国的基础，这是我们审视当今中国问题的很好的出发点，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需要关注的领域。文研院未来会大力支持艺术史研究，这不仅关涉到艺术问题，也关涉到中华文明之本体的问题。

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白谦慎教授的讲座圆满结束。正如朱青生教授所言，艺术往往和思想有关，这些前沿性的研究很有可能激发人文社会科学的活力，对书法等问题的开拓将会激发无数全新的问题空间，对新问题的处理和反应同样会为人文社会科学搭建新的桥梁——这种不断开拓的学术态度也是文研院一直以来的宗旨所在。

（撰稿：谢雨新）



16

佐川英治： 北魏六镇史三题——设置、变质、崩坏



2016年12月3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日本东京大学准教授佐川英治作了题为“北魏六镇史三题——设置、变质、崩坏”的讲座。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担任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铿、叶炜以及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与活动。

佐川英治先生指出，六镇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关于六镇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例如2014年内蒙古固阳县召开了“北魏六镇学术研讨会”，说明学界开始重视六镇史的研究。这主要得益于2000年以来当地考古学者陆续发表的关于六镇遗址的研究成果，卫星照片也使进一步观察六镇遗址及其规模成

为可能，再加上新出土墓志的不断涌现。借助于以上这些新条件，并经过实地考察，佐川先生完成了关于北魏六镇史的研究。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他的报告。

一、北魏“六镇”考

关于何谓“六镇”的问题，中国学者作了广泛的研究，大多认为北魏迁都前后的“六镇”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六镇的范围则说法各异。严耕望先生认为，北魏迁都以前的六镇是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六镇，孝文帝以后变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牟发松先生对迁都以前六镇的看法与严先生相同，而认为迁都后变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以这七镇称“六镇”。佐川先生表示他对六镇的结论与牟先生的观点一致，但是对变化原因的解释则有所不同。

北魏设置六镇是在太武帝时期。神麴二年（429），北魏打败柔然，将高车人迁

至漠南，即蒙古高原的南部，范围“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上》）。因此六镇应当在这一范围里。《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纪》武帝永明二年（484）“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条胡三省注，认为六镇是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但是此时没有御夷镇，由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诏书中提到的“六镇及御夷城人”（《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可知，故胡三省之说是错误的。而在北魏末年六镇之乱以后改镇为州时，史载“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魏书》卷八九《酷吏·酈道元传》），可见迁都以后御夷已经是六镇之一了。

关于沃野镇，《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天德军条：“沃野故城，在军城北六十里，即是后魏时六镇从西第一镇也”，可见沃野镇也是六镇之一。但是沃野镇本不在六镇中，观《太平寰宇记》卷三六灵州条“正始三年，尚书源思礼（怀）、侍郎韩贞抚巡蕃塞，以沃野镇居南，与兰山泽六镇不齐，源别置三戍”可知。沃野镇本位于汉代的沃野县，在孝文帝、宣武帝时两次迁移位置。源怀是北魏六镇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宣武帝时对六镇作了很大的改革，即“迁徙七镇，别置诸戍，明设亭候，以备北虏”（《魏书》卷八八《良吏·宋世景传》）。这里出现了“七镇”的说法。此外，赤城镇在迁都以后被御夷镇取代。因此迁都以前的六镇是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迁都以后变为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七镇。

源怀改革六镇是为了“备北虏”，那么此前六镇的功能是什么呢？太武帝将高车人安置在漠南，让他们放牧并接受他们的贡纳。台湾学者康乐先生认为，六镇“在一开始时是以镇守这些高车‘新民’为主要目的之一的”，而不是为了防御“北虏”。佐川先生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太武帝最早在漠南安置高车人的时候，“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上》），即由四个将军来镇抚他们。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东部高车叛乱，江阳王继受命平叛，史载“自怀朔已东，悉禀继节度”，后来在追述其功绩时又称“太和中慰喻高车、安辑四镇”。可知在怀朔以东的军镇中，有四镇与高车关系甚深。佐川先生认为，这四镇当是怀朔、抚冥、柔玄、怀荒四镇，理由之一是这四镇的名字都是怀柔北方的意思，而武川镇、赤城镇都是地名。据资料记载，武川镇在道武帝时已经存在，所以镇抚高车的四镇不应包括武川。后来把与四镇在同一范围内的武川、赤城两镇囊括进来产生了“六镇”的说法。

关于六镇与高车的关系，《魏书》卷四〇《陆倕传》中可见在六镇中存在“皇帝——镇将——诸莫弗”的体系。关于“莫弗”，罗新教授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中认为是高车役属于柔然时所得到的酋长的名号。而在六镇之前对于高车人的管理则与此不同。《魏书》卷三《明元帝纪》载“帝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纂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北略”，可见在六镇设置之前，存在着“皇帝——护高车中

郎将——部大人”的体系。部大人与莫弗有着本质的不同，部大人的权力比莫弗大得多。《魏书》卷一〇〇《豆莫娄传》云“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部大人应当就是大君长，可见莫弗应该是部大人之下的部落酋长。《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在北魏离散部落之后，高车人还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体系，因此北魏朝廷利用护高车中郎将与部大人交往。设置六镇以后，六镇中只有莫弗，不再有部大人，皇帝通过莫弗接受贡纳。在太武帝、文成帝时，皇帝在夏天还会到蒙古高原、阴山、河西一带，与高车部族接触，甚至有时会参加他们的祭礼。所以六镇形成了新的草原支配的方式。

总而言之，在游牧社会中存在着单于——部大人——酋长（莫弗）的支配方式；在六镇设置以前，北魏与高车人建立的是皇帝——护高车中郎将——单于·部大人——酋长（莫弗）的间接附属体系；而在六镇设置之后，则建立了皇帝——镇将——酋长（莫弗）的直接贡纳体系。设置六镇的目的就在于皇帝直接与高车部落酋长建立关系。

二、北魏六镇与司马氏

六镇在北魏迁都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六镇的军事化。北魏献文帝时，南朝的刘宋爆发了晋安王子勋之乱，淮水以北的四州进入了北魏的控制，北魏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派遣到南方。随着这一变化，在孝文帝时都城也迁到了洛阳，北魏的国家治理重点由北边转向了南方，

六镇的体系也随之改变了。六镇的军事化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1. 六镇的再配置。前面提到宣武帝时“迁徙七镇”，源怀因为沃野镇偏南，将其迁徙到北边与其他六镇平齐的地方。除了沃野镇以外，其他各镇可能也都作了调整。赤城镇在北魏后期不见于记载，而出现了御夷镇，从名称中也能看出六镇的功能从“绥和荒服”变成了“备北虏”。由此，六镇形成了一条新的抵御柔然的防线。

2. 六镇的城堡化。孝文帝太和年间，中书监高闾提议在六镇北边修筑长城，而是否付诸实施并未被记载。不过考古学者发现了在六镇的东部有长城遗址，被认为是在高闾建议下修筑的，可见高闾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水经·河水注》云武川镇“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矣”，可见武川镇在此前是没有城的，而宣武帝时为了“御北狄”而筑了城。在迁都以前，北魏采取在秋冬季节派遣军队在北方大范围巡回的方式来防范柔然的人侵，这种方式被称为“游防”。在“游防”政策下，六镇不需要过多的军事力量。而在迁都以后，“游防”的方式对洛阳朝廷是沉重的负担，因此要在六镇筑城，以“罢游防之苦”。在高闾之后，最终对六镇做出改革的是源怀，他对六镇改革的意见据说有58条，“筑城置戍”是其中重要内容。因此，作为都市的六镇正是出于迁都洛阳后北边防卫的必要性发展而来的。

3. 六镇的组织化（都督制的实行）。过去的研究认为在迁都洛阳之后，六镇军将的地位下降。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迁都洛阳后六镇镇将地位下降，并非

只是政治上轻视的表现，而是出于将六镇军事化、组织化的要求。史料中可见的都督六镇的记载基本都出现在孝文帝之后。此前单独存在的各个军镇，在孝文帝时期因设置都督区而被组织化，因而也构成了上下统属关系，下级军镇镇将的地位自然比孝文帝以前低。但是怀朔镇是个例外，因为怀朔镇经常是都督六镇的中心。

总之，迁都以后六镇的军事化是因为其职责的改变，六镇不再只是为了“绥和荒服”，同时还被赋予了“防御北狄”的新任务。

六镇与凉州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可以看到，司马氏在六镇中有很大的势力，司马楚之、金龙、跃父子三人先后担任云中镇将共43年，“朔土服其威德”。司马文思也长期担任怀荒镇将。取代司马文思的是李宝，他出自西凉的王室。李宝的儿子即著名的李冲，曾经建议六镇中的“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张铭心先生在《司马金龙墓葬出土碑形墓志源流浅析》一文中曾揭示司马氏与凉州人之间关系匪浅。从婚姻关系中亦可见一斑，司马金龙是司马楚之与北魏王女河内公主之子，娶妻钦文姬辰是自称南凉景王秃发傜檀之子源贺的女儿，夫妇共同育有三子。司马金龙还与具有北凉沮渠血统的女子育有一子，该女子则是降于北魏的沮渠牧犍与太武帝之妹武威公主的女儿。陈寅恪先生指出凉州的自立始于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八王之乱后，大批人群逃居凉州，他们奉东晋为正朔，因而与司马氏有着特殊的感情。六镇中不少人是从凉州来的。《周书》卷二八《史宁传》称史宁是建康表氏人，史载“魏

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冥）镇，因家焉。父遵……属杜洛周构逆，六镇自相屠陷，遵遂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可见抚冥镇就有2000户凉州徙民。北齐勋贵中也有许多凉州徙民，例如司马子如、孙腾、麴珍、牒舍乐等。让凉州人士在草原地带建造都市的意义何在？可以推测凉州与游牧民族关系密切，因此将凉州人放在草原地区与游牧民族交往肯定是有某种意图的。另外，唐李氏自称北凉李暠后裔，可能本来并不是为了在中原社会炫耀自己的出身，而是在六镇社会中炫耀。

三、北魏末期北边社会与六镇之乱——以《杨钧墓志》和《韩买墓志》为线索

《杨钧墓志》于本世纪初出土于陕西省华阴县，中日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分析，但是关于杨钧与六镇之乱的关系尚未有人探讨。佐川先生认为，之所以爆发六镇之乱，杨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六镇之乱爆发之时，杨钧任“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怀朔镇大都督”，可以说六镇之乱就是在他管辖之下爆发的。杨钧之子杨宽曾任将军、高阙戍主。高阙就是后来爆发六镇之乱的地方。杨钧父子还与柔然有关系，《周书》卷二二《杨宽传》“时茹茹既乱，其主阿那瓌来奔，魏帝遣使纳之，诏钧率兵卫送。宽亦从，以功拜行台郎中。时北边贼攻围镇城，钧卒，城民等推宽守御。寻而城陷，宽乃北走茹茹。后讨镇贼，破之，宽始得还朝。”

《韩买墓志》见于《晋阳古刻选》一书，其“韩”字漫漶不清，但据考证当是韩买

无疑。韩买就是杨钧之后的军主。史书在记载六镇之乱时，基本上称叛乱的人是“戍卒”。但是《韩买墓志》中还说到“杂种酋渠，远近相扇”。《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广阳王建附深传》中亦称“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

再来看破六韩拔陵，史书中说他是沃野镇人，但他并不是一般的兵士，史书记载与他同族的破六韩常“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因而破六韩拔陵也应是酋长之类的人物。与他一同叛乱的斛律金，其父是第一领民酋长；贺拔胜的父亲是武川军主，祖上是大莫弗。破六韩拔陵也应是军主。一般认为北魏的军主地位很低，史载“一生推迁，不过军主”。但是六镇中的军主可能地位并不低，因为六镇中没有民政机构，只有军事机构，民政事务也由军将负责，例如《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怀传》“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就是镇将负责均田的记载。迁都以前镇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与莫弗保持良好关系，而在迁都以后六镇组织化，军主则在都督支配之下。

六镇之乱为什么爆发？以往学者主要从阶级矛盾的角度来分析，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就在523年发生叛乱。需要注意的是，520年柔然阿那瓌投降，北魏朝廷讨论如何安置柔然降人。袁翻主张将他们安置在较边缘的地方，而当时掌权的元叉则力主将其安置在怀朔镇的北边，“请沃野、怀朔、武

川镇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仍于彼为其造构，功就听还”（《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杨钧与元叉又有着密切关系，史载“恒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并饷领军元叉”（《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昱传》）。杨钧是元叉政策的执行者，尽管有激烈的反对，还是将柔然安置在了六镇的北边。但是随后阿那瓌叛乱，朝廷派遣李崇平叛不果，因而李崇提出“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他自己说这一措施是为了提高镇民的地位，实际上主要目的可能在加强对六镇居民的管理。这一举措引起了六镇居民的反感，最终导致了沃野镇的叛乱。“寻李崇此表，开诸镇非异之心，致有今日之事。”（《魏书》卷六六《李崇传》）在叛乱中，“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附渊传》）。镇民与北魏朝廷的关系已经非常淡漠了，开始出现反抗北魏的心理。

综上所述，六镇之乱的主导是酋长阶层，他们是军镇的军主阶层。叛乱的直接起因是北魏引柔然进入漠南，威胁了他们的生存。积极推动引柔然入漠南政策的是怀朔镇将杨钧，所以叛乱也最早从他管辖的六镇西部地区开始。六镇社会的变化，源于刘宋晋安王子勋之乱，与北亚高车、柔然的动向也息息相关。至少在六镇之乱早期，叛乱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六镇不仅是一个军事要塞，而是一种处理与草原社会关系的新方法，可以说唐朝的羁縻政策的远源

就在六镇。

在佐川先生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提问与讨论阶段。侯旭东教授针对佐川先生六镇是唐代羁縻政策的远源的说法，指出汉代的道、北朝的护军都是羁縻政策，其与唐代的羁縻政策区别在哪里？佐川先生回应道，汉代的羁縻与唐代的羁縻有本质的不同，汉代的羁縻之下北方民族有自己的君长，例如南匈奴的单于，但是唐代羁縻下的族群没有独立的君主体系。北魏早期高车的部大人有君长的地位，但是六镇设置之后的酋长（莫弗）则不是君长，而北魏的皇帝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君长。六镇设置之后北魏的皇帝不但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同时也是游牧民族的可汗。北魏的皇帝会参加北族的祭祀活动，汉代的皇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唐代皇帝的性质则与北魏六镇之后皇帝的性质相似，例如唐太宗也是北族的“天可汗”。侯教授还问道，六镇的军事化与柔然的动向有没有关系。佐川先生称这时柔然的势力已经不那么强了，所以六镇军事化原因不在柔然一方，而在北魏本身的问题。

陈爽研究员指出，学界以前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论证体系，来说明迁都以后武人地位下降导致了六镇的动乱。在佐川先生的解释下，六镇之乱是因为阿那瓌内附的偶然事件，那么对于以前的解释应该如何理解？佐川先生指出，以往的解释是从洛阳角度的分析，身处朝廷的魏收也容易联系到这个背景。民族矛盾在六镇之乱时和魏收的时代都很尖锐，所以魏收也可能会避免从民族矛盾角度书写历史，所以《魏书》

的解释不能完全相信。

叶炜副教授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研究六镇史以来，学者都比较重视六镇的共同性，那么六镇之间的差异性大不大，六镇之间的交往多不多？佐川先生认为迁都洛阳以前六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地位也是相互平等的。尽管六镇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因为相对独立，所以矛盾可能不大。在迁都以后六镇实行都督制，六镇一体化了，还出现了六镇之间的上下关系，肯定会出现一些矛盾。

有同学认为对凉州的概念是否应该做具体分析，例如南凉秃发鲜卑对拓跋氏有认同，南方来的司马皇族与拓跋氏世代通婚，那么他们的认同也有可能来自这里，因此能否因为源氏、司马氏等家族来自特定的地域，就认为他们有特定的文化倾向或政治经验，从而假定他们在六镇地区有特定的影响。佐川先生回应道，这些六镇的家族自称来自凉州，但是是否能够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他表示怀疑，因此他关注的是他们为什么自称来自凉州。该同学又问道，佐川先生通过斛律金的例子来说明六镇之乱主要是民族矛盾，但是斛律金之后很快就站到了破六韩拔陵的对立面，而且像斛律金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例如北齐的开国功臣窦泰。所以这些六镇武人上层是站在这些流民的对立面的，这样一些势力最后被尔朱荣以及后来的高欢继承了。因此，能否说六镇之乱的主力是这样一些北镇的上层人士？佐川先生认为参加叛乱的还应该是部落酋长也比较多。有意思的是酋长中站在北魏朝廷一边的也很多，例如尔朱荣，但是最后尔朱荣他们还是站到了北魏朝廷的对立面，因此六镇之乱的

主力还是一些北镇的酋长。

还有同学针对司马氏、凉州与六镇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魏最初将南来降将安置在了南方，而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北伐，将司马氏安置在了六镇。那么司马氏出任北边的镇将，究竟是因为他们对平凉民有号召力还是太武帝对南来降将任用方式的变化？对司马金龙的任用是因为他与沮渠氏的通婚关系，还是冯太后对他的恩宠？平凉民可能并没有那么特殊，其实六镇中平齐民可能也有很大的比重，只是史料中记载平凉民更多一些。佐川先生赞成这位同学从北魏人才利用方式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他同时指出，他所考虑的问题主要不是北魏为什么任用他们作六镇的镇将，而是为什么“朔土怀其威德”。

罗新教授最后对佐川先生的讲座作了总结。罗教授认为佐川先生的研究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他并不只是为了理解北魏的衰落、北齐北周的崛起和隋唐的产生来追溯六镇史，而是从北魏自身的历史逻辑来探讨六镇的产生；将六镇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去考虑其内部的来龙去脉，而非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北魏历史的边缘问题。罗教授在佐川先生讲座的基础上谈了自己对于六镇史的看法：六镇的出现与北魏跟柔然的对抗有关系，但是这个对抗主要表现在北魏的主动出击。北魏在战胜的出击中抓获了很多战俘，其中大部分是高车人，被安置在了后来成为六镇一线的一千里地的范围内。高车人是柔然人的主要依靠力量，说蒙古语的柔然人是很少的，而说突厥语的高车人是蒙古高原上的主要土著人群。

被北魏占有的高车人最初并不对北魏构成任何威胁，反而对于北魏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每抓一个高车人其实都是在削弱柔然的力量，而且在经过思想教育之后他们能够帮助北魏来对抗柔然。这些人可以在漠南的牧场放牧，但其实从放牧的角度来说，漠南的条件是很差的，因此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北魏国家的财政支持。而且在北魏平定十六国各国的时候，把被征服者也都安置在这一地带，因而这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熔炉，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人群——六镇人，也就是后来隋唐帝国的创建者。

佐川先生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发现了六镇人内部的变化，他把刘宋晋安王子勋之乱和青齐地区进入北魏疆域这一事件看作重要的历史分界，将这一事件与在遥远北方的六镇的变化联系起来。罗教授指出，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这之后不久，北魏与柔然的力量对比不断向有利于北魏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的顶峰就是孝文帝后期，他可以不再担心北方出现大的军事、政治真空而安心地迁都。随后漠北的高车人不满足于柔然的统治开始反抗，以至于柔然的统治集团归附了北魏。如此北魏历史上所有的国防威胁瞬间消失了，而这种军事上的安全恰恰带来了六镇的重大问题，因为六镇不再被国家重视了。六镇得不到正常的财政支持，放牧又不足以养活六镇的人口。另外西边的秦州发生的叛乱使得北魏的财政不得转向西方，这真正破坏了北魏在北方的财政网络。因此，六镇出现了叛乱，其实这些叛乱的人们都是“饥民”，他们最初只是为了生存，并没有什么政治

志向。而北魏国家自身的崩溃给了这些“饥民”新的历史机遇，使得他们成为了后来隋唐帝国的缔造者。佐川先生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去探究六镇内部的变化，而这些

变化不能机械地看待，北魏看似最强势的时候，恰恰是六镇出现大问题的时候。

（撰稿：熊昕童）

17

汲喆： 作为宗教实践的朝圣——在事实与隐喻之间

2016年12月13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七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社会学系201教室举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青年院士、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以“作为宗教实践的朝圣——在事实与隐喻之间”为题发表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

汲喆教授认为，朝圣这一古老的宗教活动存在于一切复杂社会的传统当中，到一个非同寻常之地就是朝圣。历史学和人类学就朝圣活动本身进行的研究有很多，例如原法兰西公学的中文教授雷慕莎，就曾翻译并注释法显的《佛国记》，这是西方研究汉传佛教的开端。东西方人类学家也曾对各种宗教朝圣活动进行过研究，而汲喆教授的朝圣研究，不是从经验的意义上讲述个案，而是想探讨朝圣的社会学意义，特别是在当代宗教变迁背景下的意义。



首先，汲喆教授从宗教社会学理论入手，将朝圣放到仪式当中去理解。他认为，所有的仪式都包含着对神圣本原的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讲，朝圣本身跟其他仪式没有什么不同。朝圣也是接近神圣，只不过这个神圣体现为符号化的人或物。但是，在时空地形学的意义上，朝圣的复杂性大大超过了其他宗教仪式。朝圣的时空跨度非常大，它的核心要素是流动性，这是朝圣所特有的。朝圣的流动性对现代社会中的宗教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现代社会恰恰是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加的社会，传统的宗教活动，

要求时空上的共同在场，而流动性的增强给集体活动带来挑战。那么，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宗教朝圣的流动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如何表述这一关联？

汲喆教授接下来从社会的流动性出发，探讨了“流动”概念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双重意涵。首先，从地理空间上来说，现代生活处在一种加速变化当中，变化是律令。社会生活在不断加速，空间对人们的制约越来越小，人的运动能力大大增加，物质和信息的快速流动加剧了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叠合。这样一种经验非常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空间上的共同在场，以及与此相连的社会行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同时，距离的缩短改变了传统动员方式，偶聚式的组织显得更为有效。这种状况的后果是，社会整合机制要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上重组，而且制度的规则要和偶变的社会规则相协调，才能继续运作。

其次，从社会空间看，社会分化以后，不同的制度有各自的游戏规则和资源分配方式，每个人需根据不同的规则来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并学会在各个角色之间迅速转换。这导致现代人在个体生活中缺乏整合个人经验的坚实而统一的基础。系统整合（不同系统之间）与社会整合（人与人之间）相互交错，却互不协调，使得个体在社会中不停流动，自我认同更趋于表面化、片面化。那么，面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变化，宗教是如何适应的？

汲喆教授接下来以他在田野调查中涉及的两个宗教场所为个案，讲述了宗教团体对流动性的反应。一行禅师创立的法国梅村禅修中心，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改变有：体

验式的隐修、宗教节日的日常化、仪式规则的软化、僧侣的典范由规范变成引导，以及通过分享建立亲密关系等等。它解放了传统佛教集体实践的时间约束，与现代社会的劳动时间相协调，人们可以利用周末或平时来参与宗教活动。而且，它能最大限度地容纳个体差异，分享活动包容了个人的生命史，体验式参与软化了角色差异，促使陌生人之间形成亲密的情感关系。在柏林禅寺的例子中，净慧法师通过生活禅夏令营的方式吸引对佛教感兴趣的青年人。在夏令营中，仪式是自愿参加的，非制度化的，减少了教徒与非教徒在形式上的区分。另外，宗教活动与娱乐活动的结合方式也模糊了圣俗的界限。

汲喆教授以鲍曼的朝圣理论引出他的总结与讨论。鲍曼认为，朝圣（作为隐喻）是现代人的基本的生活范式。如果说宗教的朝圣是为了接近神，那么，现代人朝圣般的生活目标则是要“建立身份”。受新教的影响，对西方现代人来说，世界的意义不在当下，而是一个未完成的征途。人们如同荒漠中的行者，要在职业中接近神圣，确定生活的意义，建立并保持身份。到了后现代，荒漠之风消除了足迹，人和事物都失去了稳定、永恒和权威，不再需要建构身份，而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汲喆教授不认同鲍曼的两极分化，他认为现代人的存在感受既不以单一职业为目标，也并非毫无根基。生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短暂目标构成的，它们不统一在一个目标中，甚至会彼此冲突，即使每一个都不那么神圣，但它们仍是有意义的。也许，我们这样来看待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才更为恰当：它并不是从单一目标转向无目标，而是在制度分化和加速变迁的背景下转向多个目

标。对一个目标的坚持与放弃，将多个目标整合成为“生活”——这些方式取决于人的选择能力与条件——它们常常被转译为自由和权利。

同样，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区别也不在于有身份和无身份，而是单一身份与多重身份、固定身份与临时身份的冲突。也就是说，流动性所包含的个体的开放性，不该是取消身份，而是说身份具有潜在可变性，即个体转换身份的可能性和自主性。个体通过对身份的干预与筹划，使生活展现为阶段化的连续变迁。依据这样的社会背景组织而成的宗教实践，需要符合临时性和多重身份的逻辑，而朝圣恰与这种状态具有亲和性。

在评议环节，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肯定了汲喆教授在研究选择上的勇气，对于新兴宗教形态的解释要比传统形态困难得多，他改变了我们对宗教的想象，认为它是守成的、神圣的，但现实中，人们的实践并非如此。因此，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任

务是回到现实，发现真实的形态。汲喆老师的研究引导我们去思考宗教是怎样与世俗建立关系的，组织是有力量的，有些形态可能会生长出一种风暴来，仅以传统的方式不足以对它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了解了它背后的圣俗融合方式，可能对理解当下社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在互动环节，汲喆教授提醒我们，社会学研究，就是要研究社会事实的复杂性，而不是用一个标准来标定什么是“正确的”。关于朝圣的研究不要着眼于朝圣者的心态是否单纯，大家抱着各种心态来参加朝圣活动这一事实本身才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历史不能平面化对待，应该看到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变迁本身有一种传统，就如同净慧法师对柏林禅寺的改革也能在宗教上找到合理性的根源。

（撰稿：宋淑敏）

汲喆： 回到日常与重建当下——禅宗与现代人的自我建构



2016年12月16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七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青年院士、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以“回到日常与重建当下——禅宗与现代人的自我建构”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参与讨论。

在上一讲“作为宗教的朝圣”中，汲喆教授主要处理的是事实层面上宗教对现代性的适应，本讲则从意义系统入手，指出宗教在面对现代危机时所作的努力。

汲喆教授首先界定了研究问题，他指出，20世纪的佛教史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佛教由出世向入世的转变。这一问题来自韦伯的“佛教是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



宗教”，同新教相比，在面对资本主义时，佛教如何转型成为首要问题。他们往往延续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讨论宗教对政治、经济的参与，建立佛教与西方科学、哲学的对话。但汲喆教授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韦伯的讨论基于理性化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后，加尔文教特征不再突出；另一方面，从佛教自身来说，超验和现世的紧张关系亦非截然二分；更为重要的是，宗教应该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条理化和秩序化作出回应。由此说来，由出世到入世的讨论是简化的，关键在于宗教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它如何界定日常生活的价值。

接下来，汲喆教授用两个案例具体解释了这一问题。第一个案例是净慧法师和柏林禅寺对生活禅的推广。柏林禅寺是对现代社会持开放性态度的一个典型，它早在1992-1993年便提出生活禅的理念。净慧法师认为“提倡生活禅，是试图在佛教众多的修持法门中选择一种既能达到明心见性、解脱生死的终极目的，又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环境的修行方法。”在汲喆教

授看来，生活禅是把日常生活审美化、伦理化了，它以非常现象学的方式描述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如诗如画的真善美，进入禅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出世的苦行便没有必要了。在他们的表述中，“青山是禅，大地是禅；信任是禅，关怀是禅；善意的微笑是禅，热情的帮助也是禅”，日常生活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禅是个体用意识和审美体验到的现实。更进一步，日常生活的价值和目标被交给每个个体，表达出强烈的自我规训：“只要你每时每刻观照自心，每时每刻观照当下，就能够把修行落实于当下”。通过对当下的思想保持反省性的关注，信仰的原则得以贯彻，对当下的强调，又使得日常状态掌握在主体的身体、意识和行动之中，克服了意义系统的断裂。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禅法取自于祖师禅，对传统的记忆也赋予了它宗教的价值。

第二个案例是一行禅师在法国创办的梅村禅修中心。他提出“正念禅”，以回应生活禅操作困难的问题。所谓“正念禅”，是通过正念恢复自我，把分散的身心合而

为一、关注当下的禅法。它包含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比如提示性的偈语（“启动马达之前，我知道我去哪里，车与我一体，车快我也快”）、关注呼吸、行禅和听钟等方式，它尤其强调当下的体会，取消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和指向。

这两个案例显示出宗教对当下的浓厚兴趣，要回答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先了解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关系。传统禅宗的日常，往往是指僧人在寺院中不得不进行的物质性生产，它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时下禅宗所讲的日常，不特指僧人，而是所有人都需面对的世俗生活。常，不仅是例行化的重复，更是线性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形塑。现代生产的节奏改变了自然节律，理性的、直线性的时间取代了自然重演，时间在不断流淌，看似一切都在变化，可变化的形式却是不变的，这造成时间的空化。同时，日常生活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身份和制度拼凑而成，每个人的自我和连续性都面临着粉碎化和瞬时化的风险，缺乏整体上的自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日常是“时间”被现代结构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时间的概念是未来取向的。时间变成根本秩序的基础，生活是时间中事件的链条，当下是临时的、可变的位置，过去和现在的意义都由未来所决定。而未来又是一个视域，它永远不会达到。

然而，对于未来取向的现代时间，例行化的日常生活对它是一种挑战，这本身构成了现代性的悖论。向前的、未完成的、向未来开放的生活恰要通过自身的例行化

落回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某种程度上弥平了时间的线性特征，过去、现在和未来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当下的叠加；它反映在自我主体的身上，把时间性化入生活，重建人与世界、自我的关系。

这看似是一条出路，对日常生活和当下的强调，在历史学和哲学的语境下，能够终结面向未来的时间吗？汲喆教授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把握当下的要求和对未来、过去的取向并不对立。当下没有超越的视域，正是过去和未来给了它意义。现代性的未来取向并不取消当下，它只是削弱当下与过去的联系，加强其与未来的关联。现代性正是来自于当下与未来的紧张，以及对紧张的诠释。它表现为两种形态：基于对过去否定的当下主义产生了历史相对主义，当下仅仅作为满足狭隘、藐小的生活享乐，人们陷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沉沦状态；而对未来的强调也产生了另一种当下主义，把未来当下化，发展出责任原则和预防原则，强调当下就要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事实上，当下对于未来和过去都“欠了债”，很难证明未来取向的时间性失去了价值。20世纪以来，当下事件的立刻历史化（9·11事件）、危机和批判意识，无不反射出现代性的时间性危机。

汲喆教授认为，禅对当下的强调，与当下主义对现代危机的克服不期而遇。他进一步指出禅是如何赋予当下以意义的：在知性层面上，现代性隔绝了自然，世界成为个体用理性和自我意识加以把握的对象，自主性正是个体遵循程式化的理性思维，对立、负责地反思自身的活动和过程。

宗教对当下的强调，切断向前的意识，它拒绝用理性来看待自然和自我，放弃经验的建构模式，突出静观，直接把握当下的完满性。另一方面，当下之所以能够成为意义的中心，也有传统和宗教意涵。保持对当下“自我”和“事件”的感受就是觉醒，佛陀和祖师曾揭示并如此实践，以此达到解脱。

讲座的最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总结了汲喆教授的发言，他认为汲喆教授讲的虽然是宗教，但我们并不陌生，它本质上是对现代处境的刻画。汲喆教授

非常带有法国味道的研究和讨论指出后现代对于超越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观点，但他并不满意，他似乎认为真正的出路可能在宗教中。然而，这里的宗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面对现代生活生长出的新形态。不论是禅宗还是新教，它的启发绝不在于重建宗教本身，而是要理解建构新宗教的机制，理解它的意义体系和组织方式，以及它对现代问题的调试和回应。

(撰稿：国曦今)

18

亚当·罗伯茨： 当代世界民族主义者的复兴 ——基于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以及其他事例的探讨

2016年12月15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当代世界民族主义者的复兴——基于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以及其他事例的探讨”。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荣休教授Adam Roberts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长伟副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起始，罗伯茨教授引用卢梭与马克思的话引出了此



次讲座的两个目的：保持头脑清醒、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们当今所目睹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这些事件，究竟是悲剧，还是闹剧？”

罗伯茨教授先对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上台，这些现象的背后折射的都是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当然不能完全否定的：它能以条理清晰的叙述，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等问题提供一种方式。虽然与此同时，这一概念也往往会在极端的形势下造成国家对少数族裔的伤害。

在近期英美的运动中——无论是英国的“请将国家交还给我们”（Give Us Back Our Country），还是美国的“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活动使用的关键性标语皆呼喊着国家过往的繁荣。且两场运动都牵涉到对一定国际组织、全球化某些方面以及大规模移民的抵制。这无疑对相信“当今世界正在构建自由国际秩序理念”的国际化一代来说，是严峻的挑战。

谈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案例，罗伯茨教授认为，无论是英国脱欧中宣称“土耳其要加入欧盟”还是特朗普选举中声称“希拉里创造了ISIS”，两者都充满了谎言。在如今信息时代里，有太多分不清真假的消息到处肆意泛滥着，影响着这两场活动的结果。而在这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新政策来替代那些被狠狠诟病、批判的既有政策，这是这两个事件中十分明显的失败之处。

两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尘埃落定之后，在英国，最高法院呼吁任何会触发《里斯本条

约第50条》的决议都必须经过国会的审议，否则政府不能作出任何改变；在美国，特朗普上台后所提名的各个部门的许多候选人都缺乏相关从政部门所需的技能或经验，是否能被参议院通过还有待观察……罗伯茨教授在分析完脱欧及特朗普上台后的英美两国所呈现出的种种现象时预测到：除非有戏剧性的新局面出现，否则美国的选举人团和英国的议会都会接纳选举后的结果。但最终如果协商陷入僵局，随之而来的也许就会是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的复兴。

而造成如今这一局面——全球化，扩大的贫富差距，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移民，对阿富汗、伊朗、利比亚军事干预的失败——教授认为这些都是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原因。

讲座最后，罗伯茨教授引用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对公民投票弊端的批判：一些认为民主就是“选举人鉴别出公共的善交给政治家来实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人群的无知与浅薄往往意味着在实际中他们更大程度上是被政治家所操纵的。相反，约瑟夫·熊彼特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韦伯的影响，他所拥护的民主是极简的民主模式，民主应当是领导者之间类似于市场结构的竞争机制。虽然阶段性的大众投票能使政府合法化并对其问责，但政策程序应被视为其自身所有而非由大众所决定，个人的参与角色通常应被严格的限制。

(撰稿：吕莘)

19

卜正民：
测绘于浩淼之上——明时代的航行与全球舆图学

2016年12月15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测绘于浩淼之上——明时代的航行与全球舆图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担任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数十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讲座。

主持人陆扬教授首先介绍了卜正民教授的学术历程，他是世界中国史研究范围内最多产、学术著作最受到重视的教授之一。近期，卜正民教授的研究由明代社会的历史转向为从全球史的关系角度考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今天的讲座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转向。

卜正民教授的讲座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陆上看海”。卜正民教授指出，海上的活动，特别是海上的经济活动对世界史有很大的影响，也对东亚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海洋往往处于人类的认知之外。以《朝鲜供奉图》为例，在这幅图中，陆地是很清晰的，而海洋是不清楚的。而中国有海岸



地图的传统，这些传统在16世纪非常发达，卜正民教授列举了《筹海图编》、《全海图注》等例子，但是这些地图是往往是行政性的地图，而不是地理的地图。

第二个部分是“从海反观大陆”。卜正民教授提出，14世纪到15世纪，欧洲航海家开始发展测绘技术，其结果为“波多兰航海图”（Portolan Chart），这也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最古老的一个地图。这幅地图的创举在于，沿着海岸有地名和海港，从海上以点发展为线状网络，以大圈（Great circle）定位。卜正民教授指出，人们无法在陆地上画这种地图，应该是在船上的某点，通过精确的数学角度测绘出地上的固定点的。

第三个部分是“绘制地图曲面”。卜正民教授指出，《全球地图》（1507）在

这个进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利用了截断心形投影法绘图，其中有“经线”也有“纬线”——基本上没有实际用途，只是为了展示世界的形象，但是他尝试将曲面的世界放在平面图纸上。有趣的是，中国的《山海舆地全图》（1606-1609）中南美洲的形象和《全球地图》非常相似。此后，《海洋图》（1516）利用了圆柱投影的方式展示海洋形态，这个地图对于航海家而言，就相当有用了。随后，欧洲的绘图者对地图进行了很多探索，但都是指向曲面地球的尝试。以上提及的都是从欧洲的传统，但是中国也有从海看陆的传统——卜正民教授列举了1621年《武备志》中《郑和航海图》的复制件，他指出世界上所有的航海文化都有这样的传统，可是这样的地图非常罕见。

在第四部分“海上看陆”中，卜正民教授主要介绍了他研究的重点，即塞尔登地图（the Selden Map）。这是一幅17世纪的地图，藏于牛津博得利图书馆。这个地图被卜正民教授定位为太“现代性”的地图：把现代的地图和这幅地图叠加，可以发现这幅地图已经相当精确。中国的部分似乎是地图上最正常的地方，绘图的基础可能来自《余象斗》（1599）。塞尔登地图比同时期的欧洲人画的东亚地图好很多，但是到了1649年，这个技术就已经被欧洲超越。卜正民教授指出，其背后的问题可能是政治：清朝代替明朝，所有明朝的地图都要损毁，所以这种地图在中国本土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第五个部分是“大合流”。卜正民教授指出：一般的波多兰地图上面具有罗盘

和尺度，塞尔登地图上也有一个罗盘和尺度。但是他们绘图的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者完全没有联系，而为什么这两个要素都实际存在呢？这在表面上看是借用了欧洲的技术，但是技术的内容完全不同。所以与其说两者是个大合流，不如说是一个小合流，这代表着两种不同地图思想的汇聚，是海上工作者的小型碰撞和汇流。

李孝聪教授对卜正民教授的讲座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卜正民教授的讲座不是关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是一场与地图、历史和科技均有紧密联系的报告。卜正民教授通过一个历史学家的感悟和思辨来做他的研究，这背后的很多研究思路需要对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有非常娴熟的认识，因为最后的合流涉及全球性的研究。卜正民教授对中国和西方史料的考索是卓有创见的，他把人物、材料再次嵌入当时的地理空间和时间中，作了非常扎实的工作。卜正民教授现在所从事的地图科学史的解读，是一个热门，很多人都在做。但他最重要的一点是抛弃了现代人看地图的范式，慢慢体会当时的绘图师的感受和立场，重拾当时人对地图的编码方式。

在卜正民教授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后，主持人陆扬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表示，卜正民教授今天的讲座中的思路非常新颖，开启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两位学者的对谈也非常有深度，这样的对话是真正有启发意义的。

（撰稿：谢雨新）



20

罗柏松： “回光偏向”——西方对《道德经》的挪用与翻译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交流与多重误解



2016年12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四院207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回光偏向’——西方对《道德经》的挪用与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交流与多重误解”。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中国宗教研究会会长罗柏松（James Robson）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四龙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等参加了讲座。

演讲中，罗柏松教授指出，早在1934年，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曾经宣告“道德经无法被翻译”。而如今，《道德经》

已成为世界上除《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西方世界对《道德经》的传播过程中，既有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亦产生了诸多文化上的误解。

罗柏松教授首先介绍了18、19世纪欧洲人心目中以基督教为最高的宗教等级序列，也就是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和偶像崇拜（包括印度教和佛教等）这一

顺序排列，这是欧洲人认识包括道教在内的东方宗教的思想前提。接下来，罗柏松教授梳理了17世纪以来柏应理（Philip Couplet）等人对《道德经》的拉丁语和法、德、英等欧洲语言的传译情况，其中耶稣会士的贡献尤其突出，比如Joachim Bouvet（1656-1741）、Joseph-Henri Prémair（1666-1736）和Jean 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等人的翻译。

罗教授指出，早期传教士曾经将《道德经》与埃及文化相联系，甚至试图将《道德经》第14章中出现的“夷”、“希”、

“微”比附为“耶和華”，从而在道教中寻找早期中国文化中的一神教痕迹。18、19世纪西方对《道德经》的理解，又较此前有了较大的转向。一方面认为其中蕴含了基督教成分，为基督教进入中国作铺垫；另一方面将“道”与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挂钩，比如法国汉学家雷慕沙（Pierre Abel-Rémusat）曾撰写论文将老子的思想与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等相比较。也就是说19世纪的学者认为《道德经》中的思想其实有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类似努力也见于英国汉学家老翟理斯和英国新教传教士约翰·查莫斯（John Chalmers）。他将《道德经》的起始那几句话和《约翰福音》作比较。

另外，有一些欧洲学者把《道德经》和德国理想主义等思潮相联系。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对东方宗教兴趣的提升，西方开始将《道德经》与印度教、佛教联系起来，认为《道德经》反映了中印哲学思想的相关性。其中，皮埃尔·纪尧姆·波蒂埃（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认为《道德经》和吠陀哲学有关联，而理雅阁（James Legge）翻译的《道德经》被列入了《东方圣书》而大行其道。这些从文化和思想上对《道德经》加以介绍和分析的努力同时包含了大量的误解，而且也将《道德经》与作为宗教的道教相切割。

1960年代之后，西方对《道德经》的理解日趋多样化，《道德经》一度成为“嬉皮士运动”的组成部分，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影响。60年代曾在哈佛用缺乏科学依据的药物做理疗实验的蒂莫西·里瑞（Timothy Leary）和

理查德·阿尔伯特（Richard Alpert）等人，都对《道德经》在北美的流行有过贡献，但这其中不少人其实完全不具备阅读中文的能力。罗柏松教授还指出，对《道德经》的误解亦体现在西方将道家与道教看成分裂的两部分——前者是形而上的哲学，后者是巫术迷信——从而导致了宗教性道教研究的滞后。直到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开始，关于宗教性道教的研究才渐次蓬勃，由法国向中国、日本、美国扩展，并在当下语境中与科学、生态等现代性议题产生联系。讲座最后，罗柏松教授对上述讨论进行总结，并将刚出版的、由他负责编纂和介绍的著作《诺顿世界宗教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系列丛书之道教卷赠予燕京学堂图书馆。

评议环节，李四龙教授指出，罗柏松教授所介绍的《道德经》在西方的接受史极具启发意义，尤其是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误解，更值得关注。陆扬教授亦以自己亲身经历补充了《道德经》对西方政治的影响。之后，罗柏松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关于道德经与庄子、儒家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整场讲座内容丰富，妙趣横生，让听众感受到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经典的不同理解，一方面彰显各地区、各时代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重启发。

（撰稿：马小菲）



21

汪荣祖：
史学的主体性问题

2016年12月20日下午，文研讲座第二十一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汪荣祖教授作题为“史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卫东教授担任主持。

汪荣祖教授首先提出，20世纪以来科学昌盛。各个学科都欲相比附，科学成了“非科学的”科学主义。在崇尚科学万能的思潮下，英国史家贝雷（John B. Bury, 1861-1927）等提出了“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History is science, no more or less.）的口号。而贝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毅然放弃旧说，认为史学变成科学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不可能将整个世界压缩到机械的物质世界，而忽略了日常生活的感情世界；不能不顾不能量化的世界。”贝氏这一觉悟，便是意识到史学主体性的结果。

自然科学的本质，诚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论：现代科学虽在欧洲诞生，但可以环球为家。科学完全可以从一个国家传授到另外一个有理性社会的国家。而人文学科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要求赋意义于客体，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其所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



均不见之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客观”是建基于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故而不能不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

汪荣祖教授观察到近代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向西方全方位倾斜的现象。梁启超之新史学并非旧史学的“变法维新”，而是一场史学革命。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即欲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考证方法貌似呼应乾嘉朴学，实则并非朴学的创新，而取法德国史家兰克的史学方法论。傅斯年受到贝雷（John B. Bury, 1861-1927）影响，主张将史学建设成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以充分的史料来建立科学的史学，这种信心显然来自当时西方史学的科学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

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影响巨大，也是史学科学化的一种表现。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史学界又改取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法国安娜学派（Annales），俗称年鉴学派就以社会科学治史闻名。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称社会科学为史学的善邻，取“守望相助”之意。台湾史学界于1960年代已经重视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中国大陆通行历史唯物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科学，因而两岸的中国现代史学所谓“科研工作”，都是将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在书写上无异数字整齐、图表盎然的社会科学研究报告，貌似严谨有加，实枯燥乏味。而且摧毁了传统史学的三大偶像，即传记、政治、史事。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号称探究史学的深层结构，却抛弃了最基本的历史叙事。又往往存在配合理论，不免随心摘取史料，未必重视史料的周延与考订的问题。

史东（Lawrence Stone）于1980年代发出了回归“基本面”的诉求，重弹历史叙事之必要，追求史学之文学性，要求历史叙事之再生（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

“再生”，并非“复原”，如柏克（Peter Burke）所说：是在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基础上，重现大叙事之风采。至于柯林伍德（R. Collingwood）所谓“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汪荣祖教授特别强调，

柯氏并非要史家将心比心，而是将历史人物摆在史家心胸中了解——即要求史家能将既往的陈迹赋以新生命，从而将史学的重心从史料转移到史家。

汪荣祖教授进一步提出，中国现代史学一直追随西方时尚，随西风起舞，甚至仅仅仿效西方汉学的研究途径，一直没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学体系——中国现代史学似已与传统切断脐带，倒像是西洋现代史学的旁枝。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严厉批判，未必全然可取，但无疑动摇了西方现代史学的霸权，尤其凸显其强烈的“自主性”。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应具有充沛的资源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在讲座最后，汪荣祖教授据以赛亚·柏林（I. Berlin）文化多元论之义谛，强调中国现代史学要批判地重新整理传统史学的遗产，反省长期以来盲目追随西方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重建中华史学的自主性。并从史官、褒贬、历史经验、经世致用、借古讽今、历史考据、史家风格、历史哲学等角度参照分析了东西方史学的各自优长。发现中西史学实各具特色，时而呈现在方法、风格、思想等方面上。即使彼我兼备，深浅仍不一，则可以深补浅；若详略有异，则可以详补略；若彼我虽同，表达不一，正可互通以增益其事。

（撰稿：胡斌）



汪荣祖： 论全球史学

2016年12月2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一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汪荣祖教授作题为“论全球史学”的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担任主持。

在讲座开始时，汪荣祖教授首先辨析“环球史”和“全球史”的概念。汪荣祖教授指出，所谓“环球史”就是“全球史”，“环球”是动态的，有全世界的互动在里面；而“全球”是偏静态的。然而，现有的世界史主要是西方的历史，全球化也往往欧美化。

随后，汪荣祖教授分析了全球化的核心关切和意义。全球化的核心关切包括许多方面，主要有地球的不稳定性、资源并非无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人类文明兴衰无常、人类自相毁灭的可能性等议题。环球史的意义是用环球视野回顾人类之既往、环球视野观察人类之当下、环球视野前瞻人类之未来、有全球化而后有环球史。

真正的全球化不可能早于19世纪，在此之前环球尚未大通，直到现代才形成环球态势，各国、各洲、各文化之间才开始有广泛的互动。在比较各自孤立的“前近代”（pre-modern），天涯海角之相遇全靠机缘，失之交臂者有之。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技的跃进，苏伊士与巴拿马的开凿，运输的便捷，通



讯与新闻传播的快速，1863年国际邮务的开通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1864年第一次日内瓦公约的签署，20世纪初海牙国际法庭的成立，以及诸多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呈现新一波全球化的趋势。不过，同时出现“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列强竞向海外扩张，夺取环球资源、劳力、市场，形成所谓“以坚船利炮，向世界进军”，而弱国被迫走向西方所主导的世界。

汪荣祖教授认为，全球化仍存在着“中心”与“边缘”。身处亚、非、拉“边缘”者，不免会视“全球化”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延续，仍不脱西方中心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经济似乎在加剧贫富不均。列强的压迫与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全球化。

环球议题虽然迫在眉睫，但问题丛丛。经济上快速的全球化并未带来政治的全球化，国际合作往往伴随国际竞争，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环球性的社会结构，国家体制

也全无消失的迹象，主权国家仍然是无可改变的现实。快速的全球化似乎也加速了世界的分裂、不平等与冲突。

同时，文化的全球化也很显著。电视、时尚、连锁店，促成衣食住行娱乐消费极为类似的大众文化，不能低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也不能高估，其他文化的贡献不能抹杀。汪荣祖教授认为，仅靠科技不能使世界融为一体，还需要经由理念上的一致与共同准则，才能顺应全球化。全球化既不应也无必要导致单一的文化，而应是在“环球性”（globality）的认知下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组合，增加接触，减少分歧。人文世界不必要像自然界那样一致而有规律，但多元文化如何协调、合并，是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汪荣祖教授认为，全球化不应成为欧美化。时至今日，环球都能见到相同的大众文化，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牛仔裤、摇滚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大众文化并非真正的“全球化”，而是西化，更具体地说，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藉由欧美掌控的经济实力与媒体，传播以及影响到全世界，近乎“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然而这些大众文化却使许多欧美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的贡献，是将西方文明传播到全球，就像当年将现代化等同西化。

二战后，全球趋向多元化。20世纪70年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民航的发展，跨越国界洲际；计算机与通讯网络的普及，使“天涯若比邻”不再是诗意的想象，而成为生活的现实，似乎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世界。同时，殖民主义的消失与新兴国

家的兴起，使全球化更加多元。

真正的全球化仍然是进行式。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也没成为人类完美的归宿。国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依旧，南北贫富不均也未见改善，环球议题诸如通商、人权、环境、气候、疾病，不仅难以一致，而且更趋复杂。若要进而建立全球的“世界政体”与地球村，牵涉到消除国界，淡化国家主权，难度更高，仍然是遥远的悬鹄——因为国家观念以及民族主义仍甚强固，各地区经济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均，各国人民之间在思维与心理层面的鸿沟犹深，难以超越。

在以上背景下，环球史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环球共同认可的准则必须经由相互了解、容让，才能适用各国家、各文化。欲达此目的，必须要在互动日益频繁的世界里，洞察各民族与文化的异趣。货真价值而有效的“寰宇性”（globosity）的建立，不能仅靠政治上的合作与经济上的整合，而且要认真对待东西文化之异与南北地域的差距。总之，要相互了解，关注到全人类的福祉，而历史是最好的管道。

环球史由全球化而来。史家马志利徐（Bruce Mazlish）引哲学家耶士培（Karl Jaspers）的话说：二战在亚洲与欧洲一样的烽火连天，是真正的全球大战，可说是环球总动员，所以认为二战后环球史进入新的时代，因人类的自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知，都起了深远的变化。因而，环球史超越了传统的世界史。环球史纠正了传统世界史的偏颇。长久以来所谓“世界史”（world history）无论在观点上或内容上无异是“西方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West），难称世界史。西

方制作的所谓世界通史，皆不足以言全，更不能说通，也不能用西方现成的国家观、文化观，以及“西化”、“现代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概念来概括与书写。

环球史如何展开？汪荣祖教授认为环球史包揽广泛，然不可没有统筹人类不同经验与视野的架构，否则便无环球一统的历史。然而不宜套用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自不能排除在环球史之外，自亦不能忽视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性。进而，汪荣祖教授分析了环球史的分期：公元1000年以前，为“环球史的史前时期”；13世纪到15世纪，为“环球史的初期”；16世纪之后，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地理与新航路的大发现，纳入美洲与大洋洲，文化的传播，突破许多地区的孤立状态，出现环球史的新页。

随后，汪荣祖教授指出，应充实环球史的内容。建立如当代史家麦克尼尔（John McNeill）所谓的“既多元而又可行的全人类的网络”（a pluralistic and plausible “human web”），自应包括中国的特殊历史经验在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追求共同目标，增进共同价值，庶几建立属于世界性的人网，以友谊与合作而非敌对与对抗联系各国人民。然则，历史知识足以认识与和谐当前世界之用。

汪荣祖教授认为，环球史有几大共同议题：人类苦难史、气候与环境史、疾病传播史。

共同议题之一：人类苦难史。人民历经劫难乃全球普遍现象，应是未来环球史的主要内容。约有两种大劫难，无非是天

灾与人祸。天灾乃大自然的灾害，诸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台风、龙卷风、干涸、传染病、蝗灾，极端气候等造成对人类的劫难。大自然的伟力，难以预测，难以控制。解决之道唯有加强预测，以及研究环境保护之道，减少大自然的反扑。人祸一再发生，不亚于天灾；而天灾往往因人祸而起，从历史经验可知，人类经常为了发展不惜牺牲环保，使问题愈来愈严重。人祸还包括战争。文明的进步不但没有减少战争，反而因科技的发达，杀人的武器越来越凶恶，且有可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核弹。近年复有令人惊悚的恐怖攻击，伤及无辜。

共同议题之二：气候与环境史。自然环境对人文的影响无疑是全球性的，人与环境的互动也有世界性的含意。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或将改变人类对历史的理解，生态乃全球属性，将地区环境联系到整个世界之中。近年快速的经济成长，使江河污染、城市雾霾、气候异变，益为严重。中国史的生态观，包括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意识、生态政策、以及疾病对社会文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无疑能增益环球环境议题，得到更平衡而完备的历史知识。

共同议题之三：疾病传播史。疾病传播跨越疆域国界，自是环球史的重要议题。汪荣祖教授以腺鼠疫曾三次大流行、哥伦布带到新大陆的天花麻疹等疾病、宋蒙战争中的瘟疫为例，认为瘟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绝不限于医疗史的范畴，对城市、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关系到社会的兴废与国家的存亡。此外，汪荣祖教授以张伯伦、罗斯福、杜勒斯等人为例，分析了身体状况的好坏影响到一

个人的智慧、判断与决策，对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言，关系到不仅是个人的荣辱，更有关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祸福。

随后，汪荣祖教授提出了环球史书写的技术问题。汪荣祖教授认为，环球通史之难产，需要“团队合作”（team work），也可尝试“议题研究方式”（topical approach），如环球苦难史、环球环境变迁史、环球疾病传播史。同时，也可作“专题写作”（monographic study），如人类对苦难的认知与因应、古今中外对利用

与保护自然的抉择、疫病对历史的影响、“一带一路”的环球史意义等。

讲座最后，汪荣祖教授指出，历史的功用在于鉴往知来，善用历史知识可以避祸趋福，生生相息，才能永续。环球史的主要内容，诸如天灾、人祸、环境、生态、疾病、苦难，以及经济发展与善用资源，都攸关人类的永续发展。

（撰稿：李灵均）

22

李淞： “形式的深意——再读《重屏会棋图》”



2016年12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形式的深意——再读《重屏会棋图》”。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淞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朱良志担任主持。龙美术馆副馆长杜京徽、“敏行与迪哲——宋元书画私藏特展”联合策展人谢晓冬、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本次活动。

朱良志教授首先介绍了李淞教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道教美术研究方面的建树，李淞教授也关注其他艺术史研究领域。本次讲座是关于一幅名画与五个帝王的故事，通过仔细观察图像细节，从而得出了全新的认识。李淞教授从一幅五代（或者是北宋）的著名作品出发，探讨当时艺术形式和观念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此回顾中国艺术在宋元之前的内在脉络。

《重屏会棋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美术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件作品，相传为五代著名画家周文矩所作。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也藏有相似的一张画，西方学界通常称之为《后主观棋图》。两幅画构图大体上相同，细节描绘上各有短长。讲座开始，李淞教授简要介绍了关于《重屏会棋图》的国内外学术研究史。关于画中四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北宋中期王安石不知为何人，宋徽宗认为是南唐后主李煜，南宋初年王明清认为主角为南唐中主李璟。清代吴荣光逐步认出四人身份，依次是中主李璟、李璟的三弟李景遂、四弟李景达、五弟李景暹。二弟因早逝而未能入画。画中有二重屏风，屏风所画场景是白居易《偶眠》诗意。最早对此画有研究的是故宫的单国强，他于1980年在《文物》杂志撰文梳理相关文献史。近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多有研究心得。故宫研究员余辉的最新研究认为，四人的构图关系暗藏着接位顺序。

在第二部分，李淞教授主要从图像内容出发，针对画面的细节观察，追问此画的主题是否为通常所说的“皇室的行乐雅集活动”。李淞教授提出了十二个疑问：

1、棋子似乎不正常？2、谁在执黑子？3、谁是主角？谁是视线中心？4、四人目光都在看棋盘吗？5、正面李璟手里拿的什么书？为什么是他拿书？寓意何在？6、谁又为何衣衫不整？7、有人被挡住半边脸，正常吗？为什么？8、四人衣衫晕染的程度不同代表什么？9、衣服颜色的不同有意义吗？10、背屏为何画白居易诗《偶眠》诗意？11、屏风中《偶眠》诗意图的女主人戴有道冠，为什么？12、“重屏”只是为了增强空间效果、展示画家技巧吗？

随后，李教授结合史料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解答与阐释。画中棋盘为十九格，沿袭唐代的围棋定制，说明此画作者熟悉围棋规则。黑棋摆出了北斗七星的样子，指向中主李璟或四弟李景达。李璟手拿棋谱，寓意规则已经确定：兄终弟及、依次轮流做帝。画中四人目光都不在棋局，中主李璟、李景遂和李景暹都望向李景达，后者才是图像的焦点。爬梳史料，四弟李景达从小便受到烈祖李昇的特别宠爱，本欲传位于他，但朝议未能通过，便只好按惯例传位长子。而长子李璟少时便有隐逸之心，筑馆于庐山瀑布前。其父去世后，让位不成，便与兄弟们在父亲灵柩前立盟，“约兄弟世世继立”。图中被挡住半边脸的人是三弟李景遂，说明他只是一个过渡式的人物，并不重要。图中李璟（衣衫不整）和李景暹都为素色布衣，李景遂为红衣（紫色），李景达着略深的黄衣，而“赤黄”是唐代皇帝衣衫颜色。不同色彩显示了各自的身份等级。李景达衣服的衣纹经过精心钩染，与其他三人不同，这也进一步证

实李景达在画中的核心地位。图中五弟李景暹手执黑子，这是由于李景暹比较年轻，且与其余几位兄弟非同母所生，因此地位最低，需要以棋子方式表明顺从之心。而对于画中屏风的解读，李淞教授通过重点对妻子头戴的道冠和老翁目光的分析，推测出蕴含其中的深意——即李璟欲让位给李景达，了却其父的心愿，自己则以白居易为榜样，退位隐居山林。屏风具有遮断和展示的双重功能。“重屏”寓意内外两个天地：权力与隐逸。家庭重于宫廷，生命重于权力。和平理顺王位，放下宫廷之争，别有新天地。

基于以上分析，李淞教授对此画作作了进一步的推测与历史逻辑分析。推测此画原作可能创作于三个时间段：

1. 作于李璟在位时（943-961），以记录四兄弟发誓立盟。但当时宫廷人物画家排第一的是高冲古，周文矩仅画一些配景人物。如果此时画，最有可能由高冲古执笔。

2. 作于李煜在位时（961-975），以表追溯之意。周文矩此时已是名画家，但如果在此时画，则是在否定李煜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当时其叔李景达在世，故不可能。

3. 作于李煜被俘（976-978）时期，这一时期周文矩也很可能一同被俘至开封。李淞教授结合宋太祖、宋太宗二人对李煜的不同态度，再联想到李璟兄弟的盟誓和宋太宗在帝位继承上的相似性，推测出创作此画目的的一种更高的可能性，即周文矩为宋太宗所画，作为一种图像版的遗诏，以迎合、比附宋太祖和宋太宗兄弟间传位。

最后，李淞教授为《重屏会棋图》作

了总结：《重屏会棋图》的双重空间构图，表现的是双主题——权力与隐逸、进与退。特殊的构图与人物位置关系，表现了南唐李璟兄弟间的传位约定顺序。但中心人物不是位居中央的中主李璟，他已显露出退隐之心，而是李璟目光所视的李景达——按照父亲李昇的愿望，他才是帝位的合适人选。原件的创作时间，更有可能不在南唐李璟或其子李煜执政时期，而应该是为宋太宗而作，即在李煜被俘后，以图绘的“史实”支持宋太宗继位的合法性。现存两幅《重屏会棋图》的“初本”就是宋画。北京故宫所藏，品质更高，更接近原作，或就是“初本”，不是故宫所认为的“宋代摹本”。弗利尔所藏，品质略低，显示出更明显的宋代特征，当是摹本。

宫廷画家的高妙之处，起点在于技术的“逼真”和“生动”，以及制造幻觉、再现真实场景的能力，而高度则在于他们精准的理解了复杂的政治，以巧妙地图像形式创造性地表现了沉重且凶险的宫廷逻辑。

这项研究是对一件老材料的重新审视，特点是仔细查看图像细节，从构图、人物的目光与视线、角度、服饰、器物、晕染和色彩等多方面挖掘形式的意义，将这些零碎的视觉形式细节连缀成有机的整体，再联系丰富的文献资料，将作品植入五代宋初五个帝王轮替的政治背景之中，从而揭示出画面形式下隐藏的深意。

（撰稿：黄凌子）



23

刘皓明：围绕着 allegoria 的中西诗论之争

2017年1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美国凡赛大学中日文系与亚洲研究终身教授、中日文系主任刘皓明教授以“围绕着 allegoria 的中西诗论之争”为题发表演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在讲座的开始，刘皓明教授指出，allegoria 是西方传统诗学和修辞学中的一个常见术语和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却比较复杂，在本次讲座中，他有意没有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这是因为这个术语在汉语的文学和修辞学研究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专一而又普遍接受的名词，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翻译方式和理解。

首先，刘皓明教授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的《赞歌集》（Carmina）中第一卷第十四首诗入手，指出这首在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诗歌的字面意思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它字面之外的内容。贺拉斯的作品古代有两种比较重要的注释，一种是波皮里昂（Porphyrio）的注释，他根据的是距贺拉斯并不遥远的昆体良（Quintilianus）的说法，即这首诗中的浪涛是讲国家，港口是讲和平和巨头之间的同心协力。他列举了古希腊诗人 Alkaios 和

Aechilochos 诗作中虽然写航海，而是以航海比治国和城邦状况（Ship of State），这个譬喻在古希腊的诗作之中多有佐证，甚至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所涉及。他还列举了惠特曼（Walt Whitman）怀念林肯的诗作《哦，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等美国诗歌以显示这一譬喻的延续性。在这个序列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个纯然来自西方的譬喻。

再回到之前拉丁文中波皮里昂的阐释，allegoria 是“用不同的词表达不同的义”，第一种类型是由一套连续比喻构成的，其后的例证就是前引贺拉斯的诗作。在谈及拉丁文之后，刘皓明教授展示了 Liddell-Scott-Jones 所编撰的希腊文字典中提到这一词汇的复刻页，即 allegoria 的原典。今天英文中还有 agora，意思是公众召集起来开政治会议的场所。它本来是个名词，加上动词词尾，就代表在这种场合下讲话，

再加上表示“别”的前缀，就构成了这个词。在这本字典中还可以看出这个词汇产生较晚，并且这本词典的例证中引用了许多西塞罗的原文。由此刘皓明教授指出，这个词汇是在希腊化时代产生的，但是被广泛使用却是在罗马时代。

刘皓明教授提到了一种更加著名的文学形态，即基督教 Allegorical 文学。刘皓明教授举例说，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us）的著作中，他非常关心圣经字面意思和精神之间的区别。从中世纪开始，结束甚至到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文学手法几乎成为重要的表征。中世纪晚期，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一篇出现的三个动物：豹、狮子和母狼正是这一手法的表现。

进入浪漫派时期后，可以发现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对在诗中使用 allegoria 的摒弃。在和柯勒律治发表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之中，他们指出，拟人（personifications）作为 allegoria 的一种，除非在极端情况下，使用这种手法都是非自然的。他们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这些手法的。华兹华斯曾经强烈批评一个前辈诗人 Thomas Grey，在他的代表作《逆境颂》（Ode to Adversity）中，拟人占据主要比例，此诗在当时被视作为程式。但是，在华兹华斯创作稳定期的《义务颂》（ode to duty，1805/1807）中，义务被大写，呈现出女神的形态。华兹华斯将这种行为自我阐释为“诗性辞藻”的运用，但或许这种写法正是来自于他曾经严厉批评的先锐。而这种写法事实上可以回溯到贺拉斯的身上，他的诗作中曾赞颂过“机运女神”。

随后，刘皓明教授援引了 Karl Reinhardt, Wilamowitz, Jacob Grimm, Hermann Usener 等学者的观点，论述了希腊人的信仰，人类品质能力投射到自然事物中的天然倾向，德意志神话学，语言和面孔，拟人倾向，具体神明的精灵化、地方化、家族化和谱系化等议题，并将其总结为形式冲破内容的尝试，即“被表现的意义和表现的工具之间的分裂”。

在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之后，刘皓明教授进入了中西比较的环节。20年前，在西方学界中，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否有 allegoria 事实上是一个重要问题。Pauline Yu 曾经指出，西方的 metaphor 和中国诗歌中的譬喻在本体上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国的范畴中几乎不存在此世和彼世。在 Andrew Plaks 论《红楼梦》的书中，他指出，在《红楼梦》中不管有多少暗示，但是依然无法对其作出隐喻式的阅读。而还有学者指出，allegoria 是特殊的、局部的、专属于欧洲文学的模式。钱钟书《谈艺录》中也提到中国传统诗学之比兴与西方之“寓托”（allegoria）之间的区别。后来 Haun Saussy 对上述观点作出了解构式的批评和反驳。

在此基础上，刘皓明教授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的诗学是否可以进入 allegoria 的范畴之中。《离骚》中所有关于香草的描述都是譬喻，但是这些譬喻是否建立起如但丁《神曲》那样一对一的关系，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而在《少司命》中，许多意象都可以联系到生产过程之中，所以会有譬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 Pauline Yu 认为中国没有 allegoria，而且

没有超验层次的说法。并且，从精神资源而言，我们不仅存在本土的楚辞，还从外来的佛教中汲取资源。寒山诗中“如许多宝贝，海中乘坏舸”的乘舟意象，就是来自《大般涅槃经》。回到开头提到的贺拉斯海上之船的 allegoria，寒山诗中的譬喻是实，所比喻的却是玄学和形而上的层次。allegoria 不仅是西方传统诗学中的一个概念，更具有

跨越中西诗歌传统的理论意义。

在讲座最后，刘皓明教授总结道：当我们再次阅读《楚辞》这样的作品时，总会发现词汇非常光耀夺目，这些精彩之点并不仅仅在于文字的层面，还在于那些超验的被精神化的神的世界。

（撰稿：谢雨新）

24

包弼德：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

2017年1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文研院特邀教授包弼德作题为“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The Humanities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的讲座，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女士担任主持。

要谈到数字人文，首先就要澄清什么是人文（humanities）这个问题。包弼德教授认为，人文学科不是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从学科角度来讲，它被其所研究的对象——即文化现象——所限定。同时，人文也是一种学习与思考的方式：它既意味着学习文化现象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些文化现象去进行思考，对我们自身的生活与价值进行不断地反思。因此，人文是一种不断变化并伴有断裂的、关于文化生产与反思的传统。有一种观点认为 humanities 是只有地中海文明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但包弼德



教授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有文字、有思想、有文化的地方，就有人文。而在不同文化之间，也可以有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渗透的全球性人文（global humanities）。

在当今职业主义兴起的环境下，大学中的人文学科首当其冲，以至于产生了“人文危机”（crisis in the humanities）的提

法。包弼德教授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来说明如今美国大学中人文学科在招生与就业形势中面临的巨大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人文学科的价值，其中不乏一些地位崇高的政治人物。这样的情况是由人文学科一些固有的特点和社会环境的诸多变化共同造成的。另一方面，大学中的人文学科也受到新的在线学习形式的影响。大学的招生不仅对学生有年龄限制，同时也具有相当的精英主义倾向，因此高等教育的受众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诸多新兴的在线学习平台如慕课（MOOCs）、多邻国（Duolingo），则能够面向更为广阔的受众，能满足更多人“终生学习”（life-long learning）的需求。这些在线学习平台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都利用了数字、网络技术，以新技术改变了学习的形式，这将我们的视线转向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结合上来。

包弼德教授指出，大学通过开展教学与研究以促进知识的增长，而数字技术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够为人文学科服务。那么，数位人文如何帮助实现人文学科的核心任务？包弼德教授认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进步主要依靠专门化（specialization）、理论与范式（paradigm）的转变以及工具的进步。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技术就是人文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工具。人文学科的研究链条由提出问题（question）、寻找材料（source）、分析（analysis）、传播（dissemination）四部分组成，包弼德教授举出了大量已有的数字人文成果，如 Markus、Worldmap、CBDB 等，有力地证明了在这一链条的不同部分上，数字人文技术都可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帮助人文

学科的研究者更为顺利地展开其研究。数字人文技术没有改变人文学科的研究链条，但是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提供了更加强大、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大量数据的分析工具，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视化呈现手段，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在线学习平台。因为它的这些优势，现在数字人文技术的研究已经在各国兴起，世界上目前已经设立了超过 175 所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不过，包弼德教授认为数字人文并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应该是作为一种人文研究的辅助手段出现。除此之外数字人文还具有免费与公开的特性，可以被用来储存、共享信息与知识，有利于跨文化的合作。不过包弼德教授同时也指出，要更好地在这些方面发挥数字人文的作用，就要更多地致力于现有各类数字人文资源的整合。

除了作为研究工具，数字人文技术也可以应用在教学领域，以使更多人通过在线学习接受到人文知识的熏陶。包弼德教授以哈佛大学创设的“Harvard X”为例，介绍了人文教育在网络教学中的现状。他向在座的听众展示了通过对那些在 Harvard X 上选择了课程的人进行调查得到的数据，以此说明对于这些人而言，尽管有利于职业生涯的学习也很重要，但出于“终生学习”的目的而接受教育可能是这些人选择课程的更重要的考量。因此，在线的人文教育可以使更多人接触到人文学科的知识，满足更多人“终生学习”的需要，而在线平台如果设计得当，可以促进人们更加直观、明白而深入地去理解一些高深的人文知识，并能促使他们以人文的方式进行思考。由此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有着众多渴望终身学习知识的人，包弼

德教授总结道，摆在大学中的人文学科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帮助那些渴望终身学习的人。

在包弼德教授的讲座结束之后，聂馆长就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现状，围绕图书馆在未来数字人文的建设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未来高等教育的走向等问题同包弼德教授展开了畅谈。包弼德教授认为，目前人文材料数字化的工作太分散、各自为政，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共享的话，可以减少很多重复劳动；如果能够形成一种比较持久、稳定的机制，让

不同学科的学者聚在一起探讨问题、解决问题，那么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会更加顺畅。而这些工作，除了图书馆之外，恐怕在大学中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更加胜任。在讨论结束之后，在场同学也踊跃地就数字人文的建设与应用等方面各自关心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包弼德教授对同学们的提问一一作出了细致的回答。最后，此次讲座在全场师生的掌声中完美地落下了帷幕。

（撰稿：杨光、张弛）

包弼德： 传记与著述——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 与意识的形成

2017年1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文研院特邀教授包弼德作题为“传记与著述——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的讲座。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伊佩霞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出席，近百人聆听了讲座。

包弼德教授首先指出，他提倡将地方史作为研究思想史的切入点，思想史中知识网络的调查与地方史研究密切相关。对于古代中国而言，跟思想史有关的历史人物首先都

是士人，但这些士人只是出于职务之需而住在某地，不一定有地方意识。因此，对地方思想史进行研究，如果选取的人物是士人，就要考虑他们是否有代表性。



包弼德教授从这些士人的著作与传记着手研究。他基于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分析指出，从唐代到两宋，中国的进士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例如，从南宋进士的分布情况来看，浙东、闽东地区具有强烈的优势；明代则集中于江南、江西和闽东地区。随后，包弼德教授又以地图的形式展示了各地书院数量与进士数量的关系。

婺州，今浙江金华，明以前称婺州。CBDB的资料中记录了许多婺州人的条目：以歿年计，宋代有1108人（其中80%活跃于南宋时期），元代有412人，明代1173人，清代194人。随后，包弼德教授展示了基于CBDB数据统计出的宋、元时期婺州人的直接社会关系与间接社会关系网络图。其中，宋代与婺州人交流最密切的地区依次为鄞县、永嘉、莆田、钱塘——基本都是地理距离靠近的地区；从两个时期的对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由宋至元，婺州人与北方人的交流明显增强。

接着，包弼德教授对宋代士人交游网络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指出有相当多的婺州人在交游网络中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许多人之间的“连通性”是婺州人所建立的。其中，宋代婺州人吕祖谦在这种关系上位居首位。随后，包弼德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吕祖谦在当时的影响力，并通过地图展示了吕祖谦的学生在地理上的分布以及与当地进士数量的关系。很明显，在婺州人师生关系的社会网络中，吕祖谦位于最核心的位置。

包弼德教授说，吕祖谦固然是一名好老

师，也是一名道学的领导者，但他缺乏自己的思想。吕祖谦的同志会及其规约，存在许多方面的矛盾：德行共性与士人个性的矛盾，创办私学与官学的矛盾，同志会与国家、家族的矛盾，义仓、书院等私人机构与国有社会机构的矛盾。

随后，包弼德教授将吕祖谦的学生来源与朱熹的学生来源进行了对比。无论是学生的分布还是再传学生的分布，朱熹的学生范围都比吕祖谦的学生范围广。结合进士的分布来看，有些地区进士多，但其中与道学有关的少。这体现出道学是否兴盛与进士数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道学者的社会关系集中在进士多的地区，但进士数量很多的江南地区的道学者就非常少。

最后，包弼德教授介绍了婺州人的几类著作，包括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元代吴师道的《敬乡录》。其中，《舆地纪胜》作为一本地理志与北宋《太平寰宇记》相似，记录了文化地理的内容；《敬乡录》属于“专门史”范畴，其中也收录了许多地图。包弼德教授指出，从图志到地方志的转变体现出行政单位到文化单位的转变，而地方志的优势是能够用以追溯地方士人的历史。

邓小南教授最后总结道：包弼德教授的研究注重思想史与地方史之间的关联、互通，涉及文学史、社会史和历史地理、思想史和文化史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随后，包弼德教授就在场师生的提问逐一作答。

（撰稿：施朝）

(二) 未名学者讲座

06

陆胤： 从“记诵”到“讲授”——近代中国的读书革命

2016年11月9日晚，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第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记诵’到‘讲授’——近代中国的读书革命”。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陆胤老师主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夏晓虹教授担任评议。

讲座开始时，陆胤老师先对题目中的“读书革命”作了解题，他所关注的是在阅读史、教育史、书籍史三条线索交织下，近代中国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作为“入话”，陆胤老师展示了两帧老照片，其一拍摄于1917—1919年前后，是北京语言学校的一个课堂情景；而另一帧则摄于1890年前后，内容是“私塾”学童读书的景象。对比两帧照片，无论是老师与学生授受的方式、教学空间的安排、教学的设备工具，还是教学内容，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清末民初二十多年极短的时间里，千百年吟诵经典的声音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左）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陆胤老师（右）授予聘书

逐渐边缘化。在1909年传教士玛高温(John Macgowan)的记述里，私塾中的读书之声被描述为“叫喊式地念着他的课文”，另一位传教士明恩溥(A.H. Smith)则称其为“吼叫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诵读法的讶异与谴责。

陆老师承认，其“读书革命”之说受到西方阅读史研究上的“阅读革命”说的影响，同时注意到古典学研究中关于“音读”和“默读”的讨论。在这些阅读史框

架的启发下，陆老师尝试梳理中国自身的阅读行为变化的过程，却不希望为这些外来框架所囿。他指出，在中国上古时代，文本与音乐结合的方式不同，会造成不同的表现方式，随之产生了讽、诵、弦、歌、赋等行为。同样具有音节的吟咏，则有弦歌与赋诵的分别，“不歌而诵”可能是后世诵读的直接源头。但“读”字所指，又未必全是出声的讽诵。如《史记》诸表序中，常出现“太史公读某某书”的字样，试校其所读对象，乃是谱牒、记录、年表等，衡以常识，似难以出声诵之。陆老师据此分析早期历史中读法逐渐分化的过程，伴随着从口耳到竹帛，书面文本的逐渐写定，阅读有从听觉向视觉扩散的趋势。但在教育和文学的场合，诵读吟咏仍为重要的阅读形式，甚至在中古时代更带有了审美化的趋向。

在接下来的议题中，陆胤老师将考察重点转移到教育史上，关注读书日程中的记诵，并将其放置在唐宋以降理学家到古文家关注教化的脉络中。科举的繁盛成就了记诵之学的流行，随之出现一整套的教育流程。理学家对针对科举的记诵词章有很多批评，但另一方面，也有如张载、朱熹等特别重视读书的一脉。张载《语录》中强调“书须成诵”，在反复记诵时，经文义理才能被随时领悟；朱子将读书成诵目为“道学第一义”。在陆老师看来，这里又牵扯出另一个书籍史变化的语境，即唐宋以来雕版印刷的兴起。读书人更易获得书本，读书因此呈现出“苟简”的势头。朱熹等人的提倡熟读，也有要挽回这一趋势，回归上古口耳相传时代的精读、熟读的用意。

陆老师又举朱熹所撰《童蒙须知》的观点：在具有仪式感的读书过程中，熟读记诵被认为可以涵养人格，并能达到自解其义的效果。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则更进一步，将读经程序分为分段、句读、上新书、温旧书、记遍数等步骤，固然期望以此达到终身不忘的目的，而记诵这一行为本身，也被认为有收束放心的功效。

另有一种文学吟咏的传统。自中古流传至近世，中唐古文崛起后，诗赋骈文之外，散体的古文也成为吟咏的对象，而尤以清代桐城古文的“因声求气”之说最为显赫。在此，陆老师抛出一个问题，这样的成日高声诵读，是为了记忆温习还是审美体会？他认为古文家自有一套理论来统合两端，他们将“声”与“气”关系作了极为精微的辨别。更重要的是，从清中叶到民国，古文家一直用心于教育，因气求声的古文诵读论在教育史上留下了诸多痕迹，影响颇远。

直到清末，主流的蒙学教法仍是诵读。例如赵元任的早年回忆中，就充斥着记诵的声音。从赵元任的个案，陆老师梳理出诵读的层次。根据音乐性的强弱可以区分出读、背、讽、诵、吟、咏、弦、歌等；若以阅读对象区分，则经、史、古诗、近体诗、赋、骈文、古文，对应的读法又多有不同；如果根据读书功能，帮助记忆理解的背读更多作用在蒙学阶段，作为心性工夫的熟读则贯穿终身教育的过程，作为审美体验的吟诵也是伴随一生的习惯，释道经卷的唱诵则带有宗教神秘化的作用。陆老师强调，这些看似可以分析的功能，具体到某一个诵读的现场时，经常混同在一起，难以分梳。

从阅读史和教育史两个角度，介绍完中国古典诵读的传统，陆胤老师重新把话题带回到晚清时期，重点则放在蒙学教育中“记诵”与“讲授”这两种知识形态的升降上。

清末成长起来的人，在回忆早年读书经历的时候，经常会突出一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私塾教育只读不讲，只有记诵而没有讲解。“讲解”是特别的待遇，是需要向教师特别要求，或者要到比较高的程度才开始。这与朱熹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形成了对照。正是在晚清，随着西学东渐，对于读书、教育、知识的观念都有了新的认识。陆老师尝试追溯这种新认识的源头，指出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的译介和流行，到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的《变法通议·幼学》篇，一种观念的颠倒正在发生。梁启超以西方生理学话头来解释读书过程，提出“记性”与“悟性”的问题。他认为，西方教育强调了悟性，获得了科学的进展和国力的强化；中国的教育强调背诵和记性，反使儿童脑力阻塞，没有创造发明的能力。陆老师认为梁启超幼学论的资源，可能与《万国公报》等刊物上传教士的教育改革论有关。正是这种“外来”的眼光，把原本复杂而且多层次的传统读书生活，简化为“练记性”为特点的记诵之学。

陆老师指出，在“记性”和“悟性”对立的框架下，很快形成了中国重记诵，而西学重讲授的刻板印象，甚至影响到了许多旧学中文人的言论。随着科举渐改渐废，新兴的学堂体制取代私塾。这对于诵读法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打击。在陆老师看来，

整个清末新学制颁布的过程中，都伴随着记诵与讲授的争论。纵向对比1901年《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902年壬寅学制的《钦定蒙学堂章程》、1904年初癸卯学制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三种文件，讲解、讲授几乎取代了背诵、诵读，可见梁启超借重生理学话语的幼学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官方教育主导者的思维之中。

有了知识观念上的变化，更重要的则是怎么将这些原则落实为教学实践。陆老师收集并调查了部分清末随着教科书流行而出现的新型教授法书籍，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在晚清新学制颁布的前后，曾出现大量题为“教授法”的书籍，有的直接取自西洋、日本，有的则是中国塾师自道心得。学堂怎么来教学？在当时新学界，被认为是要从头学起的问题。即便是汉字汉文、经史子集，也要用新法讲授，在陆老师看来，这才是记诵传统所面临的最真切的挑战。

陆老师以1902年王立才编写的《初等国文教授》为例，通过教学空间的变化，课时制、分班制的进入，讲授具体流程的变化，向我们展示了新式教授法如何强调讲解的重要性以区分于传统的记诵之学，并将西方的分科方式引入中国学问的教育。更具理论性的五段教授法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这种分段注重安排每一节课的内容，使课堂教授有了貌似科学的流水线形式。五段教授法先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教育界流行，继而转手传入中国。日本教育学家将原本复杂的教育心理学内容简化、本土化，并且强调五段教授法是“公共之规则”，适用于一切内容一切学科的讲授。

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即系统贯彻了分段教授法，还规定教师在讲解时要用方言，切勿呆板诵文。诵读时代学童的读书声在新学堂中被教师讲授的方言、官话所取代。

不仅仅是初学读书识字，即便是最保守的经学教育也被纳入了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就是用分段教授法讲解经书的范例。陆老师另行展示了两本“披着”经学教科书外貌的新学图书：《绘图四书速成新体读本》和《绘图四书便蒙课本》。在这两种“混搭”的晚清教科书中，儒家经典被挪用来说明新知识、新名词、新思想。

输入教授法之外，清末新教育还引入了“文法”的概念，以有法可依的词性句法辨析取代以往“无法”的吟诵，应用于讲授的过程。这就引发了文法教科书的集中出现。无论“教授法”还是“文法”，都体现了晚清新知识人对于“法”的追求。他们觉得过去的读经、学文采用诵读的形式，都是无意识的灌输。从记诵之学到讲授之学，就是从“无法”到“有法”，从个别特殊到公理公例的过程。

在讲座的余论部分，陆老师将题目中的“革命”再作阐发，戏拟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漫长的革命”之说，认为单纯地展示条缕明晰的情况转变是不够的，如若中国真有读书革命，那也必然是一场漫长的读书革命，个个丰富的面向仍值得挖掘。诵读虽然式微，但它的部分功能，也被音乐、戏剧、朗诵等新口头形式继承下来。

在讲座的结尾，陆老师反思了自己的

思路：一是对“读书革命”的理解，有着阅读史、书籍史、教育史三条不同的线索，有必要加以区分；二是中文里“读书”二字本就包含阅读、书籍、教育，有时候过分的分析又会破坏读书行为的整体，特别是教育对于阅读史和书籍史的变化，始终有一个缓冲和塑形的作用；其三是1890—1900年代“读书革命”的直接后果是1910年代的“文学革命”，前者为后者培养了发动者和接受者，所谓“新青年”都背负着“老童年”的阴影。

随后，夏晓虹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评议。首先她对讲座的背景作了一些补充，指出陆胤老师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知识传播的方式在近代的改变，而“读书革命”的发生，则对应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对于此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丰富研究，陆老师更关注阅读行为本身的改变。题目的切入点很小，却能以小见大，揭示出知识传授方法从理念到实践的改变。其次，夏老师认为陆胤的议题在阅读、书籍、教育三条线索之外，还有学术史和物质文化等面向上的考虑。而在诸多历史线索的交织中，讲者最关注的是教育，这也是他一切立论的出发点。这一研究的资料是破碎分散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晚清教科书的资料，以往公私藏家都不重视，以致许多当年风行一时的名教材，甚难一睹全帙，遑论附教材而行、发行量更少的教学法，更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搜集整理。

夏老师也就陆胤老师讲座中三个未完的话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一是诵读的阅读方式和文献种类有莫大关系。可供诵读的文本多为相当于现代所谓“人文学”

的书籍。取法西方后，新式课堂在教育科目的设定上已经大大压缩了文史之学的课时。另一方面，如算学、格致、天文、地理等，一部分以往属于专家之学的知识进入小学课本，成为人生必备的常识；其中很多内容，如公式、法则等则是没有办法诵读的，可见学校科目的改变也会对读书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教材的变化影响诵读的实行。受到西学影响，新的教育理念产生，近代儿童启蒙不再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而更多是从单字教授开始不断推进。比如南洋公学的《新订蒙学课本》，第一课是“天地、日月、山水”六个汉字；最后一课是书信体的文字，也不适合诵读。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诵读应用的场合和学程阶段。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诵读未必一直是常规的阅读和学习手段。夏老师提醒注意，默诵、讲解和强调悟性的观念等，在传统中国业已存在，不过是在近代被重新发现并归入新的教育理念之中，成为新教法的代表。此中观念和事实的参差，需要进一步的梳理，才不会因为童蒙诵读的回忆而压抑了其他普遍存在的读书方式。

在提问讨论环节，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听众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陆胤老师也一一作出解答或补充。关于中国古代讲授、

“讲学”传统是否对近代存在影响的问题，陆老师补充了古代书院会讲、讲学的史实。他认为传统讲学仍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教育制度中进行，和在近代缜密完整、制度化了的教育体制中的讲授有所不同，二者应用的学程阶段亦有所区别。另一个议题则是在近代知识与德性逐渐分离的趋势下，如何在新型讲授中安顿“古”的因素。陆老师回应表示对于晚清近代的研究，需要把概念化的东西还原到社会语境中，梳理其中的趋势。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她关注教育面向，希望主讲人详述“读书革命”这一概念在教育史上的意义。陆老师认为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制度、实践、书籍、阅读等各个层面都存在变化，而他所说的“读书革命”只是其中一个面向，的确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回应这些问题时，他也谈到近来流行的晚清阅读史研究，若只关注阅读对象和内容的变化，似无法与既有思想史研究（特别是西学东渐研究）有效地区分开来。教育史的角度和方法，是将阅读拉回具体语境的重要途径。

（撰文：周旻）

07

韩巍： 西汉竹书《周驯（训）》与“黄老道家”



2016年11月16日晚，文研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未名学者讲座”第七期，主题为“西汉竹书《周驯（训）》与黄老道家”。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老师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担任评议。

讲座一开始，韩巍老师介绍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入藏和整理情况，并介绍了竹书在形制和内容方面的概况。西汉竹书于2009年1月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共有竹简3346枚，估计拼合后完整简在2500枚左右。竹简按长度分为三种规格，分别为长简（约46厘米，合汉尺二尺，内容有《日书》《日忌》《日约》等）、短简（约23厘米，合汉尺一尺，内容有医方等）及中等简（29.6-32.5厘米，合汉尺一尺三寸至四寸，其余内容均属此类），这次讲座的主题《周驯（训）》就属于其中的中等简。全部竹简均属古代书籍，不见文书类简。竹书内容大致涵盖了《汉书·艺文志》

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大门类。北大简是继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之后出土的又一座西汉典籍宝库。竹书法精美，据竹书中的“孝景元年”纪年，结合文字形体和内容分析，其抄写年代约在西汉中期武帝前后。

接下来韩老师介绍了西汉竹书《周驯（训）》的概况。《周驯（训）》现存竹简211枚，包括完整简206枚、残简5枚。整简长30.2-30.5厘米，宽0.8-1.0厘米，三道编绳，有契口。一般每简抄写24字，文字分布均匀整齐。书体接近成熟汉隶，与定县八角廊汉简相似，但显得更为古朴，估计抄写年代当在西汉武帝、昭帝之间。竹简背后有斜直划痕，有助于复原竹简的编联顺序。3号简背面近上端处写有“周驯”二字，书体与正文一致，应是抄书人题写的篇题。211号简正文之下题写有“大凡六千”四字，书体与正文明显不同，应是竹书使用者所加的“计字尾题”。篇题和尾题显示《周驯》

全篇是编联为一个简册。以每简 24 字推算，全篇 6000 字应有竹简 250 枚，实际简数应该略多于此。现存 211 枚简，约五千余字，可见有 40 余枚简、近千字的内容已经散失。

然后韩老师介绍了《周训》的篇章结构和各章内容。《周训》主体分为十四章，每章均另起一行抄写，章首有圆形墨点“●”作为提示符号，章末未写满字的简形成“留白”。多数章均以“维岁某月更且之日，寡太子朝，周昭文公自身贰（敕）之，用兹念也”开头，章末用“已学（教）太子用兹念，斯乃受（授）之书，而自身属（嘱）之曰：女（汝）勉毋忘岁某月更且之训（训）”结尾。这样的章共有十四个。各章以月名为序，依次为“正月”至“十二月”和“闰月”；另有“岁（冬）终享（驾）贺之日”，章末称“腊之明日亲（新）岁之训（训）”，应为最后一章。每章一般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二月、十二月章有两个故事），后加一段议论。唯“正月”章全为议论，而“十二月”章在故事之前也有长篇议论，似形成“首尾呼应”关系。前十三章中有七章内容与“立嗣”有关。其中，七月和九月的故事在传世文献如《吕氏春秋》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四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的一部分及闰月的故事在传世文献中有记载但不如《周训》详细，其余的故事在传世文献中没有见过。

韩老师对《周训》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推测。《周训》全篇可划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是“正月”章至“十二月”章，第二层是“闰月”章，第三层是“小章群”，第四层是“岁终享贺之日”章。最早形成的应是“正月”至“十二月”章，是经过有意编排的整体，后来增加了“闰月”章。“小章

群”可能是在文本流传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然后加以编辑。“岁终”章最后形成。因此，《周训》文本的形成也可以看做一个“层累的历史过程”。《周训》所记史事年代最晚者为秦献公，而竹简中的主人公周昭文公和共太子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另外从《周训》的文字、用词和语法特征看来，其成书年代很可能在战国晚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下著录“《周训》十四篇”，书名相同，“十四篇”也恰与《周训》十四章相合，两者应为同一种古书。

接下来韩老师分析了《周训》所体现的思想。首先是《周训》中的“为君之道”，集中见于“正月”章，采用排比句式讲述“为人君者不可以如何”，现存 11 个“不可以”（原应有 12 个），似两两为一组，共分六组：

- 第一组：（1）为人君者赏罚不可以不当；（2）为人君者决狱不可以不正。
- 第二组：（3）为人君者不可以轻言；（4）为人君者不可以言不智。
- 第三组：（5）为人君者不可以尽情于其臣；（6）为人君者不可以大恚。
- 第四组：（7）……妨于寿；（8）为人君者不可以大酒。
- 第五组：（9）为人君者不可以不好听；（10）为人君者不可以信谗。
- 第六组：（11）为人君者喜怒不可以旋发之于前；（12）为人君者不可以通其群臣之言。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条与法家思想相似的说法，这也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

另外，《周训》引用了“彭祖”的话。作为一个著名人物，彭祖在传世文献中却没

有留下直接的语录，而出土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失。《周训》的“正月”章（简 4-6）记载：

为人君者，不可以轻言，轻言则多失，多失则多悔。故彭祖曰：“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此之谓瘠？

在其它出土文献中，也有与上述“彭祖”之言类似的语句，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

戒之戒之，材（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恭之恭【之】，食不可赏（偿）。术（怵）愁（惕）之心不可长。

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思之思【之】，某（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货不可归。

另外，上博楚简中有《彭祖》篇，其中有“= 之谋不可行，述（怵）惕之心不可长”的记载。根据《周训》提供的线索，可以确定秦简《为吏之道》中的这些段落应出自战国时期的“彭祖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彭祖书”一类依托彭祖的书一般都与神仙养生等内容有关，出土文献告诉我们“彭祖书”还包括修身治国方面的内容。

在《周训》的“正月”章（简 11-14）中，还有一段引俗谚的话：

为人君者，不可以不好听，不好听则毋从智（知）下之请（情），故必听而勿闻，智（知）而默前。此谚之所谓曰“不狂不聋，不能为人公”者也。故《书》曰：“大智似狂”，其此之谓乎？

在传世文献中，与上引“谚”相似之句有很多，如《太平御览》卷 496 引《慎子》曰：“谚云：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意林》卷二引《慎子》无“谚云”二字。）又如《释名》卷二《释

首饰》：“故里语曰：不瘠不聋，不成姑公。”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今江淮间犹有此谚，云‘不痴不聋，作不得阿家翁’。”可见这种说法到很晚仍然流行。关于“大智似狂”的出处，文献指示其与太公有关，如《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八《傲慢门附狂》：“太公云：‘大智似狂。不颠不狂，其名不彰。’陈平。”《史记》记载陈平少好黄老之学，该条文献最后的“陈平”也许能给我们同样的暗示。又如《太平御览》卷 739《疾病部·佯狂》引《周书》：“太公曰：知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这说明上引《周训》之语与太公有关系。战国秦汉间的“太公书”数量很大，《汉志》“道家”下著录有《太公》两百多篇，分《谋》、《言》、《兵》三类。《周训》引“太公”也说明其与道家的联系。

综合以上的分析，韩老师总结了《周训》的思想主旨。《周训》以道家、法家思想为主，这是很明显的。但其中还有“孝悌慈仁”、“慈惠温良”、“尊仁贵信”等道德教训来自儒家，“立贤”、“让贤”以及“敬天”、“畏鬼”、“事神”等思想似来自墨家。因此，《周训》的思想主旨可概括为：道法为纲，杂糅儒墨。

《周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与我们所熟知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有着较大的差别，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西汉时期“道家”的特点呢？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两种文献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录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道家”类小序。《论六家要旨》提到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汉志》小序提到“道家者流，盖出

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裘锡圭先生在《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家”》一文中即指出：“西汉时代流行的道家思想，或者说当时的道家思想的主流，不是后人所熟悉的老庄一派的思想（实际上老和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是一种以道、法为主，兼包阴阳、儒、墨等家思想的庞杂体系。”

汉初的道家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黄老之学”。“黄老”之“老”即《老子》，“黄”指依托黄帝故事或黄帝君臣问对的“黄帝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书”，主要集中在“诸子”类的“道家”、“阴阳家”和“数术”、“方技”类。李零先生在《说“黄老”》一文中将《汉志》“道家”所录古书分为四大类：一是阴谋书，即为首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莞（管）子》；二是先秦道经，即其次的《老子》《文子》《庄子》直至《鹖冠子》等书；三是黄帝书，即《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五书；四是西汉道论，列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汉志》中，《周训》位于先秦道经之后、黄帝书之前，表明了《汉志》对于《周训》的定位。在黄老之学中，“黄”偏技术，“老”重思想；前者是知识基础，后者是理论抽象。“老学”又分刑名法术和神仙养生两大系统。

接下来，韩老师对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源流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在汉初，黄老之学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汉初名臣治“黄老之学”者有陈平、曹参、汲黯等人，文帝窦太后“好黄老之言”，影响直至武帝初期。1974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

子》乙本卷前有古佚书四种：《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或认为即《汉志》之《黄帝四经》），《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有《九主》（属《伊尹书》），被公认为“黄老之学”的代表。

关于《周训》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韩老师认为，《周训》采取周昭文公训诫共太子的形式，其原始材料可能来源于周昭文公的臣下或门客，编者或为战国晚期两周地区士人。《周训》所述并非历史实录，而是依托历史人物、借“讲史”宣扬政治理念的“子书”。（“子书”源于“事语”，《周训》的“训诫体”与“问答体”实质相同。）《周训》“道法结合、杂糅儒墨”的思想倾向与“黄老道家”相符，其“讲史”的形式也符合《汉志》对道家“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描述。班固自注引刘向《别录》称《周训》“人（民）间小书，其言俗薄”，《周训》篇幅不大，文字浅显，思想亦平平无奇，符合刘向的评价。《周训》提供了一种战国晚期“道家”著作的新类型，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中大量存在的历史题材作品，以及它们与“子书”之间的联系。

接下来，韩老师分析了《周训》“讲史”的特点及儒、道两家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儒家代表作如《孟子》《荀子》等，较少引述历史故事；其内容和叙事也有一定模式，大致以《诗》《书》所载为准，范围不出“尧舜禹汤文武”等圣君。儒家推崇上古圣王，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春秋战国的“近代史”持否定态度。道家（尤其“黄老学派”）和法家著作多引述历史故事，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讲

史”同时也在“创作”历史。道家有大量依托黄帝的“黄帝书”和依托商周名臣的“阴谋书”。道家、法家更重视“近代史”，与其“法后王”的态度有关。《周训》“讲史”的重点是春秋战国的“近代”史事，其“讲史”主要为配会议论，并不在意“史实”如何，甚至故意修改、“虚构”历史，是与道家讲史的特点相符合的。

讲座的最后，韩老师对《周训（训）》与《吕氏春秋》的关系进行了推测。《周训》以“十二月”为叙事结构，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相似。“七月”章赵盾故事和“九月”章秦穆公故事见于《吕氏春秋》之《爱士》、《报更》两篇，且文本最为近似，应为“同源”关系。末章“六王五伯”之说，“六王”、“五伯”连称在传世文献中仅见于《吕氏春秋·当务》。学者认为《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黄老之学”集大成之作，其中的道家思想不少源自三晋地区，这与吕不韦的出身背景正相符合。吕氏门客中当有不少三晋两周地区士人，故《吕氏春秋》吸收部分《周训（训）》的影响十分自然。秦简《为史之道》大量采用道家经典中的语句，如《老子》、《彭祖》等，有学者认为是受“黄老之学”影响，且可能编辑于吕不韦当政时期。西汉早期“黄老之学”形成压倒优势，与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基础有关，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战国秦汉文化的继承性。

主讲结束后，陈鼓应先生对讲座进行了精彩的评议。陈先生表示对于出土文献，他怀着与饶宗颐先生一样的感情，认为它们非常神圣，是 Bible（《圣经》），同时感谢整理出土文献的同仁花了很多心血来整理竹简。说到黄老思想，陈先生认为齐国的“稷

下黄老”非常重要。稷下先生 76 人，有姓名可考者 6 人，其中 4 人都是学黄老的，可见稷下学派中黄老之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黄老怎么会与法家结合在一起呢？因为二者都强调“公”（universal）。黄老思想的心胸开阔，在汉初，黄老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对大一统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最后，陈先生希望学界能够对“黄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主持人郑开老师对讲座和评议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并指出出土文献和思想史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郑开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对话体这种形式是有利于哲学思想的阐发，但《周训》的“训”主要还是一种训诫体的意思，它与对话体还是有所不同的。二是从竹书《周训》的结构来看，它采用了时间的框架，西方汉学家很重视中文典籍中对这种时间框架的运用，并将其称为“时间的统治”，这也是这种文体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三是由于汉简《周训》的篇题定名我们认为它是属于《汉志》中的黄老之学的，但从文本本身来看，它与黄帝书和《老子》的思想都存在着差距，我们还应该思考如何解决这些疑点问题。

最后，主讲人和评议者与听众进行了互动。韩巍老师向听众们简要回答了《周训》的作者身份和流传情况的问题，陈鼓应先生向听众分享了自己对黄老道学对当下社会有什么意义的理解。最后，韩巍老师表示，我们期待思想界更多精彩研究的出现，以进一步探索北大汉简《周训》的思想价值及其与黄老思想的关系。

（撰稿：何晓歌）

08

王洪喆： 信息时代的人与机器——维纳论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延伸

2016年11月22日，文研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未名学者讲座”第八期，主题为“信息时代的人与机器——维纳论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延伸”。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老师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担任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吴国盛教授担任评议。

在正式演讲之前，王洪喆老师表示这项研究起源于写作博士学位期间的一些线索，它不是传统的传播学工作，而是一项带有跨学科色彩的研究，他自己将之戏称为“野路子”。讲座以维纳1941年看过《公民凯恩》后给导演奥森·威尔斯写信这一历史轶事开始。占据信件绝大部分篇幅的是一部原创的电影剧本——信息与电子工程的世界史。维纳描绘了电信业在19世纪的起源，关于电报与电流的战争，对技术专利与电话网霸权的角逐，以及这一切将要颠覆性地塑造20世纪和未来世界的可能。维纳试图说服威尔斯将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必将“超越《公民凯恩》对于大众报业的描写，筑就一部预告未来的史诗”，因为“信息即将取代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成为权力操控未来世界的基础”。王洪喆老师在做了一些史料考究后发现，该剧本极有可能被威尔斯拒绝了，它可以被看做维纳控制论研究生涯



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反映了他既想发展信息技术又想坚守人类自主性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贯穿维纳的一生。

控制论的起源

接着王洪喆老师带我们回顾了控制论的起源。二战期间，维纳应军方征召进行武器研究——防空武器高射炮的瞄准系统——这一研究直接导致了维纳开启控制论这一领域。在研究如何使用数学理论准确预测飞机动态位置以使得炮手准确击中飞机的过程中，维纳和他的研究伙伴机电工程专家比洛（Julian Bigelow）发现，高炮系统是人体和机械共同构成的人机系统。对人机系统的研究需要以生物逻辑来理解机器运作，同时以机械逻辑来理解炮手的行为。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使机器模拟炮手。

反馈是控制论的核心。王洪喆老师以轮船转向器的工作原理为例向我们解释了负反馈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并说明了负反馈机制可能存在的问题——误差的不断放大导致负反馈装置的不受控震荡。机器的这种震荡启发了维纳思索人类行为中是否存在类似的由负反馈引起的震颤。在询问哈佛医学院的生理学家何罗修（Arturo Rosenblueth）博士后，维纳发现由小脑的病理学引起目的震颤或小脑震颤——帕金森病的一种——很好地验证了他的猜想。这些相似性促使维纳尝试寻找解释机器控制和人类行为的通用模式——即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讯的科学——这些探索最终导致了1948年《控制论》的出版。

梅西会议、CNM与控制论

王洪喆老师接着谈了维纳在《控制论》序言中所描述的理想科学共同体——来自不同领域的由于精神上的需要而聚集起来的自由的科学家群体。于1946年至1953年举行的由小约西亚·梅西（Josiah Macy, Jr.）基金会（控制论学者帮助该家族治愈疾病）赞助的梅西会议使得这样的科学共同体（也就是后来的控制论群体）成为可能。

王洪喆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包括维纳、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在内的梅西会议的15位成员，并重点探究了为何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这两位对数学、工程和神经科学缺少专业知识的知名人类学家参加了所有十次会议并扮演重要组织角色。这对人类学家夫妇与控制论之间的勾连关系与他们的战时身份有关——1940

年，玛格丽特·米德加入国家士气委员会（CNM, 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这一组织旨在研究导致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崛起的条件，以及如何避免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发生，其研究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发。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学者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认为，文化工业的所有权控制和单向传播方式导致了“法西斯人格”的产生。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对该观点相当认同，认为“奥森·威尔斯和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对我们时代的希特勒主义、墨索里尼主义、斯大林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所有其他恐怖主义的理解作出的贡献，比其他所有的学理分析都要有效。”而贝特森和米德在巴厘岛进行人类学研究时发现，土著的交流方式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的单向式传播。相反，其交流是互动式的和多层面的，这种交流方式会促成“民主人格”。由此他们确信，不同的交流方式对应不同的人格，而控制论物种基于反馈不断与环境进行互动直至适应环境、形成稳态这一特征，刚好与CNM组织对法西斯人格的规避以及人类学夫妇对民主人格的追求相一致。

维纳反对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科学

控制论很快染上冷战意识形态并从物理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贝特森和米德出于冷战社会科学家的实用性，相信控制论可以解决混乱时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是维纳本人对控制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持悲观态度——尽管在创始之初，控制论就被定义为既可以用来研究机器也可

以用来研究人的通用模式。

他的悲观源于以下几点：

首先，对影响社会的变量进行统计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内稳定性上，而只有诸如原始人部落那种小而紧密的社会才具有这种内稳定性。现代社会过于巨大复杂，人与人的接触需借助通讯工具，而通讯工具通常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并因其能够盈利而被争夺，这些特征都是反内稳定性的。

其次，维纳认为控制论会消弭主体的自主性，使个人在微观层面上成为被一层的行动和欲望分割的机械存在，在宏观层面上成为被“恶棍”操纵的“蠢货”，这抽空了自由人本主义的基础。

再次，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间有充分松散的耦合，例如对于天文学来说，观察者太渺小不足以影响星辰的运行；而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观察者无法与被观察对象高度分离，观察者会对被观察对象施加影响，例如原始社会经常被观察它们的人类学家改变。

维纳的反军事立场

由此，维纳彻底的人本自由主义跟米德等人的冷战自由主义之间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而梅西会议学者与军方的关系，加剧了维纳同这个团体的分歧。在美国科学家那里，对纳粹的作战是对自由的捍卫和正义的伸张，而广岛原子弹的爆炸使得这一共识破灭。广岛原子弹事件之后，维纳拒绝了军方的一切资助，与控制论团体的战略科学家开始决裂，后者将继续与军方保持密切关系，并塑造美国战后的社会

科学。在1949年8月完成的《人有人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维纳批评了法西斯主义、垄断企业、军工联合体政府和流水线工作的非人性效应。此外，他还通过宣传他对军事研究的反感来警示平民关于控制论的认知。

维纳的反军事立场导致他与沃伦·麦库洛赫（Warren McCulloch）——控制论排名第二位的领袖学者，同时也是个好战的反共主义者——分道扬镳。他批评他的同事约翰·冯·诺伊曼和克劳德·香农是冷战斗士；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捍卫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试图以教授马克思主义以推翻政府的德克·斯特罗伊克（Dirk Struik）；因与著名的共产主义者JBS Haldane保持友谊而遭到FBI监视。

赛博格与自动机器

基于人本主义价值观，维纳认为将控制论用于军事和社会控制是危险的，一个更有益处的领域应该是人体工程学和假肢研究。他参与了听力手套、模拟生理疾病的蛾/臭虫以及“波士顿手臂”等项目，并认为这是“最远离战争和剥削”的领域。但他没有想到，即使在这些领域，军事和经济力量也是无孔不入的——军事研发对医学控制论和仿生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波士顿手臂”的资助方某职业保险公司出于“省钱”而非出于维护人的尊严才资助该项目。

在1964年出版的《神与魔像》中，维纳以犹太传说中的Golem隐喻人工智能，警示控制论的潜在危险——人类通过创造生命扮演上帝的陷阱。在本书中，维纳处

理了机器学习、机器繁殖、赛博格与自动机器这三个涉及哲学的控制论领域。

控制论在社会科学中的扩散

尽管维纳反对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但控制论和信息论不可避免地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扩散，成为冷战社会科学的通用理论。从1948到1952年，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论文开始引用维纳和香农的文章；施拉姆将控制论引入传播学；20世纪五十年代，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西蒙开始应用控制论解决管理科学问题。西蒙等社会学者在五六十年来对控制论的热衷是量化美国社会科学这个冷战工程的组成部分。数学建模是战后社会科学“行为革命”的标志。这个主要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运动改造了战后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精神病学和政治学。

控制论与反共

在冷战的高潮时期，军方和政府直接介入控制论的社会科学应用，反共是公开的直接目的。1964年美国控制论学会（ASC）成立，创造ASC的动力不是来自科学界，而是来自一个隐蔽的政府科学赞助者——中央情报局（CIA）。

王洪喆老师为我们梳理了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科学研究打击共产主义的几种途径：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通过虚拟基金，将经费经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过滤，资助MIT国际研究中心和MKUltra计划（心灵控制药物开发项目）。王洪喆老师还提示，早在美

国控制论学会建立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和几个控制论研究人员取得联系并给出了史料作为支撑。

中央情报局想要借美国控制论学会来应对苏联在控制论发展上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在CIA内部，要数科学情报办公室的一名俄裔专家约翰·福特最为焦虑。1962年10月与肯尼迪总统的高级官员会晤期间，福特提出“苏联与日俱增的对建设共产主义的控制论战略的展开，对美国西方社会产生严重威胁”。

在赫鲁晓夫及其后的苏联，控制论一度取代了辩证唯物主义成为统领所有学科的底层哲学方法论。在党的官方文件中，基于控制论的计划经济和自动化成为通往共产主义的科技和物质基础。1962年11月，肯尼迪批准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下召集一个控制论小组，协助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控制论进行评估。到1964年，PSAC的控制论小组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的控制论威胁并不存在。苏联由于缺乏计算机，所以在所有科学领域都落后于美国几年。报告得出结论：控制论并没有成为一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使苏联的经济系统更趋于理性，进而使苏联的思想在许多领域更接近西方。

控制论左翼

最先将控制化与后工业社会联系起来的是战后的新左翼联盟。1964年的“三重革命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the Triple Revolution）起草了一份宣言：三个独立而相互加强的革命正在发生——控制化革命，原子武器革命和人权

革命。宣言突出了控制化，提出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项权力来保证公平分配这些新增财富。

打破工作和收入之间联系的提案可追溯到信息社会还未全面到来的60年代，这种欧美世界的左翼自由主义技术议程的浮现，需要被放置在全球60年代更为激进和多样的社会主义控制论实践中加以理解：比如，苏联的经济互联网工程、智利阿连德的控制论互联网、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电子群众运动”。而欧美60年代新左翼议程机会的丧失，也必须被放在冷战构造下，苏东阵营和“第三世界”具有意识形态对抗性的社会主义议程的陷落中加以分析。1973年，在阿连德政权连同他的控制论互联网“赛博协同工程”（Cybersyn Project）被颠覆的同一年，丹尼尔·贝尔出版了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成为制定后来“信息社会”话语的关键文本。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早写作中，贝尔就明确表达了反对新左派对后工业社会的政治议程：他认为“三重革命”对控制化可能带来的丰裕社会的希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且认为理论知识（而不是技术）才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在60年代中期，贝尔成为由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发起的2000年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Year 2000）的主席，委员会吸纳了包括米德在内的多位前梅西会议成员。作为委员会主席，贝尔否决了控制论在社会预测模型方面的应用。他批评了苏联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为苏联经济起草的控制论模型，认为这种模型必然是封闭和机械的，而对人类意识和自然的控制必须建立在一个开放系统之上。

在讲座的最后，王洪喆老师又带我们

回到了维纳的那封信。他补充说，奥森·威尔斯回绝了维纳的合作提议后，在1973年应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的邀请在他的纪录片《未来的冲击》中出镜。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于1983年在中国出版，他于同年访问中国，并在上海作相关演讲。托夫勒认为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三次浪潮的发展阶段，传统农业、工业、信息产业并存。历史契机使得中国完全可以跨越第二次浪潮某些阶段，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重点发展信息产业。托夫勒认为中国当时乡镇企业经济正是第三次浪潮所呼唤的那种去中心化的生产模式。他临走前留下的电视片当时在全国各地大量放映，给刚普及电视的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奇观和震惊体验。

最后，王洪喆老师谈了一下自己做这项研究的初衷。他认为回溯历史可以帮我们认清今天常用的信息社会话语的来源，探索背后的技术路线斗争过程，并对未来控制论可能产生的样貌有更多样的想象和干预。

讲座结束后，吴国盛教授进行了评议。吴国盛教授感叹讲座唤起了他许多回忆。他谈了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三论的流行。认为三论主张以发展、联系、整体的眼光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喜欢这个。接着他对王洪喆老师的讲座进行了一些补充，提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曾批判过控制论。随后在问答环节王洪喆老师对这一补充进行了回应，提出苏联对控制论的态度因为学界对控制论中社会主义内容的挖掘经历了一次转向。

吴教授还谈了《控制论》在中国的翻译——控制论这个词是龚育之先生翻译的，但是全书是多人共同翻译的，因为50年代翻译该书时苏联正好在批控制论，因而译者

署名郝季仁。吴教授接下来循着维纳控制论创始人这一身份，和反对把理论用于社会领域这一选择，思索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何在。他认为人文和社科的区别在于对象和方法的不同，而维纳有人文精神，倡导把人当人看。他还和在座师生分享了陈嘉映教授的看法——社科研究者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比研究对象高，而人文学者通过阐释与之看齐。他认为社会科学的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导致控制，先是控制原始人，然后控制现代人。美国和苏联是现代性的两个版本，都追求科学，都想要控制世界。维纳的控制论被编织到美丽新世界中去，但是维纳本人却有人文精神。他认为人文的合法性得不到伸张，

现在是理科的地位高于社科，社科的地位高于人文。

在问答环节，王洪喆老师用一段话为这次讲座作结：为什么我们对当下的人工智能革命毫无抵抗、缺少论辩？因为20世纪这个漫长的文化和技术路线斗争过程已经发生过了，我们生活在它的历史后果里。美国在50年代已经有过对信息技术的道路的政治性论辩，但经过冷战的变迁，资本主义已经将维纳代表的这些意见内化、软化。所以今天要恢复想象未来的能力，就要把这些历史中的“幽灵”重新召唤回来。

（撰稿：文汇）

09

程乐松： 日常中的长生——道教的生命技术与现代困境

2016年11月29日，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第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日常中的长生——道教的生命技术与现代困境”。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副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担任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担任评议。

程乐松老师对于本次演讲主题总结为两点：一是道教的长理想；二是道教作为一种信仰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在我们的基本认知中“日常”与“神圣”、“日常”

与“超越”是分开的，我们不能想象在日常中有长生的存在，或者说我们不能想象“日常”与“长生”是可以兼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对西方宗教及其理论的认识，在西方宗教传统中，他们总是将“日常”与“神圣”或“日常”与“超越”分开，这样的认知传入中国就会产生逆反性或颠覆性的状态。中国人的“超越”永远根植于“日常”，“日常”本身就是“超越”的根基与土壤。同时，我们在“日常”中看到的杂乱与整全为“长生”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而这种丰富



程乐松副教授（左）与何建明教授（右）

的杂乱的背景使得我们很难对道教的生命图景进行划一的、一贯的表述。当我们用现代知识去审视道教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基本判断：道教非常杂乱。杂乱意味着我们从学术上很难对其进行归类，很难进行理论性的表述，很难进行框架性的诠释。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所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问题，因为道教的历史事实是同神圣传说、仙传、神秘技术等混杂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自一开始理解道教便带着一种现代性的傲娇或现代性的傲慢。我们首先认为道教是杂乱的、迷信的，有了这个前提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论证。而对于我们而言，不是要说它是杂乱的，而是要解释它为什么是杂乱的，它背后的理路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及这个信仰世界所承载的生活世界。道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去理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及由信仰世界构成的历史现实。因此，就道教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窗口也是一种知识系统。但是，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放下现代性的傲慢。当我

们以自己的知识去理解道教的时候，我们只是获得了一种自我理解或“自解于心”，而并不是对于道教本身的理解，我们仍然处于无知状态。我们不能对道教做辩护，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辩护。对于信仰者而言，信仰是不需要辩护的；对于非信仰者而言，为信仰辩护是徒劳的。

程老师在谈论道教的起点与界限这个问题时，以佛教为例来说明佛教本身的许多知识是不需要普及的，但就道教而言，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大多数人对于道教都非常陌生而且缺乏理解。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道教信仰传统的起点是什么，界限在哪里？我们今天所见的《道藏》不能当作历史来读，甚至不能当作经典来读，如果我们去《道藏》寻求武功，那就是缘木求鱼。这种复杂性对造成我们在社会文化上的隔膜感，因此这种隔膜感是研究道教本身首先要面临的挑战。道教是非常讲究实践与技术的宗教，对于道士而言，他们所理解的神圣性是效验，即实践的有效

性。而对于是否在道德上领先则是次一级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技术，这种技术包含在信仰之中，然后便是实践；实践有效自然便赢得他者的信任。那么效验从何而来？效验来源于隐秘的长生技术修炼与实践，并且指向日常生活需求，并通过此种需求的解决反过来论证长生技术的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我们看到的道教。而我们所理解的道教内容既有历史性又有区域性，还有社会性、文献性，甚至包括神迹性。因此，我们对于道教的惯常认知可以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就内容而言是散漫不经、怪力乱神；就社会而言是日用不知与习焉不察；就生活而言是长生隐逸与慈俭为先。因此，道教由此三种面向构成便显现出杂乱性、弥散性。而在西方宗教理论笼罩之下，我们便会认为道教是一种巫术思维的盛宴，用弗雷泽的话说，它符合巫术最基本的规则的一种想象性技术——将身体想象成宇宙，有联系的东西可以互相交感。这是将道教作为一种现代性叙述的独特背景，我们将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信仰传统将其叙述出来，这是一种叙述需求。而对于道教修炼者而言，没有这种叙述需求。只有当道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树立起来的时候才有这种叙述要求，而我们对于它的基本认识与尊重也应该以此为界限。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有了此种叙述需求便是它本身。对于切身体验有了真实效验的信仰者本身，他不需要这种需求，对于在此种习俗生活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日用不知、习焉不察，他们也不需要宗教技术来填满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清楚的知道

这出于一种叙述需求，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保持着无知者的态度。

接下来，程老师讲到道教的“日常”。众所周知，道教是中国本土性宗教，但本土性对于道教意味着什么？道教的本土恰恰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整全性，没有一个分割的道教，或者说没有一个分割整全的日常生活的道教。如果用类型学对此进行分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何在分割的过程中保证日常生活的整全性，因为日常是不能被分割的。对于“本土”或“土生土长”，我们往往将其作为一种历史性去理解：他的思想观念、信仰形态都是从汉代的土壤中出现。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在程老师看来，道教信仰作为一个连续的面向超越的信仰不断从任何一个历史当下的生活空间抽取信仰资源并且以此回应当下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信仰需求，这才是本土。也就是说，本土并非一成不变、静态的、一次性的传递和梳理，而是一个动态和鲜活的过程。接下来，对“日常的日常性”作了阐释。所谓“日常的日常性”是一种内蕴常识的、当下浸入的生活场景。只有在常识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生活世界。在任何一个鲜活的当下，而非经过信仰的颠覆、神圣的启示，这便是当下浸入的生活场景。另外，道教的叙述方式将神秘化与去神秘化结合在一起。所谓神秘化，就是在固定范围内师徒口传心授。

程老师接着谈到道教长生的三种面相：第一种是长生的技能，比如特定时间存想日精进入体内以此获得神通；第二种是长生的叙事，即道教中关于长生的故事，至于为何如此不是道教关注的问题；第三种

是长生的信仰，长生的叙事支撑着长生的信仰，而且指向长生的实践。长生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但这种信仰确是一种持续的可能，它是神人之际的桥梁，因此可以实现神人之间的转换。但是道教必须置身于浸入性的日常之中才能使得长生得以展开，换言之，道教长生对于内部人员来说是一种自信的修炼，对于外部人员来说是一种需要被叙述的对象。那么生命技术何以导向长生？生命如何趋向不死？道教认为人的身体同天地运行规律是一致的，通过调节自身运行节奏与宇宙实现同步，以此实现生命的不朽，这是道教长生信仰的宇宙论。

以上所论可以归纳于“长生”与“日常”，那么如何理解二者关系？我们中国人对于超越的理解是“趋吉避凶”、“长命富贵”，中国人功利的生活方式恰恰是证明其与天道是相合的。一个人获得很多福气，恰恰是顺应天道的结果。日常对长生的需求，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日常必须依赖长生技术所带来的生命力量；第二是道德生活的范例，其指向恰好是长生的效验；第三是日常需求需要长生技术，例如求子、健康长寿等。如果长生对于日常是有需求的，那么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日常？对于长生的理解从何而来，我认为是靠常识与共识，而非知识。我们现在对于常识与共识的理解是从知识来的，而在传统生活中有常识与共识就够了。常识会形成一种共识，然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常识与共识一起构成与长生有关的日常。在此基础上便可以解释道教的现代困境：日常的转换。我们今天的日常不是传统意义的日常，原

有的传统常识退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常识来源于知识，而很多知识往往是反常识的。我们今天的常识是由知识构成的，并将不符合我们知识的常识逐渐剥离出去。以此定义日常，日常转换之后，生命技术自然隐退，我们不需要用中国化的方式来理解生命。因此，伴随生命技术的退场便也逐渐丧失了神秘性。现代知识规范后的日常使得道教没有合理性的日常基础，其生命技术本身必然受到挑战。当然，道教的长生是浸入性的实践，只要进入此种状态之中，对于道教的任何反击也便没有意义。因为只有发生在身体之内的效验才是最真实的。

今天的讲演并不是要说明道教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而是探讨道教为什么会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文化形象，其背后的逻辑是道教本身的问题吗？当下知识体系是被科学思维支配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可公开、可验证的。所有知识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不是等着被验证就是等待下一次的被驳斥，产生新的知识或新的假说。道教恰恰是神秘、隐秘的，与现代知识体系相悖而行。现代中国人接受可被验证的知识体系从而产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傲慢似乎也变得不难理解了。

程乐松老师讲演结束之后，杨立华老师回顾了早年学习道教、研读《道藏》的岁月，自我调侃没有足够的理论修养去进行系统化研究。杨立华老师一直认为道教是技术型宗教，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处充斥着道教徒似的生活方式，随后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认为中国文化对于天地万物保持着一种弱势态度，然后以《庄子》之《齐物论》、

《大宗师》关于“知”与“无知”理论表达中国人与西方对待自然强力改造截然相反的顺应态度。杨老师总结道，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

担任评议的何建明老师以自身与道教界的交往经历指出教内人员对于此种道教诠释化的模式是非常反感的。今天讲演是在相对否定的意义上来讲长生，如果从日常中来追求长生那是不可能的。一再强调现代性的傲慢恰恰是现代社会对于道教以及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不重视。何建明老师同意程老师道教长生是一种叙事的方式的说法，并将道教历代天师寿命作了一个数据统计，并得出结论：天师的平均寿命

为49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长生的理解只是一种信仰。道教的神仙信仰很多是死后成仙而非生前成仙，也就是“死后成仙”。神仙的理念并不仅仅是飞升，并以《钟吕传道集》中的地仙、人仙、天仙来论证不同类型的仙人其实有不同的神仙属性。何老师又以《养性延命录》中关于长生的理解以及道教内部存在的八段锦、太极拳等内功、静功解释道教长生的多种面相。最后，何老师总结说，我们应当以同情的心态理解宗教及其信徒的信仰需求，而不应当仅仅站在学者的角度叙述我们想说的、而不是他们需要的那些东西。

（撰稿：黄亮）

10

张海：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考古学的观察

2016年12月7日，“未名学者讲座”第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考古学的观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副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担任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韩建业教授担任评议。

早期中国一直都是考古圈内非常热门的话题，在西方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就经常提到“China before China”的概念，



亦即文字出现之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张海老师将通过这个时期的考古材料来描述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他的讲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回顾考古界对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历史，接着介绍中国考古学历构建的史前时空框架，最后重点关注陶器、玉器、铜器三类物质文化遗存的区域互动以及背后体现的时代变革。

一、历史回顾

——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学界对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历史与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张海老师即认为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强烈关注正体现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主要基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中不乏有三皇五帝、尧舜禹等传说祖先的记载。张海老师以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石为例，指出画像石上所绘之伏羲女娲、祝融、神农等传说人物实际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狩猎采集、用火、农业生产等要素密切相关。虽然它所记录的历史人物未必真实，但是背后反映的古人如何看待中国文明起源的观念却值得我们深思。接着，张海老师以南宋时期绘制的《禹贡九州图》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为例，指出古代文献除了包含对中国文明演进诸要素的记录，也不乏对地理空间的描述。《禹贡九州图》内含划分天下、山川景观、交通网络、国家控制等诸多观念，而何尊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已将“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的方位记录下来。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

代表的相关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他们大胆质疑古代文献记载的中国先秦史，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所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上古史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重建上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使命。新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傅斯年先生早年曾提出上古史的研究者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即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寻找中国早期历史的直接证据——既包括物质文化遗存，也包括更早的、未经后人“积累”的历史文献。

从最早在中国西北地区从事考古工作的外国人安特生，到由李济先生主持的我国第一次自主发掘的殷墟遗址；从起初以寻找甲骨为目的相对原始和落后的发掘方式，到梁思永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分别构建起中国考古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理论基础……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推动着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体系臻于完善，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愈加深入，尤以苏秉琦、严文明、张光直等先生的相关理论为代表，体现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巨大进步。是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合作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帮助我们获得更多信息与更新认识。

二、时空背景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考古学文化与年代

通过物质文化史研究建立起的考古学

时空框架是学界进一步开展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中国考古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建立起史前中国的时空框架，近年来，探源工程等相关工作又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了新的调整，以上都是学界深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前提条件。

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逐渐形成了粟作和稻作两大作物区。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两大作物区基本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开始出现交集，从而产生了稻粟混作农业区，而青铜时代的文明恰恰产生于这一混作地带。不同作物区内另有不同文化区，它们与当地生态系统紧密相关。这些文化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尤为明显，并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文化格局，直至青铜时代依旧保留，但是范围进一步扩大。考古学家正是依托这个格局中各个文化区的区域互动与时代变革来观察早期文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尤以龙山时代最为关键。

三、区域互动

这一部分，张海老师以陶器、玉器为例，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区域互动情况。这里的“区域”概念既有地理方位的本义，亦包括考古学文化传统的内涵。

1、以陶器为例

陶器的制作原料是陶泥，实则随处可见的泥土，故新石器时代的日用器主要由陶器构成。由于常见性与易碎性，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特色：并非实物的直接传输，而是装饰、器形以及器用理念等方面的传播、融合与变革。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与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三大陶器文化圈，分别是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所对应的“彩陶文化圈”、黄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所对应的“鼎文化圈”与东北地区赵宝沟—红山文化所对应的“筒形罐文化圈”。我们发现，彼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样在不同的陶器文化圈内均有分布。一方面，庙底沟类型的文化辐射范围甚广；另一方面，庙底沟类型最典型的植物彩陶纹样在其所处的文化圈中常见于卷沿曲腹盆及敛口钵等器类，但是在其他文化圈中却广泛施绘于瓮、筒形罐、豆等本地特色器类。换言之，庙底沟彩陶的传播并非源自陶器实物的远距离传输，而是纹样主题与装饰观念的大范围流传，如此，则有效规避了陶器易碎性的传播掣肘。

至于器物形制乃至器用理念的传播与互动过程，规律亦与彩陶相近。

器物形制方面，龙山文化新出现的鬻与盍，至龙山时代已广泛传播至中原地区、黄河上游及长江中下游，后成为二里头文化最典型的陶器类型。但是，各区域只是接受鬻、盍这类器形而非全然获取来自龙山文化的实物，所以不同地区的鬻、盍具有鲜明的特色，如龙山文化的鬻宽胖而石家河文化的鬻瘦长等。

器用理念方面，比如：作为炊煮器的空三足器（鬲、甗、甗等）最早出现于北方河套地区，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对当地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原及南方的用鼎传统逐渐被用鬲传统取代，鬲成为商代最重要的炊煮日用器。但是，自二里头文化始，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大量的仿陶青铜器，这

些空三足器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器形。换言之，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开始赋予这些空三足器更多的文化内涵——作为象征意义的礼器。空三足器固然源自北方地区，但是它们的器用理念在向后（时）及向南（空）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现象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无关系，张海老师在后文有关青铜器的讲述中还将再次提及。

要之，陶器具有原料易得、实物易损等自身特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区域互动方式即与这些特点相关。

2、以玉器为例

玉器与陶器相比，制作起来可谓费料、费时、费力，故其在史前文化中并非作为日用器的存在，而往往为社会上层所控制并且具有相当丰富的精神内涵。

由于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高，相关区域玉文化兴盛的前提是周边存在丰富的玉矿资源，反之，玉文化走向衰落的原因也往往与玉矿资源逐渐匮乏有关。

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与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了两大用玉中心，即：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它们兴起的基础便是周边地区存在丰富玉矿资源。至龙山时代，各地开始相继发生“用玉变革”：齐家、海岱与石家河形成新的用玉文化圈，以齐家风格为代表的华西系玉器走向兴盛的同时却伴随着红山、良渚等旧有用玉中心的迅速衰落。用玉重心逐渐从华东转向华西，个中原因恐怕正在于新矿源的发现（昆仑玉矿）以及老矿源的衰竭。

在以上提到的用玉中心或用玉文化圈中，玉器是最具代表性的权力表征物，几乎被贵族阶层垄断。以玉文化最为发达的良渚为例：良渚玉文化早期的纹样十分丰富，至中晚期之后则基本只出现一种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彼时，各种良渚玉器都在衬托这一形象，宗教意味愈加浓厚，似乎暗示了良渚社会上层阶级内部思想的统一。良渚文化盛极一时，社会内部精神世界高度统一的同时，却反映出整个文化的封闭性——从玉器区域互动的角度看，神人兽面纹样仅在贵族之间流传且施纹风格愈加隐秘。可见，良渚社会的上层阶级希望独享玉器尤其是它所包含的精神层面内涵，并不希望与其他社会分享，这样的社会实际是“封闭”的。所以，良渚文明向外传播的内容只是器形器类等“皮毛”，真正发达的思想与文化从未向外流传——如齐家风格的玉器即以琮璧组合作为典型，虽有良渚用玉传统的背景却无良渚用玉文化的内涵。

对于玉矿资源匮乏的中原地区，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并未产生发达的用玉传统，但是这里的上层阶级从未排斥外来玉器作为本地社会贵族阶层的权力表征物，比如陶寺大墓出土了极为丰富的随葬品，其中就包括从海岱或北方地区交换而来的玉器。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陶寺大墓的随葬品来源很广，反映了龙山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进行着开放的广域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中原社会的贵族阶层在社会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下需要更多的权力表征物，囿于本地并没有丰富的矿料及发达的用玉文化，他们只得从他处交换得到玉器。后者也为中原地区的贵族阶层不断开拓和发展出本

土能够创造的新权力表征物——铜器——提供现实动力。

四、时代变革

1、新的礼器载体——铜器

新石器晚期以来，中国境内开始陆续出现铜器，且早期铜器基本都是武器或者工具。然而，铜器在之后的社会进程中几乎没有发生延续性演变，而是直接发展到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传统。至二里头二期，青铜器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虽然这样的突变过程似乎暗示了一整套成熟的冶金技术由外部直接带入中原，但是中原地区能够成熟使用这套冶金技术并最终发展出一套发达的青铜礼器传统并非完全没有基础。

资源方面，铜矿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先民们在逐玉的过程中对矿石的认识愈加深刻，如二里头文化大量使用绿松石一类的次生产品即可能与早期铜矿的开发有关；技术方面，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在探索制陶技术的过程中对高温控制技术的掌握也愈加成熟；需求方面，中原地区缺少用玉文化和用玉传统，但是贵族阶层切实需要新的礼器载体与权力表征物，贵重而可得的铜器便成为新的追逐对象。

要之，铜器能够成为中原地区新的礼器载体有其资源技术的基础以及社会需求的背景。铜器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政治意义重大，比如张光直先生便提出过商代都城屡迁的原因可能正与追逐铜矿有关。

2、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依赵辉先生所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

史趋势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贯彻了几千年，这一持续而有力的历史趋势便肇始于公元前3000–2500年。张海老师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认识，认为当中原的贵族阶层主动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权利表征系统（即青铜礼器传统）之后，结合本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贯秉持的“开放性”区域互动特征，中原地区的社会开始形成“中心”和“边缘”的概念——位处中心的统治者控制着边缘的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将这些资源带入中心。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由古国发展至早期国家，控制范围远胜于前。

五、小结

正如张海老师在讲座中不断强调的，区域文化互动与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存在着密切联系——龙山时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来自于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北方与中原地区及其背后来自欧亚草原的新因素。由于缺少玉料资源，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始终未能发展出成熟的用玉文化，但是开放的中原社会除向周边社会广泛获取玉器、铜器等作为权力表征物之外，主动将原本作为工具或装饰品的铜器发展成一套全新的贵族表达，即青铜礼器系统。新的礼器载体促成了新的资源控制模式，以上便是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革。

中原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的独特道路即体现为从地理中心逐步走向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而这样的中心或许正是早期中国。

评议环节，韩建业老师首先肯定了张

海老师能够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描述早期中国形成过程所作出的努力，随后对本场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单梳理和点评。从讲座的题目《融合与变革》出发，韩建业老师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内部交流相对容易，所以地理环境是中国史前文化间发生互动融合的基础。对于玉器，韩建业老师认为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意义重大。至于史前中原地区的玉文化为何不发达，中间确有多种可能性，而张海老师在讲座中给出的解释——中原地区玉料资源匮乏——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接着，韩建业老师着重对早期中国的概念进行了更多阐述。他认为，早期中国实则一个文化圈，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韩建业老师有关早期中国的系统论述可见于氏著《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讲座的主持人孙庆伟老师进一步向两位老师追问“中国”尤其是“中”字的内涵。依孙庆伟老师所言，“中”字有一种突出自己的理念，对“中”的认同是理解早期中国的关键。既然如此，中心的概念是何时出现的？

张海老师认为“中国”概念的确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

在龙山时代经历了剧烈变革后，发展成为特点鲜明的复杂社会，他今天的讲述即旨在体现这一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不同的学科背景决定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因此不同学者对于同一批物质文化遗存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在张海老师看来，“中”就是中原，而中原地区的王国形态直到青铜时代方才出现。

韩建业老师则认为“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展。何尊“宅兹中国”的“中”指的是洛阳成周，后来慢慢发展到中原地区。直到清雍正年间乃至再以后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彼时的“中国”概念才与如今的广阔概念相近。当然，周代已经存在“天下”的广阔中国概念，比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等记载，但是，理解“中原”的内涵对于理解早期中国的概念更为重要——洛阳成周作为“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所处的郑洛地区处于中国地理、气候、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整合时期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强盛时期。换言之，绝非处处能够称“中”，中原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区域范围内对“中”字的认可形成已久。

（撰稿：李唯 张乐城）



高峰枫教授（左）向黄淳老师（右）授予聘书

11

黄淳： 品位之争——罗斯金《现代画家》的创作背景

2016年12月12日，“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品位之争——罗斯金《现代画家》的创作背景”。北京大学英语系黄淳老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丁宁教授担任评议。

黄淳老师首先介绍了此次讲座关注的主要人物约翰·罗斯金（1819-1900）。罗斯金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中经济状况较好，因此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

在游历、讲学和写书。罗斯金的作品涉及美术、建筑和社会经济学等多个领域。1843年，24岁的约翰·罗斯金出版了《近代画家》第一卷。此后的17年里，该书由一卷扩至五卷，终于成为19世纪英国乃至西方艺术评论的扛鼎之作，作者本人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牛津毕业生”也成长为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的宗师。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年轻的罗斯金关注艺术，又是什么原因推动他投入那么大的精力撰写《近代画家》？有学者认为

对印象派画家特纳的推崇是其撰写《近代画家》的主要原因，也有研究者指出该书许多理念基于对雷诺兹观点的批驳，代表了当时英国美术界新生力量对传统的扬弃。这两个思路非常有价值并且影响深远，但也并非面面俱到：两个角度都没有从正面回应罗斯金本人关于《近代画家》创作目的的解释——“将对艺术的了解和热爱传播到各个阶层”，从而“彰显造物的极致完善与永恒之美，并以此为准绳，检验一切人类的创作”。因此，在本次讲座中，黄淳老师将把《近代画家》放在“特纳”与“雷诺兹”以外的背景中考察，从19世纪上半期英国大众艺术批评的演进的角度重新审视罗斯金关于美与品味的理论探讨。

黑兹利特的鉴赏式批评

谈到大众艺术批评，我们首先必须看到艺术发展在大众生活中的状况。黄淳老师指出，工业革命与繁荣的贸易给英国中产阶级带来惊人的财富积累，这些财富除用来扩大生意和改善生活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英国的艺术品市场；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更多的人希望能在艺术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导。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曾有一名大众熟知的文艺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这个名字在《近代画家》中多次出现，他的作品也为罗斯金所熟悉。黑兹利特本人善画，在文学与美术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而且与英国的各种报刊联系广泛，经常在大众媒介上发表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但博学的黑兹利特从不采用说教口吻，反而总把自己装扮得如同博物馆里友善的讲解员，带着惊艳的

目光与读者一起分享经典作品带来的美感。

黑兹利特亲切而感性的品评一度为他赢得了不少读者。但“成也萧何败萧何”，随着人们艺术知识的积累，描述性的介绍和热情洋溢的赞美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罗斯金显然很熟悉黑兹利特的作品。《近代画家》第一卷里就引用了黑兹利特一段品评，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说法“太不专业”。事实上，整个系列的《近代画家》虽然对黑兹利特多有引用，但几乎全是否定。显然，读者变挑剔了，他们开始寻求更详细、更具体、更专业的指导，继续探寻品味的真谛。

里平吉尔的职业宣言

介绍完黑兹利特之后，黄淳老师接着讲到了爱德华·里平吉尔（Edward Villiers Ripplingille）。1843年，里平吉尔创办了杂志《艺术家与爱好者》并任主笔，以此为平台探讨“美”的话题。杂志第一期就提出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在品味的培养上，“画家才是唯一有效的信息来源”，这里的“画家”并不限于大师；其次，所谓的“画家培育品味”并不总通过画作来实现。他希望英国的画家们除了眼里有大师的作品和自己的画布之外，应当更加积极地利用各种媒介，为爱好美术作品的人们提供“准确的理解”和“系统的培训”。

对专业和画家权威的强调还渗透在里平吉尔关于“美”的理论探讨中。“什么是美？”针对这个永恒的问题，他答道：美是“多样”（variety）和“形式”（form）——多样与单调相对，形式与杂乱相对。在他看来，寻找美的征途上，单调与杂乱是绝

大多数人难以逾越的障碍，特别是当普通人试图将心中的美诉诸语言时会面临特别大的困难。专业技能决定了画家才是品味标准制定者的最佳人选。普通人要想把握“美”，不仅要注重观察力的培养，还必须依照“画家所理解的模式和艺术原理”来欣赏作品。至于品味，它只属于那些“能够如画家一般观察、思考和感受的人们”。

里平吉尔的系列论美文章与其说理论探讨，还不如说是职业宣言。假若黑兹利特为大众设计的审美教育以美术馆为理想场景，那么里平吉尔审美教育的背景一定是绘画教室。而且这几乎是他一直秉持的理念。早在1824年，里平吉尔就曾在布里斯托开设讲座，解释艺术家应当如何普及艺术原理以提升大众品味、造福社会。很多年后，当初的听众依然清晰地记得，演讲者“对自己的职业不仅理解精准”，还有着“深刻的信仰”。

罗斯金的美之沉思

罗斯金与前面两位评论家的出发点十分相近。“大众”、“品味”和“美”，同样也是《近代画家》创作目的的关键词。但黄淳老师指出，如果说黑兹利特面对“大众品味”表达的是期待，里平吉尔表达的是叹惋，那么罗斯金带来的，就是一道沸腾着热血的战斗檄文。比起之前的两位，他试图更加直接地挑战公众品味。

摆出骑士姿态的罗斯金与亲切友善的黑兹利特显然不是同一类型。同时，罗斯金与里平吉尔也有分歧。他显然没有后者那般坚定的职业信仰——不仅没有，而且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对画家主导艺术评论这

一倾向的质疑。首先，他指责对象不仅有公众，还有为大众推荐错误品味的“出版物”——这其中不仅包括黑兹利特发表文章的报刊杂志，还有如皇家艺术学院展览目录一类的专业美术出版物，打击范围非常广。其次，《近代画家》出版时的署名并不是“约翰·罗斯金”，而是“一个牛津毕业生”。匿名为简单的“牛津毕业生”，在作者与职业画家甚至整个艺术圈之间生生造出距离感。仿佛从一开始，在这场围绕艺术与品味的讨论中，罗斯金就有意把自己打成一个圈外人、一个闯入者——一个里平吉尔所谓的“爱好者”而非“艺术家”。

黄淳老师还分析了罗斯金对“美”和品味的一套与里平吉尔完全不同的标准。罗斯金指出，英语已经习惯了用“aesthesis”（感觉）指代美感。但他认为，这个词并非最佳选择，并提出了另一个同样源自古希腊语的词“theoria”。Theoria原义是“观看”，和aesthesis的“感觉”并非没有相通之处，但罗斯金特别强调二者内涵上的区别：前者获得的是纯粹的快感，后者则通过感官带来心灵上的满足，实现“造物之美的领会和沉思”。而后罗斯金总结道：所谓“美”，并不纯是感觉或智识上的体验，更不是里平吉尔所说的“物质的存在”，而是一个深刻的道德观念。所谓“品味”，其精髓也不在于面对大师作品的细微感受，更不在于对画笔的熟练运用——真正的品味，来自一颗“能够领会美的纯净心灵”。

通过theoria（沉思）与aesthesis（感觉）的对比，罗斯金在多个方面亮出与里

平吉尔截然不同的思考。首先，后者认为美源自“拣选、排布和整合”之后获得的“形式”，罗斯金却告诫读者，过分执着于形式的艺术往往流于造作，要想获得真正的美，人们就应该“一心一意地投身于自然中，勿要摒弃，勿要挑拣，也勿要嫌恶”。

其次，凭借对“领会和沉思”的强调，罗斯金质疑“技巧”在审美和品味中的价值。他曾提到，掌握了绘画技巧的人只是学会了一种语言，就像学说话的人掌握了词汇和语法。至于他表达出来的是真理还是谎言，这不取决于语言，而取决于思想和信仰，它们和技巧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思想和信仰，再高超的技术也不能够弥补画面的虚无。这也是罗斯金对里平吉尔一个直接的回应。罗斯金还曾感叹：“无数人称道构图……却没有一人能够做到眼中无构图，临别时念想着上帝的荣耀。”由对美的沉思而生发出对自然的欣赏、对神性的赞美，这一个主旨贯穿了《近代画家》系列的始终，是罗斯金美学思想的核心。

老师讲道，罗斯金这样一种充满了道德教化与宗教色彩的艺术批评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格格不入，可它实际上非常符合19世纪的要求。我们有必要记起，《近代画家》是为19世纪中期的英国读者而写，对于这一群读者中的绝大部分人而言，信仰是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宗教是文化里不可或缺的因素。罗斯金的批评如同布道辞，帮助人们把所见所感与道德生活融为一体。对当时受清教影响非常强烈的读者来说，罗斯金的艺术批评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它不仅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欣赏艺术作品，还让他们意识到热爱艺术并

不与信仰背道而驰，二者实为一体。他的艺术批评为渴望了解艺术的读者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他们惊喜地意识到，原来在画布上除了线条、构图、色彩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意义，原来艺术原则正是他们所了解的世界秩序中的一部分，原来美与品味并不来自职业艺术家的特许或教导——只要带着纯净的心灵细细观察，就可以收获美感、收获快乐、甚至窥得天意。

最后，黄淳老师提到了罗斯金的写作风格。《近代画家》里的画评不仅有评论，还有许多对画面精准而生动的还原。用罗斯金自己的话，它们的目的在于彰显美术作品中“自然”与“美”的奥义。可文字带来的效果十分微妙。首先，它描述的是画面而非印象；其次，《近代画家》出版的时候书里也没有配发图片。所以，当读者阅读这些段落时，直接引发美感的，并不是名家作品，而是罗斯金自己如画的文字。有的学者把这种效果描述为“文字与画作之间的竞争”，但也许我们可以说得更加大胆一些：与其说是竞争，毋宁说是文字性的解读超越了画面，成为一份灌注了秩序与意义的再创作。通过这样的再创作，罗斯金于有意无意之间以另一种方式树立起自己论“美”的权威。

讲座结束后，丁宁教授进行了评议。丁宁教授说讲座主题唤起了他的回忆：98年他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曾在图书馆读《近代画家》的第一版。接着他对罗斯金作了补充：在罗斯金与雷诺兹的针锋相对中，雷诺兹强调尊重大师，大师的作品看的越多临摹的越多就会得到其精髓；罗斯金强调自然本身的重要性，艺术家要用自己的

眼睛去看、去发现。罗斯金的一些言论甚至启发了后来的印象派——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特定条件下的光影的变化。罗斯金的这种提倡是划时代的，因为之前都是提倡学院派的“向大师学习”的观点。从雷诺兹一个教育家的角度出发，向大师学习似乎没错；但当临摹作为最重要的接近艺术的途径时，人们会亦步亦趋，如果只向大师学习，永远就只是在大师的阴影下。因此罗斯金在这方面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他的批评突破了一个代表官方学院派的观点。但丁教授还指出，罗斯金同时又是复杂的，他身上体现了新和旧的矛盾。

之后，丁宁教授还与听众分享了一系列与讲座有关的历史的、文化的话题。他指出，“品味”在今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它很微妙，因为你不能强迫别人有你的品味。有句话说“趣味无争辩”，但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强调趣味的多样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人们面临更多的选择，“品味”更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在问答环节，两位老师还对听众关于罗斯金与达芬奇、哥特建筑、神学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撰稿：张博雅）

12

张长东： 税收与国家权力的韧性

2016年12月21日，“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税收与国家权力的韧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副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担任评议。

张长东老师首先介绍了本次报告的主题以及结构。在正式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之前，张老师指出了这次报告是即将完成的英文著作（书名暂定Pillar of Governance，治理的支柱）的一部分，并

简单介绍了书稿的整体脉络，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报告得到反馈，收获更多的学术灵感并继续完善作品。

张老师先指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即强国与权力的韧性。然后张老师提出自己的观点，即税收制度能够有效缓解三大治理难题（及与之相关的两大悖论），从而形成“韧性”。

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张老师回顾了以往的研究，亦即国家权力韧性的各种竞争性解释（暴力机构和镇压、代议机构和体制性吸纳、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并



探讨了其得失。张老师指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识到转型范式（民主化理论）的不足，简单的两分法并不能很好解释现实世界。而在最近十几年，此项研究的“制度转向”，一方面深化了我们的认识，推动了理论进步，另一方面也仍然有一些局限性。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忽视了制度的双刃剑作用，即制度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政体；二是很难解决制度外生性问题，即制度本身缺乏独立解释力——真正的解释因素是制度产生的结构性因素或者个人操控。



考虑到前人的研究状况，张老师指出了税收制度的重要性，并引用了约瑟夫·熊彼特、马克斯·韦伯、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同时，丹·斯莱特（Dan Slater）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即税收体制通过四个基础性权力机制增强国家的韧性。张老师指出，这个研究中忽略了税收的两个悖论：增长悖论（Growth Dilemma，即税收与经济增长间的悖论）和代表制悖论（Representation Dilemma，即税收与社会控制间的悖论）。紧接着，张老师指出，中国存在三个税收机制：财政联邦制、低制度化的税收征管体及半税收国家。这三个税收机制，对于解决三个治理难题（及与之相关的两大悖论）非常有用。

张老师介绍了“半税收国家”这一概念及其测量方式，并通过统计数据 and 问卷数据指出半税收国有较强的自主性，使

人们的税负意识降低，并可解决代表制悖论的问题。同时，张老师也指出这个机制也是个“双刃剑”，会降低效率和加大不平等，从而影响可持续增长。

最后，张老师介绍了在低制度化的税收征管体制（即高名义税率、高执法的自由裁量权、税收任务制）下，存在普遍的偷税漏税情况，从而削弱民营企业家的讨价还价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会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加入人大、政协等——寻求依附和庇护。形成的是普遍的庇护关系而非“通过纳税成为代表”的逻辑，缓解乃至消除了代表制悖论。但庇护关系盛行却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周飞舟老师对张长东老师的研究和报告进行了评议。周老师指出，研究财政的很多，专门谈税收的却很少，从税收角度来研究威权主义的韧性是很有意义的。周老师特别指出，半税收国家和低制度化这两个概念很重要。

周老师认为，三十年来，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

重，努力把非税收收入纳入到税收预算的管理。但这却让预算趋向于形式化，并且破坏了非税收收入原有的职能。因此，中国这个半税收国家有种自我再生产的能力，中央政府提高税收收入的努力，正好是地方政府不断发展非税收收入的原因。随着土地财政的出现，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的。而税收收入在各种各样的审计和监督下，一部分是发展，比如招商引资、GDP，他称之为高发包高竞争；还有一部分是民生和服务，比如教育医疗等，这些他认为是高发包低竞争。把服务和发展放在一起看：服务是税收扮演的角色，却是地方政府的次要选择；地方政府首先选择发展，非税收收入用于发展，税收用于民生。只要锦标赛和政绩驱动的激励存在，这个半税收国家的程度不会根本改变且存在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机制。周老师强调要注重路径依赖的作用。中国是单一制的财政国家，地方政府无法改变税基和税率，但是却能通过补贴等措施变相改变税率和税基。

关于低制度化的问题，周老师认为这也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路径依赖。中国社会的遗产和社会的结构一直是这样，

这现象不是政府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制度和政策的产物——这是总体笼罩于国家意志与政策制度上的一个社会事实。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变迁都是在这些社会事实和常态上展开的。最后，周老师指出，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而言，独一无二的中国文明与快速的社会变迁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洞察力，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针对周老师的评议，张长东老师首先感谢了他的启发性评论。张老师的研究把半税收国家作为自变量，他认为周老师则更向前进一步，将之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这让自己之前比较零碎的思考更加深入。在问答环节，有老师和同学分别就国外和国内不同地区间的比较提出了疑问。张老师澄清了自己研究中的低制度化的概念，并进行了解答和补充回答。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老师，哲学系李猛教授，以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就政治学的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扩展了同学们的视野。在几位老师与张老师的讨论中，讲座的氛围逐渐达到了高潮。

（撰稿：吴泽民）

（三）北大文研论坛

08

阎步克：

“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若干方法与观点”



2016年11月3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论坛以“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若干方法与观点”为主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阎步克教授作主题报告；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主持论坛；文研院学术委员、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李隆国副教授、叶炜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周飞舟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

荣教授、张长东博士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论坛。

阎步克教授作了题为“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若干方法与视点”的主题报告。阎步克教授首先回顾了现代以来影响较大的几种史观。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张的唯物史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界。人们将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及资本主义的前后更迭的模式，主要是从西欧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则提出了

一种“三段论”，认为中国史经历了一个“古代社会—贵族制社会—东洋的近世”的历史进程。而这个模式，也参照了西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变迁。同时，国内外一些学者采用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用以强调东方国家的特殊性，如专制王权、官僚制度、农村公社、土地国有等。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明显差异，刺激了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专制国家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两千年一贯制的专制国家。而对两千年专制政治，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业已提供了一个基本轮廓和若干基本视点。

阎步克教授认为，各种史观都是“深刻的片面”，都好比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灯光，都能照出其独特的历史景象。揭举“制度史观”，并不是否定经济史观与文化史观的重大意义和学术成就，而是变换视角，由此寻求新知。20世纪末、21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变动，推动着人们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政治史进程。未来的世界，民权政治传统、神权政治传统和集权政治传统，是几支最具特色的政治传统，各自涉及了十几亿人口。而中国作为集权政治传统的代表，其历史展示了举世无双的历史连续性。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无论古今，都是一个巨大的权重。在学者所揭示的当代中国的集权体制、行政化社会、行政级别为主干的社会分层等现象，都能看到数千年历史的巨大惯性。如果说夏商周国家是中国国家的1.0版，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是中国国家的2.0版，而中国国家的3.0版

正在升级换代之中。这里刻意使用“升级换代”字眼，就是为了凸显中国政治体制的巨大连续性。

阎步克教授阐述了若干作为前提的基本方法与视点。所谓“制度史观”，就是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视角审视中国史。而所谓政治体制，可以归结为“制”和“人”两个方面。“制”就是政治制度，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人”就是政治势力，即各种集团、派系、阶层、阶级等构成的政治格局。这也符合经典政治学家的认识。孟德斯鸠论专制政体，一个视角是其在制度上是否三权分置，另一视角就是看是否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历史连续性可以被视为一条中轴线，各时代的政治体制变迁，既包含着发展，也时时出现出围绕中轴线的波动摇摆。随后，阎步克教授从魏晋南北朝史和官僚等级管理制度两个方面，阐述了他如何贯彻“制度史观”。

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阎步克教授谈到，田余庆先生提出了一个论点：把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最终又回归于皇权政治。由此提出了一个“变态—回归”模式，这个模式对他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启发自己通过转型、断裂、连续、常态、变态、回归这样的思维方式，把握汉唐之间政治变迁的宏观主线。以往通过“分期论”模式所叙述的魏晋南北朝史，重在凸显时代特点，而基于“变态—回归”模式，任务就可以确定为衡量政治体制的变态幅度，寻找其回归动力。政治体制包含“制”和“人”两个方面。田先生的工作聚焦于门阀、次

等士族和皇权之间，偏重于“人”的方面。阎步克教授治政治制度，偏重于“制”的方面。就“制度史观”而言，这两方面的结合点，看来就是一个关键点。阎步克教授谈到，他的《波峰与波谷》一书，就是努力把魏晋、南朝、十六国北朝的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结构与各期政治制度的变迁与发展结合起来的。在他看来，一部南北朝史，就是一部南朝文化士族与北朝军功贵族的竞争史。

阎步克教授谈到，他的另一个致力之点，是中国古代的官阶品位结构。他引入了“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概念，并且以“品位—职位”概念为基点，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建构，包括分析品位的、技术方法，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品位结构与社会身份体制的关系。通过这一整套理论概念，他得以把历代纷繁错杂的品阶勋爵，编织为一条连贯的线索，提出了中国品位结构变迁的五大阶段的模式。其最终目的，是探讨传统集权官僚制下的身份秩序。而这个系列研究，也贯彻了前述的“制”与“人”两方面的结合。例如，把品阶勋爵与“文—武”、“士—吏”、“贵—贱”、“胡—汉”等势力的身份与权势关系结合起来，与“君—官—民”身份关系结合起来。

阎步克教授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他对于制度史观的认识，在短暂的茶歇之后，论坛进入自由讨论阶段。

周雪光教授首先指出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是现代基层社会又是蜂窝状的，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在严格的正式制度之外，

又有非正式制度来弥合正式制度的缝隙。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另一方面，一些非正式制度也在向正式制度蔓延，那么非正式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正式制度？其次，周教授提出，民国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家秩序、社会结构走到了一个非常组织化的时期，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大生产和列宁式政党造成的。组织化的程度和全面性大大超过了从前，那么这是不是集权政治传统的重大变化？

阎步克教授回应道：首先，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但是这种组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方面，因技术物质条件，传统的社会控制远达不到现代水平；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大型的集权政权的诞生必须以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而专制政权通常都出现在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社会之中。为保障自由流动资源的供应，在政治稳定之时，王朝并不过分压制民间的商团、教团、私学、书院、诗文社等组织的自由活动。中国王朝的社会控制强度，可能也有一定周期性：王朝初年相对较为严酷，盛期之后就会变得宽松得多。

燕继荣教授首先阐释了政治学视野下制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三点疑问和建议：其一，制度史观能否解释王朝更替的周期性问题？其二，非正式制度在国家变迁中有重要意义，分析制度除了关注社会上层，还要关注社会下层。其三，我们通常假设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运行的体系，似乎外部的介入、强制影响不是很大，那么外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影响究竟如何？阎步克教授指出，其个人主要关注的，是在

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身份安排的问题，所以自己的模式不能解释王朝兴衰。

张静教授提出了两点疑问：一是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变化，但是统治的原则和制度的基础没有很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上世纪中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例如绅权、家庭秩序等等。一些新原则的引入，包括道德的、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都用来对抗过去的原则，因此也可以认为中国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断裂。这种矛盾的认识应该如何理解？其二，中国社会有完备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又经常被推翻或不被执行，法律、制度与实际处置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这时后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规则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那么中国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制度化的呢？阎步克教授回应说，确实，古代有很多制度是象征性的。大约是王世杰最早指出，中国的法典并不能反映法律实态。还有一些制度在就是为了象征性而制订的。就此问题，周雪光教授也发表看法，提出所谓制度的扭曲，其实可能是两种制度的并行不悖。

其他参会学者也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飞舟教授指出，社会学上谈人与人的关系更侧重于认同。西方社会学有一种假设，即相同出身的人应该有相似的认同。但是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存在集团性的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差序格局，这一点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彭小瑜教授认为，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不前，其背后有一点内涵经常被学者忽略，即观

念上的停滞。中国社会从先秦到明清，观念、价值观都没有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停滞的一个表现。侯旭东教授针对张静教授的疑问，称今天更多的仍然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很多看似被引进的新原则，其实都只是过去原则的扩大。李隆国副教授认为，阎步克教授的制度史观促使他反思对于欧洲历史的认识。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对英吉利海峡地区的认识中得来的，而如果将目光转向其他地区，就可见在欧洲也有皇权和官僚政治，例如拜占庭的政治传统、神圣罗马帝国象征性的延续和教皇的存在。叶炜副教授提出，阎步克教授的制度史观是从制度自身的逻辑出发，关注制度的延续性和自主性。但是当我们关注制度自身的逻辑的话，制度变迁的动力在哪里。阎步克教授回应道，变迁的动力来自利益冲突、技术进步等因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层面的因素：例如王莽改制、察举制度的诞生、礼制的变革都是文化价值产生差异导致制度产生差异导致的结果。

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很多具体的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不同科学家的对话反映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关怀。邓小南教授最后作出总结：一个从研究实践中凝练而成的理论模式，在其成熟过程中需要学术讨论、交流来进一步激发灵感。跨学科交流带来思想的碰撞，正是“北大文研论坛”的宗旨所在。文研院将继续组织“北大文研论坛”，为相关的讨论提供平台。

（撰稿：熊昕童）

09

刘斌 V.S. 孙周勇：
良渚与石峁

2016年12月3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应文研院之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研究员，分别就良渚和石峁遗址进行了主题演讲，并在之后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次论坛由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助理研究员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徐天进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党委副书记雷兴山和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出席，近百名师生聆听了演讲并参与讨论。

首先，常怀颖博士开门见山地解释了本次论坛的意义。中原王朝形成之前、新石器时期最后几百年中国及东亚大陆的历史，原本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后人欲窥其貌，总觉虚无缥缈。但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实物遗存的不断发现，人们对该时期的了解逐渐落到了实处。目前学术

界基本认可，新石器时期最后的五百年中，整个东亚大陆出现了新的社会状态，文明和国家兴起。而良渚和石峁遗址，无疑是这个时空中最重要的两个遗址。应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之宗旨，为了解最新的考古研究范式，欲一窥中国文明前进的道路，便邀来良渚和石峁遗址的主持人，为大家展现史前中国的塞北和江南。

孙周勇：石头上的王国——石峁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孙周勇老师曾参与或主持过神木新华遗址、华县泉护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陕北保当汉代城址等大型考古项目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于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并担任领队，著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07期，第15-24页）、《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02期，第50-56页）和《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

古》，2016年06期，第82-89页）等相关文章。

在播放了展示石峁遗址的发掘现场及3D动态模型的视频之后，孙周勇老师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表示，石峁文化距今4300年至3800年，比良渚文化年轻1000岁左右，两者相较如关公战秦琼，似无可争。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最北端的榆林市神木县，在黄土高原的最北，坐落于黄河支流秃尾河与其支流洞川沟流汇之处的梁峁山地之上，高家堡镇之北，海拔为1100米左右。

实际上，榆林出土的玉器早在20世纪20年代及60年代，便出现在了伯希和与美籍德裔学者萨尔蒙尼的书里；但直到1976年冬，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研究员在高家堡镇收集了127件，应是从石峁村一带流散出去的玉器之后，石峁遗址才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尽管在1958年陕西省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有一支队伍已记录了石峁的“三套城”结构与范围，并建议尽快保护勘查。但由于种种限制，石峁遗址直至2011年方正式启动考古工作。经过一系列工作后，石峁考古取得了一些成果。

石峁遗址中发现了内外两道断断续续的石城墙，能与龙山遗址的分布高度吻合。出土陶片密度较高的龙山遗址，几乎全被括在内城墙中。结合石峁遗址出土的大量高等级玉器及彩绘陶器，可判定石峁必为一处高等级聚落；根据城墙的分布范围，石峁确实应为“三套城结构”，即外城、内城、内城偏西中心部位的台城——皇城台。该城为石峁的核心区域。

皇城台为金字塔形结构，台顶有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和类似“池苑”的遗迹；从台顶往下，错落有致的石墙将其层层包裹。石墙上等距分布着一排排木头洞，中插木头。此种结构应为早期建筑技术“木骨墙筋”，如《营造法式》所讲“筑城时，城每高五尺，横用经木一排”，起到防止墙体坍塌、分散横向压力的作用。石墙上饰有菱形眼饰及石雕人头像，或欲营造一种威严的仪式感，使城外之人有所敬畏。

今年，考古队清理了皇城台门道。该门道由广场、南北墩台（夯土为芯石为墙，南小北大）、挡墙和类似内外瓮城一类的设施组成。文化层中出土了石范和残铜刀等遗物。石范基本用于生产铜刀，而铜刀由含砷的铜制成——这一发现对了解早期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十分重要。

内外城墙长约一万米，基本沿山而建。外城的东门与皇城台门道结构相似，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和挡墙等组成。在内外城墙上发现的瓮城与成组马面引人注目。发掘石峁之前，此种城防设施最早出现于东周之后，汉代则有最早确证，而石峁将它们的出现年代提前至了龙山时代。如此，石峁的城墙应兼具防御与象征的双重功能。

另有藏玉、藏骨等特殊现象。城墙里有玉钺、玉铲和牙璋等，有的玉器被切片塞于石缝中。其中牙璋有明确的出土层位，这为它的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藏玉或因欲赋予都城神与宗教的力量，使城门具威慑力，构建石峁人的精神凝聚力，共同抵御敌人。石峁玉器又颇杂，兼有良渚、石家河等多种文化元素，或启

示着石峁在其区域内拥有万邦来朝的影响力。东门处出有头骨坑，年轻女性居多，骨上有被烧和砍斫的痕迹。经鉴定，其人种最接近夏家店上层，似为石峁人的敌人来自何方提供了一些启示。大量杀人，或亦欲以宗教的力量控制周边部落的人群。

东门墙体出现早期中国最大规模的壁画，与红山和陶寺文化相似，绘有起稿线，这便又将这一技术的出现从汉代提前至了龙山时期。东门又有天文现象，其门道偏角与夏至日日出方位基本一致，日光可直直照进门道。此若有意为之，则说明石峁人对城址有了一定的规划，并掌握了“二至”的观念和立竿测影的方法。

此外，石峁内城有大型墓地，盗掘情况严重。基本为竖穴土坑墓，中有半月形腰龕，亦有石棺葬与瓮棺葬等。石峁城外则发现有预警系统，即哨所，或可说明石峁城绝不止 400 万平方米。

经济形态上，根据不同学科多位学者的研究，石峁遗址应为粟作农业经济，驯养有狗、马和猪，还发现了不少鳄鱼骨板。

孙周勇认为，体量甚大、保存颇佳的石峁遗址应给予我们一种中国的文化自信。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以榆林地区极高的人口密度为社会基础，中国早期最大的王国性都城——石峁城，在河套地区“一枝独大”。其完备的城防设施、发达的玉器、大规模的壁画和其他特殊现象，都使我们认识到，在公元前 2300 年左右，石峁城已成为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而其关键的时间点，又启示着以其为核心的北方大一统格局，与中原国家的出现之间的密切联系。

石峁遗址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遗址保护亦是个大问题，孙周勇老师表示，希望更多人继续关注和参与到石峁研究中来。

刘斌：良渚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刘斌老师曾参与主持过反山遗址、瑶山遗址和汇观山遗址等著名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近年来专注于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著有《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 年 02 期，第 30—37 页）、《良渚治玉的社会性问题初探》（《东南文化》，1993 年 01 期，第 103—110 页）和《2006—2013 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 年 02 期，第 31—38 页）等相关文章。

同样，在观看了虚拟复原的良渚古城 3D 动态模型之后，刘斌老师开始了他的演讲。

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 年至 4300 年，分布于太湖流域，北可至江苏新沂，南可到浙江金华。遗址位于杭州北面的盆地之中，海拔约 2 至 3 米，钱塘江在其南。良渚古城位于余杭区瓶窑镇，余杭古名“禹杭”，临平镇则发现了良渚水稻田遗存。田上有一米多乃至更厚的洪水层，几乎覆盖了 1000 多万平方米的整个杭州盆地。因此，刘斌认为，中国史书对距今 4000 年前的情形的描写始终语焉不详，仅载大禹治水等，或与该洪水层所显示的持续了上百年的大洪水有关。

良渚文化于 1936 年被发现，1959 年被正式命名；1973 年，学术界对良渚玉器有了初步认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良

渚的重要性真正被学者所了解；2007 年，良渚古城被确认，学术界开始重新看待良渚。其实良渚的出土玉器很早就曾被收藏，商代的成都金沙遗址、东周的苏州吴国窖藏，皆有良渚玉琮出土；南宋官窑制有琮式瓶，乾隆则收藏有三叉形器等。

良渚作为一个文明，拥有六大特点。

一是宗教。良渚创造了一个一神教的信仰，使整个太湖流域都有了统一的信仰，雕刻统一的神像。

二是发达的玉礼器系统。冠状饰标识通神和权力，玉钺表达王权神授的理念，玉琮是通神的法器，三叉形器和玉璜分别是贵族男女的装饰，晚期的玉璧同样是神权的载体等。

三是刻画符号。良渚陶器上共发现了六百多个符号，但没有哪篇成为明确的文字。神像之眼有时会以鸟的身体来表示，因此鸟亦是神的载体。而玉璧上带台阶的鸟纹，则与古埃及王国的名字颇为神似。

四是石器。有发达的石器工具，耘田器颇有特色，石犁发达。良渚社会是稻作农业经济，临平茅山遗址发现了 80 多亩水稻田，田埂规整。此外，良渚古城的宫殿区等边缘还发现了几万斤烧毁的稻米。

五是严格的墓葬等级。普通人的墓葬仅葬生活用具及猪狗；“村长”“乡长”一级中小型聚落的首领的墓葬，除前述随葬品外，亦葬少量玉器，如冠状饰。高级贵族的墓葬，除上述随葬品外，葬有完备的玉礼器。

六是长条形台地基址。良渚人会在沼泽中堆筑长条形的台地用以居住，这些台地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被一次次加高和拓

宽，台地之间便形成了河流。河岸以木板作为护岸，形成了人工的垂直河岸，船可直接停靠。良渚人以水路交通为主，交通工具主要是独木舟和竹排等。

自 2007 年以来，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其一是古城分为宫殿区、内城和外郭城三重结构，与后世都城的三重结构类似；都城选址于两山之间的低洼之上，苕溪流经，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似亦传于后世。良渚的筑城方式为采石于沼泽地中筑基，再以山上黄泥堆筑。

其二是发现了良渚人的建筑材料——草包泥（草裹泥），即将低洼软土以草筋包裹。草包泥无需夯筑，又可计算工程量，更方便分工协作，短时间内可能便可堆起大型建筑。古城面积约为 300 万平方米，土方量为 120 多万立方米，设有类城防设施，因城外环水，该设施或实际用作码头；城四面各有两个城门，唯南面中心之一为旱路，其余皆为水路城门。良渚晚期，城里或人满，便在堆满了垃圾的城外河道上修筑外郭城用以居住，亦有居于城墙上者。

其三，宫殿区，即莫角山遗址，整体由古尚顶（莫角山俗称）土台与其上的三个小土台组成，后者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与乌龟山，其三之上又布有 3 至 7 座房屋基址，较为规范。大莫角山台顶应原铺木板，或为供贵族在多雨的南方体面行走使用。大莫角山西南部有栈桥码头遗址，底部发现了竹编的“脚手片”。

其四，即上文所说的长条形台地基址之间的河与其护岸。护岸极为考究：木桩间距、粗细几乎均等，顶部以榫卯固定横梁等。河

中淤泥里，出土了半成品木器、非正常死亡的人头骨、石玉钻芯和黑石英片等。头骨经锶同位素鉴定，大部分食稻米，唯有两个食五谷杂粮，呈北方食性。黑石英片被认为是在玉器上雕刻细纹的工具。种种工具的出土，或表示古城内外，除了宫殿区的统治者，主要居住着手工业者。

2009年以来，随着发掘工作的向外开展，外郭城的范围逐渐清晰，其中还发现了瑶山和汇观山两座祭坛，似为早期观象台。两座祭坛的结构皆为在山顶上修筑了一个回字形土框，后为墓葬所破坏。其原理为，一年四季日出日落的角度在回字形框内摆动，由其落在回字形框上的位置便可知日期，与内蒙古和洛阳出土的晷仪神似。后或因发明了可移动的观测仪器而将祭坛废弃。无论如何，此二祭坛必与农业经济所依靠的历法有关。

古城外还有大型水利系统。2009年，古城西面8公里处的水坝被发现，后逐渐发现了低坝和高坝两个水坝系统。低坝可闭合，形成水库；高坝或用于运送山沟里的木头，具体作用不明。水坝的堆筑工艺皆为草包泥，取样经碳十四测年后，知样品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2015年，发掘老虎岭高坝时，发现其被良渚晚期的地层打破。如此，有了工艺、碳十四测年和地层上的三重证据，此当为良渚时期的水坝无误。

刘斌表示，良渚文化传播甚远，北至江苏花厅遗址，南至曲江石峡遗址，包括稍晚的延安卢山峁、榆林石峁和襄汾陶寺遗址等，都有良渚玉器出土；甘肃的齐家文化中，亦有大量玉琮，是良渚玉器的后

续发展；再晚至前文所述的历史时期，良渚玉器的身影仍频现。因此可以说，良渚文化是传承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

同时代的北纬30度线上，还有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等文明。他们虽然都拥有青铜器，物质上似比良渚发达，但从城址规模、社会分化和信仰体系来看，良渚不一定落后。因此，在西方学者总结的国家三要素“城市、文字、金属”之外，中国也要总结自己的文明模式。从良渚和石峁遗址来看，玉礼器有所传承，都城结构却大为不同，因此，中国文明应是经历了一个一脉相承的多元一体化过程。

讨论环节

常怀颖博士首先提问刘斌老师，良渚向北扩张的动力为何。刘斌老师表示，可能是由于想要控制中国如此大的版图，中原是最好的。因此南方的良渚强大了之后，便想向外扩张，逐鹿中原，但是没有成功。常怀颖博士又问，良渚为王朝阶段的中国留下了何种遗产。刘老师表示主要有君权神授的理念、具有神性与社会地位的玉礼器系统和宫城的选址与结构这三种。

常怀颖博士随后向孙周勇老师提问，比良渚人晚1000年左右的石峁人，会否知道遥远的长江流域有一个良渚世界？孙老师表示应是知道的，因为他相信早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上层奢侈品的交易网络。常怀颖博士又问其对于石峁人南下侵略了陶寺城这一观点的看法。孙老师表示赞同，因为陶寺中晚期的文化面貌来自于北方而非本地，可能是距今4000年前后被北下的石峁人所灭而导致的。



接着，常怀颖博士向二位主讲老师询问了良渚和石峁文化的政体形式及政体的维系方法。刘老师表示良渚应是联盟制的，有等级之分，以神权信仰维系统治。孙老师则表示河套区域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族群，不同大小的聚落规模，象征着不同层级的政权实体。而石峁人“一枝独大”，是最高等级的政权实体，同样以神权凝聚着整个族群。

随后，徐天进老师认为良渚和石峁遗址留给后世的最大贡献是，让人们彻底改变了对距今5000至3000年时期一南一北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并揭示了南北互相交流、影响和传承的过程。清楚了南北的情况之后，中原地区的情形便会呼之欲出，良渚和石峁的意义主要在此。

之后，孙庆伟老师纠正道，良渚和石峁的年代起码是可以接上的，即目前良渚最晚的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2300年，石峁的最早测年也是公元前2300年。并且，良渚和石峁的样品不一定是各自遗址中最晚和最早的，因此，将良渚和石峁放在一起

是很自然的，并非“关公战秦琼”。同时，良渚和石峁的衰落都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起，而根据文献记载，大禹（夏代）和越人是有联系的；根据出土遗物，二里头和石峁也是有联系的。因此，良渚和石峁的衰落与中原王朝的兴起之间的关系，颇值得探讨，而这便是今次论坛主题的由来。刘斌老师补充道，陶寺的V字形石刀，连变化规律都和良渚的一模一样；二里头的很多遗物，则与马桥文化的多有相同。因此，夏代与东南地区的联系肯定是更密切的。

最后，渠敬东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最早的国家形成的思路及其内在关系。邓小南教授则表示，本次论坛与上次的“最中国”之辨，真正让人看到了早期中国满天星斗的局面，注意到了看似隔绝的文明点之间的联系，认识到了早期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国家的，使听众皆受益匪浅。

（撰稿：胡文怡）

10

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度量衡



2016年12月8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论坛以“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度量衡”为主题。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晓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熊长云、美国博敦大学历史学系与亚洲研究系助理教授左娅、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曹晋分别作主题演讲。计量史专家丘光明教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杨哲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睿、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怀颖等出席本次座谈并参与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演讲主题为“中国古代度量衡标准器的起源与发展”。他首先详细介绍了齐量三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和，并展示实物图片。齐量三器体现了当时度量衡校验制度的存在，而建立校验制度的前提是标准器的存在，但还很难说它们就是度量衡标准器——原因是它们属私量，非齐国公量之准。现存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器是商鞅方升，

存于上海博物馆，为镇馆之宝。商鞅方升为商鞅公元前344年颁发，秦始皇公元前221年重颁。它的四壁有铭文，左壁铭文记载了齐国代表团出使秦国。关增建教授认为这次交流促进了齐国和秦国度量衡换算关系的建立。

计量史专家丘光明教授说，对这一事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学界有争议，她个人比较赞同关教授的观点。接着，关教授介绍了中国最早的度量衡复合标准器粟氏量、古代复合标准器圭臬新莽嘉量、北宋颁发的单一衡量标准嘉佑铜则以及权力象征的实物代表乾隆嘉量。他还指出古人对度量衡的研究客观上推动了圆周率计算的精确。

随后，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由“圆仪”与“土圭”谈中国古代天体测量仪器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仪器在天文学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石教授展示了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发掘的六壬枳盘、太乙九宫占盘、二十八宿盘照片，介绍了考古人员在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发现不知名的漆盒并对其用途进行推想和验证的过程。他还详细解释了浑仪、圆仪、土圭的使用方法和原理。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晓军作“东周列国的量制探讨”主题报告。赵晓军指出，东周时期，由于环境的相对封闭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诸侯各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容量单位制度，各国间同一单位的具体量值也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各国间的交流并未停止，如商鞅方升上的刻铭，就体现了战国时期秦齐两国在度量衡制度方面的交流。诸侯各国间量制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差异只有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被彻底消除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畅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通畅交流，度量衡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熊长云

作“秦诏铜箍残件与秦桶量之复原——兼论桶量与斛量之更替”主题报告。熊长云介绍了新发现的秦诏铜箍残件，并据秦诏铜箍所揭示的相关数据，复原出久所湮灭的秦代桶量的大致形制。基于古器物的新知，他也对传世文献及简牍中涉及桶量的内容着重进行考证，并就“桶”“斛”更替与王莽变法的关系，以及导致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美国博敦大学历史学系与亚洲研究系助理教授左娅作“北宋乐律改革的宇宙论背景”主题报告。左娅论述了乐律改革的技术内核，回顾了北宋雅乐改革和改革方法，并对乐律的宇宙论框架进行解读。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曹晋的报告主题为“从‘乐律’到‘人间’：北宋徽宗大晟乐尺和度量衡改革”。曹晋首先介绍了国外学者对“度量衡思想/计量思想”（Metrosofhy）的阐述，然后详谈大晟乐尺的产生、制作和传播，最后指出：源于乐律改革的尺度最终成为后世量地的标准之一，展现了封建王朝追求“政和”的决心，度量衡思想朝着更为实用的方向发展。

关增建教授对会议作总结发言：本次论坛涉及科学史、计量史、考古学、历史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不同学科学者的报告讨论对活跃学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谨代表到场学者对文研院提供这样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表示由衷的感谢！

（撰稿：谢宁 丁洁琼）

11

常怀颖：
殷墟世界的声色犬马

2016年12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殷墟世界的声色犬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常怀颖博士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刘绪教授、徐天进教授、雷兴山教授、曹大志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徐良高、严志斌、刘煜出席座谈。参加本次论坛的还有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主任梅建军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陕西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陈坤龙副教授、刘思然讲师，国家博物馆单月英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讲师马赛、首都师范大学讲师田天等。文研院访问教授祁小春、曹晋也出席了本次活动。

“声色犬马”，语出苏辙《历代论·汉昭帝》：“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气已乱”——泛指旧时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常怀颖博士借用这个成语，以乐器、

女性墓葬、以犬为代表的用牲、家马与马车的使用分别对应晚商的乐制、性别差异、信仰活动用牲和车马葬仪——从这些殷墟世界的日常生活乃至娱乐活动的方方面面，去观察晚商社会礼制与等级序列的构建尝试和过程。

犬

犬在整个商代社会是十分常见的动物，前人对墓葬中作为殉牲、祭牲的犬多有论及。郜向平（2007）、李志鹏（2011）先后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商墓中的殉狗，确证商墓殉狗始自二里冈下层偏晚。

马

常怀颖博士指出，马是殷墟世界的新生事物，应该属于舶来品。截至目前，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早于殷墟的马车。吴晓筠等学者已经指出了晚商时期马车绝大部分与高等级贵族墓有关。但若从晚商时期殷墟地区的车马埋葬看，大体有墓内殉车、陪葬车马坑、殉马坑、墓葬随葬车马器、居址零散出土的车马器及车辆几种形式。

常怀颖博士对每一类埋藏形式出现的时间、使用人群与对象进行梳理，指

出，这些晚商时期作为祭牲的马，作为陪葬的马车、车马坑以及墓内随葬的车马器都存在不同的埋藏规律。殷墟地区的晚商墓葬墓内殉车一般属于身份等级极高的人群——最初仅有商王可以拥有墓内殉车。时代越晚，身份等级虽有下降，但也至少是拥有一条墓道的高等级贵族。墓道殉车是晚商殷墟地区墓葬最为常见的方式，拆车葬在殷墟并不是主流。晚商时期殷墟地区一直存在“弓形器+策管（末）”与马络辔饰随葬两种车马器随葬传统。殷墟时期的马衔比例极低，说明可能是有机质材料制成。车器在殷墟地区的晚商墓葬中不被青睐，可能说明殷墟更强调对马的控御。

声

乐器研究是商周器用制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等级社会对乐器的使用具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对乐器随葬的等级性及编组规律的探索，将丰富对商周时期器用等级制度的复原。常怀颖博士以殷墟遗址群中目前已知的鼓、埙、磬、铙这几类乐器为例，介绍了相关的考古发现情况并指出，这些乐器通常具有社会等级秩序、文化与信仰的符号意义。

色

常怀颖博士指出，在复杂社会中，两性地位是否对等、不同阶层的两性地位是否存在差异，是社会复杂程度的标志之一。在社会礼仪认同中，有何种的性别禁忌、性别等级区分，则是社会认知和阶层观念的直接体现。虽然殷墟遗址群遗存丰富、墓葬众多，但真正得到性别鉴定可以明确

分区的墓葬却不多。因此，对殷墟世界的性别差异描述，只能是粗线条的界定。

在贵族礼制等级中，晚商殷墟社会的贵族男女等级越高，越不平等，较殷墟以前和殷墟以后都要严重，高等级贵族似乎完全不采用夫妻并穴合葬。但据唐际根先生的复原，殷墟低等级贵族和平民存在夫妻合葬现象。亦曾有学者指出，这些人群在墓葬规模、器用制度方面的两性差别也不大。但从器用制度看，除了妇好，女性贵族不能使用车马，也几乎不能使用乐器，更不能随葬兵器。

最后，常怀颖博士总结了所讲内容的几个要点：大约从殷墟二期偏早开始，殷墟世界开始了等级序列和礼制等多方面构建尝试。在殉牲方面，牺牲品种的增加及“牛优位”的确立使犬牲地位下降而不再成为核心用牲，且用犬开始区分使用对象；家马作为殷墟世界的新生事物，在用牲中的重要性十分明显，而马车为贵族所重，平民绝不可用；晚商开始尝试构建编列乐器，也开始尝试按等级区分乐器的配组；高等级贵族的两性差异突然悬殊，女性在器用制度方面开始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在铜器、墓葬等被较多关注的研究之外，晚商世界“声色犬马”所体现的礼制构建努力与尝试，代表了日常生活、个体娱乐、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都存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规范，我们可以将它看做是社会“规训”的折射。

常怀颖博士演讲结束后，韩建业教授、梅建军教授、徐天进教授、严志斌研究员、徐良高研究员等分别发表了看法、评论。

（撰稿：施朝）

12

李零： 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 ——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016年12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刘绪教授、徐天进教授、雷兴山教授、曹大志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徐良高、严志斌、刘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常怀颖出席座谈。参加本次论坛的还有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主任梅建军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陕西考古研究院王占奎

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陈坤龙副教授、刘思然讲师，国家博物馆单月英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讲师马赛、首都师范大学讲师田天等。文研院访问教授祁小春、曹晋也出席了本次活动。

演讲中，李零教授指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个长期困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大问题，他试图以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作为厘清这一问题的突破口。首先，李先生回顾了疑古运动后，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不约而同地全都把目光聚焦于族团说，指出此说乃应运而生，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学术机缘。其次，李先生进一步讨论族姓，把两周20姓分别归入黄帝集团、炎帝集团、二昊集团和祝融集团，指出族姓制度是两周时期的一大发明。复次，李先生讨论帝系，把先秦帝系分为两种五

帝说，一种属周帝系，一种属秦帝系，指出前者是西周大一统的总结，后者是秦代大一统的预告。最后，李先生对上述讨论进行总结，涉及古史传说的层次，帝系和族姓的关系，以及二重史证在考古研究上的分寸把握。

评议环节，刘绪教授指出，梳理古史的传说时代确实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的角度，关注各个地域的人奉谁为祖先。例如，东周时期秦、楚两大国一个在西、一个在南，却都奉颛顼为祖先；黄帝在五帝中似乎“较弱”，而战国时期陈国却奉黄帝为祖先。

李伯谦教授则指出，考古学的出土文物只是一个符号，我们既不能完全排斥文献记载的作用，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文献，要秉持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另外，周

系和秦系的五帝说为何不同，这些方面都值得研究。

许宏研究员则强调，现在许多考古学者对文献学极其热衷，甚至超过那些只研究文献学的学者。这能够侧面反映出，当今一些考古学者对现有文献过于依赖。

唐晓峰教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指出，不同时期中国地图之间递进、转换的关系值得关注。地理学叙述地图时通常有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反映为一个主要的社会机制。例如，研究先秦时期的地图，我们需要注意从诸侯国到郡县制转换的问题，以溯及九州到诸侯国转换的问题，而这种转换往往意味着历史的大变动，意味着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具有极高的政治力度。

（撰稿：施朝）

13

来国龙： 百年“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破坏

2016年12月23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百年‘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破坏”，美国佛罗里达艺术史系来国龙教授担任本次活动主讲。出席本次论坛并参与研讨的学者有：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咎涛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

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王军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人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梁鉴委员等。



来国龙教授用详实的历史资料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理论近百年在中国文物法制中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此次演讲主题中的“文化遗产”，在中文里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的报刊和一些法律文件里面出现。我们更早更传统的说法，如在明清的时候用的是“古董”、“古玩”；传统方志中用“古迹”、“名胜古迹”；1930年民国政府立法时用的是“古物”；1949年以后常用“文物”等。“文化遗产”是一个包容宽泛的概念。

随后，来国龙教授以时间为线索展开有关对“文化遗产”的讨论。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科举制被废除，传统儒家经典从此失去了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西方及日本的现代新观念、新价值不断被介绍、引入中国，迫使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国内以及国际中国文物市场的形成

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掠夺，也提高了国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来教授特别分析了最早的一个政府保护文物的法规，即1909年清民政部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接着，来国龙教授还讨论了王国维等人对清代皇室财产所有权问题的争论，以及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馆的开放对文物保护及艺术史研究的深远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傅斯年、李济等留学生继而将西方的文物保护理念带入中国，突出强调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并将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科学和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与研究，也是中国文物保护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文物建筑的历史价值与科学价值。为了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免遭西方帝国主义掠夺和国内外商人的破坏，民国政府于1930年出台的《古物保存法》宣布中国境内的地上地下的文化遗产“概归国有”。《古物保存法》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文物保护的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物立法（包括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基本上在这一体系之内。

解放后，全国拆城墙，文物保护服从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大量地表文物和民间收藏的文物受到破坏。但与此同时，经济建设和军事备战使一大批考古遗址得到科学发掘。改革开放以来，文物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积极参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不少国内著名文化遗产被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彰显中国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同时，国内外文物市场的进一步开

放，也使在这之前几乎灭绝了的盗墓、盗卖文物活动死灰复燃、日益猖狂。

总体来说，中国近现代的文化遗产保护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由社会精英和官僚推动的一个运动。因此，文化遗产的控制和保护与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目前，这一体制正处在转折的过程中。例如，2002和2013年对文物法的修订使得文物被允许在国内流通、拍卖、买卖，就造成了很多的文物保护问题，对中国文化遗产也有很深的负面影响。

之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咎涛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中东地区文物保护和破坏的情况。咎涛教授为我们展示的视频资料显示，叙利亚极端组织出于宗教信仰相悖的荒诞理由，对伊拉克哈特拉古城遗址、摩苏尔博物馆等地的文物进行大肆破坏。咎涛教授指出，对于叙利亚冲突，人们大多对当地难民的生活更为关心；而当地古文物保护与破坏的情况，则相对不甚受到大众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忆起自己作鲁迅博物馆馆长时，收到一批捐赠的文物，从那次事件以后开始注意到1927年前后北大学人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以章太炎为例，很多人对文物保护有兴趣，一般都从金石学开始，对出土的汉砖、瓦当等进行收藏、整理、研究。当时，教育部把德国考古信息引进中国。1913年，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的美术概念包括文化遗产，比如古代文物。1927年前后，鲁迅、胡适写了很多关于考古学的文章，对王国维等写的文章很关注。鲁迅对日本人的考古报告感兴趣，他对中国的新史学是充满期待的。那一代人的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不一样

：鲁迅和胡适对文物保护，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

唐际根研究员认为，对于文物保护的话题，不应空谈其重要性，更要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如何保护。殷墟在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附近的农村居民竟为了获更多赔偿，而继续为他们当地的建筑物添砖加瓦，近年来甚至还出现了高档住宅区和别墅。这些嵌入文物保护区的建筑，实际上都是“破坏”。唐际根指出，要解决文化遗产的名声困局，应当研究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因素的相关性，其中受益和受损都需要量化评估，并根据量化评估的结果设立文物保护补偿机制。

李人庆研究员从文化遗产破坏和保护的乡村视角，指出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从乡村视角来看待传统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破坏，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了解我们的发展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性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反思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这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国既是文明古国也是文化遗产大国。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文明，中华文明的特质是农耕文明。因此，其文化遗产地理分布特征表现出乡村特征。乡村是中华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产地，也是保护地。乡村是传统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战场和主要阵地。

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性、整体性和生态性。保存（preservation）是前提，而后才是保护（conservation）、研究（study）、管理（management）。文物部门的观念意识和弱势地位。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背景下，政府主导的保护有效性是一个问题。

要特别重视两种形态的破坏：破坏性建设和保护性破坏。因为它们的建设和保护都是在一个具有正当名义和合法性基础上动用公权力和公共资源，在公共利益的旗帜下所产生的具有合法正当性的破坏。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速度减缓和经济危机，美丽乡村和城乡一体化在乡村的展开，古村落的保护在与推土机“赛跑”，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量大面广而且时间十分紧迫。如何保护？保护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认识到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意义。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我国的保护工作正在逐步强化为“文化自觉”的遗产保护意识。其次，要建立抢救性保护的强制性措施，强化立法保护，建立建设性项目的文化遗产保护负面清单，制止建设性破坏的蔓延与扩大。第三，要从过分强调静态保护转到活态保护与静态保护并重，相互促进，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连续体和基座。第四，要保护它按照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去演变，要科学处理好“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的关系，要研究消解经济和物质发展对于文化传承发展的负面影响。第五，要在正确认识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前提下保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性和自主性，弱化其行政性，加强社会参与和制度建设。

苏荣誉研究员指出，从德国等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文物保护必须投入巨大的经费。对安阳殷墟而言，事实上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迁走当地居民，但这在如今的社会现状中几乎不可能做到。此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充分记录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来国龙教授补充道：刚发言的几位涉及到几个关键问题，但没有展开。文物保护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为谁保护，需要从学理和法理研究清楚。其次是怎样保护。从欧洲、日本的时间看，文物保护十分昂贵，需要巨额投入，那么谁来投入？谁来决定保护彼而非此，判别的标准如何。必须看到，盗墓和某些建设是最惨烈的文物破坏，我们有《文物保护法》，但这部法常常徒具其文，在一个有法不依的景况下，讨论如何技术保护是否奢谈？苏荣誉研究员刚才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实话，文物保护只能延缓文物寿命，而且往往是需要持续投入巨资也未必奏效的。有鉴于此，需要借鉴国外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首先进行全面的多种形式的记录。

唐晓峰教授指出，需要反思“文物意识”的缺失问题。北大学生都知道“红楼”，却鲜有人知道“灰楼”；都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却鲜有人去过京师大学堂的旧址。知都不知，更无所谓保护。类似的问题在社会上也普遍存在，文物意识在社会基础中的状况决定了文物保护的执行状况。

徐怡涛教授认为，应对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目前尚面临巨大挑战。将文物保护措施付诸实践，有时还需让步于民生、经济发展的压力。

史睿教授指出，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自唐末之后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包括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研究。而当一个城市不再作为国都，失去经济、军事力量时，其面积会很快缩小，而多余的部分就变为农田，其原始状态则埋于地底。因此，从都城的保护来看，洛阳的情况远好于西安。史睿教授

说，由于房地产的过度开发，西安的地下城破坏严重；但由于河南的房地产发展水平低于陕西，留下了一线生机。例如，汉魏故城太极殿、永宁寺遗址、白居易故居等洛阳城市考古的成果，其价值远超现在西安地面所见的遗迹。

梁鉴老师认为，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因素对文物的破坏情况中，经济因素更为主要。例如，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有许多保存非常好的寺庙，因为受到天气条件的制约，当地居民很少，并且每年也仅有两个月对外国游客开放。这与安阳殷墟的现况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最后，李零教授总结说，来国龙教授从

（撰稿：施朝）

14

魏斌： “山中”的六朝史

2016年12月23日晚，“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山中’的六朝史”。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魏斌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



渠敬东教授出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杨哲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汲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吴真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志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博士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此次论坛。

罗新教授首先就论坛的嘉宾和主题作了简要介绍。他指出，目前六朝史研究已相当深入，成果也颇为丰富，但山岳文化研究这一课题前人较少涉及，引言人魏斌教授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主旨引言中，魏斌教授以齐梁之际陶弘景所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一诗生发讨论。他指出，陶弘景生活的时期是中国古代山岳文化的转折期，由于山中修道和佛教山林化的影响，四世纪以降，在“山中”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内，山中聚落和山神祭祀逐渐向寺院和道馆景观转变。因此，“山中何所有”之问，蕴含着理解这种山岳文化景观变化的重要线索。

魏斌教授从“土地所在”与江南地方性、信仰景观的变化及其空间表现、文献记述与知识景观的扩张、山岳历史中的六朝遗产四个方面介绍了他近年来有关六朝山岳文化的研究。他认为，孙吴、东晋以及南朝立足江东，如何将“土地所在”的江南地方性融入侨寓政权的文化认同之

中，为南方山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与道教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山中修道到山中寺院、道馆的兴起，意味着道教、佛教的山中修行，从个体性苦修到团体性“寺院”修行的变化。后者由于现实需求，往往要依赖于世俗世界特别是皇室和士族官僚的供养和支持。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山岳信仰景观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魏斌教授指出，伴随着山岳文化景观的变迁，有关山岳的文献记述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六朝是山岳知识史上的一个转折期，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献，其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山中寺馆的兴起。山中寺馆文献与世俗权力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名利之场”和“清旷之域”并不是截然可分的。另外，单体性山岳记的出现是中国山岳知识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而早期山岳记撰述的契机似乎仍与山中寺馆的兴起有关。

魏斌教授提示了山岳文化研究所蕴涵的理解六朝历史的线索。他提出，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共同塑造了三至六世纪江南山岳的“名山化”，使之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地理格局。而山岳文化中佛、道两种因素的南北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作为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过程的一个切入点。此外，寺馆化时期的江南山林，对世俗政治、社会权力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融入性。南朝后期的宗教领域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江南寒门、寒人的身影，宗教领域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途径。“山中”的地理和文化特殊性，使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后，与会学者以魏斌教授的引言

为中心，就山岳寺馆生计、南方道路系统的构建、山岳土著力量变化、自然空间与文本空间的关系、佛教山林修行的独立性追求、山岳信仰的规范化、政治中心与宗

教文化中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交互、细致深入的讨论。

（撰稿：黄承炳）

15

郝景芳： 从《北京折叠》到《不平等的历史》

2016年12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从《北京折叠》到《不平等的历史》”。雨果奖得主、科幻作家郝景芳担任主讲，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首先，郝景芳简要介绍了《北京折叠》的主要设定：若干年后的北京共有八千万人口，时间和空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拥有一整天的生存时间和优越的生存环境。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他们拥有的时间是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口，只拥有一个夜晚。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给女儿交学费，去第二、第一空间赚外快，从而目睹了权力和财富的世界，并开始思索城市中自我的位置。



其次，从《北京折叠》出发，郝景芳阐释了这一文本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北京折叠》中假设的未来的经济趋势正是低

技术劳动力冗余，工资无法提升；政府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创造部分低技术就业。但是，郝景芳指出，考虑到低技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大量高技术职位需求和大量自动化劳动力供给，由于工资供给的链条，这批人的工资会被压到最低。郝景芳指出，她这个假设的基点在于，如果这样的人口达到上千万，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北京折叠》提供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想法，即通过减少他们的物理活动时间，从而压缩他们的工作时间和资源占有。她创作的基点在于，希望将政策制定者和被政策影响的群体的区隔描述出来，此外，她还希望能从学理的角度去理解“收入分配”这一几乎在经济学中被一笔带过的问题。

最后，郝景芳从之前的脉络中引申出了她最新的研究计划，即“不平等的历史”。

第一，不平等是确定性的存在，郝景芳从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梳理出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的两种不平等，即“富”与“贵”。

“富”主要在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往往基于血缘和职位，跟随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平等逐渐弱化；而“贵”主要在于地位的不平等，往往来源于市场中的不平等，它是很难化解的。郝景芳还关注富与贵的相互作用，她指出，历史中有很多相互限制的例证，她还非常希望用数理方程去模拟现代经济的具体形态，从而预测消费空间的增长潜力。

第二，不平等的来源值得考量，这主要包含能力差异、机会差异、分配差异等方面。郝景芳指出，人的能力差异主要包括先天差异（比如智力、体力、能力、出

生环境等等）、后天差异（比如勤奋）、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等；人的机会差异包括收入差异大于能力差异，以及交易门槛等等；分配差异主要包括财富差异大于收入差异，劳资议价能力，资本议价能力，利润分配的原则（比如稀缺性，规模效应）等等。

第三，郝景芳从中国的商业系统出发，援引中国历史资料，提出了化解不平等的“七种武器”，即劫富、济贫、保障、公有制、金融、慈善和教育。“教育”这个方面是郝景芳希望着重强调的。她指出，教育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能力，从而缩小低收入人群，提升相对工资；此外，教育还可以提升高收入群体的人类意识，并通过提升普惠性技术从而改善全体人生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经费、手段和可得性；教育的门槛和盈利性是否会扩大这种不平等，并使其固化。

最后，郝景芳着重介绍了英国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所著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及其中针对不平等的对策。她持续思考的问题在于：与不平等的斗争真的能胜利吗？平等和效率的矛盾能解决吗？有没有最优的不平等程度？此后，参加论坛的诸位学者对此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撰稿：谢雨新）

16

郑岩： 另一种绘画史——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壁画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另一种绘画史——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壁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担任主持，参与讨论的学者有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故宫博物院王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练春海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未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刘晨讲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剑威助理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文物出版社副总编刘铁巍女士也出席了本次活动。

活动开始，文物出版社副总编刘铁巍

介绍了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增订版）的出版情况。她谈到，2002初版的这本书是“考古新视野丛书”中的第一本，影响深远。当时郑岩教授还是一位年轻的学者，到再版时已成为一位知名学者。文物出版社与郑岩教授已经有十四年的情谊了，以后还要继续合作。并且文物出版社会一直向青年学者敞开怀抱，共同推进学术发展。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郑岩教授对墓葬壁画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成果颇丰。接下来，他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从宏观上谈论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思考。

他指出，人们在讲到中国绘画时，首先会想到山水画，但从传世的卷轴画上看，追到五代的作品已难以确定真伪。而2014年发现的唐开元二十八年（740）韩休墓中的独屏山水图，说明中国早在6世纪时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山水画，可以更新我们对中国绘画史的认识。今天，我们很幸运，可以看到如此丰富的考古材料，这为我们多角度地看问题提供了条件。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国绘画史的写作不应是单线条的，而存在着多个关系复杂的系统，研究中要注意将墓葬壁

画放在恰当的框架内探讨，不同的阶段材料不同，所运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壁画是西汉中期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陵。这座墓中的壁画描绘的主要是龙、凤、仙山等人们观念中的题材。显示出绘画“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的特质。汉代的墓葬壁画，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关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应更多地与思想史、宗教史结合在一起。另外，在两汉墓葬壁画与丧葬相关的其他形式的绘画中，绘画语言的发展也值得注意。以山东金乡县李庄村东汉晚期“朱鲔石室”为例，该石室体量高大，来访者可以轻松进入，其三壁的画像在表现空间关系上表现出娴熟的技法。

汉代墓葬中出现的墓主画像逐步呈现出偶像的特征，也是艺术史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一倾向，在南北朝时可能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形成一套以墓主像为核心的规制。这类壁画普遍出现于贵族墓葬中，应与绘画艺术社会地位的提高有一定关系。

在南京西善桥官山墓、金家村墓、吴家村墓、石子冈5号墓、狮子冲墓等大型的南朝墓葬中，工艺复杂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的模具和原砖不断使用、修补、重制，这一现象显示出将这一绘画原稿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其确切的作者，但以“大艺术家”为基础的中国绘画史可以从这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写起。

至唐代，墓葬壁画布局相对变得松散。郑岩教授以韩休墓为例说明了这种变化，并指出韩休墓壁画只是当时社会的流行绘画题材。这一时期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

可以从寺院内丰富的壁画中看到。人们似乎把这种想象都抽离到了寺庙中，所以墓葬壁画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苍白。因此只有将墓葬壁画与石窟寺壁画这两个系统加在一起，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唐代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

宋元时期的墓葬壁画呈现出了装饰性的特点，已近“夕阳西下”。郑岩以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1309）武庆夫妇墓为例进行了探讨。该墓墓室壁画均以屏风的形式呈现，其中所绘的两匹马，应为临摹韩幹《照夜白》所代表的一类作品（元代赵孟頫等画家也画过这一题材）。这种临摹说明当时流行的士人绘画，已经被民间所模仿。墓葬壁画中栏杆、人物等的画法也可以看出对同时期卷轴画的模仿。壁画作为宗教史、思想史的反映已经衰微，墓葬壁画已近“夕阳西下”，变为了一种单纯的装饰功能。而同时期卷轴画的系统则越来越复杂。

郑岩教授的演讲结束后，杭侃教授进行了总结。之后，李零、李崇峰、王睿、李梅田、沈睿文、练春海、刘未、刘晨、张剑葳等学者分别发表了看法。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墓葬中的佛教因素、壁画的观者、西方语境下“雕塑”的概念、同类题材在不同媒介上的表现等；方法论方面的讨论集中在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关系、美术史基本方法论的构建等问题。现场听众进行了提问，郑岩一一回应作答。

最后杭侃教授总结了今天的发言与讨论，再次对《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增订版的发行表示祝贺。

（撰稿：武夏）

17

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



2017年1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Peter Bol）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教授、李四龙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等参与讨论。

邓小南院长首先对参加座谈的学者表示欢迎，说明本次讨论的目标不在于追求“共识”，而是期待大家围绕主题畅所欲言。包弼德作为文研院的特邀教授，近期正在北大进行短期讲学和研究，关于中国知识界对“国学热”的看法是他关心的课题之一。在随后的致辞中，包弼德教授提到，他对中国思想史的变迁（包括当代的“国学热”）

很感兴趣，希望在相关方面与各位学者展开交流。回溯历史，汉唐时期的士人学者是朝廷的一部分，而宋朝的士人学者则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与朝廷保持了一定距离。到了20世纪，国家制度的范围日渐扩大，国家权力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中国学者过分采信了18-19世纪德国学者（如黑格尔）对“东洋”的看法来理解世界，认为中国没有历史，这是很可悲的；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复兴中华文明伟大文化”，即开始认为国学、儒学是有意义的。包弼德教授继而提出了几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国学有何看法？“国学”和“儒学”是否一样？现在的“国学”和20世纪初的“国学”是否是同一回事？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将“国学”与“西学”视为一组对立项，那么“西学”

又是什么？

陈来教授谈到了他所亲历的发端于1990年代、以北大为中心的“国学”研究的学术史，以及他对国学的理解。他指出，作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发展为今天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将其创办的学术期刊命名为《国学研究》，具有学术的典范（paradigm）意义。重提“国学”，象征着以北大为中心的部分学者希望摆脱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范式，回复到1920年代由北大国学门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中去。《国学研究》的出版引起了以《人民日报》为首的诸多媒体的关注，“国学”一词也开始被频繁使用。那时北大的“国学热”是邓小平南巡、商业化大潮冲击教育界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着北大学者对商业化的顽强抵抗。但陈来认为，那时的国学并没有真正热起来。此外，他还从国学研究、国学教育和国学传播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国学热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确实存在，但对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是国学传播方面的进展。他指出，国学传播即传统文化的普及，产生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文化信心增长这一背景下。在国学传播的过程中，媒体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显著。陈来特别表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全球化所表达的文化立场，也对国学热产生了助力。他呼吁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被全球化所冲淡。

高全喜教授认为，目前的思想界，尤其是近三五年来，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譬如，自由派内部出现、分化出新的一批学者，他们对传统文化、儒学和国学都带

有了同情的态度，主张不再将自由与传统视为对立，而是寻找二者的内在联系，也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历史叙事来找到文明演进的内在过程。与此相对的，曾经反传统的左翼思想阵营，也对传统有了新的认识。传统开始成为两派争夺的资源。对于国学这一概念本身，高全喜教授认为，国学是一个“活”的概念，随着大家理解的变化，其内部也会发生转变。当下的国学是包裹着传统外衣的现代性的、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未来走向，传统和国学都可以给我们提供资源。

干春松教授将近几年国学热的产生视为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人民对国家信心增长的一个呼应。当下的国学热的推动者未必是知识分子，而是民众。现在的“国学”更像是一个载体，是一个被借用来代表中国目前许多未定的共识的符号，而非民国初期时的带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或是学科反思的方式。

李四龙教授谈到了他的研究方向，即佛学和域外研究与国学的关系。他提到，此前自己一直不认为佛学是国学，而现在，国学中已被认为包含了佛学研究。一个外来文化（宗教）是如何融入到了主流的、传统的中华文明中，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国学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他希望国学能够具备更多的开放性来接纳更多的文明进入中华文明体系中。

唐文明教授紧紧围绕包弼德教授的几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20世纪初的国学与现在的国学有延续性也有差别。那时的国学有两大主题（国族建构和国民性的培养），都带有革命的历史任务。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的国学现象与过去的差别主要在于：过去是革命和打破旧传统，现在则是革命的话语终结，重视转型与建设，即从破到立的一个转变。国学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是文史哲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意识到了文史哲研究方法的局限，从而用国学来弥补这些视角上的、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国学与儒学的关系，他指出，国学突出自身的主体地位，会导致我们忽略儒学作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存在的意义，也会使得儒学被限制为一种民族文化。最后，就国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现象，他认为并没有这样的对立。文明史研究涉及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需要顺着西方文明的归宿来讲中国文明，而要强调自身文明的价值。

陆扬教授表示，知识界和民间的国学热并不是互相隔绝而是存在本质上的联系的。他认为，西方学科在处理中国知识的

时候是有问题的，对传统知识语境的把握也是片面的。他还特别提到，许多西学出身的、没有受过国学方面教育的年轻学者近来也开始对国学产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基于学者们的讨论，包弼德教授概括了许多让他深受启发的内容。比如，就国学与西学的比较这一问题，他指出，当我们作“比较”时，我们所做的其实是解读（interpretation）与构建（construction）。中西虽然常常被放在对立的位置去比较分析，但它们也有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如政府、宗教、军队、法律，等等。最后，他认为应该警惕所谓的“例外主义”（Exceptionism）现象，作为学者，我们恪守学术立场。（“For intellectuals, we are the same.”）

（撰稿：李雨澄）

18

师说，我与宋史

2017年1月6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八期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师说，我与宋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担任主持，哈佛大学副教授、文研院特邀教授包弼德，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伊佩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

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怎样读书、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伟楠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对于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的问题，四位学者给出了不同回答。伊佩霞教授首先发言，回忆了自己学术兴趣在家族史视角引导下由魏晋隋唐史转向宋史的经历，并提到是宋代学者丰富的学术思想与宋代繁荣的城市生活吸引了自己。包弼德教授也认为自己研究的领域不仅仅限于宋代，而是跨越8到15世纪“Middle Period”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他还提到自己对宋代的关注源于对当代中国的反思，特别是从唐宋变革这一基本性变迁把握中国历史的特征。包伟民教授坦言最初选择宋史是“被选择的过程”，自己曾在90年代后期想过转向江南地域研究，但考虑到近现代研究材料太多，不易理清哪些是核心的、重要的、具有牵动性的材料，故而选择返回宋史研究领域。邓小南教授在回忆自己选择宋史过程的同时，强调宋史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从近代以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宋史研究与这些

研究相比不很成体系，一些领域还不够成熟，使当代宋史研究具有较大“再认识”的空间；另一方面，宋史研究者对材料的敏感度、利用程度、开掘程度远远不如先秦、魏晋、隋唐等朝代的学者，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驰骋空间。

随着近年来数据库的建设和普及，宋史学者容易获得并使用更多材料，从而对学者利用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制定学习计划、从何处着手阅读宋代基本典籍成为了宋史研究生关心的问题。包弼德教授意识到东西方学者对于阅读原典或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方法不是从《通鉴》《长编》《系年要录》一本本通读，而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何，再选择相应的基本典籍。在读书时，特别要注意那些在宋代当时就特别有影响力的说法，并仔细思考为何时人重视此种说法。在阅读当代学者著作时也应遵循类似思路。伊佩霞教授也提到，美国的宋史研究训练不要求研究生在展开工作前通读《长编》等基本



典籍，同样建议研究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题目，在此前提下穷尽相关材料。她还认为研究生应打开阅读面，像宋代的笔记、《宋会要辑稿》、墓志铭、涉及诸多论题的《朱子语类》以及各类文集都应涉猎。

包伟民教授认为，老一辈学者要求研究生阅读《长编》《要录》以掌握两宋的基本史实是基于其自身的读书起点，不同年代学生在选择入门书方面应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建议从每一类宋代典籍中挑出卷帙不大的一种进行精读，以便建立对每类文献记载特点的印象。包教授还认为，《长编》《会要》对于年轻学生来说不是很好的入门台阶——因为编年体由片段的材料组成，缺乏故事性，史实生疏的学生不知碎片的材料应当放在哪里，不易建立一段历史的整体概念。包教授进一步对如何利用数据库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首先提出，关键词的选择对于检索结果影响很大，使用更恰当的关键词才能捕捉到更多的资料。其次，使用数据库检索是将一段文字从整个文本体系中抽出，学者需要通过之前的积累才能感觉到文本的背景。一些研究生论文中常常存在的“检索体”问题，就是数据库检索的副作用。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建立对各类文本特点的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对每类文献进行精读，特别要将文本作为需要解构的对象，了解每类记载和书写的习惯，读出文字背后的信息。

邓小南教授认为，三位老师的发言表现了国内与海外两种训练背景的差异，任



文研院长邓小南教授

何一种培养方式都是特定环境下针对特定学生的训练，各位同学要根据自己所处环境作出不同安排。她认为阅读史料应区分精读与泛读。入门时大部头的史书应泛读，而如果专治思想史或社会史，则应结合选题精读某类书籍，例如《朱子语类》或《夷坚志》等等。这两种读书方式还对应着“从面到点”和“从点到面”两种研究方法。一般来说，从“面”上着眼找“点”会比较准确，不易偏移。而对于没有广泛接触宋代文献的学生来说，从“点”上开始或许比较容易，但应当注意到“点”是能扩张的点，是各种史料成组的点。只有将某条材料周边的各种材料组成材料组，笼罩在此点上，点的研究才能比较确切。总的来说，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入手，学生都应了解此种方法特有的好处和不足。

关于学生应该如何选择研究议题的问题，伊佩霞教授坦言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建议选题应注重比较的视角：既要注意朝代间的比较，也有中国与外国的比较。

包弼德教授强调选题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并以理学发展的例子说明，很多题目和领域不一定是以朝代为发展段限。两位教授还同时建议研究生注重与学界研究“交锋”，慎选那些没有既有研究的题目。包伟民教授提出，博士生在选题时首先要了解题目的史学叙述和材料的体量，避免出现“推倒重来”。他还同意之前两位教授提出的慎选“全新”题目的建议，鼓励大家将旧题目做出新味道来。邓小南教授细致阐述了选题的“牵动性”问题。“牵动”是靠问题去刺激问题。看来是别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跟上去思考。自己写文章时哪些地方存在空白，自己也应心中有数。她还建议硕士研究生应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实在的题目，重点不宜放在“书写”等较虚的题目上，因为要判定什么东西是“书写”的结果，需要实在的积累与功力。邓教授最后强调：选题一方面要注意当前学术圈的兴趣，另一方面，如真正在某一方面做出实在的东西，也会具有切实的引领力量。

四位教授讨论的最后一个议题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包弼德教授回顾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他认为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晚近西欧产生的学术思想，其思想假设恐怕是非历史的假设。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仍是充满争议的问题。伊佩霞教授提到学习社会科学理论

是自己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原因，她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对史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包伟民教授认为史学者具备社会科学常识，特别是用到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时应了解概念的确切所指。对于二者的关系，包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是把社会解剖开来，往往仅能从本学科给定的视角回答问题。历史学研究考虑面向较全，但一旦涉及具体的领域，需要借鉴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此外，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时段不同，应当常常将社会科学家对于当代的研究作为镜子照向历史，看看现在的问题是否早已存在于历史时期，而史学研究者却没有意识到。

邓小南教授回忆到1987—1988年在宾州大学参加郝若贝（Hartwell）读书会的情况，并认为郝若贝最令人受益的建议，就是重视社会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刺激。她尤其提醒在国内读博的同学，应意识到我国博士培养制度没有对涉猎诸多学术领域做出规定，故各位同学更要有意识地补充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

座谈结束之后，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展出了一批宋代书画复制品，并对本馆古籍文献服务进行了介绍。

（撰稿：胡斌）

（四）文研汇讲

01

祁小春：

《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



冯承素摹《兰亭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论对古代避讳学及中古避讳实例作初步分析归纳，深入探讨《兰亭序》避讳现象，目的当然只限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魏晋南北朝，士族名士竞相放浪，以不拘礼节为尚，但是这一时期恰好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讲礼”的时代。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拟通过详论历代讳礼，深入魏晋南北朝士族生活的细部，藉以展现士族生活中所谓“讲礼氛围”的场景，以期进一步了解对东晋贵族生活文化之一端。

《太平御览》三六二引何法盛《晋中兴书》：

咸和元年，当征苏峻。司徒导欲出王舒为外援，及更拜为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三千石。舒上疏以父名会，不得作会稽。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陈音虽异而字同，乞换他郡。于是改会为郗〔古会切〕，舒不得已就职。

《晋书》卷七十六王舒传也有类似记载。这条数据告诉我们：王羲之的堂叔伯父王舒被朝廷任命为会稽内史时，曾拒绝赴任，要求改授，理由是“会稽”地名犯

其父“王会”名讳。朝廷认为二“会”字同音异，并无大妨。王舒则认为字音虽异而字同，请求另除他郡。为此朝廷特意把会稽改成“郟稽”，使之音形皆异。王舒尽管仍不情愿，但终碍于不以家事辞王事，遂“不得已就职”。后来其子王允之（王羲之堂兄弟）也有会稽之任，他亦以同样理由要求改授。

由此可见，琅琊王氏对家讳一事非常在意，绝不含糊，无论是音异字同、还是字异音同之字。既然王舒对以“郟”代“会”都不情愿认可，那么王羲之又怎么可能在自撰之文《兰亭序》中主动地以两次“揽”代“览”，直犯其曾祖王览名讳？本文将对古代避讳学及中古避讳实例作初步分析归纳，以期深入探讨《兰亭序》的避讳现象。然本文并不只是限于讨论此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在魏晋南北朝，士族名士竞相放浪，以不拘礼节为尚，但是这一时期恰好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讲礼”的时代。这只要看看《通典》中议论礼节之多为晋人，即可见其一端。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本文拟通过详论历代讳礼，深入魏晋南北朝士族生活的细部，藉以展现士族生活中所谓“讲礼”氛围场景，以期进一步了解对东晋贵族生活文化之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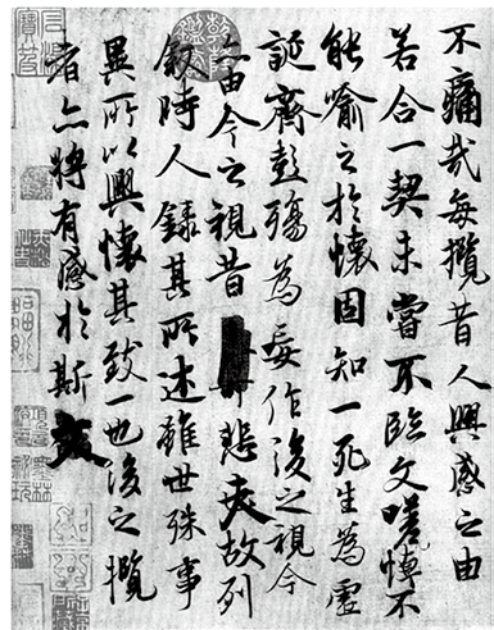
一 关于避讳字“揽”

《兰亭序》帖本（指传世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的各种临摹本以及刻帖拓本）中“揽”字凡二见，即“每揽昔人兴感之由”与“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梁刘孝标《世说新语》企羡篇三注引王羲之《临河叙》文中无此二句。又传世右军诗文尺

牍亦不见此字。王羲之曾祖父名王览（206—278），故通说以为《兰亭序》中“揽”字乃右军为避先祖家讳，用以代“览”者。此说是否成立？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者注意。从结论而言《兰亭序》中恰恰是因为有此“揽”字，反而令人生疑，以至于《兰亭序》真实问题又不得不重新议论。为了本论立论之前提成立，必须首先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王羲之究竟会不会避讳？若须避讳，王氏父子祖孙名中皆同名“之”字的现象又何以解释？

答案是肯定的。魏晋南北朝人重讳，于士族尤严。《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六所谓“今人避讳，更急于古”道出南北朝避讳森严的事实。历来学者对此均无异词，如清人赵翼曰：“六朝时最重犯讳”（《陔



《兰亭序》帖本（指传世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的各种临摹本以及刻帖拓本）中“揽”字凡二见

余丛考》卷三十一）、陈垣曰：“避讳至晋，渐臻严密”（《史讳举例》卷八“晋讳例”条）、陈寅恪曰：“六朝士族最重家讳”（《崔浩与寇谦之》）等，已成史家常识，不烦赘辞。王羲之本人也同样如此，他曾因避其祖王正之讳，将“正月”改写作“初月”或“一月”，可知他确实是遵守当时的讳礼。至于王羲之父子何以名中均含“之”字，前人对此问题论之甚详，结论是那不属于避讳范围。

（2）《兰亭序》中“揽”字究竟是不是避讳改字？

如前所述，“揽”为避讳改字乃通说，迄今为止无人质疑。《兰亭序》帖本均作“揽”，若非避讳，此字作提手旁终究无法解释。笔者以为，《兰亭序》的“揽”虽为避讳改字，但改得比较牵强，因为这不符合当时的避讳习惯。理由如下：

1、古人避讳改字，本为礼教习俗之事，然以其带来诸多麻烦不便，是无人喜而为之。为之者不得已也。因此，人们只有在实在无法绕开讳字的情况下，诸如草拟诰诏公文，或书写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时，纔以改字代讳。然而《兰亭序》是自撰之文，并非撰写公文，作者可以任意选词拟句，无须“遇讳”改字。王羲之有何必要犯其先祖王览之家讳，非用“览”而不可？与“览”同义字多矣，如读、观、咏、诵、阅、见、看、省、睹等字，都不犯讳，王羲之何以皆弃之不用而必拘泥于改“览”为“揽”以书兰亭文？

2、若谓王羲之独钟“览”字，觉得无“览”则不足以增饰其文华词藻，舍之则绝难有合用的话，那么遍检传世右军文以及大约四百余通法帖尺牍文，何以不见第二个“揽”

或“览”字？

3、按“揽”义，《说文》解作：“撮持也”；《广雅》释诂皆以“持也”作解。《释名·释容容》解作“敛”。义均释作撮、持意、即如今之抓取、总揽意（或亦含拂拭义），在一般情况下不含览字的“以目阅读、以口咏诵”之意。而《兰亭序》文中用“揽”，于文义难通。王羲之为何要在文中两次用此文义不通之字？

4、“览”与“揽”在《广韵》中均为“卢敢切”，属同音字。用“揽”代虽能避“览”之形而未能异其音，不合当时避讳习惯。如此一改，遂使《兰亭序》成为一篇只能浏览不能念诵的哑文。

笔者以为，《兰亭序》中所用“揽”字既违反逻辑，亦不合情理常识，如何解释此现象？《兰亭序》会不会真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其多出《临河叙》的一百六十七字文为后人附加之伪作？作伪者是否故意以“揽”入文中，以使世人相信为王羲之真笔？若真是如此，其作伪的马脚恰好暴露于此。

为证明这个推论，首先必须考察《兰亭序》所用“览”的改字“揽”是否合乎当时的避讳方法和习惯。为此有必要先说明一下避讳学，并结合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期的避讳实情，从其义、音、形三方面对改字“揽”加以探究。

二 关于避讳改字的方法

（1）避讳的由来——与本论的关联问题（略）

（2）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避讳改字之基本方法——同训代换、同义互训

陈垣谓：“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隋唐以前避讳方法比较单一，多用改字、空字之法，缺笔与改音（陈垣认为此法始于唐）之法出现稍晚，至唐代以后才开始普遍使用。《兰亭序》所用“揽”字乃改字之法。按时代顺序、当避讳者人名及当时人的避讳方法编成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国讳例表”。从表实例可以看出，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避讳法主要为改字法，且其所改之字必与原讳字在字义上保持一致或相近，即“同义互训”。故可以初步认定，避讳的改字，须用与原讳字同义同训之字代替，此乃改

字法的基本原则。以是观之，《兰亭序》改字“揽”在字义上与“览”不通，难合当时“皆须得其同训以代之”改字法规则。当时的国讳的避讳方法，除了上述必须同训代换、同义互训外，有时还更加严格，甚至不得用字中含同形同音之字以代讳字。上举三国孙权太子和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这类例子，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更为严格的避讳法。国讳之法如此，门阀士族私讳家讳，亦相差无几。

（3）六朝避讳实态——讳字的改字不得既同其形又同其音

以下再讨论当时人如何遵守私讳家讳，进一步考察避讳改字的字音、字形问题。魏晋南北朝士族家讳之严，前人多有论及，然究竟有多严格，却是今人难以想象的。笔者以为，考察当时士族犯讳的实例，不但能具体论述这个问题，而且还有助于了解避讳礼俗中的一些具体规矩与讲究。以下录出一部分魏晋南北朝士族之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犯讳”实例，编成“魏晋南北朝士族犯讳实例表”。近人陈登原在《国史旧闻》卷二十一“严家讳”条中，举例论述了三国以降至于两晋南北朝间士族避私讳家讳的情况，作如下总结：

- 1、三国之时，已严家讳，非特己所弗言，并亦禁人勿言。
- 2、六朝以降，自家之讳，已至禁人勿言。同音之字，甚至亦付之讳。
- 3、闻讳而哭，盖以严家讳为孝子标准之一。
- 4、家讳之避，地方官居然已悬诸令甲。

根据上举实例以及陈氏的总结，可将当时士族之间在“犯讳”时出现的避讳特

征进一步归纳如下：士族彼此间谈话时必须时刻注意，不能直接说出含对方私讳家讳之字。严格时甚至连同音字也须尽量回避，即所谓“嫌名”者是也。若任职地名或上司名与家讳抵触时，当事人可以要求移官易职，改授易名，甚至解职，这也是晋代一大特色。观上举“魏晋南北朝士族犯讳实例表”中士族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犯讳禁事例，实际上也等于告诉我们：这些也是当时在纸上不能见和不能写的避讳规矩。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从皇室到士族，避讳情形确实极其森严。从犯讳例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礼禁之严，以至于时人动辄得咎。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个讳礼愈严而愈易触犯之时代。

再据上例考察《兰亭序》改字“揽”在音、形上是否抵牾？首先，“揽”与“览”同音亦同形。姑且不说保留原有字形，仅在原字上加偏旁的避讳方法在隋唐以前极为少见，即或有之，亦必须互训，且不得同音，此可据“国讳表”、“犯讳表”上的诸实例得以证实。而“览”、“揽”却是同声同韵。即使加了手旁，那也只解决了“形”而并未解决“音”的避讳。在魏晋南北朝，改字虽有加偏旁之例，但如其字仍存讳字的声、形之部（除了常用的偏旁部首以外，如“览”中之“见”），亦当皆避而不用。如“表”中吴太子名“和”，“禾”不得用。晋愍帝讳“业”，“建邺”以避“业”讳而改作“建康”，“邺县”改作“临漳”。是以知“禾”、“邺”虽非直犯讳字“和”、“业”，但亦被改去不用。又如“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之例，理亦同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改字虽外加偏旁部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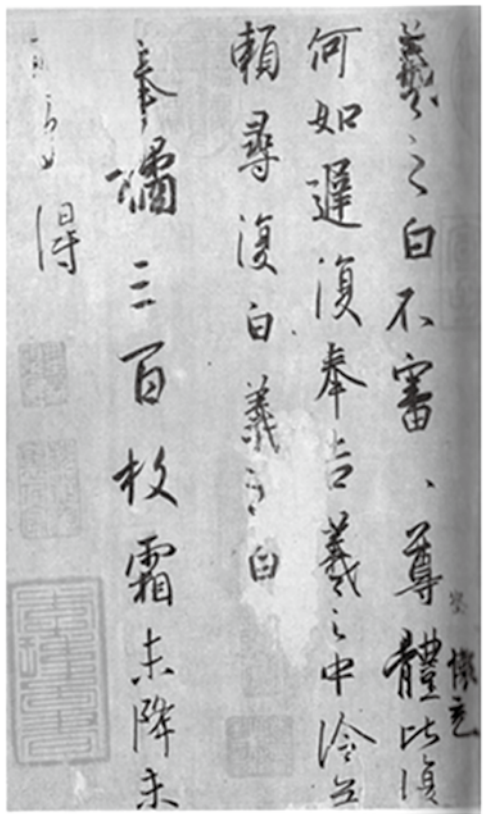
但只要字中仍保存与讳字同形同音之部者，都算不得为改字。所以“禾”不得代“和”、“邺”不得代“业”、“纭”不得代“云”。甚至还有字中保留与讳字同形而异音之部者，亦难以通行。如“会”与“郗”本属异音字，但因形同而遭王舒拒绝。然而《兰亭序》的“揽”却可以代“览”，确是难以理解。

《兰亭序》中的以“揽”代“览”之现象，以义言之：二字未能互训；以音言之：二者同音；以形言之：“揽”字含“览”形在内。因此，以“揽”代“览”，显然不合当时避讳习惯。

基于此，我们现在假定，王羲之于兰亭盛会当日果然即兴写了“揽”字，则面对四十余位与会名士，不知他是如何把《兰亭序》吟诵给大家听的？是否会“正色”、“流涕呜咽”、“狼狈而退”、“不履而走”、“闻讳必哭”、“对之流涕”？很难想象，四十多位在场的名士们（其中包括王羲之的三子：凝之、徽之、献之），对此是如何“有感于斯文”的？王羲之不惜在众多名流雅集之时，公开违反当时的避讳习俗，作此惊世骇俗之举，究竟是何原因？若无其他可以解释的理由，《兰亭序》中“揽”字的出现，是有悖常理的。

结语——但问题并未结束

既然“揽”非避讳改字，那么其字又为何会出现？与“览”同义字甚多，王羲之何以皆弃之不用，而必用违反避讳原则的“揽”字作改字，从而犯其先祖王览之家讳以书兰亭文？这样做的必要性何在？难道王羲之真是写错字了吗？首先，王羲



平安帖

之不是民间不太识字的工匠书手；其次，大凡写错字，皆属偶然现象，一错再错、连续两次书错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之所以必书“览”而不可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套用前人文章语词。盖《兰亭序》最后两句“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乃套用西晋石崇《金谷诗序》“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句。《世说新语》企羡篇三记王羲之闻人以《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相比较，甚是欣喜，故王羲之对石崇金谷园集当然会很“企羡”，从某种意义上讲，兰亭之集确实有踵金谷之会的意思。但先不论王羲之到底有无可能公然袭仿石季伦文句，假定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对《金谷诗序》模仿之作，模仿的又为何不是全文或全文的大部分，却要偏偏挑出《金谷诗序》的最后那一句来加以模仿，从而主动冒犯家讳呢？今本《兰亭序》中疑点层出不穷，其中多出《临河叙》那一百六十七文字中，不仅存在清人李文田、近人郭沫若等人指出的种种疑问，更存在避讳改字“揽”这一令人疑惑难解现象，故很难想象《兰亭序》的书、文出自王羲之，后人掺杂作伪的可能性还无法排除。总之，《兰亭序》从帖字到文章，疑问点颇多，倘若这些疑问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就不应急于断定其必出王羲之之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本文开头所言，魏晋南北朝士族名士竞相以放荡不羁为尚，然而此一时期又恰恰是历史上最“讲礼”的时代。避讳属于凶礼范围，凶丧之礼尤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所重。究其原因，当为慑于清议严厉之故——在当时因礼数不慎而招致沦废之事屡见不鲜，故士族反而多重孝道，周全礼数，对丧礼尤其不敢怠慢。

通过以上揭示的“讲礼”氛围以及相关讨论，可以确知当时士族确十分重礼以及其规矩与程度。近人许同莘在论及此事时，引沈垚之说并有如下议论，“沈垚曰：‘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尚与古不甚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精粹之言。至明则士大夫皆出草野，议论于古绝不相似。’沈氏此言，具有特识。后人习闻竹林放旷之说，遂以概当时习俗，此耳食之谈耳。南朝宰相，王导、谢安而外，首推王俭，亦深于礼学者。”盖以王氏一族之精于礼学，世代相传，其子弟于讳礼自然不容有所怠懈，皆由本论得以证明。

（祁小春教授供稿）

02

常怀颖： 何来金镶玉

——早期玉石器矿、作坊的发现与殷墟早期的绿松石镶嵌



2016年11月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常怀颖博士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室进行内部交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邀请学者赵宪章、祁小春、罗祎楠、魏斌、曹晋参与交流。常怀颖博士以“何来金镶玉——早期玉石器矿、作坊的发现与殷墟早期的绿松石镶嵌”为题，介绍了桐庐方家洲、良渚塘山、张掖马鬃山等玉矿遗址的发现过程，并对玉石矿料的开采、玉石器加工的基本流程进行阐释。

他报告的重点是讨论新石器到晚商时期绿松石镶嵌的变化。综合前人研究，他认为，使用绿松石进行装饰在黄河流域可

能最早出现在裴李岗文化。但出现绿松石镶嵌技术的时期，却比较晚。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才出现了最早使用绿松石镶嵌的装饰手法，比如大汶口墓地发现的绿松石镶嵌象牙器。从这一时期一直到龙山晚期，海岱地区比较流行的是将绿松石珠镶嵌在象牙器、骨器上，较晚也会如临朐朱封大墓所发现的那样，镶嵌在玉器上。绿松石珠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作为颜色的搭配或图案中的装饰。但在稍晚的黄河流域，以绿松石片拼合镶嵌却开始流行。在从甘青地区到黄河中游的下靳、陶寺，再到黄河下游的两城镇，较多的发现绿松石片嵌的腕饰、笄首。在

这种装饰方式中，绿松石作为装饰的主体而不是作为颜色调剂的辅助装饰。同时，以片嵌的绿松石制成的装饰品，往往是镶嵌和粘接在某种有机质材质之上的。

在稍后的二里头文化中，绿松石镶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规则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嵌，主要使用于牌饰或其他独立的器物（如龙形饰）之上，而不再仅仅作为身体装饰品。绿松石片开始与铜质框架相结合，下部依托于一层可能是粘剂黑色胶质物，附着在有机物上。同时期的四坝文化中，大片的绿松石原石，几乎未经加工，就粘贴在陶器之上，与二里头文化有较大的差别。检测分析显示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可能来自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秦岭成矿带，这与二里头文化在商洛地区的分布，是可以暗合的。在此之后的一个阶段，除了盘龙城短暂的使用外，中原腹地的绿松石镶嵌装饰数量明显减少，这可能与早商时期对绿松石矿的控制能力改变有关。

但是，在殷墟一期、二期，突然集中出现了大量绿松石的相关制品。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爆发式的，从殷墟一期开始，在殷墟二期最为集中达到高峰。对绿松石的运用，相比二里头与二里冈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装饰绿松石的器类多变，包括了礼器、兵器、车马器等；其次是绿松石片的形状多变，不再专门切割成规则的片状：有时以原石，有时可以做成不同的几何形状，以马赛克方式拼嵌。最主要的变化是，绿松石镶嵌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不仅是象牙或是骨器，而是比较广泛地直接镶嵌在铜器上，甚至于大理石之上。这些镶嵌的兵器、车马器，大都不具备实用

价值，很可能只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而从技术角度讲，镶嵌的绿松石下，不再见到早期黑色胶质物下作为黏着用的有机质载体。

根据最新的检测分析显示，殷墟的绿松石来源不似二里头遗址那样较为单一，而是非常复杂的。在殷墟一期、二期时，与绿松石镶嵌同时突然出现的还有较多且突出的来自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比如家马、马车、北方因素的青铜兵器、黄金器等。殷墟早期突然重现大量绿松石镶嵌装饰，一方面可能是商人贵族重新获得了新的绿松石矿源，甚至不能排除远距离贸易带来绿松石资源的可能；而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商人在于北方文化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与动力（最重要的是马车）的同时，结合了自身较高的铜器铸造技术，在模仿北方系器物的过程中，以绿松石镶嵌作为身份区别、技术创新的可能。

常怀颖博士在交流会的讲演过程中，从新石器到晚商时期绿松石镶嵌的变化出发，以小见大，探讨了其背后宏大的工艺发展过程和历史脉络，显示出了扎实的学术方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文研院也将大力扶持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常怀颖博士供稿）



03

赵宪章： “文学图像论”臆说

2016年11月10日下午，南京大学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赵宪章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室以“‘文学图像论’臆说”为题进行了内部交流，中国传媒大学部分师生也闻讯前来参与了交流和讨论。

赵宪章首先说明这个题目并非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深度阐发，而是就这一新的研究论域进行粗略的宏观描述。“文学图像论”是他参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对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这一论域的命名。这一研究尽管古已有之、中外有之，但是当下研究已有很大不同：就学界所面对的问题而言，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主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唱和与呼应——就这一论域的方法而言，“语图符号学”已被提升为它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之所以成为当下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文学遭遇图像时代”及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从更加宏观的层面鸟瞰，实则是“图像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的表意活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符号危机。就此而言，与其说“文学图像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图像的符号关系，不如说是通过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回应这一现实关切，其中蕴藉着深沉的人文关怀。

据此，赵宪章认为，“文学图像论”尽管已有辽远的过去，但是只有短暂的历史，1987年“国际词语与图像研究会”（IAWIS，<http://www.iawis.org>）在荷兰成立是其



标志性事件。从该学会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成果来看，诸如《文体与图像》《词语与图像中的讽刺》《莫里斯早期作品中词语与图像的整合》《文字在绘画中变幻颜色》《隐喻和绘画》《美国早期现代主义中的词语与视觉》等，足以见出“语图符号关系”已经成了他们自觉的方法论和关切焦点。

那么，这一研究的前景如何呢？赵宪章首先回顾了20世纪的文学研究，认为“文学与语言”是这一时段的母题，直接原因当然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的出现。那么，语言学为什么成为了20世纪的显学呢？赵宪章认为根源于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人类在20世纪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种冲突，背后实则都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所谓“意识形态”，

就是“语言表意”。语言是意识形态（表意）的符号载体，于是，语言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也就自然而然、理所当然。赵宪章认为，这一状况和19世纪很不相同：19世纪人类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因而社会学（广义）成为这一时段的显学；折射到文学研究论域，“文学与社会”也就成了19世纪的学术母题。那么，21世纪呢？意识形态冲突将继续成为人类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尽管它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各种变体。因此，语言学将继续成为21世纪的显学。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图像符号在世纪之交强势崛起，它作为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表意符号，大有僭越、替代前者之势能。由于图像符号的表意功能直接接受技术的支持，而语言与技术的关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图像对语言的僭越和替代刚刚开始，若干年之后的情况怎样很难预料。这就必然导致如下可能：图像学和语言学将一起成为21世纪的显学。就此而言，“文学图像论”大有可为，语图符号学方法大有可为！

赵宪章在回顾了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后认为，应将“文学图像论”置于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的广袤“田野”，注重中国学术资源的“田野调查”和研究，避免理论“空对空”和廉价的“表态性”研究。于是，对于这一“关系史”，赵宪章尝试就其分期问题请教各位。在他看来，从“语图符号学”的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文字出现之前，语言表意的载体是声音，二者的关系是“语图一体”，“以图言说”是其主要特点。二、文字出现之后，标志着“语图分体”时代的开始，于是有了二者的互相模仿，出现

了诗意画和题画诗之类的互仿文体。三、宋元之后，“近代汉语”改变了文学的诗意表达，“写意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叙事插图逐渐繁荣，以及“宋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使二者的关系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语言和图像开始共享同一个文本，出现了“语图合体”新形态，“语图互文”成为二者关系的新特点。再后就是“施为（动态）”图像的出现，直至今天的网络“图说”，但这已经超出了自己当下所关注的论域。

“语图符号学”既然是“文学图像论”的基本方法，我们就应对这两种符号的性质和功能有一个总体把握。在赵宪章看来，我们首先应当确认的是：语言是一种实指符号，图像是一种虚指符号。实指的，所以是强势的；虚指的，所以是弱勢的。因此，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并且发生矛盾时，往往表现为语言符号对于图像符号的驱逐或遗忘。赵宪章运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的大量事实来印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并且就其中的原因和后果展开了细致分析。

最后，赵宪章以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为例说明“语图符号学方法”的普适性。在他看来，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都不应该有自己的目的，它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为其其它研究提供某种“参照”，作为其它研究的“工具”，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上手性”——即经由其它目的实现自己的目的。“文学图像论”作为基础理论也是这样，它的目的只是为其它文学研究提供某种参照或支持，以实现文学研究的“上手性”。如是，“文学图像论”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赵宪章教授供稿）

04

汲喆： 世俗化理论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

2016年12月6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副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进行内部交流，主题为“世俗化理论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邀请学者曹晋、魏斌、赵宪章、祁小春，工作委员韩笑等参与讨论。

汲喆教授首先指出，宗教曾是社会学发展初期的重要理论议题，韦伯和涂尔干对相关问题极为关注。二战之后，宗教在社会学意义上成为非西方的“他者”，故而时常被放到人类学的讨论中。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新兴宗教以及新型教派不断涌现，影响日益显著，且宗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渐明显，它才重新回到西方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而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迅速，同样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理论工具方面，美国的“宗教市场理论”常被用于解释中国当代宗教。该理论代表了古典经济学在宗教方面的应用：假设人都是功利人，宗教团体如企业一般参与市场竞争。“宗教市场理论”的前提在于取代“世俗化”理论，认为在自由宗教市场的美国，宗教不会衰退。汲喆认为此种理论放弃了讨论宗教变迁

与现代性的关系，将宗教还原为个体心理学的范畴，是一种理论的倒退。

本次讲演旨在讨论受到挑战的世俗化理论对于解释当代中国宗教是否有效，特别是将世俗化这一宏大概念变成可运用的分析工具，力争把对历史事实的观察和对历史事实的抽象思想结合起来，避免对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式的理解。汲喆认为我们首先应回到“世俗化”的原初意思，即“世俗权利对宗教财产的剥夺和占有”上。这里的“宗教财产”不仅包括物质性的，还有符号性的。世俗化既代表了世俗政权在取消宗教建构社会基本秩序方面的特权，同时也代表了世俗政权对宗教资本的利用和改造。这一政教之间冲突、谈判和联盟的过程不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而是一种复杂反复的过程。世俗化过程虽从世俗力量对宗教的削弱开始，却会同时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后果，即对宗教发生建构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世俗化并不是单纯地意味着宗教的衰落，特别是宗教制度的衰落，它往往指向宗教的重构。

近代中国世俗化进程的起点恰与原初意义的世俗化异曲同工。清末新政直至民国时期大力推行“庙产兴学”运动，以没收寺庙财产的方式推动现代公共建设，使得不同派别的现代精英纷纷加入



毁庙的行动中。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除，象征着作为政治、社会、文化三合一的儒教解体（当然，儒教是否称为宗教，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正在此时，“宗教”概念藉由日本引入中国。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人对基督教的理解，认为所有宗教都应如基督教一般，具有教会、经典、教士团体等要素，它的传入也为近代中国构建“正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迷信”为取消“异教”和民间信仰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持。

与民国政府推动宗教世俗化相对的，是各大宗教普遍建立教会组织的活动。宗教协会作为跨寺院组织，其创立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抗庙产兴学运动，而全国性宗教组织则代表了宗教与世俗化的对抗。自北洋政府以来，官方虽将宗教自由写入宪法，却还是不同程度地对各类宗教社团采取消极的态度。建国初期，共产党在思想上、经济上和组织上三个方面对宗教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的建立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9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后，除了正式登记在册的宗教外，一些新兴的宗教

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使政府应接不暇。汲喆教授以法团主义的概念解释政府对宗教社团的管控，他认为在不同局势下，国家法团主义受到官方宗教机构的角色、官方宗教话语的指向和国家宗教管控的效果等三方面要素的制约。

汲喆最后提出，民国以来的宗教世俗化反映了权力社会学中支配和被支配之间的辩证关系。世俗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线性的历史过程，而是国家与宗教团体在一个充满冲突与和解、策略性计划和计划外后果的复杂进程中的互动。世俗化从组织、话语和实践等多个方面形塑宗教；同时，本在消解宗教的世俗化力量却反为宗教所利用，成为其自我建构的工具。世俗化反而重构了宗教。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认为汲喆的演讲揭示了世俗化的两面和悖反，当代世界的一些极端化教派恰恰是某种世俗化力量挤压所造成的。魏斌则回顾了早期道教组织由祭酒组织到道观化的过程：摄于早期道教独立的户籍和管理体制的强大动员力，4—5世纪政府解除

了祭酒组织，推动道观化，反而扩建成为新的道团组织。人民大学的何建明教授指出，世俗化进程不只发生在近代，元朝的僧侣官员也是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会议最后，与会学者一致表示：传统中国的“世俗化”与近代以来的“世

俗化”有何区别，当代全球主义如何挤压形成的新兴宗教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撰稿：胡斌）

05

罗祎楠：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意识 ——以北宋神宗时期盐法为例

2016年12月20日下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罗祎楠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进行内部交流，主题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意识——以北宋神宗时期盐法为例”。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访问教授赵宪章、魏斌，访问学者曹晋、常怀颖参加讨论。

罗祎楠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北宋神宗时期盐法政策的演变逻辑的研究，并以此为例探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他谈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如何找到被双方都认同的研究方式，依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比如，历史学者对于社会学者的宏大叙事与对历史材料解读的欠缺多有诟病，对社会科学学者研究历史问题的成果接受度不高。而社会学的一些宏大



理论架构又难以包容历史学对微观过程的细化研究。因此，摆在跨学科研究者面前的难题，是寻找到一个恰当的研究问题，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意识对微观历史过程进

行有重点又是详细深入的考察，进而以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机制的研究进行适当理论化，从而丰富社会科学理论。这个工作是希望结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需要考虑的。

罗老师进一步介绍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寻找对于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具有双重价值的题目。他看到宋神宗时期的盐法就是这样的问题。对于历史学来说，如何理解熙宁、元丰时期皇权的变化及其原因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蕴含着理论发展的空间：是什么原因使统治者走向依靠一种政治哲学逻辑来建构国家运行？或者说，如果统治者在国家构建（statemaking）的过程中依然可以按照理性选择来建立制度，那么为什么他们又会按照某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在公共政治空间进行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好？

罗老师进一步提出，对北宋新法的研究成果众多，很多成果反映了研究者对这个时期的直观感受。比如学者们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的探讨；比如学者们都看到变法被推翻是因为反变法派自上而下的取代了王安石的新学；他们看到了新法在实际实施中产生了很多超出预期的结果；看到王安石的新学思想对新法具有的指导作用；看到了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如吕惠卿和王安石的矛盾等等。

罗老师认为，这些直观的对历史的认识后，可以提炼出更深的历史变化逻辑。而要发现这种逻辑，需要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相应的理论训练和思考；需要对于社

会学中的基本理论如权威（authority）、权力（power）、剧场国家（theater state）、理性官僚制和家产制官僚制等进行仔细研究。同时，研究者可以将基于历史研究的发现放到和社会科学相关论题的对话中进行。比如如何理解战争和国家构建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儒—法文化在中国传统时代国家构建中的作用？这些问题构成了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对话的着眼点。

罗老师介绍了他近来对宋神宗盐法决策机制中的基本变化逻辑的一些思考。他提出，之所以选择盐法为研究，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变化过程反映出北宋国家面临的多难选择及其造成的协调困境。决策者需要同时满足多个互相矛盾的目标，而不仅仅满足于获得更多财政收益。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所假设的统治者是为了某个单一目标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展开国家建构。摆在统治者面前根本的问题并不是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是如何协调不同官僚部门使之实现多元目标。

多重目标导致了官僚内部分裂的加剧和部门间权力分布的波动性。不同官僚部门都可以利用本部门在实现某种目标中的优势，提高本部门在中央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从而制定出符合自己部门利益和观点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这些部门难以控制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其主张的政策难以达成预想效果，尤其是在价格调节这样政策结果高度不确定的领域更是如此。这样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官僚部门被其他部门取代的速度。新的获得影响力的部门又会开始改变政策，这也加速了政策的变动。在熙宁后期对盐法政策的协商过

程中，皇帝被缠绕在由几个官僚部门领导构建出的非正式协商的网络中，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元丰初开始的对西夏和辽的战争准备，使原有的运用盐钞获得战争资源的方式难以应付日益强大的战争压力。此外，熙宁八年前后，新学被规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新学从理论上解答了如何在公共政治空间中运用皇权统合作为多远利益和观念主体的官僚这个根本问题。新学极强的解释现实政策的能力，使其成为指导皇帝以国家权威的方式统合官僚的唯一意识形态。在公共政治空间中，皇权按照新学的指导运行，而放弃了更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和应对性的统治方式。这也使皇帝从被动的在非正式政治过程中充当协调的角色转而成为按照意识形态的指导在公共政治中统合全体官僚的领导者。于此相对应，官僚也开始在公共场合中有意识地呼应这样的政治运行方式，尽管在非正式政治中，他们依然有着自己的实际利益考量，并扭曲政策结果。由新学主导的意

识形态结构一旦形成，就难以发生自下而上的改变。只有到了神宗去世后，才开始自上而下地将这个意识形态结构推翻。罗老师由此提出，北宋元丰时代的皇帝“大有为”来自于对官僚政治中协调困境的应对，背后的动力在于官僚体制内部多元利益和观念的难以协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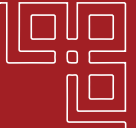
罗老师进一步介绍了自己如何就这个过程中若干关键的问题点进行历史考证的工作。比如，他通过考证盐钞、引是否“空名”的问题，来探讨盐钞市场的形成问题，通过对盐钞交易定价权中官价和市价的关系的考证，探讨盐钞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问题。罗老师正在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尝试，与会学者针对其中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每周二组织访问学者内部讨论会，也已经成为文研院的一个特色。

（撰稿：熊昕童）





专题会议



北京论坛：“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2016年11月4日至6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和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由文研院承办，涵括“出土文献研究的国际视野”、“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战国秦汉简帛研究”和“秦汉魏晋隋唐出土文献研究”四场学术交流，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27位学者相继作了精彩发言。

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以“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猗嗟’谈射礼文化的意义与内涵”为题，认为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猗嗟》文本文句与今本《诗经·齐风·猗嗟》对应，两者文辞训诂可以互为发明。张教授从“四矢”一词之使用，明确显示先秦射礼

之严谨，论证射礼文化源远流长，蕴藏之传统文化深意与内涵，有移风易俗之功用。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先生，发言主题为“《郑文公问太伯》与中国古代文献抄写的问题”。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载有《郑文公问太伯》一文两个文本，按照清华大学编者认定，此两个文本的书法和样式基本一样，所以两个抄本应该都是一个抄手所为。然而夏教授认为，两个抄本之间也显现出某些重要差别，特别是两个抄本对含有“邑”旁字的写法：一个抄本系统地将“邑”旁置于字的左边，另一个抄本则系统地将“邑”旁置于字的右边——这显示抄手利用了两个不同的底本来进行抄写，其中一个底本可能出自楚国的书写习惯（即“邑”旁置于左边的抄本），而另一个抄本则可能

出自秦国抑或另外一种北方国家的书写习惯（即“邑”旁置于右边的抄本）。夏教授此论文对说明中国古代文本制作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思路。

日本东京大学小寺敦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关于清华简《系年》的女性”。清华简《系年》有关女性的记录不多，但在《左传》等传世文献里出现很多女性。小寺敦教授通过与《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的对勘，讨论了清华简《系年》中所见的女性形象，并指出《系年》中出现的女性人物，虽然有在故事中存在的意义，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故事演进推移的力量——这种现象可能代表了《系年》作为一部文献的叙事特点。小寺敦教授的这篇报告在把握《系年》里女性人物的记述方式与特点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挖掘《系年》关于女性记述这一侧面的史料特点。

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从出土文献看高本汉《左传真伪考》之方言说”。《左传》的作者，一直以来都有争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左传真伪考》中曾尝试运用助词的比较来证明《左传》不是鲁国人所作；《左传》的语法，与《论语》、《孟子》所代表的鲁语的语法有极大不同，从而证明《左传》不是孔子所作，也不是“鲁君子左丘明”所作。单教授认为近数十年出土的文献显示，传世的典籍几乎都已不是先秦文献的本来面貌，经过汉以后的翻写，因此高本汉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左传》、《论语》和《孟子》所使用的助词比较来证明“左语”不同于鲁语，从而证明《左传》的作者不是鲁国人，是不可靠的；高本汉《左传真伪考》虽然在中国曾引起

一阵哄动，被认为是一种新颖而重要的贡献，其实并未能彻底解决《左传》的作者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些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供学界参考而已。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负责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先生，发表了题为“曾国墓地大墓之墓主人身份与曾侯與钟铭文”的报告。朱先生言，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发掘是近几年中国考古的大事件，对商周考古和先秦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他通过分析墓葬排序、出土铜器器形以及铭文内容等方面，对叶家山墓地墓主人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就几座大墓墓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三种可能。朱教授详细分析了这三种可能的优缺点，进而又分析了曾侯與编钟铭文所载的史实，并结合其他相关西周铜器铭文资料对西周早中期西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严密而整饬。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主题发言，题为“北大秦简《禹九策》”。李零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藏秦简《禹九策》的内容：《禹九策》共五十一支简，全篇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说，主要讲吉凶；第二部分为禹九策，是全书的主体；全篇用韵文写成，借助大禹行九州等图像，卜问疾病、出行等内容，大概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占卜；第三部分包括善、恶等内容。称《禹九策》属数术类文献，内容十分重要。

德国慕尼黑大学夏玉婷教授，发言主题为“青铜器铭文里反映的克商及文、武王的记忆与早期中国的纪念政策”。夏教授从社会学记忆理论的视野，探讨“武王克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为当时周人集体记忆中的

重要事件，如何进行传承以及以何种媒介进行传承的问题。言武王克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统，而是周王室有选择的记忆策略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宜侯矢簋、何尊、大盂鼎等铜器铭文，发现这样一种文化记忆传承的过程以礼仪、格式化的语言等媒介表达，并且保存在青铜器铭文记录中，对集体记忆塑造和控制的权力目前看来是掌握在周王手中。

韩国檀国大学沈载勋教授，发言主题为“浅论大河口霸国墓青铜礼乐器所见的‘逾制现象’的两面性”。沈教授的发言首先讨论邶、霸的渊源问题，其次对二者在当时的政治地位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沈教授指出对大河口墓地的“逾制”现象需要放在西周丧葬礼仪的框架中进行研讨；而晋侯的作用则在于对邶、邶等小邦进行监视。

韩国成均馆大学李裕杓讲师，发言主题为“多友鼎铭文所见军事领导关系”。他的发言首先探讨了多友鼎铭文所见战争过程，以及其军事领导关系：贵族接受周王之册命，成为周王之臣，贵族家臣以“策名委质”与贵族结成主从关系，周王对贵族、贵族对家臣要求“勿废朕命”之态度，贵族为周王、家臣为贵族坚持“不知二命”的态度。他指出周王与贵族的家臣之间，没有册命关系，因此，周王对贵族家臣不能要求“勿废朕命”，贵族家臣也不必为周王“不知二命”。指出这种重层性私属关系，从西周战争铜器铭文所见的战争命令、把握战况、战功赏赐、蔑历和对扬等关系中，可以得到验证。周王不能直接控制贵族的私属将领的原因，李裕杓认为来源于周王朝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由此建构的西周国家结构。

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石安瑞讲师，发言主题为“西周金文日名、谥号研究综述——兼论使用两种称谓的铭文所反映的铭刻行为模式的异同”。他主要对祖先称谓中使用日名、使用谥号的言语行为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两种铭文中言语行为以及措辞的用法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但是，铭文中日名的使用更着重于祭祖仪式，而用谥号的铭文更多使用于记述赏赐等官方事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称谓的本质不同：日名绝大多数是相对“称谓”适合于记述“私”方面的内容，而谥号本身是对一位祖先的绝对标识。

清华大学赵平安教授发言的主题为“谈谈战国文字中用为‘野’的‘冶’字”。他指出，战国文字中有一个写作从土从爪（也有从两横者）的字，释读很不一致，早期的主流意见是释为户，现在多倾向于释为野，但不管是释为户还是释为野，对字形结构都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结合清华简的新资料，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证明了释野说的正确性。他认为从来源上讲，这个字应是冶字的异体，始于三晋，后来进入楚文字系统。它本来是一个假借改造字，后来与冶并行，大约书同文时被废弃。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麦里筱教授发言主题为“中国境内古今文字里‘虹’字的构形及其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她讨论了甲骨金文中的“虹”字，并将其与纳西族文中的“虹”字进行比较，并指出天虹这一自然现象在民间的分布非常广阔，覆盖了从中原到今天的西南地区，且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来国龙先生，发言主题为“通假字与出土战国秦汉简帛

的研究”。来国龙教授认为借助近年来新语文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复兴，可以为简帛研究提供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专注于单个字词的本字、本义的研究，转移到对字词的语境以及文本的整体研究。二是突破以传世文献为中心、以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材料主要用于校读传世古籍的研究方法，而转变为以出土写本为主，以传世文献为辅，综合运用多种材料与手段的“新语文学”，并借以探究早期中国文本及蕴含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意义。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齐思敏教授，发言主题为“中国早期死而复生者与祭祀礼仪”。齐思敏教授将传世文献中涉及到死后复活的相关话题和这两篇出土文献内容进行比较，并论证这两篇文献的关键在于（通过自身经历）验证对于亡者的祭祀行为。死后复活者因为同时有现在现世界和死后世界生活的经历，因而在这一问题上有独特的认知视角，也因此可以作为见证死后世界并对其有独特理解的解释者。至于死后复活者关于祭祀死者最有方式的证言，这些证言就是用于验证证言自身所埋葬的墓中的祭祀行为。

复旦大学刘钊教授，发言主题为“从出土文献看《山海经》”。刘教授探讨了《山海经》的内容、文本形式以及成书年代问题，并结合出土文献材料——如甲骨文资料、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等——着重探讨了《山海经》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并纠正了以往一处断句的错误。刘钊教授认为《山海经》山经部分是战国楚人所作，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和史料价值，用出土文献注释《山海经》当是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尚缺

少一部详尽的用出土文献注释《山海经》的著作。

英国牛津大学麦笛教授，发言主题为“‘书’类的传统与文本重构‘金滕’与‘周武王有疾’之重估”。“周武王有疾”是现藏于北京清华大学的“清华简”中的一部分。麦笛教授辨析和诠释了“周武王有疾”中的施行特征，借以进一步了解战国时期文本在社会中的运用；言它在古代政事史料汇编《尚书》中的对应内容广为人知，在历史文献《史记》中也有被记载，然而，与其在政事史料中的记载不同，它大量省略了对周公在武王死后角色的清晰评价；细思此处不同，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话语，可对这些文本的运用进行重构。本报告从动态文化的角度思考“书”的传统：其成分不断发展演变，不断在环境、形势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被重新阐释。此次报告最终得出结论，这些再创的文字，不仅形式、文体有异，其所传达的内容亦有所不同。

美国理海大学柯鹤立教授，发言主题为“清华简‘筮法’与北大简‘荆诀’的比较研究——从两种占筮文书看楚国文化”。言这两种占卜文书——清华简“筮法”（约公元前4世纪）与北大简“荆诀”（约公元前1世纪）——尽管相隔几个世纪，但都反映了古代楚国的文化习俗。两种占卜方法都依靠数字计算以产生卦象，但两种占卜的展示方法完全不同，占卜时考虑的外部因素也完全不同。本报告将特别关注这些因素，包括形象、时间等，这些因素外在于每一卦之计算，但对于占者（或贞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点”：当占者占卜以决定吉凶时，这些点会包括

在占者的等式中；并且两种文献中的每一卦——这些卦均与周易传统不同——暗示出在多种可能作祟的因素中，某种因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生命，他的这篇报告将在古代楚国文化的背景中进一步探索这些作祟的可能性因素。

香港中文大学沈培教授，发言主题为“从清华简《子仪》看崤之战后秦国的处境”。沈培教授认为清华简《子仪》的主体内容是放归前秦穆公与子仪的对话，对话之前的几条简文则是秦国在崤之战后所实施的政策叙述，实为放归子仪的历史背景。由于目前大家对简文的理解不够准确，致使这个历史背景没有很清晰地体现出来。他指出简文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是秦穆公在求得国内安定的情况下，重新唤起秦国重新称霸的梦想，放归子仪是为了取得楚国的帮助，也是建立在自己国家有稳定的局面这个资本之上提出来的。

新加坡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顾史考教授，发言主题为“上博竹书《鲁邦大旱》探源”。《鲁邦大旱》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重要文献之一，记录的是孔子与鲁哀公及弟子子贡两场有关鲁国遭遇大旱及鲁君所当采取何对策的对话。整个故事及对话内容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五章的故事极为相似，甚至可谓乃同一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顾史考教授通过仔细辨析二者内容的区别，探讨了其所以不同的源由，深入发掘了文本的思想内涵，并以此来说明了一些思想史上的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钱德樑教授，发言主题为“‘恒先’的创造力观”。在

本次讲演中，钱教授把“恒先”作为早期道教一个典型概念来分析，她认为恒先的要义“自作”是道教“无为”理念的基本内涵。钱教授强调时空的界定有助于定义创造力，并理解这种创造力如何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以及为什么这种创造力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模式。

美国哈佛大学傅希明先生，发言主题为“关于北大简老子的真伪性”。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汉代竹简，对理解早期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几近完整的《老子》早期版本便是其精华之一。然而北大简不是科学发掘出土，导致学者邢文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最近我们重新观察和检视了这批竹简，以此为基础，证明北大简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研究员，发言主题为“《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斗”。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的部分记载与《史记·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同源，但另一些记载却与《史记》迥异，最引人注目的是《赵正书》，以胡亥继位为秦始皇临终钦定，而非赵高、李斯密谋后矫诏诈立。两者的异同，反映出汉初对秦代历史存在不同的认识。《史记》在胡亥继位问题上，自然地接受了当时占据主流的历史认识——这种认识来自于楚人反秦的政治宣传，为汉朝所继承，并通过《史记》，最终战胜了其他的历史记忆，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武汉大学陈伟教授，发言主题为“秦汉简牍‘居县’考”。秦汉简牍中的“居县”一般认为指当事人目前所居之县。陈伟教授亦曾认为“居县”既可指当事人目前所

居之县，也可指其家乡所在之县。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陈伟教授发现过去对简牍的断读和对“居县”的认识都有修订的需要，“居县”实为当事人家乡所在之县。在出土文献中，有“居县”与“死所县”相对的文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之前旧说，应当放弃。

日本中央大学阿部幸信教授，发言主题为“长沙吴简所见的‘市布’”。入市布简与布簿的关系有三：一，民入市简与入市布、入市调简分开统计但以乡为单位汇总核算；二，存在对入市布简有统计整理的二次记录；三，吏“市布”簿籍与为常规税务制作的布簿分别管理。指出长沙简“调布”之“调”本质在于调整物流，而非赋课之意。

美国罗格斯大学助理教授 Sukhee Lee，发言主题为“来自死者的故事：出土墓志与观察前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新视角”。他认为利用新出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墓志铭，学者们可以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发展出一个革命性的认识。当下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前所未知的细节去探究前近代的中国社会精英究竟如何，他们如何结成姻亲网络，他们与当时的国家政府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

北京大学韩巍副教授，发言主题为“北大藏秦汉简牍物质形态的考察——兼释对汉简《老子》真伪的质疑”。言简册背划线在简册编连中起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北大简整理过程中曾对简册背划线的观测与认识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有竹简的背划线被遗漏，但不能由此推出北大简《老子》为伪或整理者二次作伪的结论。指出北大简《老子》所出现的背划线的现象，也可

见于北大简《赵正书》和《周驯》，以及一些清华简。可见从战国至西汉中期，在竹简上刻划“螺旋状”划线的做法是一种稳定的工艺传统，不构成证伪的证据。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庆浩教授，发言主题为“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史中的内容和展开”。韩国和日本的古代目见的使用时期大体在6世纪末至8世纪末，因此通过讨论这个时期从中国流传而来的汉字文化和木简的相关性，使得对古代东亚社会进行实证研究也成为可能。古代东亚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吸收从中国传入的律令体制而建立的。通过文书行政，中央和地方的有效统治体制确立，及以儒家为代表的统治理念的普及等，构成了以上古代国家成立的重要要素。因为诸要素都是以汉字为媒介而传播，因此对官吏而言，熟知《论语》、《孝经》等与国家治理理念密切相关的经典成为一项必须；而能通过实证材料确认与此相同的古代东亚社会状况的，便是出土文字资料《论语》。

论坛最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作总结发言。邓教授表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是文研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工作，中国出土文献始终引起东西方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这门国际性学问近些年在海内外广泛交流，进展良好。文研院面向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推动基础学科的研究发展和跨学科的交叉合作，促进国际学界的深度交流。

（撰稿：关雪 杨坤 丁乐静）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北京大学开幕



2016年12月1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共同发起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开幕。开幕式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近百名中外学者共聚一堂。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教授首先致辞。他回顾了胡适的北大情结，指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活动与北大息息相关，虽然他只担任北大校长两年多，但是为北大作出了许多贡献，甚至去世时身上盖着的也是北大的校旗。王博教授表示很高兴看到与会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还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同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胡适思想的当代价值。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胡适引起了广泛深切而持久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胡适先生的思想，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重要的指引和借鉴，帮助我们解决建设现代国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李又宁教授强调，中国是20世纪的大赢家，全世界使用最多的文字就是华文，中华文化的边界在不断地推广。胡适先生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他的贡献具有当代性、普适性、未来性。

香港历史学会荣誉会长李龙鏞先生回顾了自己1954年在台北听过的胡适先生两

次演讲，对胡适先生雄辩的口才、平民化的作风表示由衷的钦佩。

香港珠海学院文学院院长邓昭祺先生回顾了胡适先生和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的深厚关系，指出北京大学是举办“胡适与中国新文化”研讨会的最理想的地点。

最后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会长蔡木森先生。蔡木森先生表示，北大不仅是胡适先生、也是所有北大校友魂牵梦萦的地方。他介绍了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和胡适陈独秀研究中心的情况，还回顾了自己组织编纂《胡适全集》的历程。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在“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这个大主题下，着重就“胡适与中国现代政治”、“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

教育”、“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想研究”、“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胡适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等子题展开。以胡适先生为主题的会议在北京大学尚属首次举办，会上中外知名学者云集——耿云志、杨天石、汪荣祖、周质平、黄克武、罗志田、陈平原、孙郁、章清等学者均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这是2016年人文学术领域的一次盛会。

随后，与会学者参观了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胡适与北大”展览。

（撰稿：陈少卿）

欧阳哲生教授在“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2016年12月18日）

会议即将结束，借会议的最后八分钟。我想对这次会议做一简要回顾和综述。

首先想谈一谈这次会议的缘起。让我们将镜头拉回到2015年7月20日，这天我们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2015年胡适研究会年会，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二十来位同人。这次进行了换届，承耿云志先生提名，大家鼓掌通过，我接任耿先生担

任胡适研究会会长。在这次会议上，我表示：“为了推动胡适研究向更高、更广的层面发展，我设想，策划、筹备2017年在北京召开一次胡适国际学术研讨会。”具体的做法，就是“为纪念‘文学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争取与北京大学合作，在2017年召开以‘胡适与中国新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心存此想法，但当时可以说毫无

把握。10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兄、香港珠海学院亚洲中心主任胡春惠先生两人在北大讲学。三人常在一起聚餐。胡先生希望，最好是在2016年开胡适研讨会，因为他还在任，趁他没有退休以前，他可尽其力推动。2017年他将退休。这时恰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也在清华大学访学。大家一起聚谈，同意将原定2017年召开的胡适研讨会提前到2016年12月17日，也就是胡适之的生日——胡适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之际。12月我向学校社科部提交了申请报告。不幸的是，今年3月胡春惠先生逝世，我感到怅然若失。在此，我愿对促进两岸三地学术交流做出诸多贡献的胡春惠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

今年5月4日获得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正式发文批准，这是一个好兆头。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这个批文在年内有效，这也就是意味着会议须按原计划在年内进行。时间紧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随即与各方联系，立即拟定会议的第一号通知于今年6月2日发出，正式启动了这次会议。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胡适研究本是两岸三地关注的课题。因而这个会议应该成为两岸三地同仁的一个纽带、一个平台。所以我特别表示可以由胡适研究会与北大历史学系、珠海学院、台北胡适纪念馆一起合作的名义来进行。2016年9月，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他们成立后首先开展的一项工作就是主办“胡适与北大”专题展览，对北大梳理胡适的学术工作非常支持，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10月我去香港树仁大学讲课，几次与潘邦正先生接洽，双方达成默契，大家都表示要办好这次会议。会议筹备

至此，应该说已水到渠成。

其次我想简单清理一下这次会议的成果。出席我们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八十多位学者，会议收到论文53篇，有五位作者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按照这些论文的内容分为大会“胡适与中国新文化”三场、“胡适与中国现代政治”一场，分组：胡适与中国现代教育、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想、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胡适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四场。当我通览了厚厚700多页的会议论文集，感受到大家提供的论文沉甸甸的份量。一个学术研讨会会有此收获，应该说已达到了初衷。这些论文在如下几个方面明显取得进展：

在材料发掘上，不少论文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材料，并据此提出新的见解。如王晴佳发掘了新的英文文献材料，以1917—37年间《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中心，对胡适在国际上的影响做了论证，指出胡适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已经让他成为中国学界的代表人物，在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扮演了一个“中国文化大使”的角色，其学术成就在世界上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周质平根据新发掘的英文文献材料，对胡适、林语堂与蒋介石的关系重新做了解释。杨天石利用大量新公布的材料，长文讨论了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关系。黄克武利用最近公布的新材料，主要是《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陈诚日记》、《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张群日记》对蒋介石的“三连任”问题做了新的解读。沈卫威发掘利用一组档案材料，对1948年底平津学人的选择去留、胡适为何被定为“战犯”，1957年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相关人士谈话的原始纪录，做了

新的解读。分组讨论第一组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主要涉及胡适与蒋介石、钱端升、钱玄同、汤用彤、林可胜、胡晋接、黄宗培之间的关系。这一组论文在材料上都有新的发掘。这里面有必要介绍两位作者的身份：一位是钱元强，他是钱端升先生的孙子；一位赵建永，他是《汤用彤全集》的编者。钱元强使用未公开的钱端升日记对抗战时期胡适、钱端升出使欧美的具体情形做了新的披露。当然在对材料的解读上，会议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在此我就不展开了。

在问题设置上，这次会议有好些论文的论题可以说是颇有创意的，如王中江解释了胡适在东西方语境下的“自然主义”立场。认为胡适以“自然”观念为中心而构筑的“自然主义”中的“自然”有不同的层次，它既是胡适用来解释世界和宇宙的最后依据和信念，又是胡适作为科学的认知、技术实践的客体和对象，还是他作为建立人道和伦理的出发点。章清结合“社会”概念对胡适社会思想的演进做了新的解析，指出胡适对“社会重心”的关注，恰表明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其所思所想仍立足于上层展开。胡适讲学、议政根深蒂固的还是精英意识。胡成的《胡适与罗氏驻华医社》、邓丽兰的《胡适、张伯苓与平津市民治促进会》、杨金荣的《胡适与南京高师暑期学校》、何邦立的《胡适与林可胜》都是过去少见人涉及而颇有新意的论文选题。

在观点表述上，有些论题虽过去有人做过，但由于作者站立于新的时代高度，也提出了新的见解。如汪荣祖先生对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之功过的反省，他认为百年之后回看胡适当年提出的主张，白话文极为成功，

但普及白话文是否必须废除文言？新文体是否必须完全取代旧文休？这是值得深思的。罗志田通过比较胡适与梁漱溟对世界文化的认知，指出梁氏多次说过中、西、印文化是根本不同的，但他的“轮转”方式又使文化的多元表现为阶段性的一元，实际上等于以线性的一元来涵容多元。莫云汉对胡适提出的“八不主义”给予了反思。指出其既无新意，亦见偏颇，又或本末倒置，此或少年之作，勇于破坏而少建设。陈平原、孙郁从不同的视角对胡适与周氏兄弟做了比较，陈平原借用“鸚鵡救火”与“铸剑复仇”来形容表达胡适与鲁迅各自的精神气质和政治智慧。指出鲁迅杂文的隽永、深刻、好读、解气，论敌怒火三仗，但基本上抓不住把柄，这是胡适所学不来的。但胡适的谈政治，堂堂正正，开门见山，有理有据，逻辑严密，也自有其魅力。单就论题的重大和视野的开阔而言，胡适很可能在鲁迅之上。孙郁从另一个视角比较周氏兄弟与胡适早期文学观之不同，指出日本近代文学的变化，给周氏兄弟的启发很大，他们在日本人的经验里，意识到文学里的纯和杂，各得其所。融汇各种艺术手段，对于词章的灵活使用大有意义，胡适是从一种明白、晓畅的文体里建立现代人健康的思想和趣味。他把写作从过多的精神承担解放出来，形成朗健、直观、诗意的体式。江勇振指出历来研究《镜花缘》的学者，都说胡适是第一个从女性的角度去分析《镜花缘》的学者。但是，胡适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只是他对整个社会问题关注里的一环。《镜花缘》可以有多种读法，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镜花缘》对女性的角色具有正面意义的诠释，当然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这

次会上还有不少论文提出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们的会议主题虽然是讨论胡适，但不是胡适的嘉奖会。而是通过对胡适的研讨，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深化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理解。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可以说是一次学术同仁的欢聚，一场学术的盛宴，一次令人难忘、必将给大家留下深刻记忆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我有信心地说，胡适研究将持续发展，胡适研究后继有人。会后我们将结集出版论文集，以向学术界展示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成果。

在会议的最后，我想诚挚地感谢参与这次会议的海内外同人和朋友，感谢合办这次会议的北大文研院、北大历史学系、胡适研

究会、香港珠海学院、台北胡适纪念馆，由于大家的互相配合、共同努力，终于将这次会议办成了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

感谢北大社科部、教育基金会、中关新园等部门对会议热情洋溢的支持，使会议能够顺利进行，也使我真正感到这次会议选择在北大召开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感谢为这次会议帮忙的北大文研院工作人员和历史学系的博士生、硕士生团队，他们为我们这次会议提供了一流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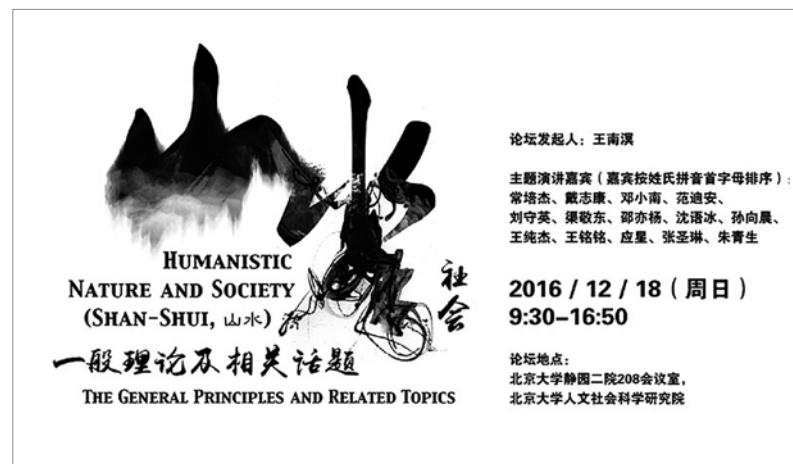
谢谢大家！

（欧阳哲生教授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适研究会会长。）

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

2016年12月18日，由文研院、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主题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常培杰博士，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创始人、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戴志康先生，文研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邓小南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中央美术学

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教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沈语冰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著名艺术家、策展人王纯杰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教授，著名评论家、独立策展人、艺术家王南溟先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教授，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张圣琳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加活动。



论坛由此次活动的发起人王南溟先生主持。邓小南教授代表文研院致辞，对众多艺术家与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证大集团与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表示感谢。

邓教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于山水的理解，认为水墨山水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宇宙观，也体现了人文学科的体悟与格局。“仁者乐水，智者乐山”，山和水固然有别，但古往今来无论是在诗词还是画作中，山水又是浑然一体、不分不离的，连接这一切的是自然。山水画作的精神不仅在其浓厚的气韵、诗意和情境，也在于其自然之性、造化之功。今天的山水又承载了更多的话题：自然、生态、审美、情感、依山傍水的乡村景观、文化根脉的延续与断裂、乡愁的萦绕与寄托……从旅游经济到生命意义，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山水似乎包容了整个社会。正因为如此，“山水社会”的话题在历史与当代、社会与人文的领域中都有切实的意义。

范迪安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山水社会”是一个叠意的题目，将本来从属于不同领域的题目放在一起讨论，并引发我们更深入的

思考。范教授通过一系列艺术作品的展示，指出在近年来的艺术创作中，山水又重新成为一个主题。当代的山水创作与传统的不同就在于，这些山水作品不再是游身于自然的想象，而是赋予了其对现实的思考。这种思考又是一种“反身叙事”，一方面投入其中，另一方面又抽身出来，于情境的在与不在之间，有距离地进行关照、思考、批评。

在邓教授与范教授的致辞之后，论坛进入主题演讲环节。

王铭铭教授作了题为“《山海经》的广义人文关系及其本体论启迪”的报告。他指出，《山海经》的内容包括了“物的存在”、“神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三个层面。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人与物、人与神、人与人这三种关系，而《山海经》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处理方式。另外，《山海经》还体现了一种时空观念，即通过地理来界定人间与天界的关系——四方与中心构成一种五方秩序，而时间是由四方的流动所界定的中心行走的轨迹。在《山海经》的叙述中，人、物、神都是自然的存在，没有等级的分别，这与西方近代的自然主义截然不同。换言之，《山

海经》中没有人与神、身体与自然的二分，而是一种“自然—文化的多元主义”。此外，王教授还借用了明人杨慎、清人毕沅的研究，指出《山海经》利用八方和大荒的各种物、神和人的形象来界定中原的“主权”。

王纯杰先生介绍了“山水社会”议题在喜马拉雅美术馆的缘起与发展。三个艺术家扣人心弦的艺术作品促成了“山水社会”这个想法的诞生，它们分别是倪卫平的摄影作品《发展是硬道理》、梁越的摄影作品《放心》和王南溟的水墨影像《拓印干旱》。2012年，喜马拉雅美术馆与亚洲协会合办“冰+煤”展览，尽管由于某些原因没有顺利举行，但是在宣传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使策划者更加意识到，美术馆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空间的平台。美术馆还依托“冰+煤”展览的基础，举办了“生态艺论”展览，同时还举行了讨论会和公众互动体验活动，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后，喜马拉雅美术馆围绕“山水社会”的主题举行了许多展览，例如2013年的新馆开幕展的“意·象”展、2014年马拉喀什双年展的“吾乡吾土”展、同年作为中德文化项目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高山流水”展、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山水社会”展。“山水社会”体现的是当代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如何让美术馆成为一个讨论社会议题的场所成为美术馆同仁需重视的重要课题。“山水社会”的展览和讨论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人、关乎人类未来的议题。

张圣琳教授带来了题为“青农深耕·人文农创：台湾大学跨领域教育的社会创新实践”的报告。她说，古往今来的青壮年对于自己的生涯认同都是繁华城市的、奔波忙碌

的、追逐机会的，而与山水农乡的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城市化以前，“少小离家老大回”是人们的普遍生活方式，“衣锦还乡”成为很高的荣誉；20世纪城市化以后，山水之间的青壮年则“一去不返”，彻底离开了山水，进驻了城市；而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则更多的是城乡之间的“归去来兮”，体现为在不同的空间中流动的错乱的认同。因此，如何让青年人深耕于山水农乡，如何通过动态教育的过程，使每个年轻人成为社会山水之间的“产品”，便是摆在眼前的研究课题。这种社会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翻转城乡关系，从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中建立新乡村认同的城乡联结。张教授进而举了两岸青年农行动和台湾青年“食养农创”的案例，来介绍台湾大学在这方面的探索。最后张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20世纪的老师如何教21世纪的学生，如何实现教师的自我转型，这也是每个教师应该努力探索的问题。

朱青生教授作了题为“找到自主的思想：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思考”的演讲。他回顾了刚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艺术史大会”的盛况，进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艺术长期受到西方的引领和压抑，如何才能使中国艺术走出自己的道路？朱教授指出，过去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的景观社会，这一说法是居伊·德波在面临着一个资本控制、权力控制的社会时提出的。但是德波的时代没有互联网，媒体形式的巨大变革使得景观社会已经成为了过去时，自媒体时代开启的是景色社会、山水社会。我们可以用“山水”来概括这个社会，是出于这个社会与中国的山水画有以下五个共通之处：第一，山水画是散点透视，而不

是焦点透视。换言之，山水画并不根据理性和组织去服从一个逻辑。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介入从而看到问题的所在。当代世界是分裂的，对于那些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过去做的只能是“焦点访谈”式的关照、同情和怜悯，而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风景，尽管这些风景是破碎而非全面的，却能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个社会。第二，山水画强调高远、深远和平远。新媒体和新方法都能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第三，山水画的笔墨大于实境。在中国画之中，怎么画比实况更重要。画家不是对景写生，而是通过笔墨来表达自己的性情。在这个虚拟的社会中同样没有真理，我们稍不注意就会陷入伪造之中。第四，图与词的共存。山水画上非常重要的一项是题字。我们只看不足以理解，只听和写也不足以交流。图与词的共存，正是图像时代新的互相理解、互相交流、共同生存的方式。第五，符号的书写性。书法不同于文字，它体现的是写的过程中人的寄托、涵养、表达和交流。体现在社会上，就是我们要把语言的过程整体地看作人类学的全面映照的过程。

渠敬东教授以“山水与现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为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渠教授指出，关于1849年梭罗发表的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以往都是从政治权利的角度去理解公民不服从，但是梭罗在五年后发表的《瓦尔登湖》则为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解释。梭罗认为，美国政治文明的基础在于每个人内在的“自然王国”，这正是整个19世纪中期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危机讨论的背景下发育出来的。中国的社会也是从这里发育出来的，“自然王国”

就是士大夫所构建的理想的自然世界，是完整而自成一体存在的自我王国。孔孟老庄合作努力达到的理想政治，多出了一种“逃避权力的渊藪”。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归隐山林成为中国士人的理想。在中国，城市构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的核心，乡村构成了一种退隐的想象——但乡村还不足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所以在乡村之外还要有山林的存在。中国的山水是出仕的，是反社会的，物己融合是山水的情怀和理想。中国的现代性的起点恰恰是西方现代性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进入西方的时候对西方并没有一个全景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现代艺术都是对西方19世纪末以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中人的写照，可是中国实际上在传统与现实世界中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当代艺术只重当下而对传统进行颠覆，这是简单理解西方现代性的虚象而已。中国的现代艺术是双重的反传统，既接纳了西方反传统的心态，同时又悖反了自己的传统。找回中国艺术在传统与现实中的接洽，在双重的超越上重新构建中国人的宇宙观，才是中国艺术的出路。

与渠教授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理解山水社会不同，应星教授的发言更强调山水与江湖在形态上的区别。应教授以“诗意的山水与行侠的江湖”为题，对钱穆先生提出的城市、乡村、江湖、山林四种社会作出了解读。一方面，江湖和山林在形态上，特别是精神形态上是对立的关系。山林是避世的形态，是“出仕神秘主义”；而江湖则与现实直接对抗，在精神上是释放性情的。山林与江湖在伦理上也是对立的，江湖的伦理是兄弟义气、快意恩仇。另一方面，江湖与山水又有很多

相通的地方，两者的物质载体具有很强的亲和性。首先，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说，高山密林成为江湖社会的理想场所。而为了对抗江湖社会，乡村社会也会在山水之间建立很多防御性的设施。其次，从政区地理角度来说，大山大川往往构成了政区划分的依据，所以也成为政权控制的真空区域，从而成为了江湖社会的主要活动场域。第三，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山水与农耕生活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但是两者又有相合的一面。因此，江湖和山水在精神载体上也有隐秘的关联。

在两位社会学家的发言之后，沈语冰教授带来了精妙的艺术解读，他报告的主题为“大烟囱的尴尬：莫奈如何协调现代工业符号与风景画的惯例”。他指出，自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的艺术家已经存在了自然风景与人工景观交会创作的惯例。除了18世纪浪漫主义短暂的时期内风景画只是单纯地描绘自然景观外，大部分时间里风景画都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到了莫奈的时代，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工业时代的到来，大烟囱成为了时代的标志。具体来说，铁路的修建，使得大量小资涌入风景区，娱乐业正式形成，景观社会也随之形成。如果说印象派的一般问题是如何表现现代城市生活和“小资”，那么摆在莫奈面前的问题就成为了如何协调现代工业符号——大烟囱与自然景观的关系。沈教授通过若干案例分析了莫奈处理这一问题的技法，例如利用特殊的视角来掩盖工业符号，用晚霞去混淆烟囱里排出的浓烟等等。由此可见，莫奈无比小心地处理着山水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关系。

刘守英教授作了题为“美丽山水下的贫困：价值发现与分享困境”的报告。他以西

藏林芝巴松错边的一个村庄为案例，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了其经济发展与山水开发之间的悖论。他指出，在我们欣赏山水的同时，不要忘记，最美的山水往往是与贫困并存的。绿水青山本身并不是金山银山，顽强保护着的历史文化名村也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收益。美丽山水的开发陷入到一个“囚徒困境”之中：不开发，穷下去；开发，则在商业价值提高的同时，山水价值随之下降。因此，如何解决这些“山水”之间的贫困，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孙向晨教授对渠敬东教授的发言作了补充，介绍了西方的精神是怎样塌陷的。他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历程充其量只有150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审视自己的危机；而西方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一个塌陷的过程。中国人将现代性看作一个光鲜的需要被接纳的价值从而去追求，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陷落。在古典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人们的主要焦虑是怀才不遇。但是古典世界是一个整全的世界，人们进可进取，退可退隐，进退自如，意义并不缺失。文艺复兴之后，人和世界开始分离，世界成为独立于人之外的系统。现代世界意义上的人是单个的人，所有的价值观都出自独立的人，而不再具有整全性。马丁·路德将人分为外在的人和内在的人，外在的人是公共的人，而内在的人在于是否得到拯救。而到了19世纪，上帝也不能来拯救人了，内在的人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私人。然而独立的人撑不起自己，所以出现了焦虑、荒诞、无助。意义世界在西方的语境下就是这样塌陷的。当代艺术没有深度就是因为支撑它的是个体，而个体的厚度是有限的。中国从来没有超越性的上帝，中国超越

性的世界是寄情于山水的，是一个整全的价值观。所以中国的山水对我们有很大的拯救意义——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转变。

邵亦杨教授从艾未未和徐冰的装置艺术谈起，展现了当代艺术是如何展现现代风情的。她认为，当代艺术是可以介入社会的。可以从思想上介入社会，并进而改变社会。

常培杰博士以“当代艺术中的历史感及其形式：以‘物性’为中心的讨论”为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杜尚开创了一个传统，即艺术作品要回答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性。正是从杜尚开始，艺术开始向生活进军，艺术作品与生活用品没有区别了。现代以来的艺术语言都在杜尚的传统内，表面上看是求新的，背后则是艺术语言与艺术技法的自我重复。如果一个作品在艺术史内不能创造出新的差异性，那么它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但是如果艺术史内的传统没有被重复，那么它又不成其为一个传统。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悖论。常博士进而阐释了当代艺术中的历史感问题。他认为古典和中世纪的艺术是目的论的，是朝向宗教的。而现代艺术是面向当下的——面向当下的历史、当下的经验。历史是具有历史性的，现代艺术在失去了目的论之后，建立了新的艺术传统：艺术是对时间过程的挽救，挽救当下的经验、挽救当下的生活。超现实主义认为应该通过艺术来改变社会，很多理论家已经对此进行反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许多人强调艺术的自律，除了社会不应干涉艺术的发展外，艺术的自律同样也蕴含着艺术不要介入社会领域的要求。中国很多的艺术作品都有介入社会的冲动，但影响力往往也都局限在自己

内部。那么当代中国艺术的功用是什么？常博士认为，把日常的、司空见惯的东西从日常生活中拉出来，使得它丧失掉自身的日常性，使我们重新发现自己的生活，正是艺术的价值。

在主题演讲环节结束后，戴志康先生致感谢词。他回顾了自己从求学到从商，从地产商到文化商人的人生历程。他指出，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社区规划，文化一直是其思考的重心。站在社会角度，引进艺术介入社会建设，落实的是其推动社会进步、构建新生活方式的理想。戴先生认为，美术馆应该成为社会的现场，艺术应该成为研究社会文化的跨学科桥梁。不管是艺术家或者其他人文社会学者，还是企业家，都应该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本着真、善、美的追求，去做新社会形态的建构者。

“山水社会”展览是2015年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项目。在论坛举办当天，“山水社会”展览开始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巡展。文研院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交流的重要平台，但是与众多艺术家齐聚一堂进行对话还是首次。艺术与人文、艺术与社会本是不可分割、互通互融的。共同举办“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论坛，是一次对话、合作的成功尝试，对于文研院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

（撰稿：熊昕童）



静园学术

凝聚议题恳谈会

01

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



阎步克教授（左）与马戎教授（右）

2016年11月14日下午，文研院就“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这一议题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恳谈会。本次恳谈会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罗新、叶炜，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王铭铭、田耕，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研院邀访教授魏斌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与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等出席会议。

邓小南院长指出，目前文研院已经形

成“文研讲座”、“文研论坛”、“未名学者讲座”等常规学术活动。展望文研院的未来发展，她表示文研院将围绕几个核心议题来谋划和推动学术活动，聚合一批重要学者，为他们在文研院进行深入对话搭建平台。文研院正在探讨中的五个研究议题包括：“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社会转型与精神重建”、“东方视角下的西方文明”以及“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她指出，这些议题

的意义并非为划分未来文研院学术活动的范围，而是以它们为中心，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度对话。本次恳谈会就邀请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围绕“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这一议题各抒己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率先就民族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提出要警惕“族群”这一类带有西方种族主义色彩的词汇进入中国后政治涵义弱化的现象，随之引出“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概念。其次，马戎教授列举了近百年来中国被纳入世界殖民体系后走过的几条道路：一是照搬西方种族含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道路；二是了解欧洲文化后再融合中国文化的五族共和与立宪共和道路。最后，马戎教授强调，五十年代后中国的民族构建在基本思路、制度和建设上是以苏联为参照的。因此，中国民族问题虽然走过许多弯路，却实属历史必然，而当代学者则应以史为镜，理性分析经验教训。

随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回到概念本身，就国家秩序这一议题做出辨证的回应。以政治制度为例，阎步克教授抛出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未来世界格局将会有怎样的关系？一方面他指出制度史观视野下的国家秩序仍是很重要的议题；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国家秩序的形成并非封闭的，而往往需要在中原王朝与外部族群的关系互动中来加以考察。

其他参会学者也都围绕恳谈会主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旨趣。王铭铭教授提出，他近年所关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尽管

版块不大，却在汉族中央朝廷与东南亚之间，构成一种文明关系。这提示我们在开展民族问题研究中，要警惕西方社会科学所内在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紧张。罗新教授继而提到了现代社会存在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并指出匆忙地去政治化是危险的。虽然宗教、族群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问题，但并不必然引起政治动荡。魏斌教授则强调他的研究兴趣注重族群关系之于中古史研究的意义，包括此一时期族群、宗教的变化所带给地方秩序的影响。叶炜副教授的关注点在于制度史观，尤其是汉唐之间的皇帝角色的不同之处。田耕助理教授则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清代西北历史，探索政治制度和社会交往两个含义对人的区分和认识等问题。

此外，各学者在讨论中，均

强调要重视非汉族学者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积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认为民族及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问题的要害，中国学者不应把民族研究固守在专业领域和东方学的想像中，而要在中国的文明系统中讲出来。邓小南院长也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肯定了学科融合对于这一主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并表示期待在未来关于其它议题的研讨会中能够秉承此次会议的精神，展开新的讨论。

（撰稿：李雨澄）



02

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



2016年11月21日下午，文研院就“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这一议题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恳谈会。本次恳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何晋、陈侃理，中文系教授李零、程苏东，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哲学系教授吴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与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工作委员韩笑等出席会议。

邓小南：

邓小南院长表示，文研院成立两个月以来，已启动“文研讲座”“文研论坛”“未

名学者讲座”等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除此之外，她希望文研院举办一些能够沉淀学术成果的活动，为学者们提供跨学科深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对青年学者、博士、硕士也产生一些学术“辐射”。跨学科深层交流是文研院成立的目标之一，文研院希望搭建平台，将学者们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尝试性想法汇聚起来，形成凝聚性的议题。

所谓的“凝聚性议题”，其目的不在于申请课题或集体项目，而是立足北大学术的长远发展，把有基础的、有意义的并且有些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学术想法、研究方向汇聚起来。议题向多学科交叉发展，

促进大家在学术思维上的沟通、碰撞。大家常谈到“多学科”“跨学科”，究竟怎么多、如何跨，是我们探讨的事情。实实在在的行动和努力，也关系着文研院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的议题分为两个大的序列，一个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另一个以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叉互动为基础。第一，中华文明序列中“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是近期将启动的核心项目。在座的一些老师在这方面已经参与了一些活动，比如北京论坛“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孙庆伟教授组织的社科院许宏与何努的对话。第二，中古时期议题是“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在这方面，文研院已经组织过几次对话，来自历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公共管理学系等学者参与其中。第三个议题是“社会转型和精神重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有若干个转型期，社会学系、历史系、政治学系一些老师对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以上是中华文明序列里的三个议题，它们没有严格的年份、朝代界限，但是大体上有一个范围——上古、中古、近代。

另外一个大的序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沟通、交流”，实际上是由9月21日圆桌对谈“西学在中国”引申出来的。围绕不同文明的沟通、冲突、互动，当时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意犹未尽，希望在这方面继续探讨下去。现在文研院着手进行的就是这几个方向，此外，还有人文社会与理科的互动，文研院也希望将来有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今天，围绕“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这一议题，我们可以

探讨做些什么、值得做些什么、从哪里开始做。

孙庆伟：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表示，文研院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早期中国这部分研究，有幸参与其中。正如邓院长所说，讲座这种方式在知识传播方面是有效果的，但是和文研院成立的意义还是有差距的。文研院要做的不仅是知识的普及，还要从整体上促进北大乃至整个国家人文社科研究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需要多层次规划，开展更深入的工作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早期中国“早”到何时，孙教授认为是史前到秦汉。它包括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没有文献）、夏到西周（“文献不足征”）、春秋战国到秦汉。史前时期以“材料为王”，对考古学非常重视。但是这有两面性，考古学“一支独大”的时候，其风险也变大，考古学在这一时期过于粗放或随意。这一阶段最需要注意的是两点：一是需要理论指导，中国考古学界的理论素养是欠缺的，以至于造成了各说各话的现象；二是在材料解读方面有时候比较粗放或随意。

例如，孙教授指出，应该避免让考古学沦为材料的提供者。比如，墓葬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不懂出土器物上的文字，既懂考古材料又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人才不足。

大问题是考古学不得不用到的概念到了史前时期的适用性如何。那是人群、族群交流、融合已经非常活跃的时代，用史前文化遗存解释现代是否妥当，值得探讨。

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但是容易陷入对具体材料的解读，忽略宏观问题。

第二个历史阶段夏到西周，现在没有写出一部很好地集文献材料、文字材料、考古学材料于一体的夏代史。关于商代史，社科院先秦史所编撰了十一卷本，基本是依据甲骨文材料，跟考古学没有关系。许倬云写的《西周史》，算是用了一点考古材料。张光直先生写的《商文明》，能够较好地体现几种证据的共同使用。因为他编撰过古代中国考古学教材，历史文化积淀较深，能把各种材料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林沄最近去台湾讲座，内容包括商代国家形成、社会结构、社会权力，运用大量的考古材料和文字材料，值得学习。

第三个阶段春秋以后到秦汉，发掘的墓葬很多，但是考古学不知如何进行。如果继续用考古学文化解释早期文明与社会，那么，使用的工具与要解决的问题就无法匹配。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考古学者如果不改变研究方法，就只能做一个材料的提供者。

归纳起来，一是学科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是一个不到百年的学科，称得上大师的人很少，理论是欠缺的、初级的，理论方面需要加强；二是对考古材料的处理方法，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提出这么久，它的贡献和局限性分别是什么，这也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三是考古和历史结合的问题，不仅是考古和历史结合，还涉及历史和考古的结合，现在能够把考古材料用好的历史学人才也不多，综合性的研究机构意义

正在于此——促进彼此了解；四是现代考古学有科技化倾向，不能说不好，科技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大量年轻人把精力放在科技检测和分析上，研究一定会碎片化，而且历史的问题未必是科技能解决的，历史未必能用数据来解释。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一直密切关注文研院的活动。他认为讲座和研究是两码事，公众很喜欢的内容不代表一定有道理。我们的很多成果是粗糙的，而且概念不统一。概念涉及中西对话问题，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世界的角度单独研究中国文明也很难。第一，应该有意识地梳理学术史，学术研究有传承和脉络，如果不熟悉学术史，很可能夸大其词，把前人的成果当成自己的“创新”。既然是研究，就要注重严谨的学风，关注学术史。第二，理清概念，比如谈到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在哪儿？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研究范围是由那个时期的历史决定的，就是文化性质很相近的群体。第三，研究的具体方法、理论，确实很缺乏。韩教授着重介绍严文明的研究方法。严先生在研究方法上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是复杂程度，一般通过聚落形态、社会来研究，这是有缺陷性的主流研究。实际上，研究一个文明体还离不开谱系研究，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的研究。研究社会复杂化和谱系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关联的，目标一致的。

李零：

中文系教授李零幽默的发言鞭辟入里。

他认为演讲更像一种表演，而学术研究是小范围的，大会不如小会，小会不如“走会”，一边考察一边谈，最后收获满满。以前提出新考古学，提倡考古学向自然科学回归，没想到好多年之后，考古学科学化越来越厉害，考古报告越来越厚。比如，一个羊头做很多鉴定，冶金考古分析元素各占百分之多少、各种元素在地理上如何分布。

许宏写的《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李零认为实际上是大都无郭，说二里头时期是典型的大都无郭。最早的中国，概念也不是特别一样。回顾考古学史，常提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按照民国建国时官方认定的黄帝纪元推算。从秦汉算起，两三千年，从西周算起，前面还有两千年。讲二重史证最多的还不是做文献研究的，而是考古学家。二重史证原来是金石学家用的，把西方考古学引进，并不是否定了金石学，反而加强了金石学，因为我们国家金石学的史料太多了。恰恰中国人特别强调二重史证，我们觉得天经地义，但汉学家觉得问题就出在二重史证。

有些理论问题既不抽象也不复杂。譬如国家形态问题，中西方对此的理解偏差特别大，他们那种小国寡民对国家形态的理解和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些东西完全不同。这些现实的理论问题，恰恰需要考古学家去研究。李零教授一贯宣扬传统文化研究以考古为基础，虽然他离开考古专业很久，但他期待考古学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考古提倡心无旁骛，但是考古是综合性学科，综合学科最不应该画地为牢。这些年来，考古学的国际化、多学科化已经很明显。

学术史很重要，考古本身应该好好回溯自己的历史。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应该整理一下，还有解放前的很多发现，有人曾做过，但结果大家没有看到。李零教授自己做追踪楚帛书的研究，旨在把长沙发掘之前的历史好好钻研一下。

此外，李教授表示，下学期将带着学生在文研院举办读书会，一起读《剑桥早期中国史》。

朱凤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认为，无论是讲座还是研讨，更多的是考疑，很多结论“看似这么回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只给结论，那是应试教育，停留在中学阶段。大学应该提出疑问，启迪思维，不断探索。借用1978年中国史学规划室提到的“缩短战线，找出成绩”，缩短战线有利于解决难点问题。

第一，中华文明起源是要探讨的。就像人一样，国家有出生、成长、成熟阶段。没有书籍记载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考古，不应该是空白。没有都城的时候，中国是怎么样的？夏文化的人群是怎么来的？在朱教授看来，夏商周这三个国家其实是三个大的族团各自建立的，应该梳理这三个族团的发展脉络。二里头文化归到商代，二里头三期在文化上是不是完全归到商代，有待进一步探讨。大多数学者承认，商代人是沿着太行山从北部过来。商的早期严格来讲也可以归到史前史时代，就是没有史料记载的时代。所以说，早期中国前面有这样一段历史。关于早期中国的下限是否延伸到汉代，朱教授认为不一定。比如，众所周知的集权制其实早在战国就形成了，

秦始皇之所以能那么快统一中国，是有基础的。早期中国研究范围到西周就差不多了，要不然范围太大。

讲座可以举办，讲座面向的是大众，除此之外，他希望专题活动的主题树立得更专业一些，采用开放式讨论的形式，听众不限，可以提问题。

第二，早期国家的形成。早期中国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关乎古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模式。从世界意义来讲，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早期模式，在相对封闭内陆环境下文明形态的产生。

第三，文明交流。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绝对不是孤立的，只是我们了解得不够。中华文明和欧亚草原文明的交流简称南北交流，还有东西交流，这两个大的“十字交叉”对中国影响很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促进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早期宗教和思想观念的研究。

第五，物质文化进展研究。比如交通工具马车，矿冶和铸造。

第六，早期中国研究的学术史本身就是个课题。

第七，与国外学者交流。德国、法国、意大利人研究埃及学有二百年了，我们对中国本身这一文明古国的历史研究还不够。相近的工具不一定是直接传播的，人本身是一个共同体，隔着大洲可以有共同的发明。做早期中国的比较研究，可以邀请一些从事其他古典文明研究的学者来交流。文研院举办的学术研究也要由简报变为合集，逐渐沉淀下来。

吴飞：

哲学系教授吴飞说，此次恳谈会让他

深受启发。西方的考古学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古典学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学科形态、范围，西方考古学从某种意义上是古典学的延伸。通常希腊、罗马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奴隶社会。那么，在有文献可考的、有记载的希腊、罗马形态出现之前，希腊和罗马是什么状态？西方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有共享的理论，因为考古学科出现正值进化论产生的时代。从人类学来看，希腊、罗马在更早的时代可能与现在一些相对封闭的海岛、丛林部落类似，所以通过研究现存的原始部落来追溯比文字史料可考更早的时代文明。迄今为止，对早期中国理论影响特别大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吴教授认为，书中对早期国家形成的追溯方法，到20世纪中后期基本被西方学术界抛弃了。随着进化论被打破，考古研究方法趋于没有宏观讲法、后现代或者相对主义。

对于文研院的座谈，吴教授提议学者们能发表一些没有发表或者自己没有讲过的内容。

程苏东：

中文系程苏东提出，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不仅要提供一些舞台，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参与到讨论中。他结合自身的学术经验，畅谈早期国家的知识与书写。比如，《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孔子塑造和影响弟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而后人通过这些记录来了解孔子。书写对于历史和知识的建构有着极大的意义，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以前

我们把文本看作固态，最多是版本的差异，但现在发现原来很多固态的东西是动态的、飘忽的、难以描述的。不过，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是最终的结论，而是要认识其复杂性。

陈侃理：

历史系陈侃理从年轻学者的角度，为文研院下一阶段活动建言献策。年轻学者面临学术研究的压力，本身积累不足又要发表文章、申报课题、寻求创新。而文研院为年轻学者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向多学科老师学习、交流的机会。他建议文研院组织一些多学科考察活动，因为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在当地建立时间感、空间感，增强对当时的物质形态和物质形态分布的了解。比如，人文社科青年教师夏令营，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何晋：

历史系教授何晋从学科划分的角度，谈考古学与历史学拆分之后的利弊。他介绍了自己参加的跨学科课题组，包括经书注释课题、汉简课题和东方学课题。文研院既不集体做项目，也不是为了出一系列的书。这种交流基于每个人独立的研究，而不是命题作文。除了老师，博士生也可以加入，在西方博士生属于独立的学者，博士三四年级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可以来交流，会受益匪浅。另外，临时性甚至不成熟的讨论可以开小型座谈会。

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

分享自己在考古所七年的研究经验，介绍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到的成果。此外，他介绍了自己的业余研究经历，他参加的商周田野工作坊是一个坚持了六年的学术研究小团体，费用AA制。每年暑假，七八个核心成员围绕一个区域考察十天，白天到考古工地现场调研，带着投影仪，每天晚上有一个人作主题报告，对当天的调研进行交流。

他提议文研院应该有自己的阵地，法国年鉴学派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文研院也应该形成一个类似于《唐研究》这样的学术阵地，持续地发布关注某一领域并形成成果的信息。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对本次恳谈会进行总结，强调文研院是大家一起聊学问的地方，这种交流打破了年龄和学科界限，探讨的内容是处于“进行时”的，而不是“完成时”。在学术研究“胶着”的关键阶段，帮助学者们激活思路。最后，学者们回归自己的研究领域，“回到自己的桌案前面写自己的东西”，如果需要发表或者进一步讨论，文研院愿意提供支持。

（撰稿：谢宁）



03

东方视角下的西方文明



2016年12月19日，文研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东方视角下的西方文明”恳谈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高峰枫、副教授毛亮，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助理教授田耕，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彭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卜天共同出席会议。

邓院长首先对来自不同院校、机构和学术领域的学者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她指出，此次恳谈会是希望就文研院提出的五项凝聚议题之一——“东方视角下的西方文明”展开讨论，共同发掘其中值得讨论和关注的内容来推进这一议题的进程，从而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们带来切实的帮助。

刘北成教授认为，中国和国际形势都处在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他指出，多年来，西学研究一直存在诸多问题。譬如，我们广泛地接受着西方的翻译作品，但翻译带给了我们概念，却没有带给我们语言文化。他也认为，在研究西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将其片面化，想让西学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很困难的。

高峰枫教授对文研院组织学术活动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议通过挑选

标志性事件、经典文本甚至颠覆经典的文本，来聚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比较熟悉的历史时代、国家、语言等方面集中地研究一个问题。此外，他也希望学者们能够围绕美国做一些讨论。特朗普的当选是许多人没有预见到的，这反映出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仍然较少。高教授指出，他对宗教，尤其是《圣经》做了一些研究，对美国宗教的错综复杂比较了解，提议可以结合当下的时事热点开展对美国历史、文化、宗教的讨论。

谈到美国大选问题，毛亮认为特朗普只是一个极端化的特例。他认为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虽不至于消失，但人文学科却会萎缩，功利主义也将盛行。毛亮继而将目光转向美国人文学科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英语系的本科教育上。提到在耶鲁大学的交流经历，毛亮肯定了其英语系本科教育计划的高执行力和教学框架百年来所维持的稳定。他认为，虽然学界普遍承认西方人文学科衰落，但这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还特别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后经典”（Post-canon）时代，认为什么都可以拿来研究，这种学术方法和态度是应该力戒的误区。毛亮认为，经典文本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办法，老老实实地教，而不是去跟随风潮。

就美国人文学科的教育，田耕也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虽然以耶鲁为例，本科教育的框架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但传授经典文本的教师却在经历世代的更替。不同的教授理解与讲授文本的方式不同，因此，就北大教育而言，我们不光要思考经典文本的选择，更要思考如何讲授经典文本。田耕一再强调了阅读经典文本的重要性，他认为，经典文本能够对人的心智产生最重要的影响。

彭刚教授在发言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需要先接受研究西方哲学的训练。他指出，西方人文学科有一个完整的“光谱”，而国内的学者常常只选取其中的一个层面来看。同时他也指出，虽然人类学科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迹象，但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即能让我们更深入地在西方脉络下对西方有更深入的研究。

孙飞宇也就文研院阅读经典的方式提出了的建议。他认为，经典可以在多个学科中产生不同影响。譬如，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可以一同阅读莎士比亚。他提议文研院可举办一些小型座谈会来研读一个经典文本或者一位经典学者，跨学科地回溯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渊源。

吴天岳则认为，目前文研院的系列演讲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壮大和发展。他表示，主题系列演讲需要做好整体规划。具体到主题的选择上时，他以“公平”为例，建议应当注重寻找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张卜天指出，做学术的根本出发点是追本溯源。他认为，我们活在西方营造出来的世界和概念系统中。教科书只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概念，却没有告诉我们学科是

如何构建出来的，概念是如何得来的。张卜天提到，想要原原本本地了解西方，就要去了解学科的创建和形成过程中，什么被保留、什么被剔除了。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表示，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西学，不能只跟着西方学者跑，而要有我们的关注点。就西方经典而言，渠敬东教授强调，经典必须守住，并且应当反思西方经典如何教，怎么学。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学界往往抽离地讨论西学，缺乏对全局的了解。膜拜的对象从萨特到弗洛伊德再到哈贝马斯等等——我们常常跟随风潮，却缺乏持续的关注。同时，渠教授也提出，我们要抓住如19-20世纪之交这样的西方变化的关键时期，从而产生关键的议题。当下整个世界的发展是琐碎化的，我们更要在这其中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西方不研究的，我们未必不去研究；西方研究的，我们也不必去跟风。西方人文学科的萎缩恰恰能够促进我们独立性的培养，对西方以更加整体的眼光去看待，不去盲目跟随最新前沿，而是回归到关键点讨论西方关键问题和经典作品。

在会议的最后，邓小南院长也肯定了西学中阅读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她提到，北大一直有许多阅读经典的尝试，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文研院在未来将会继续开办一些阅读经典的课程、研讨会，或者是回归经典的主题系列讲座。

（撰稿：李雨澄）



04

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



2016年12月26日下午，文研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恳谈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副教授咎涛，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段晴、副教授叶少勇，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魏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文研院工作委员韩笑共同参加会议。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表示，此次会议将围绕文研院的五个核心议题之一的“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展开探讨。他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文明融合的体现，而对于多文明交融、融合的讨论也一直都在进行中。渠教授指出，学术研究者应当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中西问题，更是中国与世界问题。他希望各位学者能够就该

议题下可以产生哪些主题的学术活动、引进哪些学术资源等问题做出讨论。

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段晴首先提出，多元文明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这一领域内的理论支持却还很有限。随后，她强调，常常与多元文明研究相伴的一个词是“融合”，但“多元文明的融合”这一说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段晴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文明成为体系后，不同文明之间常常无法兼容和平行发展，也不存在多文明融合。就如同不同的语言一样——学习一门语言，就必须独立地去学习和研究它，一门独立语言是不与其它语言融合的。因此，段晴强调，虽然我们经常强调融合，但融合并不真的存在。反之，文明的冲突以及如何冲突下保持多元文明的共同存在才是应当思考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认为，中国的学界重古希腊研究而轻中世纪研究。

关于议题中的“多元”，从事天主教研究的彭教授认为，学术传统并不认可多元，我们的文化也同样有这一倾向。彭小瑜认为，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和多元（diversity）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但多元并不代表整齐，且往往带来冲突与战争。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多元”这一概念。此外，彭小瑜教授还特别指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应当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加以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提到了自己曾经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国内学术界有没有研究非洲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这一问题引起了李安山教授的反思：中国学界有时过于关注本国文明对非洲的影响，却忽视了非洲文明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东方文明的伟大，也要虚心研究其它文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咎涛对伊斯兰化与斯拉夫化等过程十分感兴趣。对于国内多元文明学术研究，他认为，我们尚落后于日本学者。而特别就多元文明研究中的多语言问题，咎涛则指出，有些语言是可以互相加强的。

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的研究方向是佛教研究，这与印度文明密切相关。有关多元文明的融合问题，他认为，文明融合中首先存在立场为题，在这之后融合才有可能出现。除了“融合”之

外，还有文明的对抗论，兼容论，多元论，排他论等等。他强调，融合是可能的，但是文明有秩序、有体系，有主辅结构，文明的交流需要正常地展开。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汲喆认为，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背后有文明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他指出，文明的存在往往是为了要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而研究文明则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从器物、语言等方面的具体研究，另一个则是从规范性的角度去研究什么是文明。他表示，在学术研究中，后者往往更加重要。

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副教授叶少勇认为，对一个领域的深挖是最重要的。他指出，印度佛教领域的“生产者”严重不足，中国的印度佛教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呈现出了实业空心化的状态。他强调，作为学者，要在一个学科里“安心做农民”，而不是急于把成果“变现”。

在会议的最后，渠敬东教授指出，目前在多元文明这一领域中，学者们应当将还处在被忽视的、被人认为不重要的却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推出去”，让它们变得重要。他强调，做学术，不能只是搞学术活动，而要落实到做研究上——这也恰恰体现了文研院“涵育学术”的宗旨。

（撰稿：李雨澄）



内部交流

01

钱理群教授新著《岁月沧桑》研讨会



2016年11月5日，“钱理群教授新著《岁月沧桑》研讨会”在文研院举行。该书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与会。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是钱理群教授在过去二十年间主要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早在1990年代，他就提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计划，并在此后相继出版了《1948：天地玄黄》与《我的精神自传》两部著作，在学界广受好评。2016年，他的《岁月沧桑》问世。该书是他在这一领域沉潜十年的重要创获，也是“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教授深入研究了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与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1950至19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与精神际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陈平原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举行此次研讨会，既是为了一本书、一个人，也是为了一个时代。钱理群教授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介绍了其自2014年宣布“告别学术

界”以来完成的三部著作（《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岁月沧桑》与《星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的相关情况。他特别补充道，除去已经收录在《岁月沧桑》中的七篇长文，关于1950至19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他还进行了陶行知、卢作孚、胡风、杜高、束星北、冯亦代与“大批判小组”等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园研究员围绕“当代史研究的工作伦理”问题展开发言。她认为，伴随着大量回忆录与1949年以来各类“运动档案”的相继出版，当代史学界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结合1990年代之后出现的相关研究著作，她具体讨论了应当以何种姿态与方法处理这批材料。她呼吁所有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都应当对此具有“知识上的兴趣”。对于《岁月沧桑》，她认为这是一部介于文史之间的学术著作，同时也属于广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在叙述方式上尤其值得称道。而与同样进行这一时段研究的洪子诚教授以及她本人相比，钱理群教授的专长在于具有大的历史视野与学术格局，这点对于从事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至关重要。

《北京青年报》社编辑陈徒手先生认为，《岁月沧桑》是一部典型的能够在史料中发现问题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照亮史料的著作。他通过具体分析书中的赵树理、胡风、顾准与冯亦代四个个案，展示了该书为学界贡献的新的论题与论域。作为同样关注这一时段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他希望档案资料能够在相关研究中被更为充分的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以“迷途中的坚守与坚守中的迷途”概括了《岁月沧桑》的基调与主题。他认为钱理群教授运用自身在鲁迅研究中积累的已经十分成熟的方法进入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解释了这一领域中大量的以往不能得到恰当解释的问题。而尤为可贵的是，钱理群教授在写作时还能时刻将自己作为反思与逼视的对象，从不以某种“后见之明”的立场或者秉持一种简单的道德判断的方法来评价原本复杂与丰富的历史境况。他指出，以往将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思路已经失效——因为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毛泽东时代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一现象必须为研究者认真面对。邵燕祥所经历的曲折的思想历程与王元化的几度转向，就是其中的显著证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副研究员提出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为学界贡献了两种重要的学术思路：一是以陈平原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史与教育史的研究方向；一是由钱理群教授与赵园研究员开创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模式。结合《岁月沧桑》，他具体讨论了精神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钱理群教授从文学史研究

进入精神史研究并非“转向”，而是一种“返本”——因为精神史内在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他认为与20世纪中国发生的时代巨变相比，当代中国没有产生可以与之匹配的大文学家与大思想家，所以既往的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并不能很好回应20世纪百年的历史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史研究的作用便发挥了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姚丹副教授认为《岁月沧桑》是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史诗性著作”。她十分欣赏钱理群教授在书中采取的叙述式（而非判断式）学术语言。与赵园研究员一样，她也强调了在该书处理的七个个案背后具有一种大的思考与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耿化敏副教授从党史研究的角度评价了《岁月沧桑》。他认为该书的核心线索是“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提出该书的重大意义是修正了以往将毛泽东时代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二者描述成为一种二元对立关系的简单论断。具体而言，他认为该书具有四个重要突破点：一是既有的对于1950至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研究著作大都站在知识分子的单一立场上讨论问题，而该书在此基础上还能兼顾执政党的视角；二是该书揭示了在这一时期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具有一种体制性的效应，在个案的“异”中也有更深层次的“同”；三是该书充分注意到了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心态以及与执政党的关系变化，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四是该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一手材料，这对

于当前的党史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启发。由此，他提出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应当更多关注这一时期的政策研究与知识分子组织机构研究，只有将执政党的文本与知识分子文本合而观之，才能做出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与论述。

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认为《岁月沧桑》处理的核心命题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知识分子与政权的互动过程”，而具体个案的选择更是体现出了钱理群教授的“匠心”。该书七个个案分别代表了七类知识分子，但同时又都是对于这一命题的回应。他提出该书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因为在当前学界，左右两种立场的学者在论述 1950 至 1970 年代的中国历史时更多地都是根据各自需要对于历史加以利用，而钱理群教授则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历史本身。他具体指出了《岁月沧桑》的三点学术价值：一是钱理群教授在使用史料的同时，并不排斥个人经验进入研究过程，这就避免了基于后设立场对于史料任意发挥的现象发生；二是钱理群教授真正贯彻了“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内在于他的思想世界，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以自己代替研究对象发声；三是史学不是史料学，比史料更为重要的乃是史识，而该书正是一部具有卓越史识的著作。

此次研讨会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岁月沧桑》是钱理群教授的“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是学术难度最大的一部。她认为该书完成了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全景展示。与

一般的知识分子研究著作相比，该书在悲情之外，更展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具有契合关系的一面。她把钱理群教授所谓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具体区分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历史”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她看来，对于前者的研究是既往知识分子研究的主流，该书也发扬了这一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深入到了研究后者，即知识分子的处境、心境与命运的层面，因此也就具有了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视野。《岁月沧桑》既打破了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做出的知识分子受难式的历史叙述套路，也打破了部分左翼学者将 1950 至 1970 年代神圣化的论述格调。她表彰钱理群教授对于左右两派学者的不足都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向研讨会提交了书面发言。他认为钱理群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品格与气象，已经从“压在心上的坟”成功提升成为了“立在心上的碑”，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陈平原教授在总结发言时同样肯定了钱理群教授的学术成就，并讨论了在使用检讨等档案材料时应当如何处理研究者的权利与研究对象的尊严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他建议以此次研讨会为开端，北京大学应当加大对于已经退休的资深学者的关注力度，及时对他们晚年的优秀成果加以认真回应，促成他们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学术交流与精神对话。

（撰稿：李浴洋）



02

“艺术史研究与发展” 恳谈会

2016 年 12 月 6 日下午，文研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09 室召开“艺术史研究与发展”恳谈会。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祁小春，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淞、刘晨来到文研院，就文研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文研院与艺术史这一领域的合作与互动进行交流与探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出席会议。

邓小南院长首先对各位学者、艺术家们的来访表示欢迎。她指出，文研院是一个跨学科交流平台，而艺术史则是一门天然的跨学科专业。邓院长指出，学科建设需要依托不同学科，而文研院则希望在目前的学科基础上做一些补充。她期待同与会嘉宾一起探讨文研院能够与艺术史这一领域开展哪些合作、如何合作。

李淞教授指出，艺术史作为一个天然的跨学科专业，其危机恰恰来自于它的学科性。跨学科是一个趋势，但也需要在这个趋势下保持艺术史的学科性。而艺术史与文研院的合作可能，李淞则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考虑：一是谈方法，即讨论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方法论问题；二是谈事情，即从论题入手，在具体内容上开展深入交流；三是谈学科，即商讨如何完

善艺术史学科，尤其是如何向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借鉴。李淞认为，艺术史要有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核心技术，也表示期待与文研院开展长期的、定期的、连续性的活动，包括学术会议，座谈会等。李淞以宋画为例，提出未来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对同一作品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深度交流对话。

白谦慎教授一方面为大家介绍了美国综合性大学艺术史专业的配置概况。他指出，西方的综合性大学都有独立的艺术史系，而非隶属于历史系或艺术系，其师资力量力量的配备与学生数量也是国内大学目前无法赶超的。另一方面，白谦慎教授也认为文研院与艺术史的合作应当从议题着手，便于操作。

祁小春教授也指出，艺术史在我国学科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在国内，艺术史专业常常被设置在艺术系、美术系下，这是沿袭了苏联的模式。譬如，这样的设置将艺术史定义为了术科性的专业，容易使学生只侧重术科上的建树，而忽略了理论上的积累。

朱青生教授认同国内的艺术史专业在学科结构上存在问题。他认为当下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艺术史专业、甚至是艺术史系建立起来。此外，他还提到，随着数字艺术的蓬勃发展，对图像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丰富的新成果。艺术史研究可以与自



然科学中的认识论相结合，产生新的研究契机。朱教授强调，如何看待图像将成为未来的一个理论热点，因此艺术史在未来的学术界也将更加获得重视。

此次研讨会历时两小时，与会嘉宾都表达了各自对文研院与艺术史这一领域合作交流的展望。最后，邓院长特别指出，艺术史学科建设虽然有待完善，且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学科结构得到优化之前，基于目前的学科结构，文研院可以对艺术史面临的一些困境提供帮助，成为艺术史

专业学科建设完善前的一个过渡。同时，文研院作为一个跨学科交流平台，也十分需要来自艺术史领域的各种议题讨论。文研院自成立以来，已举办了多个艺术史领域的讲座、座谈会等，邓院长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保持这一趋势，与艺术史展开更加深入的、能够沉淀下来的、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

（撰稿：李雨澄）

03

“数字人文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2016年12月14日下午，文研院召开“数字人文”建设与发展恳谈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崔海媛、中心成员罗鹏程与王昊贤，文研院工作委员韩笑，国际合作部李雨澄以及CBDB项目管理尹航等出席会议。

邓小南院长首先对各位的来访表示欢迎。她指出，数字人文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对于许多学校和学者来说还比较陌生。此前的一些这方面的努力，譬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方的合作项目“中国历代人物传记”（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以下简称CBDB）就是一次跨越国家界限与学科界限、持续时间较长的尝试，这其中有一些瓶颈有待突破，也更有经验值得吸取。北京大学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部门在数字人文领域已有相当积累，召开此次恳谈会旨在加强沟通，为下一步整合资源打下基础。

图书馆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崔海媛表示，北大图书馆迄今为止已经做过很多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与实践，譬如和社科部合作的区域研究，包括基于地图做的许多可视化展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崔主任认为，哈佛大学在跨学科应用上处于领先地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她也

指出，北大图书馆处在一个转型期。近年来，图书馆的借阅量呈减少趋势，但网上电子资源的检索应用大大增加。面对数字时代新科技的冲击与影响，北大图书馆正在考虑自己的角色变化，做出了许多新的调整。一是做出了许多新的应用，如“北京大学学术成果生态系统”——它通过和科研系统密切结合来对老师的学术成果做自动获取；另一个则是出版物的网上发布，尤其是对一些尚不具备网上发布能力的校内出版物进行资源整合，将成果发布在网上。

崔主任还特别提到，从数字专业的方向看，学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汇集点。她指出，北大正在以哈佛的“open scholar”为依据建立一个“北京大学学者主页（Scholars@Peking University）”，力求把教师的学术生平、学术出版成果进行整合，并希望未来可以和其它系统对接，自动更新资料。这一项尝试不仅体现了技术上的进步，更蕴含着图书馆思想观念与出发点的转变——即从被动的资源汇集平台向主动提供服务的转变。除此之外，北大图书馆数字人文方面的进展还体现在：信息化与数据中心的建立、古籍图书馆对古籍的数字化整理、特色资源中心等。崔主任强调，北大图书馆在技术上是自信的，目前方法和技术都已不再是局限，他们急需的恰恰是各方对他们的需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尹航是CBDB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也借此机会介绍了CBDB的发展、特点、突破与瓶颈。他指出，CBDB目前能够产生的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在一般意义上作为人物词典

使用；二是在较多例证才能回答的问题上，直接得出一些基本印象；三是作为个人研究的起点。而对于CBDB目前存在的问题，尹航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主要是资料来源和 workflow 产生的数据分布时段与侧重层面的不同以及重复人物问题。通过长时间在项目中的参与和反思，尹航指出，人文学者和数据专业的合作至关重要。

谈到需求，邓院长认为，数字人文领域值得做的事情还很多。她指出，文研院是一个跨学科平台，并不针对单一学科，因此任何学者都不可能把握得住所有领域，也就需要借助先进手段。以目前文研院推进的五个凝聚性议题为例，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就包含了考古、历史、古文字与古文献、思想史等学科领域，而社会转型则是从春秋战国到当下都有所涉及，且还有制度的、思想的、经济的、法制的转型等等，涉及的面很宽。邓院长也指出，在文研院这个平台上，有许多原本通过凝聚而产生的研究成果最后却被分散地发布到了不同的地方，这是有待改变的一个现状。

邓院长强调，学者们需要视野上的刺激带来思想上的刺激，以广泛的、高质量的成果搜罗为基础，视野才能得以开阔。邓院长表示，文研院需要北大图书馆的帮助从视野上来对以前的研究产生根本的冲击。文研院与北大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

（撰稿：李雨澄）



04

“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座谈会



2017年1月11日下午，文研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座谈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Peter Bol）、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聂华、北京大学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崔海媛、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建设发展项目负责人朱本军、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研究员史睿等参与讨论。

邓小南院长首先对参与座谈会的学者表示欢迎，指出此次座谈会的中心是从学校层面进行数字人文问题的讨论。

包弼德教授对数字人文进行了基本介绍。他指出，不论是中国大学还是外国大学，都不缺乏对于文字、影像等正式出版物的数据库，但普遍缺乏对在校学生和老师非正式数字资料的收集。包弼德教授简单地介绍了目前数字人文应用的例子：GIS、CBDB等数据库都是数字人文的成功案例。这些数据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息平台，其信息可以被永久保存、完善并可以被公众利用。与会者认为，这种数据平台的成功建立不是任何一个独立机构可以承担的，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学校人文学者与图书馆技术团队共同努力。包弼德教授随后对数字人文的运用进行了更加具体的

介绍。以CBDB为例，他指出，CBDB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词典，而是新型的数据库，因而它更强调范围较广的数据资源的整理，而非对某一特定历史名词进行准确的检索。

崔海媛教授简单介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数字人文方面的发展现状，指出在现阶段，传统图书馆已经在资源上不具有优势。近些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阅量显著下降，人流量也有所下降。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来自于研究范式的变化，因而在如何向师生提供更加完善的数据服务问题上，图书馆需要进行服务转型。北大图书馆致力于进行对文本挖掘、可视化等工具软件应用的网站建设。通过对先进系统的应用为在校师生应用新范式进行研究提供帮助，搭建一个不同学科间针对同一问题交流合作的数据平台。崔海媛希望包弼德教授针对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提出建议。

朱本军指出，通过调研，现阶段数字人文在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应用落脚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将数据进行数字化（由纸本到电子）的非结构化数据抽取；第二是作为处理重复性检索的工具；第三是应用数字人文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用到人文研究；第四是以量化手段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进行辅助。就北京大学而言，有大量的古籍、档案、拓片、墓志铭等材料并没

有实现数字化，出于版权和资料的保护考虑，已经实现数字化的资料的开放范围也十分有限。史睿则指出数字化时代到来后，图书馆面临进行数字化创新的选择。数字人文的应用可以将传统的包括年表、世系在内的文本资料索引转换为电子文本，从而便于建立点与点资源之间的联系。现代图书馆除了进行文本的保存，更重要的是要完善组织知识、分享知识的职能，要深入到最核心、最基础词典的编纂工作中。史睿还提出了数据库间不兼容、无法对接的问题，图书馆需要做的是订立最基础的标准。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倡议下，第二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筹备于2017年5月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数字人文范式下的史学研究”，分为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研究、数字人文与历史文献整理和数字人文范式下的史学和相关领域四个分主题。邓小南院长认为可以将论坛的主题扩大到更加宽泛的

范围，艺术史、考古等都可以纳入此次论坛的主题。邓院长认为就北京大学而言，以图书馆为依托推进数字人文是较为可行的道路。朱本军也提出了希望与哈佛大学建立数字人文方面合作的希望。

北京大学图书馆拟建立数字人文工作坊，希望以此推动北大对数字人文的建设。包弼德教授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指出现阶段国际知名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是十分必要的。斯坦福、哈佛等美国顶尖高校目前都在进行数字人文平台的建设，推动国际间的合作将对数字人文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撰稿：禹思恬）



静园雅集

03

黎晟： 图示与功能——南薰殿宋代帝后像的图像分析

2016年11月11日下午，文研院“雅集”系列活动第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黎晟带来主题为“图示与功能——南薰殿宋代帝后像的图像分析”的演讲。黎晟博士后以往从事于美术史研究，他的博士后研究师从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试图将美术史的研究与正史的研究相结合。帝后图像，既是艺术图像，又是政治图像，不但可以从肖像画、人物造型的角度研究，又可以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

黎晟博士后以南薰殿宋代帝后像为中心，从真伪、图式、造型三个角度展开演讲。其中，真伪问题固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南薰殿中的帝后图像得以长期保存在宫殿中，其真无疑；但通过细节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

南薰殿图像成立于乾隆时期。乾隆十二年（1747）十月辛巳，发现工部库与内务府库藏有一批明朝留下的历代帝后、圣贤、名臣像挂轴与册页，下令重新装裱，于乾隆十四年（1749）奉藏于整修一新的南薰殿中。清亡之后，1914年归古物陈列所，1927年归国立历史博物馆，1933年南迁，1949年



大部分迁台湾。南薰殿图像在到台北之日，就已阙8轴。据蒋復聰先生考证，宣祖、真宗、英宗、神宗、徽宗、钦宗、理宗的半身像现藏于北京故宫，而太祖立像可能藏在国博，其他图像都藏于台北故宫。

现存宋代帝后画像类型主要有帝后册页和挂轴，其中挂轴包括坐像轴、立像轴、半身像（胸像）轴。其中，册页与大幅坐像的面容、衣冠基本一致，有同一的来源。但太宗像所戴非直脚幞头，册页中还多一孝宗皇后像。表明曾有过孝宗皇后像与另一版本的太宗像。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榜题的文字与元明两朝南薰殿图像相似，画法也与元代帝像册相同，类似明代波臣派，不类宋代。此外，色料、画法也是完全一致，

应出于统一制作。因此，册页应为明人临自大幅的挂轴，而不可能是宋代当时制作的，故研究宋代美术史应将这些册页抛之在外。

黎晟博士后向我们展示了所有宋代的帝后半身像轴。从宋宣祖到宋哲宗后，这些像轴很明显没有统一的规式——不仅衣冠不同，画法也不同。其中有两像大有问题，很明显不是宋代的作品。宋太祖一像题有“赵太祖”，这一名称更多见于明后，并且该像上还出现了唯一一个收藏印，疑为明宪宗内侍钱能之印。另一宋徽宗像中，巾式为明代样式，而其衣纹的处理亦非宋代样式。

从图式的角度看，宋代帝后像保留了早期的半身像传统图式。由唐及宋，逐渐产生由生前小像转制大幅图像的传统。宋代帝后像包括宗教偶像类、祖先像类、日常生活或故事类等类型，材质上有绘画（绢质或壁画）和塑像（石雕、泥塑、金属、夹苎等）。

宋代帝王立像，今仅留两张：其一为宋太祖立像，高达2米56；其一为宋太宗立像，仅高60余厘米——这也说明两者的功能有别。其中，宋太祖立像存在问题，其玉带为明代款式，不可能为宋人之物。黎晟博士后举例称，唐凌烟阁《历代功臣像》等立像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宋代《睢阳五老图》、《中兴四将图》、《八相图》也是立姿群像。这些群像之中，人物以相对的姿态站立，使得人物之间获得互动。对比而言，独幅的宋代帝王立像颇有“不自足”之感。黎晟博士后推测，这种立姿行礼的帝王像，或为帝王礼敬先帝，或为帝王礼神。

宋代帝后坐像，有《宋宣祖坐像》和《宋宣祖后坐像》——两像的画法和衣冠形制都与宋代人像不同。《宋宣祖后坐像》中，其

后冠不类宋代，而“累丝点翠”的工艺更类似明代；此外，其中后服霞帔的使用亦在明代较为多见。因此，这两张像也具有较大的问题，不应作为南薰殿宋代帝后像的研究对象。

综观其他的帝后坐像轴，早期并无统一形制，帝像自神宗起样式基本一致，后像从英宗、神宗起样式基本一致。从神宗开始，帝后变为面对面结构并且大小相同，这说明人们开始有意制造“帝后对挂”的形式。部分画像中有拼接痕迹，门幅大多在50多厘米，而未拼接的画幅全为南宋帝后，尺寸宽多在100厘米，这与南宋制绢历史相符。

此外，从历史角度综观帝后坐像轴，能够勾画出许多层面的演化历程。坐像轴的用线由北宋细劲的铁线描至南宋的方折遒劲、多变运笔，体现了两宋画风的变化；帝王幞头由细变粗再变细，后部由小变大、逐渐后仰，体现出宋代幞头样式的变化；帝后坐具由早期的不统一到神宗与英宗之后的统一等。黎晟博士后通过两条纵贯线直观地展示了宋代帝像与后像的演化历程。整体而言，帝像与后像的变化基本一致，且以神宗像、徽宗像、高宗像为关键结点。其中，坐像轴线条、幞头样式等细节的逐渐演化，表明画作制作于宋代不同时期；某些突变，如尺寸、朝向、坐具样式，则可能表明了制作制度、奉祀制度、展示方式方面的变化。

最后，黎晟博士后感谢了在场师生的到来，并指出目前的课题中关于宋代帝后像的研究极其繁多，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深入细致地阐述。

04

黄小峰：宋画的迷雾

——对若干传世画作断代的再检讨



2016年11月18日下午，文研“雅集”活动第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中央美术学院黄小峰教授带来主题为“宋画的迷雾——对若干传世画作断代的再检讨”的演讲。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出席座谈。

黄小峰教授首先指出，今天研究的宋画对象要打上引号，因为许多所谓宋画的画作年代是存疑的。现在对传世画作的研究，通过借助电子图像的方式，我们很容易对画作进行细读；而通过对画作的细读，就容易发现画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随后，黄小峰教授围绕《却坐图》、《纺车图》、《五马图》这三幅相传为宋人作品的画作，展开自己关于画作断代问题的思考。

《却坐图》藏于台北故宫，无款，高146.8cm，宽77.3cm。黄小峰教授发现了

《却坐图》的许多问题。首先，《却坐图》中的人物都是很明显的“左衽”。比较宽泛的说法是，左衽多为胡人，右衽多为汉人。若此画作于南宋理宗时期，则时人鲜有左衽，今可考之左衽仅存两处，其一为陆信忠《佛涅槃图》，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其二则为成都市保和乡东桂村宋墓出土的一种人形物件。至明代《宝宁寺水陆画》则已混用左右衽。因此，黄小峰怀疑《却坐图》可能作于辽、金甚至元代。

其次，黄小峰教授重点关注了《却坐图》中一处人物的手持器物。对比同时期的图像描绘与墓葬出土器物，都没有与《却坐图》中接近的器物。而根据《元史·舆服志》的文字和《大明集礼》中图文并茂的记载，此处器物则与其中的“卧瓜立瓜”之“立瓜”酷似。

黄小峰教授还注意到，《却坐图》中人物的“方心曲领”具备特殊纹理。宋代帝王像一般都有方心曲领，但最初领上并无图案。自1325年永乐宫三清殿壁画起开始出现各种图案，或为宗教性的图像。1443年法海寺壁画及此后的宝宁寺壁画、《真武灵应图册》以至弘治年间的石家庄毗卢寺壁画等图像中，人物领上图案的纹理却与《却坐图》中人物的领上图案酷似。此外，《却坐图》中人物衣袋的折叠方式、仙鹤头部的细节处理等方面都十分细致，达到了许多明代传世画作的

水平。因此，《却坐图》作为与宫廷主题相关的画作，如果并非作于宋理宗时期，而是明代初期的，那么其意义就会有大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是《纺车图》，相传为宋人王居正所作。《纺车图》中的老者皮松嘴瘪，描摹细腻。黄小峰教授指出，赵孟頫的《纺车图》题跋不甚可靠。首先，第一段题跋中写有“图虽尺许而气韵雄壮”，但其实际尺寸为二尺二寸四分，误差较大。其次，第二段题跋是一首诗，其中将画中纺车称为“辘车”。辘车的形制记载见于当时的多种传世文献，在材料充足的情况下，赵孟頫应很清楚画中的纺车并非“辘车”。此外，赵孟頫所作《农桑图·织图诗》中既有辘车，又有纺车，暗言其异。因此，此处赵孟頫的题跋十分可疑。

黄小峰教授还指出，《女孝经图》等画作中有纺车的图像，对比可见，《纺车图》中的纺车没有轮边，曲柄的位置也甚奇怪。另外，纺车上端的两根柱子向后延伸，应为二人合作的纺车。对于《纺车图》中的纺车，黄小峰教授认为其用途应为纺麻。首先，画中人物所穿之衣非常厚，应为麻衣；其次，人物身后有一个竹筐器具，应为“绩[筑虫]（音穷）”，为盛放麻绩之器，有“日用而生财”之意。

整体而言，《纺车图》构图对称，中部很大空间分配给两根丝线。黄小峰教授认为，其中有五个要素——老妇、少妇、儿童、线、纺织工具，从而体现家族协作的意味。后代《方氏墨谱》中有“世掌丝纶”之说，其中“世”即为三代人的体现。该画作虽然多处画得过于简单甚至有误，但也具备这五要素，同样强调三代人协作的过程；《程氏墨苑》

中缺少老妇，但两代人亦能反映“世”之意味。因此，总体而言，以《纺车图》对后世影响之大，其时代不能太晚。

王绂1410年作《湖山书屋图》，其图式与《纺车图》相似，具其五要素而另有一处细节——河对岸有一名牧童。黄小峰教授联想到《纺车图》右下角把玩蟾蜍的儿童，其形象与《刘海戏蟾图》相似；而阎次平《四季牧牛图》中的牧童亦在把玩蟾蜍。因此，黄小峰教授猜测，《纺车图》中的儿童可能为一个牧童形象。若果为牧童形象，则其相当于“耕”的元素，与“纺车”恰形成一个“耕织图”的组合构图。

《五马图》，宋人李公麟所作，相传已佚。由右及左，别为五马：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首先，五幅之前四有黄庭坚所作题跋，而其中三处“岁”字，两处为“山”字头，一处却为“止”字头，黄小峰教授怀疑是另有他人仿其笔迹所写。其次，黄小峰教授对比五马的图像还发现，最后一幅“满川花”的画法有所不同。第一，马肚的位置偏低，马头却与其他马一般高，极显敦实；第二，马头处的缰绳位置不对称，且缰绳系于马头侧面的方式在元代以后方为多见。

这两处细节引起了黄小峰教授怀疑的目光。从《宋会要辑稿》等零散的文献记载来看，1087年前后朝廷对西域使者的态度有明显转变，因此1086年西域使者来访时很可能并未进贡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题跋所记载的该阶段进贡马匹都可能存在问题。此外，苏轼《三马图赞》所言《三马图》亦出于李公麟，而其与《五马图》的关系不得而知。黄小峰教授表示，此前他在

与日本学者的讨论中得知,《五马图》或还保留于世。而现在我们无从得见《五马图》的原貌,这成为了诸多问题的主要缘由。因此,若能等到《五马图》重见天日之时,或许诸多相关疑问便能迎刃而解。

黄小峰教授在结束主题演讲后总结称,自己今天对三幅画作各自提出了一些疑问,但都没有给出最终的解答。白谦慎教授肯定了赵孟頫的《纺车图》题跋非常可疑,但又

指出《纺车图》中纺车的形制问题应与其真伪无关,因为老妇神态的描摹都能如此细致,纺车形制的描绘不应有明显的疏失。经过在场多名师生的一番讨论,对于《纺车图》中纺车异于寻常的形制,很可能为某些地域之特有。最后,黄小峰教授谦称,自己在与大家的讨论之中受益良多。

(撰稿:施朝)

05

白谦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遭际——从吴大澂说起

2016年12月2日下午,文研院“雅集”系列活动第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以“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遭际——从吴大澂说起”为主题展开演讲。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等学者出席。

白谦慎教授近年来一直在研究一位历史人物——吴大澂。吴大澂(1835-1902),江苏苏州人,1868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后历任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既为学者,又为书法家和收藏家,在艺术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



吴大澂“一生好入名山游”。自1870年登西岳华山起,陆续登临崆峒、祁连、长白、罗浮、泰山、庐山等名山,不仅临众山刻石,还作有《长白积雪图》、《庐山海会寺》等画作。他的一方纪游印刻有“曾览泰华、空同、祁连、长白、罗浮、蓬莱、

员乔、方壶之胜”,其中还囊括了蓬莱、员乔、方壶这三座海上仙山;另一方更晚期的纪游印则在原基础上补衡山、匡庐。这些活动都继承了中国文人之已久的登临揽胜、赋诗作画纪游的传统。

吴大澂生活于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出生五年,鸦片战争爆发;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去世三年后,科举制废止;九年后,清朝覆亡。吴大澂的家乡苏州是文人文化的重镇,他在那里接受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教育;同时,由于苏州的进士数量多,从而苏州人在京城任高官、参与外交活动的人数也远胜他地——这就促使文化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使得苏州在晚清政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白谦慎教授指出,之所以选择吴大澂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吴大澂生活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来自一个在政治、文化上都举足轻重的地区,还因为他所为官的地区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吴大澂的师友有许多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其师有吴云、冯桂芬、陈奂、俞樾、潘祖荫、李鸿章,其友有左宗棠、陈介祺、翁同龢、盛昱、缪荃孙、洪钧,其姻亲更有沈树鏞、汪鸣銮、廖寿恒、张之洞、袁世凯等。通过他们,可以观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两代士大夫的文化生活。而此处的“文化生活”,包括艺术活动和学术活动,两者密不可分。

在文化领域中,吴大澂涉猎甚广,成就很高,是著名的学者、艺术家、收藏家、赞助人。白谦慎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关注的一些话题,其中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吴大澂的篆书》介绍了吴大澂由小篆向大篆过渡的过程,并论述了吴大澂

的学术思想与书法的关系;《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分析了当时社会为何有如此大的书法需求,并且是社会精英最主要的艺术爱好;《晚清官员的小楷》主要论述了书法与官僚体制的关系,例如小楷与科举制必然存在关系,而中举者的小楷在科举考试前后亦有变化;《吴大澂的篆刻》在介绍吴大澂的篆刻和古印收藏的基础上,还分析了刻印与晚清针对六国文字认定的学术活动的联系;《吴大澂和绘画》则着重讨论了书画与绘画的不同,以及何为“业余”的问题。

吴大澂的藏品种类繁多,包括青铜器、玉器、印章、陶器、刻石、书画、瓷器、拓片等。对于官员的文物收藏这一话题,白谦慎教授指出,在晚清这一国家危难之际,政府官员在收藏活动时必然会面临一种“玩物丧志”的焦虑。对吴大澂而言,则是既有珥春市吴大澂广场“民族英雄”形象的赫赫石像,亦有廖冰兄题有“八千子弟半摧折,只幸腰间印未失”的饱含暗讽的漫画——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介绍完吴大澂其人的相关研究后,白谦慎教授开始谈论“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遭际”的话题。正如对吴大澂褒贬不一的评价,传统文人艺术近年来逐渐面临时代的挑战,因此吴大澂在《古玉图考叙》中开篇即辩称,自己收藏研究的古代玉器“非以为玩物也”。白谦慎教授还指出,吴大澂与毛泽东颇有渊源。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湘军的故乡湘潭出生,而此时吴大澂正任湖南巡抚,因此吴大澂曾做过两年毛泽东的“父母官”;而毛泽东一生虽写诗无数,却从不盖印章。而此后被广泛用于宣传,所谓“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则倾向于使用一些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因此，白谦慎教授指出，从毛泽东开始的中国领导人逐渐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疏离。

最后，白谦慎教授总结称，政治精英结构在 20 世纪的变化给中国艺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人艺术作为文化遗产还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作用，但它本身却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现象。渠敬东教授评论称，白谦慎教授层层勾勒出吴大澂的形象并加以着色，使得我们能够全景地了解一位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的人物，也能够体会到文化、艺术在今天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吴大澂其人，更是时代的巨大变迁，及其晕染在人身上的不同内容。

陈洪捷教授提问说，中国历史上，兼具政治家与文人双重身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在这种多重身份的背景下，他们对自我的认同是否存在冲突或有所偏重？他们在政治场合如何表示自己的官员身份？

白谦慎教授回答称，书法和诗歌是中国文人必备的技能，但作为官员而言，写字和做文章这两点在晚清颇受批评。事实上，晚清官员大量写书法不是为了卖，而是通过赠送以维持整个精英集团的内在凝聚力。像吴大澂这批官员，其实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他们都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但又因为社会批评的存在，所以在公务繁忙之时，都对外宣称自己无暇写字或是收集古董。

邓小南教授指出，南宋时期的收藏鉴赏也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当时也是一个国破家亡、风雨飘摇的时代，但仍有一批人讨论这个话题。以朱熹为代表的一些

学者，将“游于艺”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整体中讨论，认为一个文人的素养要求四者兼备。

渠敬东教授补充道，吴国帆、陈寅恪先生都是从这个意义上从事艺术和学术工作的。而“中学为体”的真正意思在于，这里的“体”指的是人格、广泛的修养和完整的人的形态。

白谦慎教授同意“游于艺”是一种文人修养的观点。例如，吴大澂也是理学家，写篆书时一笔不苟，写对联也不赞成用行书；还有上层社会的书画只赠不卖，这些都是精英集团凝聚力的问题。

袁明教授回忆了 1984 年与费正清先生的长谈。当时费正清站在美国汉学的角度说，大量中国近代人物都没有研究，而后举了许多例子，其中就包括吴大澂的老师冯桂芬。但袁明教授指出，外国人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人物，并不会像白谦慎教授这样从审美到实物地理解，因此还是要靠我们自身数千年积淀的“灵犀”。随后，袁明教授质疑称，白谦慎教授最后总结时说“文人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似乎暗示着文人艺术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文人艺术中是有“魂”的：这种经历数千年沉淀的“魂”，这种精神脉络，这种中国人的情趣和审美，或许并不会消失，能够在当今或未来以别样的表达方式而存在。

白谦慎教授解释说，“成为历史现象”并不意味着消失。历史上，最上层的经济、政治精英直接介入艺术创作的现象，恐怕今后很难恢复；这种参与之深、参与之广，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当时所谓的“业余爱好”不仅能“修身养性”，更受到科举制等体制上的保护——最大的书法

家全是当官的。但这种文人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还是会产生非常久远的影响。

随后，白谦慎教授又回答了在场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白谦慎教授感谢了各位嘉宾和在场师生的到来，在大家的

热烈掌声中，本期“雅集”活动落下帷幕。

（撰稿：施朝）

06

王纪宴：交响乐的谜语 ——从贝多芬到马勒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下午，文研院“雅集”系列活动第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著名乐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纪宴教授带来主题为“交响乐的谜语——从贝多芬到马勒”的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访问教授赵宪章、汲喆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王纪宴教授出身戏剧世家，从小受到民乐熏陶，后深耕西方古典音乐，主要研究音乐组织与阐释，曾于《爱乐》杂志等多家媒体发表过重要乐评文章。

王纪宴教授首先为我们播放了一段 2009 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海顿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的视频。演奏《告别》第四乐章尾声时，演奏团团员纷纷依次离场，直到仅剩两名小提琴演奏者和一名指挥，而后两名小提琴演奏者也离场，最后仅留下台上的一名指挥，及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

关于海顿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的创作背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以海顿为首的乐团团员企盼休假而不得，让乐长海顿



设法使主人意识到他们“该休假了”而创作；另一种解释则是，主人手头不太宽裕而想要解散乐团，乐团成员不愿失去工作而让乐长海顿创作此曲。何种解释才正确？这便是一种“谜语”。在电影《魂断蓝桥》中，伴随男女主角离别场景的《友谊地久天长》则接近于第二种解释，此处的音乐为他们将来的重逢及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

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则饱含“谜语”的成分。《谜语变奏曲》包含十四段变奏，其中每首变奏曲前都有不同的缩写字母或绰号，而作者埃尔加偏偏不指明它们分别代表谁，让大家来“猜谜”。随后，王纪宴教授为我们播放了《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这段变奏在相当漫长的铺垫之后便是极为辉煌的高潮，非常适合在音乐会上演奏。王纪宴教授指出，事实上我们在欣赏这段音乐时，已经不再关注它的“谜语”的答案如何，而更加关注音乐本身。交响乐本身寓意的难以领悟，也是交响乐作为“谜”一样的存在而面临的巨大挑战。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有一段关于交响乐的论述：“没有比用几个声部协调歌唱的规则更伟大和更令人崇敬的奇迹了！古人不通晓此规则，但它终究被人——造物主的模仿者——发现。通过巧妙的多声部交响曲，人应该在短短一小时之内凭借想象看到世界在世间中的全部永恒性；而且，就通过音乐——上帝的回声——享受到最美好的幸福而言，人应该几乎达到上帝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所达到的那种满意程度。”王纪宴教授认为，这是非音乐工作者所给出的最杰出的论述，作为科学家的开普勒是在用赞美诗一般的语言，鼓励我们听复杂的多声部音乐。

保罗·格里菲斯在《西方音乐简史》中说“一首交响乐可以在一小时之内，让人体验它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可理解性。”美国文化史家雅克·巴赞的一段颇具欧洲中心论思想的论述则说：“西方音乐的卓越之处在于，它通过以平均律调整的音阶，通过发展各种复杂的形式和乐器，使音乐的表达力达到了其他文化未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指挥家汤沐海则直接道出了东西方听众的区别：“西

方的听众是听结构的，不是像东方的很多听众一样喜欢听一条美好的旋律，一旦有太多的发展，就不想听了。”

王纪宴教授指出，结构感绝非只属于音乐技术层面，而与人的精神隔膜。一个典型而朴素的例证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中《欢乐颂》主题的出现和发展。当这个主题在千呼万唤后终于出现时，它并非“闪亮登场”，而是听起来相当喑哑的低音区。正如萨波奇·本采在《旋律史》中指出的：“（与海顿和莫扎特不同）贝多芬的伟大旋律却大多数都在中提琴和大提琴的阴暗声区内。”在此后的三次重复中，这个主题不断趋向丰满、有力和灿烂，直到鼓号齐鸣的强奏。

旋律在重复、发展、对比、再现中呈现出结构之美，专业音乐家可以从谱面、从技术上了解，而普通听众也能从听觉上直觉地感知——如果他全神贯注地聆听。有结构感的多声部音乐，成就了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直到布鲁克纳和马勒的鸿篇巨制，没有外在情节导引，仅靠音乐自身的变化、对比，就能让听众沉浸于其中，乐而忘返。

王纪宴教授又介绍了常被贴上“左派”标签，实际上则具有相当高音乐价值的《红旗颂》，指出其魅力在于对豪迈之情、壮烈境界的渲染。随后，王纪宴教授为我们播放了汤沐海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旗颂》，其结尾竖琴伴奏下的双簧管演奏，让听众亲临胜利的喜悦与幸福；而音乐也在此刻戛然而止，又使听众想起未解放区的苦难人民。这也是一种“结构之美”。

王纪宴教授指出，贝多芬大大丰富了交响乐的深度而导致后世听众“跟不上”，于是对音乐的阐释应运而生。例如，作家E.T.A. 霍夫曼就做了许多阐释贝多芬音乐的

工作。但这些对音乐的阐释，必然地将一些音乐本身的可感内容固化到阐释性的文字之中；我们更应稍稍脱离这些文字的束缚，直接与音乐本身对话。

我们谈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时常想及“命运敲门”、“扼住命运咽喉”之类的词汇，有时甚至直接称其为“命运交响曲”。王纪宴教授指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命运敲门”是一种过度的解读。事实上，贝多芬并未对这部交响曲命名为“命运”，并且贝多芬生前谈话录的许多部分是一个叫辛德勒的人伪造的，其中就包括这种“命运”的解读。所谓遭受耳聋折磨、与命运搏斗等诸多联想，很可能都是违背贝多芬本意的。王纪宴教授说，现在提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一般不提“命运”二字；现在演奏这首交响乐，则不再为刻意传达“与命运搏斗”而使用气势恢弘的大规模乐团。随后，王纪宴教授分别播放了德国指挥家蒂勒曼和奥地利指挥家哈农库特指挥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并解释了乐章结尾“断开式”的演奏与贝多芬所作乐谱的一致性。

虽然音乐在贝多芬时代脱离宫廷、脱离贵族，但贝多芬也不将音乐作为纯娱乐，同样注重音乐本身的含义。例如，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就加入了合唱队的元素，唱词为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而有些作曲家，甚至试图将音乐作为一个离奇荒诞情节的伴奏，如法国音乐家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每一乐章都各有相应解说，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就对柏辽兹颇有微词。王纪宴教授说，究竟是音乐必须具有外部的解说，还是音乐本身会说话？这种交响乐的“谜语”，是我们永远都躲不过的。

随后，王纪宴教授提到了作曲家马勒。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曾是弗洛伊德的精神病人之一。王纪宴教授介绍了马勒的生平经历并指出，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水乳交融、完美无缺地表现了死亡。这段音乐同样存在着“谜语”：它被用于电影《魂断威尼斯》的片尾，有人认为是表达爱情，有人认为是表达死亡。但“爱”与“死”，回到音乐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回事？

最后，王纪宴教授用雅克·巴赞在《黎明中的衰落》的一段话结尾：“如果要在这场把艺术与生活脱钩、为了形式而去欣赏音乐的辩论作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的思维并不是纯粹的，它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反应和后天联想，是无法排除或予以忽视的。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统觉。”

“很久以前曾进行过一项研究，观察懂行的听众在不知道音乐的标题和作曲家的情况下，对一首乐曲如何‘接受’。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音乐家，他们的感受都受到各种各样所谓外在因素的影响。完全漠然被动的听众等于是精神不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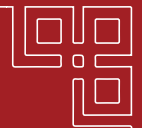
王纪宴教授最后说，事实上，交响乐的“谜语”的正解便是“无解”，因为不同人、不同时期的感受都可能不同。音乐本身具有多面性与包容性，不同于电影、戏剧等更为明确的艺术形式。正如《魂断威尼斯》的最后一幕——塔奇奥在阿森巴赫面向的大海中渐行渐远，究竟是阿森巴赫的幻觉，还是真实出现的场景？这些都是艺术为我们所留下的想象空间。

（撰稿：施朝）





文研回望



“清新风气 一流标准”：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邀访学者项目 第一期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项目第一期圆满结束。第一期邀访学者项目从2016年9月开始，至2017年1月中旬结束。特邀教授樊锦诗、黄进兴、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木山英雄、汪荣祖、包弼德（Peter K. Bol），访问教授祁小春、赵宪章、魏斌、坂元弘子、白谦慎、汲喆，访问学者曹晋、常怀颖、罗祎楠在我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

邀访学者项目是文研院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发挥北京大学的整体优势，立足于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研究，集聚骨干学者，探索学科之基本原理及前沿领域，为学科建设 and 人才培养提供学术支撑；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促进国际交流，争取在重点学术领域实现突破。

海内外学者可经由自主申请并通过遴选的方式成为文研院的邀访学者，邀访时间一般为四个月左右，分为每年的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文研院为邀访学者提供“量身定制”的学术服务，根据学者提出的具体工作计划以及合作交流提议，通过讲座、论坛、读书会、工作坊、研讨会等形式，充分鼓励相关领域学者参与学术交流。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杰出校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教授来访期间，于2016年9月8日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一期“敦煌保护研究三十年”座谈会。彭金章、荣新江、杭侃、孙庆伟等多位著名学者围绕敦煌学研究的的发展、敦煌遗址的保护等话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9月13日，“北大文研讲座”系列活动开启，首讲由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主持，樊锦诗教授主讲“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讲座的在线直播吸引到近万人观看学习。配合本次活动，“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巡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2016年12月5日，樊锦诗教授回访文研院，并赠送敦煌壁画精美复制版，对文研院的发展寄予厚望。

黄进兴，台湾中研院院士、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等。黄进兴教授来访期间，于9月14日、23日，分别作题为“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社会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与“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的演讲。讲座分别由院长邓小南教授、历史系赵世瑜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教授、北大历史系陆扬教授担任评论人。众多师生到场聆听。“北大文研论坛”第三期，黄进兴教授以“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及其衍生的问题”为题主讲。其后于9月19日-21日参加了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会议，并且与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共同担任了文研院揭牌主题研讨会“学术传统与范式转移”圆桌讨论的主讲嘉宾。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 杰出贡献教授，兼任美国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会会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6年9月20日，文研院揭牌仪式之后，阿伯特教授以“作为理念和日常工作的学术”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为北大文研院乃至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镜鉴。

木山英雄，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先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神奈川大学等，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10月15日，恰逢鲁迅先生去世八十周年前夕，木山英雄教授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学术思想座谈会”，追忆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自己多年的学术思想，同鲁迅博物馆研究员等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汪荣祖，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汪荣祖教授来访期间，分别于12月20日、26日作题为“史学的主体性问题”以及“论环球史学”讲座，讲座由历史学系郭卫东、欧阳哲生教授担任主持。22日，汪先生以“当代中国史学走向何方”为题，担任文研论坛主讲。



包弼德 (Peter K. Bol), 美国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地理分析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 致力于唐宋思想史研究。包弼德教授在北大访问期间, 参加了文研论坛“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师说, 我与宋史”, 并且参加了文研院与北大图书馆共同主持的“数字人文”座谈, 以及“流水曲觞: 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2017年1月10日、13日, 包弼德教授作题为“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传记与著述: 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的讲演, 讲演分别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教授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

祁小春,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兼职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王羲之研究。来访期间, 祁小春教授在文研院就“《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进行学术报告, 交流了研究心得; 在雅集系列活动中, 带来了主题为“王羲之的《十七帖》诸问题”的演讲; 在“艺术史研究与发展”恳谈会上, 就文研院与艺术史领域的互动进行了探讨。



赵宪章, 曾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中国艺术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形式美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目前从事“文学图像论”研究。来访期间, 赵宪章教授以“‘文学图像论’臆说”为题在文研院进行了学术交流, 在中文系等单位举办了学术讲演, 参与了文研论坛、雅集等诸多学术活动, 并且与艺术史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魏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古区域史。来访期间, 担任北大文研论坛“‘山中’的六朝史”主题引言人, 就“县始碑考证——史传阙失与地方记忆”进行了交流, 参加了文研院“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恳谈, 并且参与了北京大学中古研究者组织的许多学术活动。



坂元弘子,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董事。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从民族、阶层阶级与性别视角分析中国思想到近代后如何转型的问题。来访期间, 坂元弘子教授以“晚清民国文艺界人士的性别观”、“谈付梓《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岩波新书)之后的省思”为题, 在文研讲座发表讲演。

白谦慎, 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研究工作。来访期间, 参加了文研院组织的“艺术史研究与发展”恳谈及雅集等活动, 并且在文研讲座以“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晚清官员与书法”为题发表讲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淞教授、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主持了讲座。



汲喆,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ALCO) 博士生导师 (社会学与人类学专业)、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 (CEIB) 主任、法国大学研究院 (IUF) 青年院士 (membre junior)。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汉传佛教与社会变迁、宗教教育、宗教全球化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访问期间, 汲喆教授以“作为宗教实践的朝圣——在事实与隐喻之间”、“回到日常与重建当下——禅宗与现代人的自我建构”为题, 在文研讲座发表主题讲演; 并在内部交流中做题为“世俗化理论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报告。

曹晋,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 研究兴趣在于考察思想、知识和科技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访期间, 主持了德国历史学家吕森“历史之思: 面相未来的视角”、图宾根大学傅汉思教授就明朝末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译《坤舆格致》(De re metallica) 在中国的翻译、流传与影响等问题在文研讲座的讲演; 主持了文研院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她本人也围绕“从‘乐律’到‘人间’: 北宋徽宗大晟乐尺和度量衡改革”这一议题在文研院进行了交流。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中国考古学史及铜器范铸工艺研究。来访期间，常怀颖博士主持了文研论坛“良渚与石峁”、“殷墟世界的声色犬马”，并且以“何来金镶玉——早期玉石器矿、作坊的发现与殷墟早期的绿松石镶嵌”为题，进行了内部交流。

罗祎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致力于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路径，研究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生性发展道路。来访期间，罗祎楠博士主持了“中国政治秩序历史研究中的基本理论视角”读书会，参与策划了“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国家秩序”、“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文研论坛，并且在文研院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意识——以北宋神宗时期盐法为例”的报告。



邀访项目结束后，学者们回忆了在文研院的访学经历，作阶段性总结。

赵宪章教授说：“文研院的生活让我结识了学界许多新朋友，特别是来访的各位学者。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爱，每位学者都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让我真正体会到‘学海无涯’、‘山外有山’的含义。以邓小南院长、渠敬东常务副院长为代表的文研院工作团队的勤奋态度让我非常感动。我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既看到一位纯粹的学者对于学术的忠诚，也看到北大对于学校的热爱与奉献，从而对于北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对于当下中国学界和教育界，我们有时有一些怨言，但是，我从这里看到了希望。”

祁小春教授谈到：“作为一名邀访教授，文研院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外地来的学者，大多在住宿、工作地点方面多有不便。文研院在这些方面考虑周到，提供了住宿地

点，还提供了个人工作室，使我宾至如归。我在文研院的一段时间里面，很多学习、交流的活动都能很便利地开展，不熟悉之处也有学生帮忙处理，都要归功于文研院的高情厚谊。在静谧安详的著名学府中，容易让人沉淀下来。有需要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图书资料、电子资源也能够被利用起来。这段时间，有什么需要的资料都能在图书馆查阅，有点滴思绪和想法的时候可以在二院的工作室作札记写文章，闲暇时还可以散步至未名湖畔，路过许多前辈学者工作过和住过的老屋子，在这种氛围中漫步，能够思接千载。我在文研院的这段时间，也逃离了不少尘俗事务，无丝竹之乱耳，这期间我在北大校内校外先后做了多次学术讲座，同时还完成了拙著《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增补修改版）的编写工作。目前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已进行的最后校对，预计春节前后即将付梓问世。这本书的问世，是我在文

研院从事研究工作的成果之一，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我对文研院的一个小小的献礼。”

常怀颖博士总结道：“在文研院驻访的几个月中，是我个人从学生到进入学术研究以来，第一次真切、直观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尊严，第一次能够安静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研究而不被打扰，第一次能够在理想的研究环境中以放松的心态工作，同时还有很多拓宽视野的机会，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启发、互动。从这个角度来讲，文研院的定位模式和运行理念是正确的，是实实在在的，绝非以轰轰烈烈的宣传博名声。”

魏斌教授回忆起在北大、在文研院的点点滴滴。“无数次在燕南园、未名湖周边散步，美景旧事，让人遐想留恋。2016年12月30日傍晚临走前，屈涛兄帮我在二院门口留下最后一张合影，不禁想起二院生活的种种场景。三个多月的时光仿佛转瞬即逝。席慕蓉的诗：

在长长的一生里 为什么

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离开的伤感让人难过。不过，我更愿意将这三个多月的二院生活，当作一个新的起点。相信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静园二院将不仅仅只是心底里一份难忘的记忆，还将成为一个经常回访的学术港湾，一个温暖的家。”

除了表达对文研院的热爱与感谢之情，学者们也积极地对文研院的发展建言献策。

曹晋博士建议，未来的邀访学者在申请时要提出较为详细切实的在文研院的工作计划，希望尽快地让驻访学者相互熟悉起来，有利于跨学科交流。

汲喆教授认为，文研院应该是精神放松的空间，以帮助学者寻回学术上的自由兴趣，希望文研院保持对学者的宽松态度，不必要求限时发表学术成果；文研院可与历届学者保持联系，建立一种俱乐部制度，如普林斯顿一样，让历届学者在文研院网站持续发布自己的学术动态，同时为驻访学者再访北大提供便利。他借用亭林先生的话，表达对文研院良好学术氛围的肯定：“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

罗祎楠博士希望文研院可以一路走下去，尤其在这个中国文科学术界物质日渐丰富而精神有些迷茫的时代。“我相信，文研院可以被写入中国学术历史。我希望在历史书中写到：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在北大建立了一个“驿站”。这个驿站传递着价值信仰和坚守，涵育了思想的创造力，承载着学术旅者纯真友谊，并将学术薪火在这里传递下去。之后在中国，也会有更多人为这个民族、为人类守候着这样的信仰、好奇和不断创新的力量。”

魏斌教授借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中的写景之言为寓，寄语文研院：“结构何迢递，旷望极高深。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

2017年3月1日，第二期邀访学者开始报到，文研院将继续坚持“清新风气、一流标准”，为学者们提供高规格的学术研究环境、高品质的学术交流服务。

（本文于2017年1月20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谢宁）

历史学家包弼德访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哈佛大学副教务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于2017年1月2日至16日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院的特邀教授，包弼德在访问期间主讲了“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传记与著述：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讲座，并作为重要嘉宾参与了“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师说，我与宋史”“流水曲觞：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等学术论坛。

包弼德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198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1997—2002年任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现任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地理分析中心主任等职。他致力于唐

宋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多部，其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及《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均被译成中文出版。后者还为他赢得了哈佛大学2009年度卡波特奖（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2015年，包弼德教授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度荣誉地理学家称号。历史学家出身的包弼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而且在数字化教育方面也有出色的贡献。作为哈佛大学负责教学创新的副教务长，他在推广地理分析的教学与研究和在线教学方面的成果令人瞩目。200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起全校范围的讨论，最终创办哈佛大学地理分析

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并出任首届主任。他主持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项目（Harvard X），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HGIS）项目主任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项目主任等职。

1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七期“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会议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包弼德教授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和李四龙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等参与讨论。

包弼德教授说，他对中国思想史的变迁、包括当代的“国学热”很感兴趣，希望在相关方面与各位学者展开交流。回溯历史，汉唐时期的士人学者是朝廷的一部分，而宋朝的士人学者则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与朝廷保持了一定距离。到了20世纪，国家制度的范围日渐扩大，国家权力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中国学者过分采信了18—19世纪德国学者对“东洋”的看法来理解世界，认为中国没有历史，这是很可悲的。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复兴中华文明伟大文化”，即开始认为国学、儒学是有意义的。包弼德教授继而提出了几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国学有何看法？“国学”和“儒学”是否一样？现

在的“国学”和20世纪初的“国学”是否是同一回事？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将“国学”与“西学”视为一组对立项，那么“西学”又是什么？陈来教授谈到了他所亲历的发端于1990年代、以北大为中心的“国学”研究的学术史，以及他对国学的理解。高全喜教授认为，当下的国学是包裹着传统外衣的现代性的、新的东西。干春松教授将近几年国学热的产生视为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人民对国家信心增长的一个呼应。李四龙教授谈到了他的研究方向，即佛学和域外研究与国学的关系。唐文明教授紧紧围绕包弼德教授的几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陆扬教授表示，知识界和民间的国学热并不互相隔绝，而存在本质上的联系。

1月6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八期“师说，我与宋史”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主持，包弼德教授、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伊佩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邓小南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怎样读书、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陆扬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祎楠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对于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的问题，四位学者给出了不同回答。伊佩霞教授首先回忆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家族史视角引导下由魏晋隋唐史转向宋史的经历，并提到是宋代学者丰富的学术思想与宋代繁荣的城市生活吸引了自己。包弼德教授

也认为自己研究的领域不是仅仅限于宋代，而是跨越 8 到 15 世纪“Middle Period”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他还提到自己对宋代的关注源于对当代中国的反思，特别是从唐宋变革这一基本性变迁把握中国历史的特征。包伟民教授坦言最初选择宋史是“被选择的过程”，自己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想过转向江南地域研究。邓小南教授在回忆自己选择宋史过程的同时，强调宋史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从近代以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宋史研究与这些研究相比不很成体系，一些领域还不够成熟，使当代宋史研究具有较大“再认识”的空间；另一方面，宋史研究者对材料的敏感度、利用程度、开掘程度远远不如先秦、魏晋、隋唐等朝代的学者，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驰骋空间。

随着近年来数据库的建设和普及，宋史学者容易获得并使用更多材料，从而为学者利用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制定学习计划、从何处着手阅读宋代基本典籍成为了宋史方向研究生关心的问题。包弼德教授意识到东西方学者对于阅读原典或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何，再选择相应的基本典籍。在读书时，特别要注意那些在宋代当时就特别有影响力的说法，并仔细思考为何时人重视此种说法；在阅读当代学者著作时也应遵循类似思路。

1 月 7 日，“流水曲觞：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邓小南、包伟民、包弼德、伊佩霞、李华瑞等来自中美两国的二十余位学者相

聚一堂，就各自研究领域与关心议题展开交流。会议由赵冬梅教授主持，邓小南教授致辞。

1 月 10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包弼德教授作题为“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的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主持。

包弼德教授首先澄清什么是人文。在当今职业主义兴起的环境下，大学中的人文学科首当其冲，以至于产生了“人文危机”的提法。包弼德教授认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进步主要依靠专门化、理论与范式的转变以及工具的进步。数字人文技术就是人文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工具。人文学科的研究链条由提出问题、寻找材料、分析、传播四部分组成，包弼德教授举出了大量已有的数字人文成果，如 Markus、Worldmap、CBDB 等，有力地证明了在这一链条的不同部分上，数字人文技术都可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帮助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更为顺利地展开其研究。数字人文技术没有改变人文学科的研究链条，但是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提供了更加强大、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大量数据的分析工具，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视化呈现手段，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在线学习平台。因为这些优势，现在数字人文技术的研究已经在各国兴起，世界上目前已经设立了超过 175 所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1 月 11 日下午，“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会议由邓小南教授主持，包弼德教授与文研院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聂华、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崔海媛、北大数字人文建设发展项目负责人朱本军、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研究员史睿等展开讨论。

包弼德教授介绍了目前数字人文应用的例子：GIS、CBDB 等数据库都是数字人文的成功案例。这些数据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息平台，信息可以永久保存、完善并可以被公众利用。与会者认为，这样数据平台的成功建立不是任何一个独立机构可以承担的，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人文学者与图书馆技术团队的共同努力。

1 月 13 日，“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包弼德教授作题为“传记与著述：12 至 17 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的讲座，讲座由邓小南教授主持，渠敬东教授、伊佩霞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出席，近百人聆听了讲座。

包弼德教授首先指出，他提倡将地方史作为研究思想史的切入点，思想史中知识网络的调查与地方史研究密切相关。对

于古代中国而言，跟思想史有关的历史人物首先都是士人，但这些士人只是出于职务之需而驻在某地，不一定有地方意识。因此，对地方思想史进行研究，如果选取的人物是士人，就要考虑他们是否有代表性。包弼德教授从这些士人的著作与传记开始着手研究。他基于 GIS、CBDB 的分析指出，从唐代到两宋，中国的进士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随后，他以地图的形式展示了各地书院数量与进士数量的关系，并且对宋代士人交游网络的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

访问期间，包弼德教授与校内外师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1 月 16 日，包弼德教授结束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期半个月的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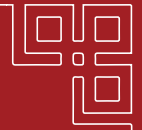
（本文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谢宁）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01

2016-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常怀颖博士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进行内部交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邀访学者赵宪章、祁小春、罗祎楠、魏斌、曹晋参与交流。常怀颖博士以“何来金镶玉——早期玉石器矿、作坊的发现与殷墟早期的绿松石镶嵌”为题，介绍了桐庐方家洲、良渚塘山、张掖马鬃山等玉矿遗址的发现过程，并对玉石矿料的开采、玉石器加工的基本流程进行阐释。

02

2016-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李伯重教授作了题为“停滞与创新——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的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评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数十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讲座。

03

2016-11

“北大文研论坛”第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若干方法与观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阎步克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李隆国副教授、叶炜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周飞舟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张长东博士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论坛。

04

2016-11

2016年11月4日至6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和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05

2016-11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由文研院承办，涵括“出土文献研究的国际视野”、“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战国秦汉简帛研究”和“秦汉魏晋隋唐出土文献研究”四场学术交流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27位学者相继作了精彩发言。

“钱理群教授新著《岁月沧桑》研讨会”在文研院举行，该书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与会，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担任主持。

06

2016-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许宏与何努两位考古学家应文研院之邀，分别就二里头和陶寺两个遗址，进行了一场“最中国”之辩。在这场辩论式讲座中，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数百位师生前往观“战”。

09

2016-11

“未名学者讲座”第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从‘记诵’到‘讲授’——近代中国的读书革命”。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陆胤老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夏晓虹教授担任评议。

10

2016-11

南京大学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赵宪章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以“‘文学图像论’臆说”为题进行了内部交流，中国传媒大学部分师生闻讯前来参与交流和讨论。

11

2016-11

文研院“雅集”系列活动第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黎晟作主题为“图示与功能——南薰殿宋代帝后像的图像分析”的演讲。

14

2016-11

文研院就“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这一议题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恳谈会。本次恳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罗新、叶炜，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王铭铭、田耕，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魏斌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与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等出席会议。

15

2016-11

文研院邀访学者内部交流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武汉大学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魏斌作题为“爨使碑考证”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工作委员韩笑、邀访学者赵宪章、祁小春、罗祎楠、常怀颖、曹晋参加了交流会。

16
2016-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应邀作题为“宋代的榜谕告示”讲座。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出席，数十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讲座。

文研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未名学者讲座”第七期，主题为“西汉竹书《周驯（训）》与黄老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巍老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担任评议。

17
2016-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外文系兼任教授李爽学应邀在文研院作题为“明清西学与文学”的讲座，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主持，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与了讲座研讨。

18
2016-11

文研“雅集”活动第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中央美术学院黄小峰教授带来主题为“宋画的迷雾——对若干传世画作断代的再检讨”的演讲。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出席座谈。

21
2016-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斯（Hans Ulrich Vogel）应邀在文研院作了关于汤若望将阿格里科拉《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翻译为《坤舆格致》的学术讲座。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黄燎宇担任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担任评议，来自德国驻华使馆、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众多学者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文研院就“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这一议题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恳谈会。本次恳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何晋、陈侃理，中文系教授李零、程苏东，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哲学系教授吴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怀颖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与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等出席会议。

22
2016-11

文研院邀请学者内部交流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曹晋博士作题为“‘累黍’与‘指律’：中国古代度量衡思想略论”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工作委员韩笑、邀请学者赵宪章教授、魏斌教授、常怀颖博士参加了交流会。

“未名学者讲座”第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时代的人与机器——维纳论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延伸”。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老师

24
2016-11

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担任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吴国盛教授担任评议。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题为“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以宋代为例”的主题研讨会。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以“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为题发表讲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淞教授担任主持。

29
2016-11

“未名学者讲座”第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日常中的长生——道教的生命技术与现代困境”。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副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担任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担任评议。

02
2016-12

文研院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高峰枫、陆扬、李猛、周飞舟、孙庆伟、邢滔滔、刘云杉、张辉、叶炜、张亚光、韩笑对邀请学者的筛选标准展开了讨论。

文研院“雅集”系列活动第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以“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遭际：从吴大澂说起”为主题展开演讲。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等学者出席。

03
2016-12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应文研院之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研究员，分别就良渚和石峁遗址进行了主题演讲，并在之后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常怀颖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徐天进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党委副书记雷兴山教授和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出席，近百名师生聆听了演讲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日本东京大学准教授佐川英治作了题为“北魏六镇史三题——设置、变质、崩坏”的讲座。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担任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铨、叶炜以及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与活动。

05

2016-12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研院特邀教授樊锦诗回访文研院，并将敦煌壁画复制版赠与文研院，对文研院的发展寄予期望。

06

2016-12

文研院内部讨论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副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进行内部交流，主作题为“世俗化理论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讲演。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建明，邀请学者曹晋、魏斌、赵宪章、祁小春，工作委员韩笑等参与讨论。

“艺术史研究与发展”恳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09 室召开。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祁小春，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凇、刘晨来到文研院，就文研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文研院与艺术史这一领域的合作与互动进行交流与探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出席会议。

07

2016-12

“未名学者讲座”第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考古学的观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副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担任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韩建业教授担任评议。

08

2016-12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论坛以“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度量衡”为主题。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晓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熊长云、美国博敦大学历史学系与亚洲研究系助理教授左娅、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 / 文研院访问学者曹晋分别作主题演讲。计量史专家丘光明教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杨哲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睿、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怀颖等出席本次座谈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五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白谦慎教授以“晚清官员与书法”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09

2016-12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一期和十二期分别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常怀颖博士作题为“殷墟世界的声色犬马”的演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作题为“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刘绪教授、徐天进教授、雷兴山教授、曹大志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徐良高、严志斌、刘煜出席座谈。参加本次论坛的还有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主任梅建军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陕西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陈坤龙副教授、刘思然讲师，国家博物馆单月英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讲师马赛、首都师范大学讲师田天、文研院访问教授祁小春、访问学者曹晋等。

12

2016-12

“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品位之争——罗斯金《现代画家》的创作背景”。北京大学英语系黄淳老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丁宁教授担任评议。

13

2016-12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七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举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青年院士、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以“作为宗教实践的朝圣——在事实与隐喻之间”为题发表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

14

2016-12

文研院召开“数字人文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崔海媛，中心成员罗鹏程与王昊贤，文研院工作委员韩笑、国际合作部李雨澄以及 CBDB 项目管理尹航等出席会议。

15

2016-12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当代世界民族主义者的复兴——基于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以及其他事例的探讨”。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荣休教授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长伟副教授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测绘于浩淼之上——明时代的航行与全球舆图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担任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数十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讲座。

16

2016-12

文研院“雅集”系列活动第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著名乐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纪宴教授带来主题为“交响乐的谜语：从贝多芬到马勒”的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访问教授赵宪章、汲喆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七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青年院士、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以“回到日常与重建当下——禅宗与现代人的自我建构”为题发表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参与讨论。

17

2016-12

文研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共同发起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开幕，近百名中外学者共聚一堂。

18

2016-12

文研院、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主题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常培杰博士，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创始人、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戴志康先生，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邓小南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教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沈语冰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著名艺术家、策展人王纯杰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教授，著名评论家、独立策展人、艺术家王南溟先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教授，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张圣琳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文研院学术委员、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加活动。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四院举行，主题为“‘回光偏向’——西方对《道德经》的挪用与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交流与多重误解”。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中国宗教研究会会长罗柏松（James Robson）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四龙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等参加了讲座。

19

2016-12

文研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东方视角下的西方文明”恳谈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高峰枫、副教授毛亮，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助理教授田耕，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彭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卜天共同出席会议。

20

2016-12

文研院内部讨论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罗祎楠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意识——以北宋神宗时期盐法为例”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访问教授赵宪章、魏斌，访问学者曹晋、常怀颖参加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一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汪荣祖教授作题为“史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卫东教授担任主持。

21

2016-12

“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主题为“税收与国家权力的韧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副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担任评议。

22

2016-12

“当代中国史学走向何方”主题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会议室举行，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文研院特邀教授汪荣祖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元周担任主持。

23

2016-12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百年‘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破坏”。美国佛罗里达艺术史系来国龙教授担任主讲。出席本次论坛并参与研讨的学者有：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咎涛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王军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人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苏荣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委员梁鉴等。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山中’的六朝史”。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魏斌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杨哲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汲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吴真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志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怀颖博士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此次论坛。

25

2016-12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形式的深意——再读《重屏会棋图》”。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淞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朱良志担任主持。龙美术馆副馆长杜京徽、“敏行与迪哲——宋元书画私藏特展”联合策展人谢晓冬、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本次活动。

26

2016-12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一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汪荣祖教授作题为“论环球史学”的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担任主持。

文研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恳谈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副教授咎涛，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段晴、副教授叶少勇，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魏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汲喆，文研院工作委员韩笑共同参加会议。

文研院举办 2016 秋季学期学者总结聚谈暨新年联欢会。

28

2016-12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从《北京折叠》到《不平等的历史》”。雨果奖得主、科幻作家郝景芳担任主讲，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30

2016-12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另一种绘画史——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壁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担任主持，参与讨论的学者有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故宫博物院王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练春海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未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刘晨讲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剑葳助理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文物出版社副总编刘铁巍女士也出席了本次活动。

04

2017-01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Peter Bol）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春松教授、李四龙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等参与讨论。

05

2017-01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校办 103 会议室召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工作委员韩笑代表文研院汇报“胡适与北大”、“蔡元培与北大”、“黄文弼与西北考察团”展览情况。

06

2017-01

“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师说，我与宋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担任主持，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文研院特邀教授包弼德，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伊佩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怎样读书、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祎楠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07

2017-01

“流水曲觞：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邓小南、包伟民、包弼德、伊佩霞、李华瑞等来自中美两国的二十余位学者相聚一堂，就各自研究领域与关心议题展开交流。会议由赵冬梅教授主持，邓小南教授致辞。

09

2017-01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美国凡赛大学中日语系与亚洲研究终身教授、中日语系主任刘皓明教授以“围绕着 allegoria 的中西诗论之争”为题发表演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10

2017-01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举行，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文研院特邀教授包弼德作题为“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的讲座，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女士担任主持。

13

2017-01

文研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会议。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束鸿俊宣布北京大学关于文研院副院长职务任命的决定：聘杨弘博任文研院副院长、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和行政助理参加了会议。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文研院特邀教授包弼德作题为“传记与著述——12 至 17 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的讲座。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佩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出席，近百人聆听了讲座。

16

2017-01

文研院邀请学者项目第一期圆满结束，开启第二期的准备工作。新的年里，文研院将继续坚持“清新风气、一流标准”，为学者们提供高规格的学术研究环境、高品质的学术交流服务。

